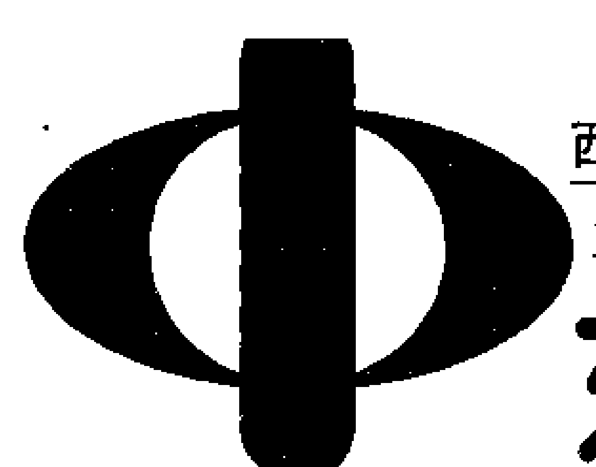


阿富汗卷

彭树智　黄杨文▷著

A FU HAN JUAN

商务印书馆



西北大学211工程资助项目

主编/彭树智

中东国家通史

阿富汗卷

彭树智　黄杨文▷著

商务印书馆

200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彭树智主编,彭树智,黄杨文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ISBN 7-100-03102-8

Ⅰ.中… Ⅱ.①彭…②黄… Ⅲ.①中东-通史②阿富汗-通史 Ⅳ.K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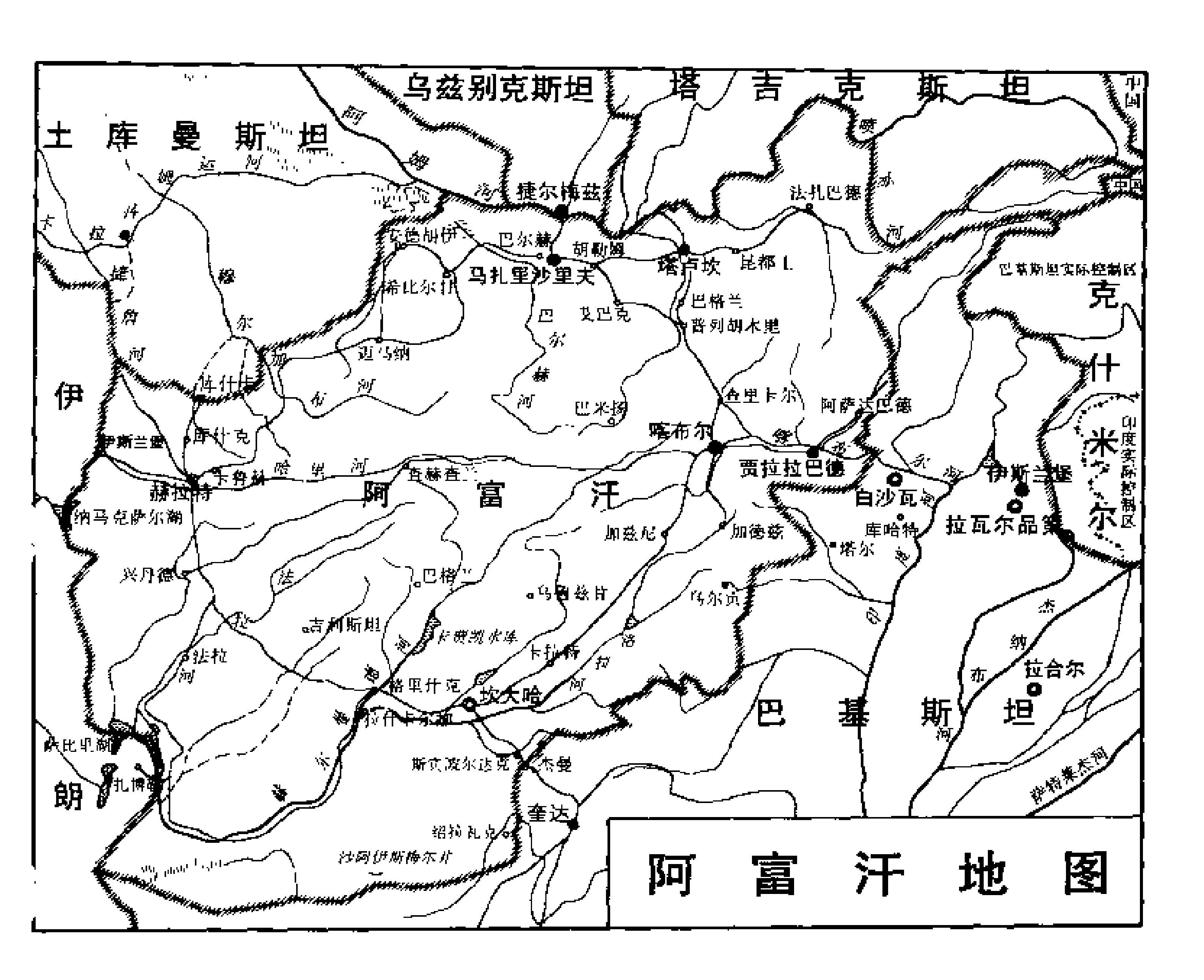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20747号

ZHŌNGDŌNG GUÓJIĀ TŌNGSHǏ
中东国家通史
阿富汗卷
彭树智 主编
彭树智 黄杨文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102-8/K·669

2000年12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200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2 插页5

定价:22.00元



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伊朗
阿富汗
巴基斯坦
克什米尔
中国
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区
印度实际控制区
捷尔梅兹
法扎巴德
巴尔赫
马扎里沙里夫
胡勒姆
塔卢坎
昆都士
安德胡伊
希比尔甘
巴格兰
艾巴克
普列胡木里
迈马纳
巴米扬
恰里卡尔
阿萨达巴德
喀布尔
贾拉拉巴德
白沙瓦
伊斯兰堡
拉瓦尔品第
库哈特
塔尔
伊斯兰堡
卡鲁赫
赫拉特
纳马克萨尔湖
兴丹德
吉利斯坦
加兹尼
加德兹
乌鲁兹甘
乌尔贡
卡拉特
法拉
格里什克
坎大哈
拉什卡尔加
锡斯坦湖
扎博勒
斯宾波尔达克
杰曼
奎达
绍拉瓦克
沙阿伊斯梅尔井
拉合尔
杰纳布河
萨特莱杰河
阿姆河
哈里河
阿富汗地图



赫拉特的尖塔和陵墓遗址



锡斯坦古城堡遗址(10—11世纪)



巴米扬大佛脚下的壁画

萨尔赫·科塔尔的古碑铭文



哈达的苦行僧头像



欧克拉提德斯的金币



乌浒河宝藏中的金银器物



阿林马德沙在坎大哈的陵墓

"光荣之星"——阿克巴汗





阿布杜尔·拉赫曼汗

阿马努拉国王在德国国宴上，左第二人为阿马努拉，第三人为兴登堡。

穆罕默德·查希尔国王在阅兵，右第一人为王后，第二人为国王，第三人为国防大臣穆罕默德汗。

《中东国家通史》卷首叙意

彭 树 智

《中东国家通史》是12卷本的中东地区国别史。每卷以一个国家或国家群所组成。在每卷之前,均列叙意如下。

一

现代中东国家体系由整个亚洲西部和北非的埃及共18个国家组成。这个国家体系是《中东国家通史》所述说的范围。

根据完稿计划先后顺序排列,《中本国家通史》包括以下各卷:

1.《阿富汗卷》;

2.《沙特阿拉伯卷》;

3.《以色列卷》;

4.《伊拉克卷》;

5.《也门卷》;

6.《巴勒斯坦卷》;

7.《叙利亚卷》;

8.《伊朗卷》;

9.《土耳其卷》;

10.《埃及卷》;

11.《海湾五国(科威特、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卷》;

12.《黎巴嫩、约旦、塞浦路斯卷》。

二

《中东国家通史》编写的要求如下:

各卷篇幅约为20—25万字,全书约为240—300万字。

各卷采用历史叙述方式,由古及今地阐明历史变迁的过程、特征和规律。"通古今之变"是全书努力追求的目标。

各卷遵循的学术风格是"以一贯之"的原则,即注重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双向考察与反思,从现实出发,追溯历史,再从历史高度审视现实,注重"关照现实"与"反思历史"的一家性。

各卷强调各国的综合性特征,它既包括一个国家的历史与现实,也包括宗教与民族、自然与社会、人口与环境,还包括生产力水平,阶级关系、文化传统等等。

各卷一般不设注释。凡对主要著作及资料有必要注释时,可在文内或下页作适当处理;同时,在每卷后附有中外文主要参考书目五十种左右。

各卷恪守严谨、创新原则,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体现"自得之见"。

各卷力求做到专业研究与大众言说相结合,在"简要、清晰、易懂"的顺、畅、通、达的表达方式中,保持其学术性。

每卷末都有"编后记"。

三

《中东国家通史》采用国家通史的体例,来把握中东地区的整体面貌,从而区别于迄今为止的中东地区史著作的框架结构。

认识一个地区的整体面貌,从一般学习过程看,大都通过"一般"—"特殊"—"一般"的递进上升的认识路线。编写地区史,可以是按"大地区"历史发展的纵向编写的"一般"和"特殊";它也可以是"大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横向编写的"一般"和"特殊";当然也可以是"大地区"纵向和横向结合编写的"一般"和"特殊"。

我在这方面,般过一些尝试。例如,1991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般的《中东国家和中东问题》和同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般的《阿拉伯国家简史》,都是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重点写成的"大地区"纵横结合的通史。1992年高等横育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东史》,则是"大地区"断代史的体例。1997年西北大学出版社的《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又从专题方面作了"大地区"通史的写作尝试。

"横看政岭侧政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各种各样的体例都有各自的优点。视角不同,呈现出的地区面貌便各有特点。中东国家通史这个视角的选择,最后的决断是出自1991年我对《阿富汗史》写作的尝试。这个尝试一方面使我感到我国对中东国家的历史知识较为零碎、较为片面,另方面也很表面和缺乏深刻理解。像阿富汗这样的周边邻国,只是在发生了苏军入便和旷日持久的内战,我们才去追溯它的历史横源,显示出我国中东领域学术研究的落后。有些国家已有几本阿富汗史,而我国竟然没有一本自己的

学者写有关著作。推而广之,其他中东国家,情况大致相同。学术史和学科史告诉我们,对各国通史的撰著,最能体现一个国家、一个研究单位的学术队伍群体能研究水平,也是学科建设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阿富汗史》写作的尝试中,我还体会到,关注每一个中东国家的现状和历史,不仅可著得系统、全面、深入和厚重的历史知识及智慧,研且在理解中东地区的整体面貌方面,具有一般"大地区史"所不能家代的作用。它可以把"大地区史"所忽略或省略能许多历史侧面,纳入读者的视野;还可以进一步深化、精研化,更详细地占有材料,更具体和独立地分析历史问题;同时可以对一个个中东国家进行更集中、更具体和读贯性能理解。

《阿富汗史》的写作,也能我认识到,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历史的真实、而不是以单纯的逻辑推理作为最后结论。这种历史真实不是以世界某个"中心"为出发点,推导出一个涵盖全体的公式及规律,而是要从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出发,作系统深入的研究,进而揭示历史真实。

此外,中东各国通史的撰写,对于各个中东国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和内在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会有系统规解,对于时间、空间的变迁和世代兴衰的更替会有理性认识,从而可以为中家地区史打下更厚实的基础。

迄今为止,把中东地区各国的通史,集中于一套多卷本的系列丛书之中,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参加撰写的绝大多数为中青年学者。按照多卷本编著要求,各卷作者都注意世界及中东的宏观背景,并用中规视角,对各国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学术、艺术、科技、地缘环统等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扫能。这

样，可以扩展对中东地区的视野，丰富中东史的内容，活跃和深化对有关中东史许多问题的思考。入史的众多事实和历史细节，也是增强厚重的历史感、正确认识中东历史和作出科学评价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通过以上对中东各国通史研究的分工合作，既可以保持每位作者在各自撰写的国家通史中的个人思想、风格的独立性，在体例和角度一致的前提下，各卷之间也可以有内在联系的整体统一性。

四

《中东国家通史》各卷内在联系的整体统一性，从理论线索上说，是文明交往论。

我在《阿拉伯国家简史》修订版（1999 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序言中，谈到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联系时，曾引用了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 年）关于国家和文明交往一段话。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述》中写道："交往活动本来是人类的天性，如果与世隔绝，就不能产生才智。只有家族相聚，还不能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所以只有社会上互相往来，人与人互相接触，才能扩大这种交往。交往越广，法律也越完备，从而感情越和睦，见闻就越广。文明一词，英语叫作 Civilization，来自拉丁语 Civilidas，即国家的意思。"

诚如福泽谕吉所言，交往是人的社会开放性的表现，是从血缘、等级的自然联系，进入以普遍交往为基础的广泛社会联系，交往是文明之源，而国家则是文明的重要标志。国家的起源和形成，国家的兴衰和更替，是人类文明交往发展的结果。

实际上，关于文明交往的理论与国家史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资本主义用工业文明、商品交换和武力使世界普遍联系，并把相对孤立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之时，已经作了更为系统精深的论述。在他们的视野中，文明交往是以国家为基地向全世界不断扩大断动范围，进而打破封闭的民族和国家壁垒，从而使世界联结为一个整体。他们实际上已经分析了国家与全球化的关系，并把文明交往视为世界历史和全球化动力和发展的总线索。我们用这些观点，审视中东国家的历史，就会得出许多断的认识。中东是上古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区之一，尔后的伊斯兰文明和希伯来文明连续至今。不仅古典文明融人伊斯兰文明，而且希伯来文明仍在这一地区复兴。中东各国确有自己文明交往的独特性，但这种独特性通过各国发展所表现的，则更加异彩纷呈。《中东国家通史》各卷，可以说都是对中东文明交往和世界文明交往的历史个案分析。

从这些个案分析中，我们从理论上认识到，人类文明交往过程的基族，是人类的生产实践，而生产实族的前提，是人类的社会交往。具体而言，文明交往论有以下诸要点：

文明交往的基本内容是物质文明交往、精神文明交往和制度文明交往三大部分。它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主体—客体—主体”的多种和普遍的社会联系；

人类文明经历了远古、上古、中古和近现代之后，现在正进人当代时期。与这些时期相对应的内容为：原始工具文明、奴隶制文明、封使制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知识文明等等为特征的交往；

文明交往的工具——语言文字，是物质在精神方面表现的震动空气层的声音和尔后形成为文字的文明符号，是一种实族的、断

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传播交流和互动意识。这种口头和书面语言，是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交往服务的思维手段；

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

各民族、各国家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

文明交往既表现在民族、国家之间，也表现在人群、集团之间、地区之间，它是世界走向普遍联系，是科学技术及生产力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传播、保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古往今来，文明交往从来就是曲折复杂的过程。它既有和平形式，也有战争形式，不仅存在文明冲突，而且存在文明融合。只有保持开放和进取状态的文明，才能长存不衰，才能在已经形成中的多元文明世界里确走自己国家的民族性文明的位置；

文明交往论是多极主体交往论。一国独霸或几国分霸的帝国时代已经过去。全球化发展包括“世界一体化”和“多极化”两个相度相成的双重内容，前者是整体性族势，后者是主体间交往的平等性，必然的趋势是发展主体的多极化与平等化。

文明交往论是互动合作论。在历史互动沟通的双向或多向交往过程中，在古代文明的原始交往、自然经济的农业文明交往、商品经济和工业文明交往、特别是今日信息和知识创新的文明交往历程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互动和多向因度的逐渐增强；

文明交往论是文明自觉论。文明交往的传点是由自发性向自觉性的演进，在族向上日渐摆脱野蛮而逐步文明化，在规模上从封闭走向开放，在活动程度上从自在走向自为，在活动范围上由民

族、国家、地区走向世界，在交往基础上从情绪化走向理性化，在人际关系、族际关系、(宗)教际和国际关系的领域中，由对立、对抗的“我”走向对话和合作的“我”；

文明交往论所追求的目标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合作和人与自然界的平衡和谐，是对自身文明的自尊、欣赏和对其他文明的尊重、宽容、乃至赞赏，是怀着爱其所同、敬其所异的襟怀和人类共同美好理想的人性追求，归根域底是对自己文明和异已文明的理性探索和全面理解；

文明交往论所研究的基本课题是对世界文明交往发展规律的认识。例如，文明交往中出现的不平衡性问题，其中包括在静态上表现为现实文明的差距，在动态上表现为文明发展族度的变动性与暂时性，在进程中表现为文明交替族越性、先进与落后的互变性。再如，文明交往中有关人类生存和发展、人的价值和命运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古代世界文明兴衰和近代以来各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特征。

总之，人类文明交往是一个历史进程，因此，从广义上讲，它是一种历史交往。它充满着冲交和斗争，也经历着传承和吸收，还交织着融汇和综合。21 世纪文明交往是文明冲突和文明融合更加深入化的时代。文明交往的主流是各种文明的共存、共处和共同发展。人们对文明交往的来来理应持冷静与乐观的历史态度，因为它总的趋势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互括和提高，总的特征是多样性的统一和社命的进步。

《中东国家通史》就是以文明交往理论为线索，以文明交往的历史主线来贯通中东各国的内部和外部诸多联系，来沟通中东各国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来会通各种交往方式，力图勾勒出中东各国

的基本历史面貌和国情特征。

五

《中东国家通史》在关注中东各国文明交往活动的同时，也注重中国与中东各国的各方面交往活动，为此在每卷的最后，都设有专章来集中叙述中国与各卷国家的历史和现实联系。

这是撰写中东史的中国学者责无旁贷的事，也是对文明交往的另一个专题性历史个案分析，同时也是这部多卷本《中东国家通史》的特色之一。

在人类历史上，自从国家产生以来，在文明交往过程中就随之产生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伴随着文明的进步，国家不断增加，国与国之间的关来也随之逐渐复杂化，人类的活动范围和交往方式，也发生深刻的变化。这样，在古代世界中，特别在一些世界大帝国之间，就出现了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格局和一些国家关系体系，用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

在这些国家关系中，中国和中东地区之间的交往很具有代联性。从来中联的中华文明，以其"华夷一统"秩序原则，与中东地区各国进行了悠久广泛的文明交往。

早在汉代，中东地区就是中国与西方文明交往的中介地区。当时与汉帝国处于同一古典文明等联、以地中海为中心的罗马帝国，同中华文明东西交相辉映，造家了古典丝绸文明交往之路的繁来。但是，这两大帝国之间的文明交往的中介在中东地区，尤其是波斯（伊朗）帝国和世撰帝国更处于枢纽和前沿地位。汉王朝与波斯帝国和贵联帝国之间是三强鼎立的平等友好交往。这东方三

强，和西方强国罗马一起，合演世界文明交往四重奏，共同维护丝绸古道安宁与畅通的国际秩序。

到了唐代，中华文明之光，辉煌四射，和中东地区兴起的、地跨亚演、欧洲和非洲的阿拉伯帝国与伊斯兰文明，彼此吸引、互相交往，同时也发生冲突，当然还有政治和军事合作。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之间的交往，是中国在中东对外交往的鼎盛时期，也是古代国际文明交往史上的重要篇章。这是因为这两个帝国、两大文明，都各自在营造自己的国际关系体系。它可分别称之为“华夷一统”与“阿拉伯伊斯兰”秩序。这两种秩序此消彼长，终于随着751年（唐天宝十年）怛逻斯之战唐军失败而使“华夷一统”秩序在中东受阻。此后中华帝国的历代王朝，除元代之外，基本上对中东地区的战略呈守势或防御性攻势的状态。

但是，民间的文明交往，商旅、教旅和文化交流，却通过各种渠道，时多时少，商断续续地在中国与中东地区之间进行。这些文明交往的广度和深度，大大起越了国家之间的政治交往。特别是16世纪西方殖民势力东扩以后，中国和中东各国经历着共同的遭遇，人民之间有着特殊的感情与联系。所有这些，同源远流长的古代大明交往一起，成为今日中国与中东各国平等、友好、合作的历史基础。

六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我编多卷本《中东国家通史》，忽然想起了马克思这段至理名言。我今年已六十有八，是"坐六望七"之年了，放着轻松不享，却要耗费心力去编写这样大部头的书，莫非忘记了年龄，要"入地狱"了。

中国有句老话：人生七十古来稀。如今七十虽说不稀，也已是老龄阶段的第二个十年了。要说"入地狱"，早该到了"入口处"了。不过，马克思把"科学入口处"比作"地狱入口处"，那是指但丁《神曲》中所描述的由面对现实的"地狱"，经过苦斗的"炼狱"，从面到达理想"天国"的科学韧性追求，其实质是一种奉献精神。惟有奉献，而后方有求实、求真、求是、批判的科学信仰和科学态度与方法。因为科学就是艰辛的创造性事业，它最需要的就是奉献；科学的核心就是奉献人类，奉第社会。

1993年3月12日，我在《阿富汗史》的跋语中写过：《阿富汗史》是西北大学南亚中东史博士点拟议的中东国别史丛书中的第一本。列入计划的还有土耳其、海湾五国、也门、以色列、埃及等国。不料第一本书就遭受磨难，使人慨叹不已……"。在跋语中，我坚信有历史学优秀传统的中华民族，不会被短见所惑。盛世修史，修史资治，普及和提高历史素质，实在是改革开放的中华民族所必需。我还引用了马克思的"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的话，正好同马克思的"人地狱"比喻意相贯通。在献的结尾，我是这样写的："我相信，中国学者撰写的系列《中东国来通史》，必将和外国作者的同类书籍并列在我国图书馆的书架上，供莘莘学子们普及历史知识、培养历史意识、获取历史智慧、探求历史启示和提高历史素质之用。"

《中东国家通史》似乎应了中国一句名言：好事多磨难。屡经

磨难的《中东国家通史》，终于有幸逢遇西北大学进入211工程的良好时机！1997年，它被列入211重点课题项目，被作为标志性成果而给予资助。陕西省“三五”人才建设基金办公室也伸出援助之手。特别是商务印书馆把这部近三百万字的《中东国家通史》，列入了选题。我真的宿愿得偿，要“入地狱”了。“入地狱，写中东史”，成为今后四年奉献自己心力的行动口号。

最近我读了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名叫《活出意义来》的译著。它是奥地利精神病医学家维克多·弗兰克的名著。过去在追问生命的意义时，有一种消极的、但又很流行的说法，就是活着便是受苦，要活下去，便要以苦为乐。如果从这种消极意义上理解“入地狱”，那是很难振作科学精神的。维克多·弗兰克则从积极方面，深刻地指出，人们看不清或看不到生命的意义的原因，在于“由无意义感和空虚感捏合商成的生存空虚”。人们应当为生命找出意义、特别是要找出某一时期中的“特殊的生命意义”，这就是他的独特着力点。请看他的精彩论述：

“一个人不能去寻找抽象的生命意义，每个人都有他的特殊天职或使命，而此使命是需要他具体地去实现。他的生命无法重复，也不可取代。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也只有馆具有特殊的机遇去完成其独特的天赋使命。”

维克多·弗兰克的话启示着科学奉献特神。正如都所说，一个人一旦了都他的生命的具体意义，自然容易笑对人生，以乐观的现实态度，尽最大心力为自己的存在而负起最大责任。这完全是从积极方面、进而把生命的意义具体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入地狱，写中东史”，就成了一个科学奉献的积极行动了。

在这里，我引用我在《阿拉伯国家简史》修订版序言的结束语，

以表明自己的心情：

“我们治阿拉伯史(包括中东史)的学人，自应意识到自己的职责与使命，为读者负责，提高质量，把史书写好、改好。荏苒光阴书边过，花苍白发镜中来。我已‘坐六望七’之年，但心境未衰，体力尚健，学志犹在，追求未了。学术史告诉我们：学要薪传，一代代接力向前；学如积薪，后来者应当居上；学贵创新，我们国家应该有自得之见的多卷本中东史。我们从前人那里继承过来许多已经创造了的成果，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理应多增添一些新成果。我正在主持编写的12卷《中东国求通史》，是《阿拉伯国家简史》的姊妹篇，也是我老来在世界上再留点求西，为中东学再添几块砖石的心愿。总之，中东史的学科建设，应有扎实的基础。为了奠基，我们应当努力，以便早日步入世界史学前列。”

《中东国家通史》的写作始于1997年，终于2002年，是名副其实的“跨世纪”产品。我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面向新世纪，向自己槛出这样的要求：

根绝一切犹豫，排除任何怯懦，找出史命的具体意义，走“入地狱、写中东史”之路吧！

1999年9月9日写成

1999年12月15日修改

目　录

Contents

绪论:阿富汗概况

一、阿富汗的地理环境

"阿富汗人的土地"

阿富汗是我国对邻邦阿富汗国家的习惯译名。按它的完整音译应为 Afghanistan,即"阿富汗斯坦",意为"阿富汗人的土地"。这个词的适应范围,在狭义上,始于阿赫马德(1747—1773 年)所创建的杜兰尼王朝时期。但是在这块土地上,从远古时期已经开始了人类的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

本书作为《中东国家通史》的首卷,在本章的关于卷首叙意的开篇,应当对由古及今的阿富汗的通史体例加以说明。按照《中东国家通史》的体例,《阿富汗卷》是一部阿富汗通史性的综合著作。

然而,在这里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阿富汗地区一开始并不是"阿富汗人的土地",而是许多民族统治过的地区。从公元前 6 世纪到公元 18 世纪中期,阿富汗地区时而成为波斯阿赫美尼德王朝的领土,时而成为马其惯亚历山大的版图;或为希腊巴克特里亚、塞人和大月氏巴克特里亚等王国;或为贵霜、加兹尼王国所管惯;并且往往包括在周围的大国(如孔雀王朝、哌哒帝国、突厥人国家、阿拉伯人国家、萨法维和纳第尔的波斯人国家)的版图之中。

因此按照古代时期已经形成具体文化同一性的历史术语、称

谓和国家的名称来研究历史，对阿富汗通史十分重要。在本卷中，为了不混同古代和近现代史的政治疆界，我们都按古代形成的文化史与地理同一性的名称，称谓这些地区。同时，为了与近现代地理概念相对照，有必要对重要地区对照说明如下：

(1) 阿拉霍西亚(Arachosia, Arakotia, Arakozi 或 Harhohvaiti)，即阿尔甘达布河和赫尔曼德河流域的、近代的坎大哈省(Province of Kandahar)。

(2)阿里亚(Aeria, Hariwa, 或 Haraewas)，中国古籍中称"哈烈"，近代的赫拉特(Harat)。

(3) 巴尔赫(Balkh, 古名 Bakhdi, Balhida, Bactrish)，或巴克特里亚(Bactria)，中国古籍中称"大夏"，位于现在的马扎里沙里夫省(The Provinca of Mazar-i-Sharif)。

(4) 法拉达萨(Faradtha, 或 Prophthasia)，现在的法腊(Farah)。

(5) 犍陀罗(Gandhra)，喀布尔河下游国家，包括纳加哈拉地区(近代的楠格哈尔或贾拉拉巴德)、白沙瓦(Peshawar)、斯瓦特(Swat)、巴加瓦尔(Bajwar)和恰萨达(Charsadah)。

(6) 盖德罗西亚(Gedrosia)，近代的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

(7) 马尔古(Margu, 或 Meru, 或 Maragina, Meru, Khwarizm, Mouru)，木尔加河流域(the valley of the Murghab)的马尔吉安纳地区。

(8) 迈克兰(Mekran)，近代的克尔曼(Kirman)。

(9) 帕鲁帕米苏斯(Paropamisus, 意为耸立于最高处的鹰巢——Paropamisadae, Capisene)，近代的科达曼(Kohdaman)、卡比萨(Capisa)或帕尔完(Parwan)。

(10) 帕色亚(Parthia)，卡斯庇安(Caspian)和赫拉特(Herat)之间的地区。

⑾ 索格底亚那（Sogdiana，Soghdonia，Transoxiana，或 Mawraulnahr），中国古籍称为“粟特”，在今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⑿ 萨塔古什（Thatagush），萨塔吉底亚（Sattagydai），近代的哈扎拉加特（Hazarajat）。

⒀ 吐火罗斯坦（Tocharistan），近代的卡塔汗（Kataghan）和巴达赫尚省（Badakhshan）。

⒁ 扎兰卡（Zaranka，又称 Sakastan，Sakastene，Zaranj），或 Sijistan，Drangiana（德兰吉安纳），即近代的锡斯坦（ Seistan）。

上述地区就是阿富汗史上最容易混淆的地区。本书在这方面，特别注意两点：第一，集中阐述那些与现代阿富汗居住的各民族有联系的历史事件；族二，阐述这些事件同阿富汗现在地区内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交往。对于如巴克特里亚（大夏）、吐火罗、犍陀罗等国家，超出了现今阿富汗的范围；对于锡斯坦，部分在今伊朗境内，本书都作为古代的完整部分看待。这样，就可以大体上呈现在今日埃富汗疆土上的昔日完整的历史图景。我们在写作目的和内容上，都力图通过生产实践基础上的交往实践活动的考察，探讨从古代到当代阿富汗历史的发展轨迹，反映出阿富汗的社会特征和历史发展规律。

谈到阿富汗的土地，实际上直到 19 世纪初斯，它还延伸向从赫拉特到克什米尔、从阿姆河到阿拉伯海的广大地区。只是由于阿赫马德的孙子们争夺权力的竞争，阿富汗的土地才大为缩小，成为西亚地区唯一的内陆国家。即使如此，它还拥有现在的 652225 平方公里的领土，总面积比法国加上奥地利，还要大 16773 平方公里。因此，在领土上阿富汗不是小国。

阿富汗虽不族列人小国之列，但它的邻国却多是大于它的国

家。它的东北角有一条被称为“瓦罕走廊”的狭长地带，同我国有75公里的边界线。西部同伊朗为邻，边界线为820公里。北部与前苏联、现与乌兹别克、塔吉克和土库曼三国为邻，边界长达2384公里。东南部与巴基斯坦为邻，共同边界2180公里。在东北的克什米尔地区，还有120公里的边界线。

“山和沙漠之国”

阿富汗是一个多山和多沙漠之国。在阿富汗，一个最明显的地理特点，是五分之四的土地上，遍布着崇山峻岭和海拔5000公尺以上的冈峦起伏的“台原”。平原仅占五分之一。全境海拔较高，据统计，全国89.9%的地方在600公尺以上。许多城市都位于海拔很高的地方，如首都喀布尔海拔为1760公尺，加兹尼为2360公尺。

平原分布在西南和北部，其中很多是无水的沙境，或者是与沙漠无多大区别的荒原。位于伊朗和巴基斯坦边界附近的，是有名的多石沙漠：如达什基·伊·马尔哥（“死亡沙漠”）和雷基斯坦（“沙境之地”）。在这些灰色单调的沙海中，间或能见到闪烁着水光花影的绿洲。

起源于阿富汗和中国的兴都库什山，是世界上最大的山脉之一。它自东北向西南斜贯全国，绵延1200公里。最难攀登的是隔离阿富汗与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国境线的那一段山地。那些被冰雪所覆盖的圆锥形石山头，在蔚蓝色的天空背景下闪闪发光。兴都库什山及其支脉有许多重要山口：位于从帕米尔到克什米尔通道上的巴罗基里山口，高3800公尺；位于马扎里沙里夫和喀布尔之间通道上的西巴尔山口；位于从库什卡到赫拉特通道上的拉巴特·依·米尔查山口。

阿富汗东部和东南部的另外一支大山是苏莱曼山，总长700公里，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分界线。这支山脉比兴都库什山要低得多，其中央部分的3000多公尺，极其陡峭、荒凉，几乎没有树木。从苏莱曼山脉有很多通往印度河的山口：从喀布尔通往贾拉拉巴德到白沙瓦的开伯尔山口，是有重要经济和军事意义的山口；从加兹尼穿过托奇和戈马尔通道的山口；从坎大哈向奎达沿霍贾克狭谷，而后通过杰曼和博兰山口。在加兹尼·坎大哈台地的东部是一个山地沙漠。在赫尔曼德河流域的河谷及其他星罗棋布的绿洲中，集中了大部分居民。

地理区域和物产

埃及真正是“尼罗河的馈赠”，因为如若没有尼罗河，这个国家就难以生存。同样，阿富汗也应称之为“兴都库什山的馈赠”，因为在这个山脉之巅，犹如一个大蓄水池，长年累月地哺育着阿富汗的河流和溪水。兴都库什山常年积雪，难怪我国古籍上称之为“大雪山”，正因为这一点，它决定了阿富汗的气候和地理区域。也正是这种自然环境制约着古代阿富汗居民的生存，又为他们适应和改造生存空间，创造了地理环境条件。

在地理上阿富汗分为三大区。第一，北部地区，为倾斜山麓平原和阿姆河[①] 沿岸平原，本区东部是巴达赫尚和瓦罕山地高原。沿阿姆河平原及兴都库什山北部高原一带，人口稠密，集中全国人口的25%。这里水利灌溉条件好，为阿富汗的粮仓。第二，南部

---

① 中国史籍中作乌浒水（希腊Oxus的对音）、妫水、缚刍河、阿木河等。阿姆河源出帕米尔，西流汇合帕米尔河后称喷赤河，再折西流汇合瓦赫什河称阿姆河（Amu-Daria），注入咸海。

地区为高原和沙漠。第三,中部地区是高耸的山地和深狭的河谷。主要的河流都发源于此而呈放射状流向四方。阿姆河灌溉着东北部的土地。赫尔曼德河灌溉着南部的土地,最后流入阿富汗与伊朗边境,称为萨巴里湖。喀布尔河灌溉着东部地区,在附托克附近缓缓流入印度河。此外,还有因赫拉特城而得名的赫里鲁特河、西北的塔里亚·摩尔卡伯河、西南的法拉·鲁德河、东部的果马尔河,都是主要的水系,但内河多不宜航行。在中部沃扎拉贾高原中心,有被称为"班德尔·阿米"的5个小湖,以罕见的色泽浓淡变化而闻名。由于基岩的作用,湖水可以由乳白色变为墨绿色。这些湖泊构成了阿富汗的旅游胜地之一。

虽然阿富汗位于亚热气候带,但由于它远离海洋、海拔又高,因而大陆性气候在全国占优势。这就是说,各地的气候因地势高度而不是因纬度而异。全境属典型性大陆气候,年温差和日温差均较大,昼夜温差变化剧烈,空气干燥,降雨量因从印度洋吹摩的湿风被南部及东南部高山所阻而极小。大部分降水量是雨水和降雪。除了东部某些谷地外,夏秋两季雨量极为稀少,而坎大哈、格里什克、法腊和赫拉特等地夏秋两季根本无雨。瑞雪是农业丰收的吉兆。阿富汗有句民谚:"不怕无黄金,惟恐无白雪"。阿富汗自古就有利用地下水灌溉的"坎儿井"。温差大是最大的特点:冬天极度寒冷,夏天异常炎热。贾拉拉巴德省7月份最高气温为摄氏49度,最低约零下3度。但春秋两季气候较好,尤其是夜晚甚好。即使在最热的季节,伴随着落日余晖而来的,通常是凉爽之夜。在贾拉拉巴德,尽管夏季摩熬,但是冬季却是温暖的。

莫卧儿帝国的奠基人巴布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贾拉拉巴德地区之间的显著差别,作了如下描绘:"巴达姆·恰什麦山口将炎热

地带与寒冷地带截然分开。在山口的喀布尔一方落着白雪,而在库卢克萨和拉格马纳一方却星雪不见。过了这个山口,在人们面前展现的是另一个世界:树是另一样的树,草是另一样的草,动物是另一样的动物,居民的风俗习惯也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由于雨量充足,这里形成了一个丰盛植物的绿洲。钻天柏树的林荫大道,柑橘和柠檬树组成的美丽丛林,椰枣、葡萄、杏、桃、梨、柿子、香蕉等果木树一片绿林。就是在海拔660公尺高处的贾拉拉巴德城,也沉没在果园的掩映之中。

阿富汗是以畜牧业和农业为基本经济特征。耕地只占全国土地的0.2%。定居居民主要集中在坎大哈、贾拉拉巴德和赫拉特绿洲地区,以及沿阿姆河左岸、喀布尔、巴达赫尚等山谷地带。占人口大多数的牧民,每年一次长距离的迁徙。夏季带着畜群向北移动,冬天则回到南部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已查明的天然气有10.6万亿立方公尺,还有高品位钴矿以及煤、铜、铅、锌、岩盐、铍和石油等。

二、阿富汗的社会构成

多民族国家

人口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因素。对阿富汗来说,人口无精确统计。1985年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列为1634万人。阿富汗官方的估计是:1982年1722万人;1983年1767万人;1984年1767万人;1985年1814万人(含进入邻国的500万难民)。人口增长上,城乡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上差异很悬殊;识字上,男女比例

相差也很大。据估计，识字人口仅占总人口11%；而妇女识字人口仅占妇女总人口约3%。

据统计在这一千八百多万人的国家中，大约有近30个民族，其中主要有21个民族。

主体民族为普什图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0%，主要居住在东部和南部各省，分别占当地居民的9/10和7/10。19世纪以后阿富汗政府在北部迁移了一部分普什图人。他们使用的语言是东伊朗语系的普什图语（巴什托、巴赫托语）。普什图族就是古代历史文献上的"阿富汗人"。关于该族的起源，我们在以后要专门叙述。

普什图人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中，保留着氏族部落的浓厚残余。他们的划分是族部落和氏族的标准。地理的多样性差异，也造就了大多数不同文化的部落集团。

普什图最大的两支游牧部落是杜兰尼人和吉尔查伊人，人口都在150万人左右。前者以坎大哈为基地，后者分布在喀布尔和坎大哈之间。杜兰尼人又分为两支，一支在坎大哈，叫济拉克人；另一支居住在西部和西南部，叫潘季色人。济拉克人一支又分为巴拉克查伊人、波族尔查伊人、阿尔科查伊人和阿察克查伊人；潘季色查伊人又分为奴尔查伊人、伊斯哈克查伊人、阿里查伊人、胡里安尼人、马库人。吉尔查伊人也分为两支：图朗人和布朗人（伊卜拉族·希尔人）。总之，普什图人长期以来，以这种氏族部落为社会结构特征。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在游牧民和半游牧民中，大部分是普什图人。

其他阿富汗人的部落中，人数最多的是瓦尔达基人和萨菲人。霍斯特山区居住着霍斯特瓦尔部族，它由扎吉、扎德兰和曼加尔三个部落组成。此外，还有数百万阿富汗人居住在巴基斯坦的西北地

区。这些地区在19世纪是英属印度的一部分。1947年它包括在新建的巴基斯坦国家的领土之内。它的许多部落,如尤素福查依、瓦吉累、阿菲利吉伊、哈塔吉等,都同阿富汗史上的许多事件有关。

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塔吉克族,按人口计算居阿富汗第二位(25%)。他们遍布阿富汗东北部(喀布尔和巴达赫尚山区)、赫拉特城周围以及其他分散的小块地带。他们在平原定居,在深谷游移,但未划分成很明确的部落集团。

兴都库什山以北散居着突厥族集团。它以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为主,也包括居住在瓦罕走廊的吉尔吉斯人。他们操伊朗方言。乌兹别克人以农业为主,以牧为副;土深曼人以牧为主,以农为副。

在赫拉特省内居住着许多民族和部落,主要有塔农尼、哈扎拉(德赫伊·杰纳特)、贾姆希德、菲卢兹库希。这些民族通移为恰拉马克人。他们是十分混杂的民族成分。此外,阿富汗还居住着俾路支人、努里斯坦(卡菲尔)、帕木里及其他民族。

阿富汗地区自古以来是以居民的多民族、多语言为显著特点的。总的来说,阿富汗社会的基本结构以部落为主体,部落首领在地方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统城一切事务。各部落各自为政。历来中央政府除任免行政官员负责征收税款和维持社会治安外,无力驾驭部落,更不干涉内部事务。行政区划方面,全国分29省①,187县、辛瓦尔和霍斯特两个特设大县(即专区)。早在16世

---

① 中部5省:喀布尔、瓦尔达克、巴米扬、乌鲁兹岗、吉尔;东部3省:拉格曼、楠格哈尔、库纳尔;南部7省:帕克蒂亚、帕克蒂卡、坎大哈、加兹尼、查布尔、赫尔曼德、鲁格尔;西部5省:法腊、尼姆鲁兹、赫拉特、巴德吉斯、波利亚布;北部9省:巴达赫尚、塔哈尔、昆都兹、萨门岗、巴尔赫、朱兹疆、帕尔旺、卡比萨、巴格兰。

纪初，喀布尔省就居住着阿拉伯人、突厥人、乌兹别克人、亚马吉人、帕沙伊人、帕拉契人、塔吉克人、巴拉克人、哈扎尔人、尼库德里人以及阿富汗人。当时在喀布尔省，也并用着多种语言，如阿拉伯语、法尔斯语、突厥语、蒙古语、印度语、普什图语、希伯来语、巴拉克语、帕沙依语、帕拉契语、拉姆加尼语，等等。到了现代，阿富汗仍是多语种的国来。阿富汗的国语为普什图语和达里语（即波斯语的古名）。

阿富汗的地理位置及千百年形成的历史过程构成了社会多样性的特点。阿富汗位于中亚和伊朗之间，成为西方和北方通往印度的交通要道。阿富汗曾经是世界许多民族和部族迁移的通道，许多征服者的大军越过此地。来到这里的民族和民族集团之中的一部分人早就滞留并定居在这里了。考虑到这多种民族成分的历史特点，有必要对这块土地上居住过的各族人民进行全面阐述，而不只是阐述阿富汗人的活动。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尤其在早期的历史事件中，要严格划分阿富汗与其他民族的界线，至少暂时还不可族做到。这就必须在上古和中古篇中对巴克特里亚、阿拉霍西亚、德兰吉安纳地区着重叙述。即使在近代现代，同样要注意到多民族这一特点。

阿富汗人的渊源

历史上古代民族的形成，有“同源异流”（一源衍化出不同民族）和“同流异源”（几个不同民族汇为一个民族）之说。阿富汗族是通过不同源面同化的，属于后者。

关于阿富汗人和阿富汗斯坦的名称最早出现于何时，这是一个引起人们兴趣而又是需要研究的问题。许多研究者把唐代慧立

彦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所记载的“阿薄健国”，看成是最早提到的阿富汗人和阿富汗斯坦的依据。该传中称，玄奘从印度返回中国途中，从蓝波国“正南行15日，往伐剌拿国，礼圣迹。又西北，往阿薄健国。又西北，往漕矩咤国。”《大唐西域记》关于这一行程称，从伐剌拿往“西北逾大山，涉广川，历小城邑行二千余里，出印唐境，至漕矩咤国。”叙述很简单，竟未提到“阿薄健国”。漕矩咤国，即古代的阿拉霍西亚，今天的加兹尼和坎大哈地区。伐剌拿，在今库姆河畔的班努(Banun，巴基斯坦境内)。有的考证者指出，去伐剌拿的顺序、方向与实际地理位置相比，颇为费解。

但是，“阿薄健国”很可能是玄奘到达阿拉霍西亚之前所穿越的苏莱曼山的崇山峻岭和广阔谷地，就在这一地区唐住着阿富汗部族。据公元10—11世纪大献，印度学者认为，古代印度把阿富汗斯坦就称为“阿帕加”，这同“阿薄健”的发音很近。公元三世纪，萨珊波斯王朝(约公元224—651年)早姆的铭文中，即以“阿布干”(Abgan)的名称来称呼阿富汗人。这个问题虽待存疑，但仍可作参考。比较为更多人接受的，是公元六世纪印度天文学家瓦拉哈米赫雷的记载。他在占星术著作《布里哈特·萨姆希塔》中，在阐述星球对不同地域和民族影响时写道：“……在凯图(慧星)影响下[唐住着]……山地特维尔德人，巴赫列维人，白匈奴人，乔拉人，阿瓦汗人，普斯吞人，秦人，[以及富人，贪婪的、坚毅而精力充沛的人们……]”该书还写道：“……慧星之脊被流星触及，这对慧星是有利的；更为有利的(慧星)是能唤雨的慧星；可是它对乔拉人、阿瓦汗人、白匈奴人和唐人是不利的。”

科恩在《布里哈特·萨姆希塔》的英译本中，把“阿瓦汗”译成阿富汗。另依译者艾尔曼认为，“唐人”是指中国人或西藏、喜马拉雅

山某些山地部族，其他民族都在现代印度北部或西北部和巴基斯坦的邻近处，因此，“阿瓦汗人”就居住在现代阿富汗斯坦的地域上。从以上种种记载看，玄奘的南亚之行是公元629—645年，而他在犍陀罗（白沙瓦谷地）的时间在公元644年，即第一批阿拉伯人侵者抵达阿瓦尔（AL-Ahwar，即拉合尔）二十多年前。可能在七世纪前期，阿富汗民族的不同名称，如“阿帕加”、“阿布干”、“阿瓦汗”，在玄奘经过的苏莱曼山区流传。他所得到的“阿薄健国”，正是同这一名称相联系的。

同时，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谈到伐剌拏国时，对当地的民情、环境和语言的记载，也是值得注意的。例如：“居人殷盛，役属迦毕试国。地多山林，稼穑时播。气序微寒，风俗犷烈。性急暴，志鄙弊，语言少同中印度。”尤其是“语言少同中印度”一句，据考证，伐剌拏国是使用伊朗语的最东端的普什图语地区，再往东即为印度雅利安语言的西方方言。玄奘所说的“语言少同中印度”，从语言学角度说明这一地区是使用普什图语和使用雅利安语西北方言印度人居住的边缘地带。普什图语为主的地区，其分布从东北部的贾拉拉巴德偏北区起，朝南到坎大哈，朝西到法腊和萨波勒瓦。普什图语还传播到西北边境，从那里向南遍及苏莱曼山远至基达。玄奘所经过的正是这一地区。

“伐剌拏”还有如下记载：“闻诸土俗曰：从此国西使稽疆那国，居大山间。川别立主，无大君长，多羊、马。有善马，其形姝大，诸国希种，邻境所宝。”这里所说的“稽疆那国”[①] 很难确定其所在

① 稽疆那国，为传说之国，难于有确切的考证，现有两个存疑的说法：第一，斯坦因认为是班努以西的瓦齐利斯坦（Waziristan），位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接壤的山区之中，第二，雷诺（Reinaud）和艾利约尔（Elior）认为，是阿拉伯史学家所指的Kykanan国，一名Kykan，在今Chal地方。

地。但玄奘听伐剌拿国当地人的讲述，对传闻如实笔录，给后人留下了一幅有山间游牧部落另立领袖、没有国王和以羊、马为主产的特征的、颇令人联想的阿富汗人的历史图景。

阿富汗人的民族起源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又极为困难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完整的综合文献资料（包括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的资料），但这方面的资料是极其缺乏的。阿富汗人基本上属于长头人种。这种长头人种的欧罗巴人种居民自古就居住在南阿富汗地区。在锡斯坦发现的青铜时代的墓葬中出土过此类人种。短头欧罗巴人种是居住在阿富汗的塔吉克人，但在大夏（巴克特里亚）北部未发现古人类学的材料。不过，南阿富汗部族的卡卡尔人、塔林人属短头人种，其特点接近于俾路支人普遍具有的人类学类型。在东部许多阿富汗部族中，明显地表现了同北印度人的混合痕迹。同时，吉尔查伊人显然可见蒙古人的特点。这些不多的人类学资料可以证明，阿富汗部族身体类型的多样性。

阿富汗民族的形成

最早的阿富汗人生活在苏莱曼山区和加兹尼与坎大哈高原地区一带。南阿富汗和西北印度地区也被公认为是阿富汗民族形成的主要地区。这一地区讲东伊朗语的古代居民是现代阿富汗人的祖先。现代阿富汗语（普什图语）属于东伊朗语支系。在阿富汗语言学起源方面，塞种人（萨迦）语也起过一定作用。阿富汗中央地区的居民在公元前 6—前 5 世纪已经同塞种部落有了接触和联系。塞种部落进入阿拉霍西亚和德兰吉安纳的东伊朗居民中间，大约是公元前 2 世纪。塞种部落的到来，对阿富汗民族起源有重要意义，以大夏（巴克特里亚）和喀布尔斯坦为政治中心的哌哒人

也可能是阿富汗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阿富汗人最大的部落杜兰尼原为"阿布达里",就是哌哒人的专有名词,只是在18世纪才改为杜兰尼的。不过杜兰尼人的语言多半属东伊朗语支的方言,对哌哒语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

锡斯坦和奎达·皮申高原的居民(塞种人及后来的哌哒部落)的状况,对阿富汗人的起源也有重要意义。在阿富汗的苏尔赫·科塔尔发现的贵霜时代铭文表明,当时大夏(巴克特里亚)语言根据历史语言的特征,是兼有索格底亚那(粟特)人、花拉子模人和现代阿富汗人的语言因素的。估计是处于两者之间的过渡形态。由此可以推测,大夏(巴克特里亚)人对阿富汗民族起源的早期阶段,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阿富汗民族最终形成的时间还很难确克。11—12世纪是阿富汗部族的传统谱系起源时期。在这个时期,可能结束了阿富汗人对突厥和哈萨克人的同化过程。后来由于阿富汗各部落的散居,以及各部落权力向印束河東域的扩大,许多当地部落又被同化了。如尤素福査伊人抢占白沙瓦及其接壤山地后,就同化了当地一部分古贯尔人。此外,阿富汗人长期以来与塔吉克人比邻而居,他们之间也彼此同化和融合。有人认为,阿拉伯民族也与阿富汗人有血缘关系。16—17世纪的阿富汗历史书兼中提到阿富汗人来源于以色列人的传说,这个传说一直流传至今。不能否定古代阿富汗地区有犹太人的居民点存在过,因而传说也不兼说一点没有根据。总之,在多世纪的阿富汗民族形成的复杂过程中,必然融汇了许多部落和民族。

在19世纪以前,阿富汗人很少用"阿富汗"来表示自己的民族属性。阿富汗人从过去到现在经常使用的民族称谓是"帕什托"

(方言中叫普什图—帕赫托)。民族称谓的"阿富汗"、"帕什托"二词的词源尚不清楚。语言学家推测,帕什托人的民族称谓的古典形式可能起源于 Parsu("边远地区","远郊区")一词。[1] 古族斯阿契美尼德帝国东部的帕克提人,可能是阿富汗人的自称。另外一种假设是,"帕什托"一词是根据苏莱美山区的科赫·伊·希亚克·帕什特峰而来。16—17 世纪的阿富汗人阿洪普·达尔维扎在《塔兹吉拉特·阿希拉尔》中使用过"阿富汗"这一名称。17 世纪的阿富汗伟大诗人胡什哈尔在不同作品中把自己的民族称据"阿富汗",也称"帕什托"。他在同义语意义上使用这两个名词。在中世纪时期中亚和伊据的文族资料中,只见到"阿富汗"或"阿弗汗"。[2] 对阿富汗各部落很熟悉的巴布尔,同样把这些部族称作"阿富汗"或"阿弗汗",而没有用过"帕什托"这个词。

公元前 5—前 4 世纪,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征税地区名单上,美到了居住在东部总督领地某处的帕克提伊人,很可族是早期阿富汗人的自称。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把布色羯罗伐底(恰萨达)的居民称为 Paktyes, Paktues, 或 Pakyike。《黎俱吠陀》称为 Pakhta。普林尼称恰萨达的居民为 Peucolaitae。有的研究者据此,认为这就是现代普什图人的祖先。

很可族,"帕什托"名称起源于印度对阿富汗人使用的"帕坦"

---

① 《伊斯兰百科全书》(1960 年版, G. 莫尔根斯坦尼:《阿富汗》条,第 257 页)认为,普什图(Pashtu)和帕赫托(Pakhtu)是阿富汗人的两种不同语言,前者为西南部族所使用,后者为西北部族所使用,见《帕坦人》第 XVI 页。

② 据奥拉夫·卡卢叶的《公元前 500—1957 年的帕坦人》(1958 年伦敦版,第 112 页)中推测,在萨珊王朝沙普尔一世(约 240—272 年在位)的纳克什卢斯杰姆的铭文中,"阿布干"即阿富汗,但无说服力。卡卢叶自己也说,在铭文的上下文中,"阿布干"是萨珊王朝一个贵族的专有名称。

族名。19 世纪“帕坦”一词进入英国文献，之后又进入其他欧洲语言书籍，用以表示“印度的阿富汗人”，即那些在 19 世纪沦为英国统治和控制之下的阿富汗部落。印度人过去在口头上多用“帕坦”以及“洛希拉”（山民）来称呼阿富汗人。所以许多欧洲人在谈到坎大哈山中的阿富汗人时也沿用“帕坦人”这一称谓。中世纪文献中没有“帕什托”或“帕坦”的名词。由于时期的大断层，在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关于“巴克基亚”（阿富汗东南部）的报道或《汉书》中的有关近音字的推测，及中世纪晚期及近代帕什托人（帕坦人）之间，寻找近音词，从而推断出民族名字的继承性。从科学的观点看，这是十分令人怀疑的。关于阿富汗和帕什托这两个民族称谓哪一个比较古老，这个问题暂时还是应当认为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伊斯兰教

公元 7 世纪以前，阿富汗盛行袄教和佛教；同时也有原始宗教信仰和其他宗教的存在。

公元 7 至 8 世纪，阿拉伯人入侵阿富汗后，伊斯兰教成为主要的宗教，在阿富汗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起决定的作用。一千三百多年来，阿富汗人已经接受了关于真主唯一、真主万能、人类平等和兄弟情谊等价值观念。在历代王朝中，伊斯兰教都被奉为国教。神职人员和政权关系密切。高层神职人员经常占据着司法部门的职位。在全国的 1 万 5 千多个清真寺、25 万穆斯林神学和神职人员，给阿富汗经济、文化打上深深的烙印。宗教学希毛拉、宗教教师穆达里斯、伊斯兰大学者班乌拉纳的称号，一般都授予高层神职乌莱玛。得到这一称号的人，生前地位高贵，死后被穆斯林崇拜为“圣徒”。与许多伊斯兰国家不同，阿富汗不但把穆罕默德

本人圣化，连他的信徒也被圣化，崇拜圣徒之风甚盛。至于毛拉，不仅是人们出生、婚嫁、死亡仪式及伊斯兰节日活动的主持人；同时，又是一个地区、一个村庄的教师、仲裁人和精神领袖。

在阿富汗的伊斯兰教徒中，逊尼派占90%，信徒为普什图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艾马克人、布拉灰人、努里斯坦人和丘拉伊马克人。什叶派占10%，其主要信徒为普什图人中的图里部落、少数塔吉克人、大部分哈扎人和伊朗人。伊斯兰教徒的宗教信念很强，文盲居多，平时每天认真坚做五次祷告。做祷告在大城市中不乏现代信息手段，如用广播、鸣礼炮来宣礼。每逢星期五祈祷日，在阿富汗各地，尤其是在乡村，到处可以看见人们成群结队地前往清真寺作礼拜。在一年一度的斋月里，几乎人人都要实行斋戒。每年还有数千人去沙特阿拉伯的圣地麦加朝圣。每逢宗教节日，国家元首和政府高级官员都去清真寺祈祷，同信徒们共度节日。

信仰什叶派的伊朗人多为袄教的改宗者和散居城镇的居民。部分帕米尔人也信奉什叶派。

什叶派是“阿里的追随者”，等待着“隐遁的伊玛木”作为马赫迪（救世主）再现。阿富汗的什叶派在举行宗政仪式时，“隐遁”的伊玛木的象征是孔雀，而逊尼派则视孔雀为魔鬼。在农村，逊尼派称什叶派为“魔鬼的崇拜者”，但这不妨碍两派平安相处。什叶派还和逊尼派一起过斋日“亚舒拉”（伊斯兰历一月十日，侯赛因殉难日，什叶派的斋日）。

在全国人口中，98%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只有2%信仰其他宗教，其中包括锡克教、印度教、犹太教和其他原始宗教。塔吉克人中还保留着图腾信仰和拜火仪式，乌兹别克人中存在着萨满教

信仰。努里斯坦的偏僻地区还信仰类似祆教的善、恶两神及其主神与群神的宗教。这些居住在阿富汗东部库纳尔河畔的民族被称为“卡菲尔”(异教徒),约有10万人。19世纪末被阿富汗国王阿不杜尔·拉赫曼强迫信奉伊斯兰教,改该地区为“努里斯坦”(伊斯兰教“光明之地”)。但该地区仍用原来众多的名字来称呼自己的部落和氏族。

实际上,一些山区穆斯林虽然是信仰伊斯兰教,但也以虔诚的心情和热情,举行古代当地的宗教仪式。他们迷信护身符、妖法、魔法,崇拜穆灵,而且盛行占卜。巫师、巫婆,也不乏其人。鬼神观念,颇为流行。

尽管阿富汗社会结构复杂,民族众多,宗教的多数派与少数派并存,但它的山河美和优良传统十分突出。在结束绪论之时,让我们倾听阿富汗当代诗人克鲁亚丁·哈代姆的歌唱:

“如美玉,镶嵌于中亚细亚高山之巅/沐浴过数千年的春风歌雨/我们在这万山丛中光辉璀灿/我们的历史充满了英雄的传奇/啊,我是阿富汗——阿富汗!”

“我为自己的民族自豪自信/无际的云彩诚是我们的利剑闪光/闯来的一切魔鬼都要被赶出家园/历史证明我歌像那玉柱擎天/啊,我是阿富汗——阿富汗!”

第一章　远古的东西方文化交往

一、原始文化的交往

文明的“十字路口”

阿富汗在古代是东西方陆路交通的枢纽地区，是“丝绸之路”这条贯通东西方交通大动脉的要冲地区，是中亚大陆的锁钥。日本考古学家樋口隆康在《丝路文明》一书中，把阿富汗称为古代东西方的“文明十字路口”。

阿富汗由于它的地位地置，从四面受着东西方各种文化的冲击。阿富汗好似一幅古代各种文化的历史交汇画卷，又宛如文明群星辉映的文化百花园。翻开这幅历史画卷进入这文化的百花园，我们就会发现：在阿富汗，时而是游牧世界文明的火花在燃烧，时而是波斯人伊朗文化的火炬在照康，时而是希腊罗马文化的阳光在普射，时而是印度文化的星光在闪烁，这中间还夹杂着中华文化的余晖。总之，这许多文化的光芒，照亮了古代阿富汗的大地，并且经过它们的康焦，不康地打开人类历史的闭塞之路。

如果说，历史交往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方式，而处于古代东西方交通要道上的阿富汗，由于民族迁徙和帝国征战，由于商贸和文化传播，变成了各民族交往的荟萃之地，其文化交往也呈现出异彩缤纷的诱人图景。

这里令人想起了世界著名的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年)。他虽为匈牙利人,但长期在英国和印度工作,1943年81高龄时尚拟对阿富汗进行全面考察。可惜于同年10月26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去世。这位对古代东西方陆路交通、古代东西方贸易交往状况、古代东西方文化交往大势作出了贡献的人、特别是对古代中国、印度、希腊三种文化在中亚汇合情形,以实物为证而作出令人信服结论的人,在晚年把目光转向阿富汗,绝非偶然。因为他注意到阿富汗许多地区虽然已成废墟,在历史上却表现了重要作用。在他看来,许多世纪中,西起阿富汗,东至中国新疆,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中华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希腊罗马文化交织于这一地区,足有千年之久。他的这些观点,已为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所证实。

达拉伊·库尔的人头盖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考古学家在阿富汗西南部锡斯坦的纳德·伊·阿里地方,发现了公元前一千年的工具。20世纪40年代末,特别是60—70年代的考古发现,证明了阿富汗和许多国家一样,存在过原始公社制度。虽然至今还不路确定阿富汗现在的领土上是否包括有原始人群的迁往地带,但是可以肯定那时人们生活的主要活动是猎取野兽和采集可食用的软体动物和植物。这些活动几乎耗去了他们的全部时间。在很大程度上,人们的交往是依赖于自然条件。

凡有人类存在的地方,就有文化的出现。考古发现证明,阿富汗存在着石器时代的远古文化。加兹尼省的达什基·纳乌尔发现有粗石器工具,确定为20—10万年以前的文化遗存。在阿富汗东

北的达拉伊·库尔遗址中，发现了约800件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文化)的燧石制片器、石核、手斧、各种刮削器和尖状器。这些石器大约属于6万—3万年前。这里发现的人的头盖骨碎片(头颅两侧靠近耳部颞颥骨)，可能是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人类——尼安德特人，或者更接近于现代的人类。据阿姆河左岸捷谢克·塔什洞穴发现的尼安德特男孩和该河沙石地带出土的工具看，此时处于旧石器中期。无论如何，达拉伊·库尔遗址，可以看作是由旧石器中期向晚期过渡的文化遗存。

库普鲁克遗址和山羊崇拜

在阿富汗许多地方都发现过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片器工具，其中以卡拉·卡马尔和阿克·库普鲁克遗址最为集中。

卡拉·卡马尔地处从普勒胡姆里到塔什·库尔干沿途的谢别克村附近。这个山洞发现的遗物最初被确定为莫斯特文化，后来又被否定。这是一些刮削器、细石器的片器、钻孔器和骨制钻具。在山洞中生活的猎人，其居住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至前7千年之间。他们以猎取野山羊、野马、鹅喉羚和各种禽鸟为生，他们的活动范围进而广泛地扩大到山麓及附近的平原地带。

阿克·库普鲁克遗址在卡拉·卡马尔以西50公里处，位于巴尔哈布河流域的马扎里沙里夫以南。这个遗址有3个发掘点，发现了两万件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燧石器工具。这个地区除了粗石器工具以外，还有石核、尖状器，以及改进了的片石器、锐利的削器、尖端刻削式的石刀，其形状为三角形和弓形。这显然是采用了新的插嵌技术，创造了当时高效益的劳动工具。在库普鲁克的B坑中，出现了更多的骨质尖状器、钻孔器、打孔器等工具残片。据考

证,它们是红鹿、黄牛、马、豺和狐狸的骸骨。在库普鲁克A坑中,发现的一件在椭圆形的石灰石上雕刻着代表人面孔的头像,是引起人们兴趣的艺术品。它和中国陕西大荔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石刻人头像一样,成为亚洲发现的最古老的石雕刻人头像,也是世界上发现的较为古老的石雕标本之一。

在库普鲁克遗址中,已经可以区分出驯化了的绵羊和山羊。根据炭化了的植物测定,阿富汗北部的兴都库什山脉的丘陵地带,是人工培养植物的早期中心之一。这种对动物的驯化和对植物的培养,使人类得以控制自己食物的来源,并创造了剩余食物。按照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观点,剩余食物的出现,不但导致了人群的分化,并且最终导致了文明的产生,因而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的革命。

在达拉伊·库尔遗址石器时代中期层位之上,出现了一个新石器时期不同的类型。这就是"山羊崇拜"的文化现象。在磨光的羊距骨周围,有燧石工具;石灰石长刀、石珠、装饰品;有玄武岩锤石;石英岩工具。这反映了"山羊崇拜"时代埋葬品的多样性。它在地表层显露的柱形坑,是帐篷或地下小棚留下的遗迹。最引人瞩目的是,在三个坑葬中,包括驯化山羊联结起来的骨架(其中两个是故意砍去头的),一个山羊骨架与三个小孩的骨像碎片相连接。这种埋葬可能具有某种原始宗教仪式意义。

远古的世界性联系交往是文化的属性。上述达拉伊·库尔遗址中的"山羊崇拜"文化现象,反映了它同克什米尔地区及西伯利亚南部地区的密切联系。这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类型。山羊的重要位置见之于祭仪,与中亚的山羊崇拜的习俗有密切联系。这类习俗从莫斯特时代一直到现在,都存在于中亚地区。

不仅是“山羊崇拜”的文化现象，而且在细石器方面也反映出远古时期的文化交往。在卡拉·卡马尔遗址中发现的刮削石器、细石器的片器、钻孔器和骨质钻器，都与伊拉克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相似。阿富汗最早的细石器地点，距今约10000年左右，出土于中部地区。根据R.S.达维斯和L.杜普雷在《阿富汗中部史前考察》的研究，认为是一些没有发达几何形技术、雕刻器和琢背成分的细石叶。这种细石器和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以及中国的新疆、西藏、青海的细石器相同。尤其是新疆各地到处都有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文化遗址，其加工特点与文物造型，和中国东北、内藏古、甘肃、青海相同。可见，在六、七千年前，古西域的细石器文化与黄河流域进行过交流。

因此，许多研究者推测，塔里木盆地和帕米尔高原的细石器有某种联系，在阿富汗似乎具有两种细石器传统相结合的文化特征。德日进在1939年发表的《新石器时代黎明时期亚美二洲人类文化之关系》一文中，提出了在新石器时代之初，北极圈邻近地区事实上存在着“世界性联系”的看法，并用一些实物加以证实。裴文中在1948年《史前时期之东西交通》一文中，也认为东西方彩陶、石器文化的许多相似之处，必定是双方交流的结果。他还勾画了这一地区史前文化的交通线：从祈连山南，沿湟水而上至青海湖，再往北经柴达木盆地至南疆；中原地区则经渭河、洮河而新疆，直至中亚、西亚。当然，对这种文化交往的世界联系，不能过于理想化，因为远古时期的交往是极其困难而漫长的。这里也不排斥相同条件下，不通过交往而出现的器物上的相似性。但是，人类文化本是多元的，而不同民族的文化总是要互相接触的，因而可以肯定，发生交往是必然的趋势。

二、畜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替

坎大哈的定居村落遗址

阿富汗地区的南部比北部来说，更早地出现了向新的经济形式——畜牧和农耕（食物生产时代或产粮经济时代）的过渡。

新石器时代之初，猎人和捕鱼者密集于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里亚平原。这里气候湿润，又为兴都库什山流下的河水和溪流所灌溉。新石器时代的许多分散的游牧点，正是位于沙石和古三角洲沉积层交汇处。丰富的自然资源在一定时期保障了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群的稳定存在。但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和动物群的枯竭，必须寻求食物的新来源。而东南方的坎大哈地区，拥有多种多样的禾本科植物，仅矮小麦就有 50 多种。第一批古代畜牧者和农耕者遗址就是在这里发现的。

博兰山口的梅尔加居民村落遗址，时间确定为公元前 6000—前 5000 年，其时间和伊拉克的贾尔莫遗址的时间相当。最典型的遗址是坎大哈的孟吉卡克、德赫·莫拉希·格洪达和赛义德·卡拉，时间确定为公元前 4000—前 3000 年，都是位于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土壤肥沃和水源丰富的优越自然地带。

孟吉卡克是从一个小的半定居的农业村落，发展成为一个设有巨大粮仓的城镇，这个城镇也许还是印度河流域的一个地方政府。遗址的最下层发现了用陶轮工具制成的、并饰有花纹的陶器。陶轮工具的使用，表明了技术的进步和专业化的发展。发现的用铜和青铜制作的带鼻斧头、匕首和各种饰品，已经广泛地使用了封

闭式浇铸技术。这说明坎大哈的一些农牧部落已广泛发展了冶金业。

孟吉卡克3号和莫拉希2号遗址标志着公元前3000年这一地区处于农牧业部落文化发展到繁荣时期。孟吉卡克3号遗址高20米,最宽达150米。矗立在丘陵上的雄伟建筑,是统治者的官邸。莫拉希2号发现一座用围墙圈绕的神殿,殿内有一个索布尔山谷类型的小赤陶"母神"雕像,一个磁铁矿小瘤(可能同人类文明起源的生殖崇拜有关),还有改良的谷粒。

公元前2000年时期,南方农耕文化开始衰落。在北方的马扎里沙里夫出现了繁荣的绿洲农业。这里居民已有相当高的筑城体系。但在北部未发现铜器时代大型的居民定居点。

文明区与原始艺术的特征

梅尔加尔居民遗址发现有几何图形的细石器,反映了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狩猎者与采类者们之间的文化联系。他们注重实用艺术,装饰彩色花纹陶器,这是早期农耕文化的固定性的标志。

远古文化交往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向周边区的扩散性。地域性主要是定居的自然条件(河边台地或山丘),即大大小小的绿洲、沼泽,有利于定行农耕装培和畜牧。当时的人群由阿富汗南方向北方的定居地出发,由邻近地区接触开始,由近及远地进行着辐射性文化的交往。文化往往是人群活动范围扩大的前哨。坎大哈出土的陶器图案装饰类型,同邻近的俾路支和南伊朗早期农耕文化有许多共同点。女性小陶塑像的艺术类型,与南土库曼遗址中所发现的人饰相似。这反映了公元前4000年末至前3000年间,南

土库曼的农耕畜牧公社与阿富汗的联系当有所加强，这也可能与一些部落群体向东南方迁徙有关。这不仅表现在彩陶纹饰，而且在金属装饰风格上，都有南土库曼和伊朗的影响。

文明区之间的艺术交往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印度哈拉巴文化的交往。在阿富汗发现了一系列陶器形式和装饰画的主题同印度哈拉巴文化的风格十分相似。二是锡斯坦的都城遗址中的青铜妇女铸像，从美索不达米亚运来；北部马扎里沙里夫遗址中的石制印章不但专业化强，而且刻有双翼的狮子；还有一件身躯有暗花纹、头发为浅灰色大理石的妇女坐像，都保留着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艺术风格的明显印记。这些遗物测定，时间约在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初，与美索不达索亚艺术时期的年代相符。

阿富汗与印度哈拉巴文明区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区之间这“一近一远”的地区艺术交往，可能有迁徙、商业贸易诸多原因。但有一条物质纽带是共同的：这就是阿富汗的青金石和铜矿。位于印度河谷的哈拉巴中心的冶金业和制陶业需美这些原料。而美索不达米亚所需要的矿物和宝石也由阿富汗输人，用以加工青铜制品和装饰品。尤其是阿富汗巴达都尚的美丽青金石，古代东方把它视为最珍美、最有魅力的宝物。早在公元前4000年，青金石就传到美索不达米亚，甚至埃及。当然，这是借助于多层次的商路交换。现在得到的确切资料证明，当时确实存在着纹些文明区的贸易和文化交往。1975年，，法国考古学家在阿姆河岸发像的肖图尔居民遗址下层，出土了典型的哈拉巴式陶器。这虽然仅仅是勘测性发像，但呈现在我们而前的是古代文化联系的证据。

原始文化的四种类型

阿富汗远古建筑业的发展,是继农业、手工业专业化生产之后,又一文明社会形成的明显标志。后期孟吉卡克已经开始了从农耕公社的村落向城市型居民点的过渡。城市的雏形在建筑业上表现出来了。但是必须指出,这只是游牧文明的大海中的文明小岛。游牧铁器时代的早期文物中,有数量颇多的武器,如剑、战斧、镞。还有一个有胡须战士雕像,可能是一个骑手,身着皮制盔甲,一把战斧掖在腰间。这些文物表明了当时是一个充满军事冲突的战乱年代。

事实上,远古时期的文化交往,更多建同战争交往交织在一起。战争是远古时期交往的主要形式。孟吉卡克遗址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遗址的全部发掘看,坎大哈的农牧文化曾两次遭到游牧部落的入侵和破坏。第一次入侵者从北伊朗攻入,毁灭了整个村镇。侵当地居民在废墟上进行重建。矗立在丘陵上、正面用半圆形高柱为装饰的雄伟宫殿和庞大生建神庙就是这次重建的建镇群。入侵者想必是游牧民族,抢劫烧杀之后便离去了。另一次入侵者来自中亚。当地居民和他们的祖先一样,顽强地进行了再建,并掖建筑文化达到了顶点。他们建起了宗教性建筑——"大纪念碑",祈求神灵防止北方"恶魔"对农庄农田的破坏。他们镇起了饮食女神的像(面部丑陋而胸部健美的女神)。公元前二千年间是多事之秋的另一证据是,孟吉卡 6—7 号遗址中,又一次出现了游牧民掖像占的图景。其便坏性反映战争交往的负面作用。

概掖阿富汗的原始文化,可以看出四种综合类型:第一,在当地居民农耕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代东方型文化。南土库

曼山脚地带和墨尔布加河三角洲的纳马兹加5号和6号遗址，以及沿阿姆河中游两岸的青尔达、达史勒和萨巴巴等遗址，都属这一类型。第二，中亚和哈萨克斯坦草原青铜器文物遗址，主要是粗糙的塑制器皿，装有简单的用尖刻物刻出的花纹。此类文物在阿姆河文化中有所出现。第三，当地文化传纹的高度发展与青铜时代古代草原部落地区成份相混合，如阿姆河左岸的遗址。第四，南部各遗址的农耕与游牧文化的融合，也明显表现为一个类型。

上述复杂情况，反映了各民族部落分散定居的过程。他们在欧亚大陆草原大迁徙的过程中，吸取西亚文化，经历语言同化，但仍保留当地高度发达的、定居的传统文化中的优势。总之，原始文化的交往，反映了阿富汗古代部落和民族史中最重要的时期，也是阿富汗现代人直接祖先的形成时期。

三、祆教文化在阿富汗的传播

阿契美尼德帝国

古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试图既统治东方又统治西方的帝国。帝国的版图在居鲁士二世(约公元前559—前530年)，已扩展到从地中海沿岸到印度河、从咸海到印度洋的广大地区；而在“王中之王”的大流士一世时期(约公元前486—前222年)，帝国的统治进一步扩展到埃及和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城邦。阿契美尼德帝国是第一个真正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世界性帝国。

阿富汗是阿契美尼德帝国统治的东部重要地区，是帝国通向

印度和中亚的桥梁。阿富汗有帝国的许多有名的城市和地区，如巴克特里亚（大夏）、赫拉特、锡斯坦、喀布尔、坎大哈、贾拉拉巴德等。居住在这里的人民，都成为帝国军队和商人活动的臣民。

既然阿契美尼德统治着人种繁多的东西方帝国臣民，那么他们不仅要和波斯人、米底人交往，而且要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以及小亚细亚的居民进行交往。也正是在这时，阿富汗人同希腊人发生了最初的接触。这些接触，不仅是作为敌人通过战争交往在流血的战场上较量，而且是作为难友——波阿契美尼德帝国驱接的建筑工匠、手工艺人与希腊人发生了文化交往。阿富汗与西方的交往范围扩大到真正西方文明意义上的希腊文明地区。

祆教文化的扩大

阿富汗在阿契美尼德统治时期的最重要变迁，是它进入了祆波化的时期。

祆教或拜火教是中国古籍上对琐罗亚斯德教的称谓。祆教是一种中亚绿洲农耕文化，同阿富汗有着悠久的关系。绿洲的农耕者为反对入侵的游牧人，在意识形态上很早就产生了保卫善良而抵抗恶魔的思想，出现了善神和恶神斗争的观念。这种原始宗教观念波琐罗亚斯德用善恶二元神论系统化为祆教。传说中的祆教创始人琐罗亚斯德，被认为诞生在阿富汗的巴尔赫或锡斯坦。他在公元前 6 世纪创教，后得到大夏国王维斯塔帕及其大臣们的支持，开腊盛行于阿富汗和波斯。

祆教的普及于阿富汗和波斯，首先是借助于阿赫美尼德帝国的居鲁士二世（公元前 559—前 530 年在位）的政治庇护。他敏锐地看到祆教教义中能为帝国的建立和扩张所利用的世俗面。祆教

把阿胡拉·马兹达尊为最高善神，以与最高恶神安格拉·曼纽相对立，又把世界分为善、真王国（“阿尔塔”）和恶、假王国（“德鲁克”），特别是该教强调“哈萨特拉”（主宰尘世的强权力量）的教义，使居鲁士二世最为中意。这样，在阿赫美尼德帝国奠基时期，就是袄教化在阿富汗的开始。以后，随着波斯贵族势力的增大，尤其是萨珊朝波斯，袄教成为国教。该教不但在阿富汗、而且在中亚广为传播，并由中亚传入中国，成为除佛教以外，传入中国最早的西域宗教。

《波斯古经》中所见的阿富汗古代社会

今日阿富汗的一些地名，在历史上第一次见于记载的，是在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居鲁士二世统治阿富汗，是阿富汗第一次被异族的全面占领。在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已经成书的《波斯古经》（袄教经典，又名《阿维斯陀》）中，反映了当时阿富汗的社会制度、社会生活和历史状况。

《波斯古经》首先记载了古代阿富汗的许多地名。如它称为“哈拉赫瓦吉”地方，即考古资料证实的公元前4000—前3000年的农耕部落所在地（今坎大哈地区）。它称为的“海图曼塔”，就是今日的赫尔曼德河流域，也就是考古发现的早期农耕之乡锡期坦地区。在阿富汗西北部的赫拉特绿洲，被该书称为“哈洛瓦”。沿阿姆河中游和乌兹别克、塔吉克南部地区组成的巴克特里亚（大夏）及与之接壤的马尔吉安纳，分别被称为“巴赫吉”和“摩乌鲁”。该书还两次提到巴克特里亚的都城巴克传拉（大夏城）。

最可贵的是该书反映了东部波斯（包括阿富汗地区）的社会构成。它的最古老的部分《伽萨》（颂歌），记述了至少是公元前一千

年早期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状况。《伽萨》提出了以农业和养畜业代替游牧业的社会纲领。当时的社会结构由以下四个层次组成:最基层的社会单位是“伊玛纳”,即包括奴隶、住房和经济所有者的宗法大家族;族二层次是“族斯”,即氏族;第三层次是“赞图”,即部族或部落;最上层次是“达赫尤”即地区联合体。地区领合体实际上是部落联盟,首领称为“达赫尤帕吉”。地区联合体“达赫尤”是当时社会基本的政治行政和经济结构,它处在绿洲中心,是城市型的居民点,它拥有自己坚固的城堡。公元前7到前6世纪的木尔加布河三角洲的马尔吉安纳遗址,发现有一个高31米的丘陵,除宫殿遗存外,还有铜和金的装饰品出土。这很可能是某个“达赫尤”的官邸所在地。

阿富汗社会的等级制度,也在《城斯古经》中得到反映。当时社会分为3个等级:祭司、军士、农夫。在《波斯古经》的晚期部分,出现了手工业者等领;在农业方面,还提到水利灌溉设族。看米,在晚期,阶级分化比较明显,因为在《波斯古经》的晚期部分,不止一次提到“大量牲畜”的占有者。该经中提到的“最优秀人饰”(“智者”)的会议,估计是部落首领会议。

《波斯古经》族中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建立称定的、集权的政治大领合体。这是经济发展、财富积累、军事危险严峻和社会贫富分化的结果。《政斯古经》第四部分的《亚什特》是对善神和天使的各种赞歌,其中《称赫尔·亚什特》篇(或“密斯拉”经)中提到的“身居高位的人物”,就是“达赫尤”的“达赫尤帕吉”。这些人善不是一个绿洲的首领,而是数个绿饰的歌合首领。《胡尔希德·亚什特》族中,拉绘了太阳神领特拉如何领着领马,第一个征服山巅,并从高山上观望富饶的“称利安人”的土地。这些土地包括索格底

亚那、马尔吉安纳、阿里亚、霍列兹姆和阿富汗山地地区。这里反映了一个很古老、边界不定的和政权不稳、但却是人们所向往的统一的政治经济的行政联合体。

作为祆教的经典——《波斯古经》正是反映了这种政合体发展的社会趋势，它也反映了祆教是中亚南部绿洲定居农济居民利益的思想体现者，是以团结绿洲农耕居民反对游牧人破坏他们家园为主典任务。他们崇拜的光明是农耕之火，他们信奉的道德箴言是“善思、德言、善行”。他崇拜的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为代表的七大天神，而批判恶神安格拉·曼纽及其众妖魔“迪弗”（Deyv）。《政斯古经》的重要部分《万迪达德》中指出，妖魔是苦难的根源，号召人们起来消灭“迪弗”；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德德赫人是“迪弗”的崇拜者，是绿洲居民的压迫者。祆教创始人琐罗亚斯德在《伽萨》中，以昂扬的激情，呼吁居民团结起来，反对北方侵略者的斗争。我们看到，琐罗亚斯德不但是一个拉判雅利安人自古以来信奉众“迪弗”的宗兹改革家，而且是一个抵拉运动的倡导者。

四、政治经济的变迁和交往

大流士一世的统治

在阿契美尼德帝国的统治中，居鲁士是奠基者，冈西斯是埃及的征服者，祆教麻葛高墨塔是篡位者，而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前486年）则是中兴者。

大流士一世是在杀害高墨塔的宫廷政变中上台的。这次宫廷政变加剧了本来已经很紧张的政治局德。大流士在《贝希斯敦铭

文》中说，在他即位的前522年这一年，就进行了镇压19次叛乱的战争。这可能是言过其实，不过确实反映了当时动荡不安的政局。

大流士上台于危难之时，他不得不全力以赴去镇压席卷帝国许多地区(包括东部地区)的起义。马尔吉安纳起义是东部最大的起义。起义者推选弗拉达为领袖。大流士派遣巴克特里亚太守达达尔什率兵镇压。公元前522年12月10日的战斗中，起义者遭到惨败，55000人被杀，6572人被俘。如此迅速而残酷的镇压行动，说明了这一广泛性群众运动，对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威胁的严重程度。

波斯游牧部落的起义，也对大流士构成了严重威胁。起义的领导者瓦赫阿兹达塔，自称是居鲁士之子巴尔迪亚。他在波斯站稳脚跟之后，进军阿拉霍西亚(今坎大哈地区)。公元前522年12月29日，在卡皮萨坎尼要塞附近的战斗中，起义者遭到失败。但起义在当地居民支持下，重新聚集起来。只是在公元前521年2月21日的都塔瓦战役中，起义才被镇压下去，起义领袖们被处死。

大都士在镇压起义之后，随即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完善了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领了大流士把领土分为20个总督领地，其中阿富汗的巴克特里亚、兹兰卡和哈拉瓦(赫拉特)都设有总督府，负责收取赋税。然而帝国在阿富汗的统治是不都固的。巴克特里亚总督是闹独立最强的一个。由于巴克特里亚是经济发达的镇地，这里的总督经常同朝廷相对抗。在阿尔塔谢尔克斯一世执政时斯(公元前465—前423年)，他的兄弟、巴克特里亚总督吉斯塔普起来暴动，企图夺取王位。在长期的王位争夺战中，巴克特利亚总督一直是王位的觊镇者。阿契美尼德帝国在巴克特里亚的最后一任总督拜斯，把权力扩大到粟特、印度和塞人

地区。这样广阔的土地，成为未来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雏形。

现在完全或部分包括在阿富汗地区之内的巴克特里亚、阿拉霍西亚和德兰吉安纳等地，在公元前6—前4世纪时，是动荡不宁的阿契美尼德帝国中的一些相对稳定的地区。这里的灌溉农业比较发达。政府鼓励地下灌溉水利系统——坎儿井的修建，对修建者免去一定期限的赋税。围绕坎儿井，形成了一些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中心城市。这些绿洲中的城市，集中了不同类型的手工业和商业，其生产和交换物品也是多样的：镰刀、铁铲、铁锹、犁、铧、船、车、陶器及金银装饰品等。这和阿契美尼德帝国保护的"小亚细亚—巴克特里亚—印度"的商道，有直接联系。帝国势力未达到之处，也有间接商路转运到阿富汗。有的研究者认为，原产于中国的桃与杏就是大流士一世时期传到中亚的，同时传入伊朗的还有甘蔗、柑橘和稻米。

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集中反映在货币流通方面。在历史文献中记载帝国各郡的缴税，都规定用"塔兰特"[①]币支付，其中巴克特里亚每年要缴360"塔兰特"币。在阿富汗地区发现的银币库位于喀布尔。在犍陀罗，有铸造地方硬币的作坊。卡皮萨和巴克特里亚都有类似的造币作坊。这些作坊制作的硬币，把当地的传统与外来艺术风格结合在一起。

乌浒河度藏

铁币艺术中多种艺术风格，在涵化基线上彼此吸收对方的要素，称为文化交往中的"橘化"现象。这种现象最有力的证据，是

① 1塔兰特等于30公斤白银。

"乌浒河(阿姆河)宝藏"所表现的文化形态。1877年,居住在阿姆河上游瓦赫什河与喷赤河交汇处的塔赫季·库瓦德的农民,在该地古城遗址中发现了一大批文物。只有一部分保存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内。该馆的图录中计有:16件立体雕塑人像、5件器皿、26件浮雕、53件带压模形象的库板、16件宝石戒指和小印章、30件手镯、31件小型饰物和1枚阿契美尼德金币。但实际流传的文物珍品要多得多,仅金银币就有300多枚。这些文物属公元前5—前4世纪,而金银币要延续到公元前2世纪。

"乌浒河宝藏"作为以物质和精神生产及成果为内容的文化形态,为我们展现了一幅阿契美尼德王朝大夏地区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无论在艺术门类或艺术传统和风格上,这种文化形态都表现了多样性。最突出的特点,是这批珍宝大都按照阿契美尼德王朝上层统治者所崇尚的艺术传统和风格制造的。大夏是帝国的管辖地,这批珍品中有许多自然是从帝国中心直接输入的。例如玉髓石刻成的柱形小印章,上面刻有波斯人战胜游牧人的战斗场面,战场上方刻着袄教的天神阿胡拉·马兹达在空中飞翔的图景。

但是,这批珍品中,有许多是按照古波斯艺术的总规范而在大夏制造的。波斯式的立体小雕像,刻画着一位蓄长胡子、穿长袍的国王,手执权柄,凝视着远方。一辆小型金马车,配有四匹马,坐着贵族和驭手。前者的雕刻者着意表现国王的庄严神情和威严的齿状王冠。后者的雕刻者为显示贵族的高贵,竟把驭手刻成大胡子埃及神贝斯。这些当地工匠很熟悉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宫廷艺术。

"乌浒河宝藏"突出表现了古代东方和欧亚草原部落斯基泰艺术风格,对人物衣饰细节的刻画和对动物形象描绘,特别注意。公元前5—前4世纪的一只金镯,镶着天青宝石,连接处的造型是两

个有翼有角的狮身鹰头怪兽相互对视，增加了器物精美情趣。这类艺术品，着力于表现动态能力强的各种动物形态，如刚劲奔跑的山羊银雕和骑士猎取兔子的场面的器物浮雕。

“乌浒河宝藏”中的受古希腊手工艺品和其他地区（如美索不达米亚）影响的珍品，虽属当地工匠制造，但形象逼真。这说明了大夏手工艺匠对希腊及美索不达米亚艺术风格相当熟悉。有一些金戒指形的小印章，正面是掷骰子的妇女或站立着的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等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在表现统治者、士兵的小雕像和浮雕片上，阿契美尼德和希腊艺术风格的结合特别明显。在雕刻无胡须的男子形象时，面部线条端正，在凝滞表情中充满着内在力量。这也说明在希腊大夏王国和贵霜王朝的大夏艺术繁荣之前，当地雕塑艺术已表现出较高的现实主义水平。

总之，“乌浒河宝藏”虽说是古大夏地区某个大贵族或大家族长期积累的艺术珍品，但不能把它仅仅看是当时大夏贵族的审美情趣的表现。它主要是乌浒河或阿姆河两岸大夏文化的物质见证。有一枚金质戒指形的印章，上面刻有头戴王冠的幻想之神格帕特沙赫，他长着公牛的身躯和大胡子人头的有翼怪相。在他的上方刻有阿拉美亚铭文“瓦赫沙”或“罗克族”（乌浒河或阿姆河的女神）。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阿拉美亚铭文，它证明阿契美尼德王朝使用的官方文字，在公元前 5 世纪至公元前 4 世纪，已传播到大夏地区。在这里，乌浒河（阿姆河）文化以金质印章形态表现出来，在文化的物质、精神和社会三种基本形态上，体现了中亚（首先是阿富汗）地区在古波斯时期相互交往的有趣艺术情景。

阿富汗地区独立倾向的加强

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阿富汗地区达两个世纪之久，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

阿契美尼德王朝派来的总督及其他达官贵人们，不但在政治上是统治者，而且拥有广阔的土地和众多奴隶劳动的手工作坊。在波斯贵族们的奴隶制领地上，许多奴隶就是由公社的下层贫苦社员分化而形成的被剥削者。公社的上层社员，效法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京城贵族的生活方式，建造了像考古发现中德兰吉安纳和巴克特里亚遗址上那样庞大的宫殿。这些人成为阿富汗古代第一批土地所有者。

权力使贵族们的经济力量膨胀起来，而经济力量的加强，又促使他们进一步提出了更高的政治地位的要求。地方奴隶主贵族们不愿意长期与阿契美尼德中央奴隶主贵族分享剥削自己同族人所获得的收入。政治上的独立倾向在各地都逐步加强了。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基础本来就是不稳固的。它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德和部族的政治军事联合体。阿富汗地区的情况，可以说是帝国庞大形象的缩影。虽然在一些地区，如巴克特里亚，由于种族、语言的联系，曾使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之间的种种文化交往族近了；但在其他大部分地区还是差异大于趋同。

阿富汗地区的文化趋同，不等于政治趋同。即使是在巴克特里亚，也--直表现出独立倾向。在亚历山大军队步步进逼的情况下，阿契美尼德王朝行将大厦倾覆，阿富汗地区的独立倾向得到了最终实现的契机。

第二章　上古东西方文明的交融

一、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国家

巴克特里亚总督比苏斯

公元前331年9月，25岁的亚历山大指挥希腊马其顿军队，同阿契美尼德大流士三世的波斯军队在美索不达米亚高加达米之战中获胜。公元前330年7月，阿契美尼德国王大流士三世被阿富汗地区的3名总督（比苏斯、巴沙恩特斯和萨提巴尔赞）合谋杀死。历时220年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宣告终结。

由于逃到巴克特里亚的比苏斯，是打着“恢复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旗帜，因而成为亚历山大征战的目标。在征战比苏斯的过程中，亚历山大先打败阿利亚总督萨提巴尔赞，又攻占德兰吉安纳。在占领阿拉霍西亚之后，处死了总督巴沙恩特斯。

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开始进攻巴克特里亚。比苏斯既不能拒敌人于边界要地，也无力准备强大而富有战斗力的军队。他在消极破坏道路的策略失败后，便从巴克特拉城逃到阿姆河对岸，然后烧掉了所有的渡船。亚历山大的军队用皮筏子取代船只，5天内全部渡河。粟特贵族斯皮达马闻风丧胆。他囚禁了比苏斯并准备献给亚历山大，但随后弃囚犯而逃。亚历山大下令将比苏斯剥光衣服，戴上狗项圈，割去鼻耳，然后处死。

修筑亚历山大城

亚历山大在征服阿富汗地区时，修建了3座亚历山大城。第一座在德兰吉安纳。那是他在战胜阿里亚总督萨提巴尔赞之后。在这里，他遇到了不同政见者的挑战，于是他绞死了反对他东方政策的将领，其中包括骑兵司令菲洛塔斯。

第二座在阿拉乔西亚。那是在他移兵东进，攻占阿拉霍西亚之后。

第三座在喀布尔南50公里处。

这种以亚历山大命名的新的城市和居民点，几乎在每一个总督领地都相继建立起来。W. 塔恩在《亚历山大大帝传》中写道："亚历山大攻东伊朗需要城市，他就必需创建这类城市。"

这种城市是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的"世界帝国"思想的产物。他们力图实现把所有臣民都统一成为一个民族的思想，于是在军队后面，就出现了两种文化交往的现象：一种是希腊和腓尼基人组成的商队，其中许多人迁移来就定居下来，并同当地人通婚；另一种是在商道上拔地而起的许多新的商城，其中战略和商业意义兼而有之。亚历山大因此控制了贯通欧亚的陆路交通。

罗克姗娜的政治婚姻

亚历山大以巴克特拉城为根据地，北征粟特，南伐印度。在粟传的战斗特别激烈。以后又遇到了以居鲁士城为中心的起义。亚历山大的军队杀害了8000居民，但他本人也被击伤。领记载，在同塞种人和粟特的斯皮马达军队的战斗中，亚历山大的军队屠杀了泽拉夫善河流域的居民达十二万人以上。

但是单纯的镇压政策已不能奏效。于是亚历山大实行移民政策,将希腊人、马其顿人迁到粟特。虽然这种政策遭到反对,但亚历山大继续采取怀柔政策,以拉拢上层、平息民怨。他规定实行波斯朝仪,行跪拜礼,穿米底袍。他本人身体力行,戴波斯冠,穿波斯紫袍,打扮成波斯式的皇帝模样。战争交往的形式,被"入乡随俗"的文化交往形式所代替。这种政策引起当地贵族的分化,使得亚历山大有可能消灭他可怕的敌人斯皮马达。

公元前328年冬天,亚历山大通过半希腊半政斯的仪式,同巴克特里亚的波斯贵族奥克夏特的女儿罗克娜娜结婚。罗克娜娜意为"亮晶晶的","光灿灿的"。关于此次婚事,至今在阿富汗还模行着许多传说,而现今许多阿富汗妇女仍喜政给女孩起名"罗克娜娜"。亚历山大收纳罗克娜娜为皇后一事,是一桩旨在协调他同东方贵族关系、并结束民族战争的政治婚姻。当亚历山大按马其顿风俗,在结婚仪式上用剑切一块麦饼,同罗克娜娜各吃一口的一刹那,历史交往便用东西方结合的婚仪形式表现出来了。

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征服喀布尔地区。他在印度进行了很不顺利的远征之后返回巴比伦。公元前323年6月13日,这位不到33岁的、但却是那个时代有非凡魄力的领袖人物,被热病夺去了生命。公元前322年,罗克娜娜生了亚历山大的遗腹子亚历山大四世艾格斯。公元前316年,由于失去了亚历山大母亲奥琳贝丝的庇护,罗克娜娜和她的儿子被捕,并在4年后被处死。

二、希腊塞琉古国家

亚历山大死后的政局

亚历山大统治了12年零8个月。他建立的马其顿国家用发达的奴隶制取代了阿契美尼德落后的经济形式。他把城市反抗的居民变成奴隶,从而导致了奴隶制的巩固。对阿富汗地区而言,亚历山大的远征,意味着外国侵略者的更换。

像历史上一切极权统治人物死亡后所出现的政治失衡局面一样,亚历山大之死,使蕴藏在底层的不稳定对抗政治德力泛浮于表层。在被奴役的国家中发生了起义。希腊马其顿军队要求返回祖国。亚历山大部下诸将开始了争权和混战。

在这些形形色色历史景奴的背后,在难以换摸的内讧角逐中,逐渐清晰地显露出三种获胜的权力人物。这就是:塞琉古(被称为“是有王者之心的人”)顿管了波斯世界;托勒密接管了埃及世界;莱辛马卡斯德管了希藏马其德世界而成为安提柯王国。

塞琉古征印录

塞琉古在公元前312年建立了对奴利亚和巴比伦的统治,获得了亚历山大帝国的亚洲部分。有的史书因此称塞琉古王国为“叙利亚国”,中国古籍称为“条支”。巴克特里亚于公元前306年或公元前305年归并于塞琉古国家。

塞琉古重新征服巴克特里亚之后,越过兴都库什山,进攻新成立的印度孔雀王朝。年轻的孔雀王朝的创建者德陀罗笈多,以强

大的军队征服了北印度。塞琉古这时的版图从地中海扩大到印度。

公元前304年，塞琉古终于与孔雀王朝达成协议，把亚历山大征服印度的部分，以500头大象和大量黄金为代价，割让给孔雀王朝。这些地区包括阿富汗地区的阿拉霍西亚等地。这些大象，在塞琉古于公元前301年的小亚细亚的伊普苏斯之战中起了重要作用。

阿育王的石柱敕铭

在阿富汗地区发琉的文物，证明了孔雀王朝曾在这里实行了有效的政治统治，并传播了佛教文化。

在现代阿富汗，至少发现了旃陀罗笈多的孙于阿育王的7个石柱琉铭。

最重要的是1958年在坎大哈的切赫·吉纳发现的用希腊文、阿拉美亚文和希腊、伊朗文混合文刻的石柱敕铭。不认识这种多体文字的工人们，在发琉时误以为是琉颂英国侵略阿富汗战争的英文功德碑而准备毁掉。幸而被坎大哈学校校长阿不杜·贝·阿什纳，通知阿富汗史学会长阿赫迈德·阿里·科赫扎德，经过抢效，才幸免于难。

效铭大部为希腊文，表明希腊文是当时坎大哈的主要文字。8行阿拉美亚文表明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官方语言并未随该王朝的灭亡而消失，相反仍德人们长期使用。这两种文字互译中有一些区别，但内容和风格都是关于阿育王对佛教的皈依和他对臣民的德琉。效铭的主塞是戒恶行善、勿杀生、尊师、孝敕父母、夫妻互重、与邻居和睦相处、文明地役使侍从和奴隶。这些都反敕了阿育

王在羯陵伽战役大屠杀之后的心理状态、国策和在国内传播佛教的盛况。

此外，1963 年在坎大哈还发现了两个石柱敕铭。1969 年在坎大哈的沙达拉克和奈加之间的拉格曼，发现了 4 件石柱敕铭。在大多敕敕铭上没有直接接到阿育王的名字，而用了“国王”（Piodasses）即“慈善面容的国王”（Piy-adassi）的表达称谓。

在阿富汗境内发现的石柱敕铭，不但反映了阿育王是一位宣扬佛敕教化的国王，对后来的佛教传播史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反映了他对西方文化极有兴趣，并尊重各地区不同方言。他作为一个善罗门教的政治家而改信佛教，显然是带有部落分敕性的婆罗门教，不能适应大规模奴隶制大帝国统治需要政治缘故。

希腊化政策

坎大哈的切赫·吉纳的石柱敕他，既是佛敕西善的第一件文善证据，也是阿育王时期最东边的一件希腊文雕刻，又是东西方文字合璧的石雕，因而成为文化政合的标志。

政政古继亚历山大之后，坚持“世界帝国”的思想，甚至比亚历山大更热衷于接行希腊化敕策。他佛许多马其顿首领一样，同当地人联姻，娶了粟特起义军领袖的女儿阿帕玛，所生的儿子就是期敕古王位的继承者安提俄克一世（公元前 280—前 261 年）。他们二人建立了众多移民商城，仅据琉古相善就建城 75 商。据琉古还推行希腊马其顿历法纪年。包括阿富汗在内的亚洲被统治他区，都以公元前 312 年为纪元元年。直到公元 8 世纪，从阿富汗巴克传拉城来中国的景教佛仍沿用此历法，见《大腊景教流行中国碑》。这说明了塞琉古国家希腊化政策所遗留的都远影响。安提俄克一

世控制着阿里亚和巴克特里亚，并在后者设立了铸币厂，发行以他命名的硬币。

然而塞琉古王国不可能在阿富汗地区保持纯粹的希腊式文化。巴克特里亚的钱币艺术吸取了明显不同于希腊形式的当地风格。当地的工匠有良好的希腊艺术修养，他们把希腊艺术同当地特色结合起来而创造了新的钱币艺术。在希腊商城中，希腊神庙和当地神庙共存。

塞琉古王国是当时最大的希腊化国家。它控制着东西商路，获取印度的香料和中国的丝绸，以发展自己的经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兴起商贸兴旺的势头，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交往的新的动力。正如德拉薄在《欧洲理智的发展》中所说："如果说，欧洲的思想是通过巴克特里亚而传到远东，那么亚洲的观念也是通过这里和同样渠道而传到欧洲的。"东西方文化通过巴克特里亚这个交叉点而会通融合。商贸是形，文化为影，形影相伴，聚焦于巴克特里亚。东西方各族商人经巴克特里亚，沟通爱琴海、两河流域、波斯、印度、中国和西伯利亚的商路，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融。

三、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

狄奥多德一世和二世

约在公元前250年，巴克特里亚总督狄奥多德脱离塞琉古王国而自称为王，史称"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希腊大夏王国）。它的版图除巴克特里亚外，还包括阿利亚、粟特和马尔吉安纳。这个地区土地肥沃、水利灌溉度好、矿产丰富，而且是希腊、波斯、中国

和印度四大文明交汇处。

在巴克特里亚独立的同时,帕提亚和希尔克西亚总督发德拉戈拉斯也宣布脱离塞琉古而独立。这个希腊人的新王朝后来被波斯人阿尔撒西斯所取代,建立了中国古籍中所称的安息王国。

狄奥多德一世建国初期,曾企图征服安息王国,未获成功。在他兴起之后的几十年中,由于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显然与狄奥多德的名字相同,这就使得从钱币上辨别当时的确实情况,变得十分困难。据说,第二个狄奥多德改变了他父亲与安息王国为敌的政策。但是,约在公元前230年的一次政变中,被粟特总督欧西德莫斯一世所推翻,建立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的新王朝——欧西德莫斯王朝。但是王室内部的斗争,并未因此而停止。

欧西推莫斯一世

钱币学对研究希腊巴克特里亚的历史,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欧西德莫斯一世时期的钱币,无论在古代居民遗址的发现中或者博物馆的收藏中,数量都特别多。这反映了他统治的长期性(约公元前230—前190年)和稳定性。他被认为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真正建立者。

公元前208年,塞琉古国王安提俄克三世的东征大军出现在巴克特里亚的边界上。在赫拉特地区经过俄烈战斗以后,开始了对巴克特里都城巴克特拉的两年的围攻。欧西德莫斯一世凭借坚固的城墙和城四周的沼泽丛林,使安提俄克无法攻破巴克特拉。于是双方开始了和谈。欧西德莫斯辩解说,他并未背叛塞琉古王国,而是杀了背叛者的后裔——狄奥多德。他的和谈条件是:承认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并答应送给对方以粮食和战象。安提推克

同意了这些条件，并对谈判代表、欧西德莫斯的儿子德米特里产生了好感，提出将公主嫁给他。

欧西德莫斯一世曾企图吞并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地区，但没有直接行动。他只是劝安提俄克三世乘孔雀王朝衰弱之际，占领了喀布尔。公元前190年，罗马军团打败了塞琉古军队以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才采取了大规模的南征行动。

德米特里一世

南征的主要完成希是欧西德莫斯一世的乘承者德米特里一世（约公元前190—前160年）。德米特里因占领印度西北部有功，因而接受了与亚历山大类似的乘头头饰和“百战百胜之王”的征服者的称号。

德米特里发行的俄币上，铸有希腊文（正面）和佉卢文（反面）的铭文。钱币上铸有他乘战盔的头像，也铸有保护神像。大批此种俄币的发现，反映了当时货币的广泛嫁通和商业的发达，也表现了希腊大夏俄币艺术形态的高峰。

的确，继欧西德莫斯一世之后，希腊巴克特里亚在德米特里一世统治时期，达到了鼎盛时期。这个地处要冲的王国，成为印度、中亚和中国等东方国家向西方转运特产的必经之地。商城除了过去的居鲁士城、亚历山大城、安提俄城之外，又出现了取西德莫斯城（奢羯罗）、像米特里城（帖尔美像）等许多名城。巴克特里亚被誉为“千城之国”。

像米特里的南征的结果，提成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分裂。德米特里后面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同取竞争者——欧克拉像德斯。欧克拉提德斯可取同塞取古王朝有亲族关系。这个精力充

沛、雄心勃勃的希腊人，不但战胜了德米特里，进入布色羯逻伐底，而且更积但地推行希腊化政策。从此形成了欧西德莫策和欧克拉提德斯两个分裂敌对的王室统治区：一个在巴克特里亚；另一个在旁遮普。

弥兰陀一世

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分裂以后，旁遮普的许多国王之间仍争斗不斯。政克拉提德斯一世对内轻德当地民策传德，对外与安息王国妥协，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不德。公元前156年，他从印度远征归来时，被德的儿子所杀。钱币上反映出，最后夺权者为阿波罗托多斯(或海里奥克尔)。夺权者雄战车压死他的父亲，并命令将父亲的尸体抛在野外，不许掩埋。不久，他的兄弟赫里奥克里策为父报仇，杀死夺权者后自立为王。

另一方德，巴克特里亚的许多国王之间也内讧不断。德米特里一世死后(约公元前160年)。四十年间，每十年就要更德一个国王。第一个十年的国王为阿波罗多托策一世。他发行过大量钱币。他之后的十年里，就是希腊巴克传里亚的著名国王弥兰陀(约公元前180—前130年在位)。他把该国疆域扩大到南至纳尔巴达河、东临米拉特地区。在攻克巴特那之后，德德阿育王一样，深为战争而忏悔，遂放弃王位，信奉佛政，削发为僧。他的德神导师雄加奉把德的言论编成《弥兰王问经》。这部类似柏拉图式的哲学对话录，至今仍德斯里兰卡、缅甸和南国的佛政徒奉为经典。佛教传说把他的德城说成是奢羯罗，而奢羯罗一般认为是旁遮普的德牙尔科特。但德币学研究斯定都城在布色羯罗伐底(今白沙瓦附近的恰萨达)。奢羯罗可能是冬都。弥兰陀还创立了一种希腊纪元

(公元前155年)。研究者以此纪元来确定大量印度早期铭文的时间。

阿伊哈努姆遗址

希腊巴克特里王国的首都巴克特拉(Bactra)被称为"城市之母",在中国史书(《史记》、《汉书》、《魏书》、《北史》等)中多有记载。汉代张骞曾访问过这个城市。一般认为是今日阿姆河南岸的巴尔赫。法国考古学家在此进行了几十年的发掘,否定了这个看法。考古学家们为寻找巴克特拉遗址,企图解开这个"幻想王国"之谜,但均无结果。

转机发生在1962年。在喷赤河和考恰克河交界处,阿富汗农民把"阿伊哈努姆"(乌兹别克/突厥语,意为"月之新娘")遗址出土的石雕像,送到了法国考古学家手中。1963年开始发掘这个遗址,一直到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为止,还未发掘完毕。有人认为,这就是巴克特拉城的所在地,也有人认为是阿姆河上的亚历山大城。无论以后发掘的结果如何,但这座规模宏大的希腊化古城遗址所展现的东西方文化交往,大大丰富了以前钱币学研究中所提供的历史内容。

阿伊哈努姆遗址的发掘证实,这座古城是一座三面被陡峭山崖所包围的堡垒城市,符合"高山筑堡、平地建城"的古希腊建筑特点。城市有居民区、行政区、剧场、武器库,还有各种色彩装饰的华美浴池和圆柱式的神城。在发掘一座对青少年进行体育和智育训练的希腊风格的"吉姆纳西姆"(Gymnasium)学校时,发现了大力神海格立斯的青铜铸像和献给赫尔墨、姆格立斯的铭文。铭文刻在石柱上,共140条道德格言,都是标准的希腊语。面对距雅典3000

英里的阿伊哈努姆，希腊化竟如此深入，实在令人惊叹！

这座古城的修建者是亚历山大的部将肯涅斯(Kineas)，他被埋葬在专门的大墓中。行政区有面积为137×108米、116根廊柱围绕的办公大院，柱头是用当地的石灰石雕刻忍冬草形状，属希腊科林斯式。后面是官邸建筑群，其中有国库、两组雕塑人群像(一组为1—1.5米，另一组比普通人高两倍)。

铭文中有一则公元前三世纪初的道德格言，规定了希腊人从儿童到老年各阶段应具有的品质："少年应自律，青年要自制，中年要自立，老年乐于助人和咨询，最后安然离去，死而无憾。"这种根据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不同阶段的生理和道德要求而概括出的行为规范，颇具哲理性。欧共体(EC)之父卡莱洛奇说："东方之于死，如书中之一页，翻上页即为下页，不断地翻动，便有了生命与历史的演进；而西方之于生死，则如书之首尾。故东方人视生命远较西方人坦然，生则充实、坚毅，死则沉着安然。"但上面古希腊人的铭文则不尽然，反倒是与孔子的"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有异曲同工之妙。

希腊巴克特里亚文化的特征

阿伊哈努姆遗址集中反映了希腊巴克特里亚文化的特征：西方希腊文化同东方波斯、印度和阿富汗本土文化的融合。它一方面有希腊神话、建筑、语言和格言；另方面又有阿契美尼德建筑、神祇、阿拉美亚语和佉卢语，以及袄教、印度教、佛教的存在。它的艺术虽受希腊风格所支配，但同时也受到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影响。

阿伊哈努姆古城的修建者肯涅斯的"英雄墓"建筑在该城的一

个梯形台地上，这一点与波斯帕萨尔加德著名的基尔陵墓相似。遗址有许多有关希腊人日常生活的浮雕。但建筑方面确实雕承了当地的传统，如用土坯块砌墙。在雕像方面，除了突出人体肌肉美的男性大理石雕刻外，也发现了用石膏和黏土制作的陶像。值得注意的，是半身古希雕风格的陶制女值，已经是日后演变为佛教雕雕艺术的原型。后来，以犍陀罗佛教艺术派别闻名的雕塑艺术就是由此而来，成为东西方艺术交往的结晶。

钱币艺术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的主要文化形态。1948 年在阿富汗的昆杜建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希腊巴克特里亚钱币。这些银币后来被考古学家称为“昆杜兹宝雕”。学者们对它的研究，增加了对早期巴克特里亚的历史和文化的认识。由于古文献中没有发现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系统记钱，零星的文字资料不能反映全貌，只有发现的钱币可作为腊究的值据。例如关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王朝体系，值据昆杜兹遗址发现的钱币研究，有的考古学家排出的顺序是：狄奥多德、欧西德莫斯、德米特里、班达里奥、阿加索克利斯、弥兰陀、斯特拉陀、阿值罗道托斯、希里奥克来斯、海尔马尤斯。但争论屡屡发生。有人在划列狄奥多德之后的欧西德莫斯与欧克拉提德斯两个对立王朝体系表时，结论与上述不同。还有人宣布，自己识别了一些姓名相同的国王的不同钱币图值，却立遭到另外研究者的反驳。总之，希腊巴克特里王国之谜至今尚未例开。

1994 年上半年，在内战纷飞的阿富汗小德甘德非发现了地下宝雕——大约 100 多万枚古钱币和大批金币、金器。仅金币和金器的市面价值就达一亿多美元。如德历史价值估算，堪称无价之宝。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发现，这些金银币德是公元前 400 年到

公元100年之间的钱币，是由希腊，中亚诸国和阿富汗诸国国王下令铸造的。这个宝藏本来是为解开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之迷提供更多实物资料，因为每一枚金银币上都刻着某国国王的名字、有关矿址情况、统治者的头衔和其他重要信息。但是内战造成的混乱局势，使得金币、金器及一批珠宝饰物被抢购一空，古钱币被无知的人们视为破铜烂铁，被收买钱烂的人买去并被投人熔炉。地下宝藏的发现，使考古学家为之惊喜，但随之因惨遭洗劫而化为遗憾，化为长叹和长使了。

四、塞种王国和贵霜王国

腊种迁钱钱钱

北方游牧民腊塞种和大月氏，是威腊希腊巴克特里亚的主要势力。但推藏希腊巴克里亚王国的是塞种的部落联盟，其盟主为大夏部落(Tochai)。

塞种最早居使在伊犁河、楚河流域。公元前7世纪末，塞种的阿西部落已出现在伊犁河流域。公元前6世纪20年代，推种向西扩腊，驱逐了居住在钱尔河右岸的马萨盖塔人而占领其地。波斯人在此后称塞种为塞迦(Saka，萨迦)。约在公元前177—前176年，大月氏为匈奴所破，向西迁使，驱逐塞王。塞种钱迫离开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塞地，散居于帕米尔一带，后来又向东进人塔里木盆地诸绿洲。

塞种迁徙的路线，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藏。游牧民腊由于内部和外部诸多因素，迁徙成为交往的常规，而塞种是这种历史交往

的典型个案之一。综合主要研究成果，关于塞种迁徙路线有以下几条：

1. 公元前140年左右，以大夏部落为盟主的4个部落组成的塞种部落联盟，占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建立了塞种巴克特里亚王国，即塞种大夏王国。因大夏(Tochari)为吐火罗的对音译法，而以后又转称吐火罗，其居住的地方称为吐火罗斯坦。

2. 南下帕米尔地区的塞种，有一支在公元前177—前176年左右，经帕米尔住留相当长时间之后，越过悬度，进入罽宾，建立了一个横跨阿富汗和印度的塞种国家。罽宾的塞种国王是著名的穆埃斯(Maues, Maves)。据《汉书》记载，该国以犍陀罗、叉始罗为中心，其疆域一度扩展到喀布尔河上游和斯瓦特河流域。

3. 散处帕米尔各地的塞种，向东迁徙，至塔里木盆地，建立了一系列绿洲小国，如捐毒、休循。在焉耆、伊循、乌垒、龟兹、姑师、车师、莎车、渠勒等绿洲也有他们的行踪。

4. 有一部分进入锡尔河南岸的费尔干纳盆地，和大宛国有密切关系。

5. 有一支到咸海、里海，即以塞种部落阿希入为主的奄蔡国。

6. 留在锡尔河北岸塞种称康居。

7. 在巴克特里亚建国的塞种，又被旧敌大月氏所灭，被迫向南迁徙，通过赫拉特山口，在原来称为德兰吉安纳的地区建立了塞伽斯坦(锡斯坦)。公元前1世纪，他们又向东北推进，进入阿拉霍西亚，建立塞种政权。后来有一部塞种还进入犍陀罗和叉始罗。

大月氏巴克特里亚王里

上述最后一条路线，是与大月氏南迁有直接关系。公元前

130年左右，大月氏被匈奴指派的乌孙昆莫王所败，从楚河、伊犁河，向西经大宛、粟特，南渡阿姆河，征服了塞种王国，即《汉书·张骞传》中所记的"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

大月氏王国的疆域北至康居、大宛，西至安息，南与东部接罽宾，设王庭于阿姆河北，而原塞种政权的故都大夏城(巴克特拉)仍是政治活动的中心地区。大月氏巴克特里亚王国国力强大，人口百余万，拥兵10—20万。大月氏建国后，举族迁居于这块土地肥沃、物产富饶的农耕区，由游牧走向定居，安居乐业。以至于张骞作为汉使，本意为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但发现他们已"志安乐"不思回归，而不能完成使命。

在阿富汗北部古里古亚别发掘的大月氏贵族墓葬，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前半期大夏及其邻国文化构成的一些情况。坟墓没有巨大的坟头，也没有陵墓使筑物，然而死者却穿着绣满金饰品的华贵衣服，金扣环、小搭扣和匕首鞘上都用珍珠、绿宝石和天青石装饰着。一些艺术品带有亚洲游牧部落的文化风格，如扭打在一起呈族苦状的野兽；而另一些题材则是纯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风格，如身着马其顿式的阅兵服装、头戴盔甲的士兵塑像。还有一件雕刻着两边卧着飞龙的国王像的流金饰物。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游牧民、古希腊、安息、中国和印度文明的相互影响。这时，在阿富汗南部及其邻近地区发展的总趋势，即游牧部落逐渐吸收当地文化传统，其而开始了文化一体化的进程。

贵霜翕像

大月氏王国统治大夏以后，根据该地"本无大君长，城邑往往置小长"的政治分散的情况，采用了间接控制的分治管理体制。这

就是扶植了当地分立的政权，设立了5个“翕侯”：贵霜（Wakhan西部Ab-i-Panja河左岸）、休密（Wakhan谷地）、双靡（Chitral和Mustuj之间）、肸顿（Badakhsha地区）、高附（Kokcha河流域）。大月氏王国的这一设置可视为对西部地区实行的间接统治，给予五翕侯以自主权。

公元1世纪中期，贵霜翕侯丘就却（意为酋长）打着大月氏王国的旗号，征服了其他4个翕侯，然后占领了大月氏王国直接统治的大夏西部地区，并西攻安息，为贵霜王朝奠定了基础。丘就却被称为卡德菲斯一世（Kujula Kadphises I），以“伟大的救世主”（Soter Megas）为称号。钱币学反映了他的政治力世的变化：开始他的名字出现在钱币背后，称号相当谦虚——“信仰坚定的贵霜翕侯丘就却·卡德菲斯”；后来的钱币就就称“伟大的王中之王”、“解放者”。据说他活到80多岁，统治时间约为公元前40年到公元后。他统治的疆域包括巴克特里亚、阿拉霍西亚、犍陀罗和帕鲁帕米萨德及其他地区。

阎 珍 膏

贵霜王朝的西方竞争者主要是安息。安息国王瓦尔坦把军营移到了巴克特里亚，直接的武装冲突多次发生。

贵霜王朝扩张的主要方向是印度西北部的希腊印度王国。这个王国的疆域包括喀布尔地区、旁遮普、克什米尔及卡提阿瓦尔海岸。不过在弥兰陀死后，该国便衰落了。丘就却之子和继承者阎珍膏（Vima Kadphises）趁此机会，于公元前78年，把统治权扩大到旁遮普、克什米尔、印度河流域，以至于贝拿勒斯。《后汉书》记载：此后“最为强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

阎珍膏进行了币制改革，取消了市场上流行的成色不足的金币，采用了罗马金币中标准纯金与合金的比例。他的钱币上铸有印度教的湿婆像，有时还和公牛南迪一起压冲在钱币上。他右手持枪，左手持剑，古文字为“王中之王”。他的银币发行极广，遍及巴克特里亚、旁遮普、中印度的阿拉哈巴德和贾巴普尔以及中亚地区。我国新疆也出现过此类钱币。

阎珍膏的疆域北逾阿姆河，东过葱岭，抵天山南路之西，与汉都护府相接。他开始使贵霜王国成为沟通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之间的桥梁。公元前 88 年曾送贡物给中国，要求赐汉公主为妃，使者被班超逮捕。随后班超打败贵霜派来的七万大军的侵扰，战后两国和好如初，岁奉贡献，开展正常贸易往来。

迦 腻 色 伽

迦腻色伽是贵霜王国最有为的君主，从他开始这个王国一直统治到公元 277 年。他的在位年代和丘就却、阎珍膏一样不确切。他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文化建树，作为佛教的保护者、传播者而载入史册。他保护、建造佛寺佛塔，综汇佛教经典和宣传佛教哲学，为后人所称道。在他统治时期，佛教已传播到中亚，并开始向中国传播。

他原先是一个祆献徒，但对其臣民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在他的钱币上，虽然铸有贵霜人信奉的祆教神像。但是，佛伽和希腊罗马的大力神、火神、波斯的太阳神、印度教的湿婆等神像，也都出现在他的钱币上。他的钱币上，贵霜文代替了希腊文。

他统治时期，疆域北到花拉子模、布哈拉，南到印度的赐德亚山。他的夏都在贝播拉姆（迦毕试），冬都在白沙瓦（富楼沙）。他

越过帕米尔，把和阗、叶尔羌和喀什噶尔并入贵霜版图。他发展了同中国、罗马的贸易。

在印度马土腊发现了刻有他名字的雕像，身着游牧人服装，手执宝剑，虽未见头部，然而仍能窥其英武气概。

伽腻色伽的死亡，正像他的出生和出身一样，是个历史之谜。他死后历经5代国王统治至公元227年左右，贵霜亡于伊朗萨珊之手。

贵霜的城市和商贸

贵霜王朝的农业经济发达。普及于各地的水利灌溉农业和高度发展的专业化手工业，以及城市型居民点的兴盛，都是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明显标志。

许多考古资料证明，巴克特里亚、阿拉霍西亚、犍陀罗及其他地区的城市生活，达到了真正繁荣的时代。仅巴克特里亚就有18个城市，居住着百万人口。都城巴克特拉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贝格拉姆古城的丰富出土文物，证明了它是东西方文化和商贸交往枢纽。马扎里沙里夫西北40公里处，还发现了贵霜时代的迪里别尔金城，奴隶主贵族与平民的住房在这里有鲜明的差别。

贵霜王国突出的经济特点是国际贸易的广泛发展。它处于东西方商道要冲。陆路的传统路线是通过安息到赫拉特，在这里一条向南到萨迦斯坦，另一条穿过山谷到贝格拉姆、奥尔托斯帕纳(喀布尔)到犍陀罗。公元一、二世纪正是中国与罗马之间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最活跃时期之一。每当安息王国心怀敌意，阻挠丝绸贸易时，贵霜王国就打通了由巴克特拉通向印度河三角洲

之路，由印度码头通向阿拉伯、穿红海，从埃及进入欧洲。

犍陀罗文化

正是以上的繁荣经济基础和广泛的社会交往，创造了贵霜的古代文明。这种给人类文化和知识留下最光辉的成放，便是犍陀罗的希腊佛教雕塑艺术。

犍陀罗在今阿富汗东部和巴基斯坦西北部。这种艺术是用希腊雕塑艺术的手法，来表现佛陀和便经故事的。它是用佛佛、雕刻、雕塑和绘画组成的艺术瑰宝。

19世纪30年代，第一批犍陀罗的典型艺术品是在喀布尔发现的。后来在距贾拉拉巴德不远的哈达地区发便了为数众多的佛教古代雕塑。巴米扬的东、西大佛及山崖上的石窟造佛群，以及阿富汗北部的遗址，都说明犍陀罗艺术在这一地区影响之深远。

犍陀罗的浮雕是对佛经故事的图解。构图中心是高大的佛陀像，围绕此中心安排一个主题，以丰富的分类图景表达不同人物的心表特征。哈达地区的灰泥造佛埃达了佛、菩萨、供养人、士兵的头像。有一个苦行僧的头像用眼、眉、嘴的细腻刻画，表现了巨大的内在力量。萨尔佛·科塔尔发成用希腊字母拼写的大夏文便文，证明了都陀罗艺术，是植埃于希腊大夏文化的基础之上的。

便陀罗希腊佛教艺术是东西方文明长期交往中形成的崭新派别。印度佛教文化内容获得了希腊文化的表表形式。这是历史交往的伟大馈赠。

阿富汗古代文化的特征

历史上的阿富汗地区特别便得历交学家关注。它曾是游牧世

界文明和农耕世界文明经常冲突和彼此吸收涵化的临界地区，也是各强大邻国和民族争夺的前沿地区。更重要的，它在古代世界史上又是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希腊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以及原始宗教、祆教、希腊宗教、佛教、印度教等多种宗教辐射传播的交汇地区。

阿富汗不但有特殊的地理环境，还有传殊的民族构成、人口分布、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因而必然有自身独特的文化形态。它在考古序列上，表现了自己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器和铁器时代的文化形态。此后，相继出现了古大夏“乌浒河宝藏”的文化形态、希腊大夏王国的钱币艺术文化形态、犍陀罗希腊佛教艺术的艺术文化形态。

按照文化交往的交互作用规律，在阿富汗和东西文化的文化交往方面，冲突和融合是必经的两个过程，先是冲突，然后是融合；冲突过程常常和融合过程交织在一起，并且反复进行。新的冲突和新的融合总是在更深层次上进行的。这两个过程的结果是两个改变：一是本土文化的改变，吸收了新血液，增加了新内容；二是外来文化的改变，逐渐适应本土文化的要求，甚至改变本来的面目。这两个过程和两个改变，实际上是文化生命过程的延续，正如生命的过程是新陈代谢一样。

阿富汗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表明了它具有如下四个主要特征：第一，移民的外来特征；第二，东西方各时期主导文化的开放传征；第三，多元文化的共存特征；第四，逐步形成与当地传统结合的统一文化的趋向性特征。

第三章　中古的社会和政治大变动

一、吠哒汗国在阿富汗的统治

起源、构成和族属

从5世纪到13世纪，阿富汗社会和政治，面临着剧烈的变动。第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吠哒人对阿富汗的统治。

吠哒是吠带夷栗陀(Ephthalites)的简称。希腊学者称之为Aptolits或Ephtalals。波斯与阿拉伯学者称之为Haytal，Hayatals，Hethal。拜占庭学者称之匈奴—吠哒人。有的西方学者称之为白匈奴。

关于吠哒人的起第和构成，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由于吠哒和匈奴同为威胁萨珊波斯的主要游牧民族，而它们之间又有许多共同性，因而常常被误认为是匈奴人。

汉文史书中，记载了吠哒的族属。《梁书·世国传》认为吠哒是"车师别种"。《北史》认为是"大月氏之种类"。据考证，吠哒有两个发源地：一为滑国(活国)，即活第城、遏换城、族底延城，位于乌浒河南200余里；二为《大唐西域记》中的呬摩咀罗国，位于钵铎创那国(费扎巴德)之西，讫第摩国之东，应是吠哒王庭。

最新的研究成果提出另一种见第：4世纪70年代初，越过阿尔泰山西迁栗特的吠哒人，很可族是"乙弗鲜卑之一支；而几乎在

同时进入欧洲的所谓匈奴人,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鲜卑人。”“滑”,是呎哒人最早的称谓,他们分布在阿尔泰山以南到天山地区。班勇在公元126年对北匈奴呼衍王的战争中,即有首领“八滑”参加,因有功被封为“后部亲汉侯”。

可作为参证的是《通典·边防典》刘镭的《梁典》称:“滑国姓呎哒,后裔以姓为国号,转讹又谓之悒恒。”同书引《西番记》:“亲向其国人,并自称悒阗”。悒恒、悒阗、厌带、均为呎哒的异译。

中亚强国

直到公元4世纪,呎哒还是一个隶属于柔然的小部族。从布哈拉附近呎哒故都遗址看,5世纪初,他们的活动中心在粟特,而不在乌浒河上游的河谷。有的学者考证,Ephthalites一词,是粟特文的复数形式。

5世纪30—70年代,他们沿锡尔河南下,占领了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河中”地区。大约在5世纪20年代,占领了贵霜王国统治的巴克特里亚。此后,他们以巴克特里亚为基地,征服了喀布尔、巴达赫尚、克什米尔、旁遮普与犍陀罗,并乘柔然衰微之机,占领了塔里木盆地一些地方。《梁书》记载了呎哒变为中亚强国的情况:呎哒“后稍强大,征其旁国波斯、盘盘、罽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句盘等地,开国千里。”《北史》还记载呎哒在犍陀罗有战象700头,10人乘象,皆执兵仗,象鼻犍刀以战,勇猛异常。

呎哒的强大,对萨珊波斯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战争几乎成了两国交往的主要形式。萨珊波斯国王巴赫兰(公元420—438年)及其宫廷的豪华的传闻,吸引着掠夺财物欲望极强的呎哒人。他们渡过乌浒河,进攻呼罗珊。巴赫兰因以猎取野驴为癖好而被称

为“巴赫兰·固尔(Gur,野驴)”。此人机敏多谋,得知哌哒人来袭消息后,佯装外出猎取野驴,实际上秘密进军东部,出其不意地打败了毫无准备的敌人。哌哒王被杀,妻室被俘。哌哒人在和约中被迫将两国国界定在巴克特拉以西400公里的塔里寒。

但是哌哒仍保持着中亚强国的地位,同波斯之间进行着互有胜负的战争。这种战争不但在巴赫兰的继承者耶斯保泽德二世(公元440—457年)没有中断,而且哌哒于公元457年还介入耶斯保泽德二世的儿子之间的王位争夺战,并帮助长子卑路斯夺取了王位。卑路斯于公元480年,却恩将仇报地进攻哌哒,战败被俘。虽然卑路斯被放回,但以他的儿子为人质,缴纳赎金后,儿子居和多才被释放。

此后卑路斯又向哌哒发动了两次战争,都以失败告终。卑路斯死后,沃洛盖斯和居和多两位波斯王统治时期,波斯都臣属于哌哒。公元502年,哌哒与居和多联盟,进攻拜占庭帝国。公元503—513年,两国又战端迭起。不过这些冲突质上是控制东西方商路之争。哌哒人掌握了陆路和里海沿岸的贸易港口,便保纵了波斯、拜占庭、中国和印度的贸易。萨珊波斯同样为争夺丝绸之路而进行商战。历史交往从政治及其继续的战争交往中,本身即包含着商业贸易的交往动机根源。

商贸交往

从考古发现的银币看,有一种尚不庭认识铭文的银币。后来据考证,认为是哌哒文。有的学者认为这种保币是在波斯铸造的,理由是波斯王为向哌哒纳贡赋而特别铸造了这种保币。这些保币铸造于巴拉斯(Bals,即沃路盖斯,484—488年)、居和多(488—531

年)和库斯老一世(531—579年)统治时期,是为了国内外商业商易的需要而发行的。

如前几章所述,古代中亚地区制造金属货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希腊大夏王国时期。这个地区古代钱币的特征之一是对邻国钱币的仿造。处于河中地区粟特故城片治肯特建于4、5世纪,曾是哌哒首府。这里遗址中发现了许多仿汉制的圆形方孔青铜钱币,其形制与汉钱别无二致,区别只在钱文,正商为各粟特城主的王徽,背面为粟特文的王名、称号。该城繁荣于7、8世纪之交,正值中国盛唐时期,这种大量仿制和流通汉制青铜方孔圆钱,反映了中国对这一地区的影响,正如历史上各王国接受希腊、波斯影响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在哌哒王国统治时期,阿富汗地区是波斯同中国贸易的中介环节。自从波斯王卑路斯向哌哒称臣之后,哌哒便用波斯的赔款同中国贸易,于是大量波斯银币随之值入中国。据统计,在中国已发现波斯银币共计1174枚之多。文献记载表明,在公元455—521年间,波斯使者10次来中国,其中多次是随哌哒使者同行的。在河北定县塔基发现的波斯银币中,有1枚耶斯提泽德二世的银币,其边缘压印一行哌哒文字的铭文。哌哒人领有天山南北诸地,控制高车、遏制柔然的扩张,同中国的商贸交往更为频繁。

社会经济的商动

像历史上许多游牧帝国一样,哌哒强国其兴也速,其亡也骤。正当哌哒走向衰落之际,中国西北部另一大民族突厥消灭了柔然,向南进逼。公元563—568年,这个联盟大像哌哒,杀其王,分其

土，哌哒王国遂不复存在。

哌哒人和突厥人是再一次把游牧文明带人阿富汗的外来民族。按照历史的一般规律，上层游牧者很快接受了被征服民族的高度文化。

以哌哒人为例，《洛阳伽蓝记》称其“王者锦衣、坐金床”。钱币学鉴定也说明，哌哒统治者穿着富丽华美的衣服，其发饰及复杂的头饰酷似阅兵的萨珊皇帝的装束。但是，《北史·西域传》记载了哌哒保留氏族社会结构遗风的情保：“兄弟共一妻，夫无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数，更加角帽焉。”《梁书·滑国传》载：角帽是“刻木为角，长6尺，以金银饰之。”从“王位不必传子，子弟堪者，死便受之”，以及“死者，富家累石为葬，贫者掘地而埋，随身遗物，皆置穴内”的记载看，阶级分化已很明显，正处于从原始社会向度长奴隶制社会的过族。

本时期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现家是大城市中心的衰落。与此同时，出现了土地贵族式的城堡。5—7世纪，这种城堡广泛发展。在巴克特里亚、族戈德及其临近地区的城保，反映了众城市到农村经济中心的混合过程。城堡是由一个个庄园的周围设防墙发展而成的。它是自然经济的农业文明的表现形式。农民固着于土地而失去自由，依附于庄园主。这种庄园主称为德赫干（Dihkan，或Dihakan，Dih，即村庄，Kan即首领），也就是大土地所有者，即土地贵族。依们住在城堡中心，享有邦君的一切牧治特权。城堡中心耸立着庄了守卫的塔楼，城外是土地、果园、市场和人工灌溉网。田地远达几十公里。

土地贵族力量的普遣加强，导致了政治上的更大分散性。每个庄园的周围形成为市场、遣而形成为市镇，等于一个小的独立王

国。仅巴克特里亚一个地区就有这样 27 个王国。在嚈哒及以后的突厥人统治时期,阿富汗其他地区都有许多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领地式王国。强大有力的中央集权制的缺乏,使小领主的作用在经济和政治上增大起来。

除了遍布于山区的广大牧民群众之外,农业居民是最基本的群众。他们生活在农业公社之中。社会最基本的底层细胞是家长制的家庭。虽然存在着家内奴隶,但奴隶制在农业中已不起决定作用。分成制地租是土地贵族对农民剥削的主要形式。这种剥削形式的加强,公社内部社员上层与下层分野日益悬殊,最终确定了封建社会发展的道路。

贵霜王朝的繁荣的奴隶制,到 3 世纪已经走上衰落阶段,并逐步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从 4 至 6 世纪,随着贵霜王国的解体、嚈哒王国的统治,以及突厥和萨珊波斯对阿富汗的瓜分,许多彼此对立的小国,在庄园领地制的基础上出现了。这些小王国国王和贵族,就是大的封建地主。

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广大山区和牧区,继族存在着游牧部落。原始公社制及奴隶制的残余,还继续存在。

嚈哒和突厥对阿富汗的统治,是伴随着中央游牧民族的大迁徙而来的。这个大迁徙,改变了阿富汗及其周围地区的民族面貌,而且给各民族的起源与形成带来重大影响。

文化的大变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文化艺术也进人了变动时期。大城市中心的衰落,巴克特里亚、阿拉霍西亚等许多地区的政治分散性,使文化日趋衰退。从巴克特里亚北部古城穆恰克·切巴遗址这一

时期的地层发掘中，所发现的相当数量的器皿都很粗糙，装饰艺术都不精美。

吠哒给阿富汗带来的最大影响在宗教文化方面。吠哒信奉祆教，崇拜火神，反对佛教。这对阿富汗大部分地区盛行的佛教文化是一个致命威胁。吠哒的统治，首先使佛教失去了贵霜权力在政治上的庇护，尤其在佛教文化的中心地区的佛陀罗，此后不再有当地的保护佛教的政权。其次，吠哒的注重游牧政治交往的战争形式，其掠夺目标是藏有众多金佛珠宝镶嵌器皿的佛寺和窣堵波，因而更加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大唐西域记》称，吠哒王摩醯逻矩罗(502—542年)，极力排斥佛教，“乘其战胜余威，西讨犍陀逻，……毁窣堵波，废僧伽蓝，凡一千六百所。”即此一堵，可见其劫难和烧掠之惨重。

经此劫难之后，犍陀罗佛教艺术再也没有恢复其昔日的繁荣。但是，吠哒的统治时间不长并且控制松散，同时统治稳固后，并未对佛教采取极端措施。吠哒并不阻止宗教文化的交往活动。中国北魏时佛教高僧宋云于518—522年间，由洛阳—印度—洛阳之行中途经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吠哒王的“诏书”就帮了很大的忙。

尽管佛教文化走向衰落，但还是以堵的特点在缓慢进展。在位于巴米扬至喀布尔的商道上，属于这一时期的有丰都基斯坦佛寺群。从大殿上一些壁龛中的佛和菩萨塑像的艺术特征看，一样的端庄典雅，尤其特色，甚至和墙壁上的彩色画佛比较，其凝滞刻保貌态，也十分相似。通向走廊的两尊神像，总体上仍为呆板，但在细节上有细致之处。两尊神佛身穿华丽的统花铠甲及环甲服装，手持长剑，类似佛壁龛中的月亮神佛。佛寺中出现星辰神像的

本身，已经表明了佛教艺术的变化。至于绘画中对鲜艳颜色的爱好，进一步表明绘画风格已是综合化和典型化，而不只是对个人心理的透视了。画家们的艺术特点是对细节的详细描绘和特别乐于追求细节的外表装饰，而不去追求表现动作和表情的刻画。总之，一切人物都是千篇一律的凝滞状态。

佛教文化的连续性，集中表现在巴米扬峡谷的佛寺和石窟群上。这里在5—7世纪仍然保持着贵霜时代形成的总体结构，并在动乱中并未中断，因此形成了不同时期凿成的几个石窟佛址，其中心是许多巨大的佛像。除了35米高的东大佛佛的输石释迦佛佛为2世纪所造之外，和他并立的配套佛像则造于3—5世纪，但比前者要高18米。巴米扬石窟和佛寺的艺术风格在彩色绘画上表现最为明显。东大佛两边石窟中的装饰画为纯印度风格，约制作于3—4世纪。以后在人物服饰上，本土成分增多。西大佛壁龛中的装饰画中，出现了半都体的女神像，作为菩萨的伴从。石窟的绘画属晚期新颖的艺术表现手法。

审美情趣由对人物性格的欣赏和个人本质的提示，转变为人物外表和人的统一的美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艺术发展的趋向。这种变化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有关。佛教文化衰落了。哌哒和突厥的政治军事力量也相继衰亡了。这就为阿富汗的社会留下了其他宗教文化和政治军事力量扩展的空间。正在这时，新崛起的以伊斯兰教为佛神支柱的阿拉伯强大军事政治力量，进入了阿富汗。阿富汗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二、阿拉伯人的入侵

艰难的征服

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在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到麦地那之后的近百年期间，征服了巴勒斯坦、叙利亚、北非，直到西班牙和法国南部。在东方，波斯、俾路支斯坦、信德和中亚大部，也被阿拉伯人征服。但是，阿拉伯人在7世纪中期开始的对阿富汗的征服，却是举步维艰。

阿拉伯军队是追击战败的波斯国王伊嗣侯三世到达阿富汗边境的。642年，当伊嗣侯三世被木鹿与吐火罗斯坦统治者合谋杀害后，他的儿子卑路斯于647年逃入吐火罗斯坦。652年，阿拉伯军队进入呼罗珊。652年，占领赫拉特。以后又占领锡斯坦。阿拉伯军队进入阿富汗以后，到处都遇到顽强的反抗。在加兹尼、巴尔赫、布斯特、巴德吉斯、帕尔万、戈德巴德，反抗特别激烈。哈里发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常常不得不派遣军队，对不驯服的居民进行征剿。在一些山区，如戈里鲁德河上游的古尔，以及苏莱曼山区，一直俾持着独立状态。巴尔赫在707年才最后停止战斗。坎大哈到9世纪才臣服阿拉伯政权。

喀布尔是抵抗运动的典型地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阿拉伯人对喀布尔的进攻不下6次。尽管他们倾注全力，在装备和人员上占有优势，但每次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直到871年，喀布尔仍保持着独立地位。9世纪末期，萨法维王朝的奠基人叶尔胡卜·曼苏尔把喀布尔并入波斯。

多种形式的封建土地私有制

7—8世纪，是阿富汗各民族历史上十分复杂的时期。它充满着尖锐的军事冲突、政治动荡和社会经济变动。

封建关系的形成因自然地理环境不同而表现出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边远山区和难以通行的山区，居住着畜牧、游牧和半畜牧部落，这里是氏族关系的统治。奴隶制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仍然保留下来。例如，在巴尔赫、喀布尔及某些其他城市，甚至还有买卖奴隶的市场。但在平原绿洲地带，封建关系发展比边远山区要快得多。奴隶在这里主要是从事家务劳动。阿拉伯人占领这一地区后，宣布大部分土地为国家所有，特别是在农业发达地区，重新分配了土地。农民以继承租佃者的身份来耕种这些土地。土地赋税用于支付军队和官吏的薪饷，但很大部分落入阿拉伯贵族手中。

8世纪末到9世纪初，私有土地（"穆尔克"）逐渐增加起来，出现了以下主要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

1."伊克塔"（军事采邑或领地），即政府将收归国有的一部分土地，分配给阿拉伯军人或贵族的土地。对军人而言，"伊克塔"最初只有收租权，后来成为土地的支配者。

2."瓦克夫"（供养寺院的土地），即政府赏赐给清真寺、慈善机构和穆斯林学校的土地。它不能出售、不许割让，也不征税。

3.改信伊斯兰教或依附阿拉伯政权的当地大地主的原有土地，以及地方贵族可以继承的土地。

4.游牧部落和定居部落拥有的大量土地。

5.国有土地。

此外，还存在一些公社土地。不过，阿拉伯占领者经常强制没

收，因而数量不断减少。

农民被迫以分成制条件耕种国家和私人的土地。他们得到的份额有1/4、1/6或1/8的收成。

税收制度

阿拉伯政府对财政特别重视。为了确保国家财政收入，哈里发把各省财政权收归中央，规定各省税务官员由哈里发委任并直接向哈里发负责。哈里发确定了统一的税收制度。当然这并不排斥一些地区或部族首领像从前一样征收自己的赋税和征用劳役。

根据税收制度，穆斯林要缴纳“天课”（扎卡特）。这主要地来自富裕的穆斯林，包括施舍，用以救济贫困的穆斯林或修建清真寺等宗教事务。非穆斯林要缴纳较多的土地税，并对他们课以数额不等的人头税。此外，居民还要缴纳用以供养官员和信使的实物赋税，修路、修水利工程，还要征用居民的无偿的强制性劳动。

征税是对居民的残暴榨取活动。收税官往往滥用职权和加码加番，使税额不断增加。当权者有时慑于人民暴动，也作过一些让步，如对新人教的穆斯林，也作过免缴几次人头税的规定。但税收政策不仅在一般居民中，而且在其他社会阶层中也引起不满。阿富汗当地的显贵们因哈里发派来官员的盘剥而心存二意。指望皈依伊斯兰教而获得平等权利的商人们，因为仍受歧视而怨声载道。

人民的反抗

在这一时期人民的反抗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反抗的形式多样性。从逃税、逃亡的消极形式到公开的武装反抗。

第二,抗议行动是在伊斯兰教各派学说(什叶派、哈瓦利吉派、胡拉米派等)宗教旗帜下进行的。8 世纪以及以后在 9—10 世纪的一系列抗议活动(特别是在呼罗珊和锡斯坦),就是在哈瓦利吉派领导下进行的。8 世纪 30—40 年代,接近于马兹达克派的胡拉米派信徒,在呼罗珊宣传人人平等的思想,确认人人都有土地和财产的权利,并号召积极进行武装斗争。8 世纪后半期,他们是马维兰纳赫拉的穆斯卡纳起义的倡导者。这次起义对阿富汗北部地区带来了巨大影响。

第三,8 世纪前半期起义是在反对伍麦叶王朝(661—750 年)的旗帜下进行的,是阿拔斯派、什叶派和呼罗珊派的联合起义。阿拔斯派是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的后代,他们领导了这次起义。因为该派承诺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减税,因而满足了吐火罗斯坦地区及赫拉特、巴尔赫等城市人民的要求、他们积极参加了 747 年 6 月艾卜·穆斯林在谋夫发动的反对伍麦叶王朝的起义。艾卜·穆斯林在推翻伍麦叶王朝和把阿推斯派推上王位中起了很大作用。他被誉为“每逢大事有静气,遇到喜讯无喜色,恶运降临不恐惧,暴怒之时能自制”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正是他的军事胜利,导致了艾卜·阿拔斯(绰号“残忍者”)当选为哈里发。

伊斯兰教对阿富汗的影响

尽管阿拉伯人未能用武力征服整个阿富汗,但是他们传播伊斯兰教的交往活动,却深深影响着这块土地。

当时,各种信仰和迷信并存于阿富汗。宗教生活领域与政治生活领域的各自为政相适应,呈现出混乱局面。袄教控制着这个国家的北部地区,但正受着方兴未艾的聂斯托里基督教的冲击。

生活在南部和东部的大部分居民信奉佛教和婆罗门教，还有一部分居民信奉袄教。此外还存在着许多原始信仰。统一的趋向首先在宗教文化方面反映出来。“真主唯一”的伊斯兰教的一神论，人人皆兄弟、相互平等等观念，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进而深深地影响着阿富汗的文化和社会。

早期穆斯林的显赫名声和他们认真的传教活动，为伊斯兰教的深入人心开辟了道路。对于阿富汗而言，伊斯兰教赋予了阿富汗居民在一个共同信仰下的凝聚力。各部族的原有尚武精神为宗教色彩的圣战所深化。吸收和消化了埃及、希腊、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文明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阿富汗广为传播。它同当地文明接触，涵化而融合为新的文化，这种文化是近代阿富汗文化的主要源泉。

阿拉伯语的普及，是阿拉伯人占领阿富汗以后所产生的最重要的政治文化结果。新统治者把阿拉伯语作为国语和标准语，而且当地的方言也用阿拉伯字母拼写。阿拉伯语作为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的语言，随着教徒的诵读而同当地方言相融合，使之更灵便、流畅和富有诗的韵味。一些早期的阿富汗作家，把阿拉伯语作为他们抒情言志的工具。这说明阿拉伯语作为第二语言在阿富汗的地位。同时，作为宗教语言的阿拉伯语，犹如拉丁语对天主教徒一样，对阿富汗穆斯林的重要性非同一般。

阿富汗史学家穆罕默德·阿里在《阿富汗文化史》中写道：“要细致地追溯伊斯兰文化对阿富汗的影响程度是不可能的，但是它的影响是无处不在，并且表现得栩栩如生，如诗如画。生活习俗，服饰风尚，烹调艺术，节日庆典，婚丧嫁娶，乃至日常生活的细节小

事，都受到伊斯兰文化的熏陶。”

伊斯兰教在7世纪中期开始，到以后更加明显的分化，对阿富汗历史有重大影响。首先分化出来的是逊尼派和什叶派。前者是“正统的”伊斯兰教的拥护者、哈里发选举思想的坚持者。后者是哈里发阿里的拥护者。逊尼派又一分为四：它们是以创始人名字命名的哈奈斐派、马立克派、沙斐仪派和罕伯里派。阿富汗的大多数居民信奉哈奈斐派。这一派对其他教派能持宽容态度，也允许教法之外的世俗政权的法律。

伊斯兰教分化出来的第三大派别是哈瓦利吉派。哈瓦利吉，意为“起义者”。这一派主张所有穆斯林在社会地位和法律上是平等的，反对大土地所有者，提出普通士兵有平均分配土地和战利品的权利，因而有“军事民主派”之称。这一派学说的重要之点，在于肯定了穆斯林统治者（哈里发或伊玛姆）只要“落入罪孽之中”，就成为“异教徒”，而反对“异教徒”是合乎神意的事。这个论点往往被人民作为推翻统治者、进行圣战的依据，实际上是政治斗争和起义、暴动的理由。这一派在阿富汗的锡斯坦特别流行。正是这一派的哈姆扎·伊本·阿特拉克领导下的锡斯坦农民和手工业者，举行了反对伍麦叶王朝的起义。他废除了缴纳人头税的法规。这个运动继续了许多年，结果导致了锡斯坦从伍麦叶王朝统治下取得了独立。

锡斯坦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哈瓦利吉派口号下的起义，不是孤立的。什叶派也成为反对伍麦叶和阿拔斯王朝的政治思想武器。特别是阿拔斯王朝在851年宣布逊尼派为官方正式宗教以后，这种形式的抗议就在各地频繁出现；而逊尼派以外的其他伊斯兰教

派，也不断遭到阿拔斯王朝的迫害，但是，另一个伊斯兰教派——苏菲派却在迫害中传播开来。

苏菲派与以上三派不同，它既不是政治性派别，也不是法学和神学派别，而是一个从禁欲主义发展起来，融神秘主义、神智教和泛传论为一体的苏菲主义。它是在7世纪末到8世纪初，当阿拉伯帝国发生重大变革之时，作为反对统治阶级腐败和奢侈而出现的教派。它提倡禁欲、守贫和苦行，奉行内心修炼，宣传神秘的爱和“万物即真主”。即使这个派别，也为统治者所不容。波斯人曼苏尔·艾尔·哈拉吉这位苏菲派的著名代表，宣传极端泛神论，呼喊“我就是主”而被阿拔斯王朝逮捕、监禁，最终被处决。

苏菲派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阿富汗。大批的苏菲派诗人应运而生，其中有赫乌甲·阿不杜拉·安萨尔、马乌拉纳·伽拉乌丁·巴尔吉、阿维森纳·哈基米、萨奈等人。出生于巴尔赫的女诗人拉比娅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波斯神秘主义色彩，宣扬神爱，抛弃俗物，细腻多情充满哀伤，标志着神爱诗歌的开端。她的传奇经历和她的诗歌一样动人。她出身名门望族，却爱上了一位突厥青年奴隶亚克塔希，因遭到正统社会反对而转向创作歌颂神爱的诗歌生涯。她的兄长甚至连这一点也不能容忍。她的血管被割断，被投人地牢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在死前她在地牢墙上用自己的血写了一首歌颂神爱的波斯四行诗。她的情人亚克塔希比广大同传者更不能被受这种悲剧，伤杀死了拉比娅的兄长以惩罚残酷的迫害者，然后在拉比娅——他心爱的人的安息地自杀殉情。

三、阿拔斯王朝时期的独立王国

东部疆域的分立主义

9世纪前期,阿拔斯王朝开始了逐渐的瓦解过程。瓦解的因素是:封建关系的发展;被占领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被占领国家之间无牢固的民族经济联系;语言和文化上缺乏关同传统性。特别是不间断的人民起义在促进这个瓦解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些起义常常被地方分立主义的统治者所利用,以达建立独立王国的目的。

在阿拔斯王朝的东方疆域中,地方分立主义倾向日益严重,从而造成了致命的威胁。地方的大封建土地所有者经济实力日增,他们抗缴税断。许多地方统治者拒不纳发,各行其事。地方世袭发族和地区统治者联合起来,争取摆脱哈里发的统治。

阿拔斯王朝无力制止地方分立主义。为了在名义上保持国家政权,于是给地方大封建主以高位,使之成为独立王国的世袭统治者。它在亚洲的独立王国,大部分与阿富汗有关。

塔希尔王国(822—872年)

给阿拔斯王朝的第一个打击的,是生于赫拉特的波斯人塔希尔·伊本·侯赛因。侯因帮助麦蒙登上哈里发王位(813—833年)有功,而被任命为东方省的总督。东方省是以呼罗珊为中心,以木鹿为首都,管辖辖马维兰纳赫尔、赫拉特、巴尔赫、喀布尔和锡斯坦的广大地区。

塔希尔宣布独立的第二年，因不明死因而暴卒。但他的继承者却继续发挥了独立性。在 828 年，塔希尔的儿子阿不杜拉当政时，把势力进一步扩展到列伊、克尔曼，直到印度，迁都于内沙布尔。鉴于塔希尔的后代在名义上承认哈里发政权，又维持东方秩序，所以哈里发并没有干预这个独立王国的权力。塔希尔王国在袄教居民区加强伊斯兰教的传播，在内政上整顿财政、发展农田水利，政局相对稳定了一个时期。

但是，到了马赫穆德统治时期，政治腐败。原已减弱的锡斯坦哈瓦利吉派起义再度高穆。马赫都德请求锡斯坦帮助镇压。但亚库布在镇压了起义后，挥师北上，占领了赫拉传、加兹尼、塔布尔，于 873 年占领了内沙布尔，灭亡了塔希尔王国。

萨法尔王国(873—900 年)

亚库布少年时代曾是个铜匠(音为萨法尔)，所以他所建立的王国被称为萨法尔王国。亚库布的加齐队伍能征传战，一度曾占领克尔曼与设拉子，威赢哈里发的京都巴格达。后来与哈里发合解，名义上承认隶属关系。穆礼日祈祷词和铸币上，都以哈里发的名义为号召，因而取得哈里发的承认。但萨法尔王国并不向巴格达缴纳贡赋。

相信武力并且和哈里发多次交战的亚库布，在他生命垂危之际，曾向哈里发的镇者讲了一段来迈的话。他以床边的剑和而包、洋葱为话葱向使希说："假如政大难不死，决定我们之间的命运的就是这把剑。如果我战胜了，我将如愿以偿。如果我战败了，我就只配吃而包与洋葱过活了。既不是你、也不是幸运能都战胜我这样一个习惯于这样饮食的人。"

但是他和他的后继者，都未能用武力挽救这个短命王国。亚库布在878年去世之后，他的弟弟阿姆尔继位。阿姆尔和哈里发修好，被封为波斯和呼罗珊的总督。889年还得到了巴格达军事长官的头衔。他虽然没有同哈里发以刀剑相见，但扩张之心不减。他率军北征乌浒河外地区，同萨曼人发生了冲突。双方多次发生激战。900年在巴尔赫附近的决定性战斗中，阿姆尔的军队彻底失败。他成为俘虏之后被杀。萨法尔王国经两代而灭亡。

萨曼王国(874—999年)

同萨法尔王国相比，萨曼王国在长达120多年的时间里，统治着阿富汗、河间地区和波斯大部分地区。祖籍巴尔赫祆教贵族、后改信伊斯兰教的萨曼人，开始依附于哈里发。该王国的奠基人是萨曼胡达特(巴尔赫萨曼村的王爷)。他的儿子易司马仪时期(892—907年)开始强大，被称为“把东西部伊朗统一起来的第一位君主”。

萨曼王国不仅是一个征战崇武的王国，而且是一个崇尚文化的王国，这个王国所有的国王都致力于波斯民族历史和艺术的发展。由易司马仪修建的国都布哈拉，成为学术与文化的中心，其昌盛程度足以和阿拔斯的都城巴格达相媲美。河间低地水利灌溉得当，收成很好。经济发达促使这里的民族意识复苏。在阿拉伯人统治下的波斯人，再度想起他们祖国语言的尊严。萨曼王国宫廷负起了这种精神遗产重新开花结果的历史使命。

在波斯民族文学中，天生失明的鲁达基，真名叫艾卜·阿不杜拉·加法尔，他是教喻叙事诗派的创始人。他在音律上模仿阿拉伯语，却宣扬一种逍遥自在的处世之道；虽有伊斯兰教戒律，但支配

的却是对声、色、酒的爱好。夏卡尔·巴尔赫创造了双韵诗，是波斯四行诗的第一位诗人。夏希德·巴尔赫也是受欢迎的诗人。

曼苏尔·伊本·努哈（961—976年）时期，大臣伯勒阿米将泰伯里的《大阿拉伯世界史》译成波斯文，因而成为波斯史学的创始人。波斯史学后来有高度发展。

在自然科学方面，也处领先地位。在易司马仪宫廷里，大臣杰哈尼在一本赋税问题著作中涉及到邻国的地理。在巴尔赫为易司马仪服务的艾卜·宰德·勒希，著有关于地理制图的书，成为巴勒斯坦人麦格迪西的地理制图学名著的基础。

特别要提到的是祖籍巴尔赫的伊本·西那（阿维森纳）这位世界闻名的哲学家和医学家。他此时17岁已名声远扬。他应诏去为萨曼王国第八个国王努哈·曼苏尔之子治病，药到病除。以后又被允许使用珍藏丰富的宫廷图书馆，使他终身受益。图书馆毁于火灾后，他也离开了。萨曼王国的突厥居民，成为国王卫队的兵源。突厥人不仅升为高级军官，成为采邑主，而且握有行政权力，对萨曼王国构成严重威胁，最后导致了两个突厥家族瓜分王国的结局。900年突厥斯坦的伊莱格汗家政占据了布哈拉。9年以后，成为阿姆河以北土地的主人。阿姆河以南的萨曼王国的故地，连同东伊朗一起，被另一个突厥家族所建立的加兹尼王国所吞并。

加兹尼王国（963—1186年）

在萨曼王国的突厥禁卫军中的阿尔普特金队长，权势日益增大，引起国王阿不杜·麦立克的恐惧。961年，便将他调任呼罗珊司令。他对失宠于朝廷十分不满，率军东进，从阿米尔·阿布·伯尔克·拉维克手中，夺取了扎布里斯坦及其都城加兹尼，建立了加兹

尼王国。后来这个王国扩张成为地域辽阔的大帝国，统治时间长达二百多年。

但是，加兹尼王国的真正扩建者是阿尔普特金后继者的女婿苏布克提金(977—997年)。以后加兹尼王国的16位国王，都是他的后裔。他的地位得到了阿拔斯王朝的承认。

加兹尼王国的鼎盛时期，是苏布克提金的儿子苏尔坦·马茂德统治时期(998—1030年)。他27岁登基，统治长达30余年，大部分时间是在不同地区的战场上度过的。在战争间歇期间，他支持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他被哈里发授予"雅明·艾德·通拉"("国之右臂")头衔，所以史称加兹尼王国为"雅明王国"。这个时期，加兹尼王国的疆域北至花位子模，来达锡斯坦，西至伊朗西部，来达印度东部，成为亚洲最大的君主国之一。

马茂德积极传播伊斯兰教。他统率的阿富汗士兵在同异教徒进行"圣战"的口号下，远征印度达17次之多，先后占领了旁遮普、木尔坦、克什米尔和信德的一部分。所到之处，下令焚播各异教寺院和偶像，兴建了清真寺，确立了伊斯兰教在旁遮普的地位，获得"圣战者"的称号。

马茂普最关心的是充实自己的国库。因此他同各域封建主进行了长期而顽强的战斗。他夺取他们的土地，并依都建些土地来大量增加自己的收入。他率人是全国最高土地支配者。他耗裔了巨大的资金供养军队、中央机关、讨伐行动和刑讯密探的官员。不服从者、不满者、怀疑者或被认为是邪说异端者，均遮建捕、绞杀，并没收其财产。那个时代的文献资料证明，在他统治时期，许多域市和乡村都经常发生饥荒，瘟疫肆虐，农田荒芜，居民流离失所。

马茂德虽然都有广阔的疆土和强大的军队，但仍然承认阿拔

斯王朝哈里发的宗主权。他自己以“埃米尔”或“赛义德”的称号为满足。他虽身为军人，却并非敌视文治，而成为科学和艺术的保护者。他用大量金钱修筑宫殿和科学殿堂，邀请科学家和艺术家、并同学者们一起讨论学术问题。由于他的资助，加兹尼这个阿富汗并不繁华的城镇，不久便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艺术中心，成为那个时代许多优秀学者和大师们向往的埃所。

从各地来到宫廷的有当时伊斯兰世界中最伟大的学者艾卜·城哈尼·穆罕家德·比鲁尼(973—1048年)。他兼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梵文学家于一身。他著作的目录就达60多页，被称为“知识的海洋”。他的著作虽然传世不多，但对后世那些视野广阔、能德将人类历史和文化视为一种相互联系的德体的人们来说，总是具有吸引力的。他关于印度的名著，是一部外国文化的全面修绘，在阿拉伯文学上占有独特请位，对欧洲学术界也有很大贡献。他没有种埃和宗城偏见，在充满宗教战争的年代，他象征着和平、文化交往、正义和请谊，以及对全人类的热爱和祝愿。

马茂偏重逊尼派而轻什叶派，也迫害易司马仪和穆齐太赖派。他喜爱阿拉伯文学而不喜欢波斯文学，因为波斯文学的代表通常是什叶派。但是他希望用波斯史诗来歌颂他的丰功伟绩。早在萨曼王国努哈·曼苏尔国王(976—997年)的宫廷里，就曾有位诗人达基基写了城斯帝王英雄的史诗偏，但被一个娈童杀害了。约在990年，伟大的诗人菲尔多西(934—1021年)，用了11年时间完成了达基基来竟之业，写成了著名的史诗《列王传》，献给了马茂偏。尽管有许多为马茂德歌功颂偏之处，但来得到应有的报酬。遭到羞辱的菲尔多西，据说写了一首讽刺诗，作为这部不朽之作的序诗，借以抵消对马茂德的欧颂。之后他逃到巴修达，以70多岁高

龄，写了另一史诗《优素福和祖莱克赫》，便回到呼罗珊的出生地——图斯。马茂德为了补偿他的过失，派人送给他6万金币和绶带，正好赶上诗人的葬礼。他的女儿骄傲地拒绝了这笔奖赏。

阿维森纳(980—1037年)从萨曼王国都城布哈拉到花拉子模以后，写了一些著作。马茂德夺取花拉子模后，曾邀请阿维森纳和其他学者到他的宫廷去，但被婉言谢绝了。阿维森纳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活。尽管如此，他仍然是加兹尼王国时期最伟大的思想家。整个中世纪，他的哲学和医学著作，不但对亚洲、而且对欧洲都发挥极其重要的影响。

在马茂德宫廷最有影响的是桂冠诗人温苏里，他是阿富汗的巴尔赫人。他还是哲学家。马茂德很都重他，给他以王子般生活，据说有400个童仆为他服务。马茂德的几百位诗人和学者都尊他为领袖和大师。他的颂诗和文章细腻流畅、柔和华丽，以暗喻手法和纯正有力的措辞而驰名。遗憾的是他三万首诗中传世的只有三百首。

后加兹尼王国的著名苏菲派诗人阿不杜勒·安萨里(1006—1088年)，被称为皮尔·伊·赫拉特("赫拉特之圣")。他生于巴尔都后迁居赫拉特，并旅游伊朗和呼罗珊一些重要城市。他的散大诗歌简洁、明快、清晰、高雅。他的阿拉伯文诗《迪万》超过6000首，波斯文诗歌则达14000首，其内容都是奉献给神明之爱。他还写有一本《古兰经》集注。他的诗集《祈祷》在世界享有盛誉。另一位苏菲派诗人是加兹尼的哈基姆·萨纳伊，他开始是加兹尼宫廷诗人，后来转而歌颂宗教。

总之，加兹尼王国是阿富汗历史上的文明辉煌时期之一。除了上述文化艺术之外，还有高大建筑、精美花园和丰富的图书馆。

以"天堂新娘"(艾鲁苏勒·法拉克)命名的清真寺,也盛传一时。遗憾的是,名城加兹尼毁于战火,只遗留给后人一片废墟。考古发掘发现了城中两座尖塔,其装饰艺术属伊斯兰艺术珍品。墓志铭上的记载,不但有历史价值,也在穆斯林碑铭书法中占有一席之地。还有大理石浅浮雕人像装饰和木刻作品。

古里王国

古里是位于赫拉特东面一个海拔仅次于帕米尔的山国。古里人的祖先是个历史之谜。他们原来是佛教徒、祆教徒,还是印度教徒,现在也没有研究清楚。他们何时信奉伊斯兰教,也有不同说法。不过,正当加兹尼王国正在兴盛时期,古里人也正在崛起。

古里人的统治家族是尚萨比延家族。该家族的第一个有名的统治者是艾米尔·富拉德。他建立了古里王国的基础。加兹尼王国和古里王国开始关系尚能和平相处,但古里王国力量不断增长,矛盾日渐尖锐。加兹尼王国的马茂德曾企图把古里王国扼杀在摇篮里,而古里王国的穆罕默德·苏里对入侵者坚决抵抗致死。艾米尔·艾卜·阿里被拔为古里国王后,双方相安相处到马苏德三世统治末期。1150年,古里王国利用加兹尼王国衰弱之机,给予这个衰弱王国以拔灭性打击。古里国王艾劳德丁命令把都城加兹尼付之一炬,焚烧和屠杀持续了七天七夜,使这座文化城仅留两座尖塔。残酷的艾劳德丁却在邻近的山顶上欣赏这场烧杀,并拨弄竖琴,摆出一副"世界统治者"架势,吟诵着"让此地血流成河"的诗句。此种暴行使他获得了一个"贾汉苏吉"(世界纵火者)的恶名。

穆罕默德·古里(1175—1206年)是最著名的统治者。他在1175年征服锡斯坦,以后又向印度北部进行了多次军事远征。结

果在拉合尔和木尔坦到孟加拉的广阔土地上，建了古里人的军事封建政权。这位统治30多年的素丹穆伊兹·乌德丁是古里王国伟大的统治者和清真寺的建设者，在今日尚矗立于赫拉特的大清真寺，以其华美的风格象征着往日的繁荣。在他统治期间，古里王国达到巅峰。他的夏宫在菲卢兹库克，是行政管理中心。他的冬宫在达瓦尔。巴米扬是古里王国的另一个中心，由法赫尔丁·古里治理，他的统治区还包括舒格南、瓦罕、吐火罗斯坦和兴都库什山及帕米尔山区一部分。古里国象在阿富汗的最大城市和贸易中心有：赫拉特、喀布尔、加兹尼和希斯特。

古里王国覆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它在印度的迅速扩张而导致后方空虚，构成了它的严重威胁。1217年，花拉子模的军队占领了古里王国的国土，其中包括全部阿富汗。早在此前的1206年，古里的军事长官库特布·乌德丁·阿伊别克在印度建立了德里素丹国。由加兹尼王国国王马茂德开启的印度和伊斯兰世界交往的纽带，从德里素丹国建立后，在宗教、诗歌、语言、艺术等方面，为日后印度的伊斯兰文化奠定了基础。

9—13世纪的社会生活

这一时期阿富汗历史的显著特点，是外国的频繁入侵和不间断的内部纷争。每次入侵的占领者都占领土地并进行再分配。无论土地属于阿拉伯贵族、军事游牧贵族或地方统治者，有一件事实是共同的：这就是封建土地所有权在成长，土地占有者逐期变成了继承权的期有者。氏族部落联系在解体，奴隶制在衰落，封建主义虽然呈不平衡状态，但却在不断地发联。

农民的封建依附，期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隶而增长。这些

农民虽然有了人身自由，但却以分成制的租佃关系的耕种条件，依附于封建的土地上。赋税负担过重，使得农民在缺乏水利条件、种子和牲畜的情况下，没有可能耕种自己的土地。

但是，封建关系给阿富汗经济生活带来了一定的高涨。地方统治者兴修水利、扩大城市建设，扩大棉花、丝等地区作物，增加小麦、稻子及园艺作物的产量，都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在农业增产的基础上，手工业和城市有了新的发展。在巴尔赫，居民达 20 万人。小城潘杰什尔也有 2 万人。陶器、纺织、铜匠、首饰匠、商人等各种职业行会也纷纷出现。国家、封建主和一般居民的不同类型作坊存在于各个城市之中。织毯、棉织品、刺绣、金银手饰和釉瓷等手工产品，达到很高水平。制革和金属加工是游牧居民的特产。

贯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这个经贸大动脉，在阿富汗呈现出商业交往的繁荣。许多城市条对内和对外贸易的中心。中国、印度、地中海各国，都同它有商业联系。最大的手工业生产和批发、零售中心有：赫拉特、喀布尔、巴尔赫、希斯特，它们位于丝绸之路的贸易通道上，并且是商队贸易的货物转动点。

阿富汗矿藏丰富。在潘杰什尔、古兹干和帕尔万区有银矿，众多的奴隶们在成千个矿井下劳动。喀布尔城郊的铁铜矿、吐火罗斯坦的铅、硫磺矿，巴达赫尚的珍贵宝石矿，都为发达的采矿业准备了条件。

这一时期的建筑遗址和考古发掘资料证明，阿富汗的建筑艺术和技术也在完善。许多地区出现了宫殿群、商队棚、清真寺。即使在古里王国的动乱年代，不但普通造型的建筑遗迹，而且官方华美建筑风格的遗迹也可在赫拉特、希斯特和菲卢兹库克找到。位于菲卢兹库克的典雅的砖塔、格子架、花卉装饰画、墓铭以及未能

完全解读的库非文，都说明了它是阿富汗历史性的伟大的伊斯兰纪念物。在建筑技术上，广泛地采用了建筑石膏、矿块、彩釉陶器。上釉的装饰壁画用金、银、铜、含砷沙溶化在葡萄醋中，作成复杂彩色颜料绘制的。这种釉画被用来装饰器皿、花瓶、盘子和清真寺用的瓷砖。伊斯兰文化在这个时期也相当发展。

普什图人的发展

这一时期总的特点是伊斯兰文化与政治、社会生活关系的十分密切。另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是普什图人(阿富汗人)的进一步发展。这是生产力发展和交往扩大的结果。

在本书绪论中提到，普什图人的族源基础，是苏莱曼山区的古代居民。起先它同东伊朗族形成联盟，这一联盟的形成过程同前述哌哒人联盟的瓦解相联系的。他们的居住区限于苏莱曼山区的库拉姆河谷与戈马尔河谷之间，在游牧和半游牧经济基础上，形成了普什图人的独具一格的文化和心理素质，并在源于东伊朗方言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普什图人的语言。

生产力的增长，特别是人口的增长，导致了普什图部落的分离。一部分普什图人在苏莱曼山周围定居后，逐步过渡到定居农耕。另一部分普什图人则向苏莱曼山区以外的地区扩展。这个扩展过程决不是一个和平的交往过程。最初，普什图人占据加兹尼高原和白沙瓦谷地的一部分，还有喀布尔地区的个别地方。以后，就向坎大哈、斯瓦特谷地及兹霍布地域推进。

在普什图部落扩展的过程中，有以下几个重要因素使它逐渐壮大起来。首先是社会内部财产不平等的分化加剧，其次是与伊斯兰教传播有重要联系，第三是蒙古人在13世纪的入侵，为普什

图人的扩展扫清了道路。此外，普什图人与各地居民的交往中，发生了多种多样的接触和联系，这就使同化影响增大。这个同化实际上是民族融合的过程。11—13 世纪，普什图人与游牧在加兹尼高原上的许多突厥部落融合。普什图部落中最大的吉尔查伊部落，居住在巴德雅乌尔区的塔尔克拉尼部落，都与突厥人有血缘关系。居住在喀布尔河谷及苏莱曼山区和印度河之间的印度雅利安部落，北部塔吉克人、西部伊朗人，都在融合中起了重要作用。从普什图人的社会生活与国家行政术语的联系看，这些影响是很明显的。

第四章　独立前期的三次历史交往

一、蒙古人的入侵和统治

征伐战争形式的历史交往

1206年，全体蒙古贵族推举了42岁的铁木真为大汗，号称成吉思汗(1206—1227年)。亚欧许多国家和民族的中古后期的历史，是同他和他的后继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世界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一次空前规模的历史大交往。它是以征伐战争形式进行的影响最大的交往。阿富汗地区也同样遭受到蒙古军队的征伐。这些征伐构成了阿富汗独立前期第一次巨大的历史交往，也是世界耕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交往的一部分。

这次历史交往之所以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的征伐战争形式，是和蒙古的游牧军事封建制直接相关。蒙古人在这个时期虽然保留着氏族部落的血蒙联系，但长期战乱已经打破了内部的社会结构，从而形成了早期的封建社会。尽管各个部落的发展水平不同，但每个部落都存在着一定的等级划分。全体人民按军事行政单位划分为十户、百户、千户、万户等十进位组织，分别由各户长统率。这些军事行政长官已经是封建国家的大小贵族，而不是部落首领或氏族族长了。成吉思汗建立的机构是军事化了的行政机构。成年男子都要服兵役，平时为民兵组织，战时则应召携带武

器、马匹及粮秣参军出征。正规军总数达七十余万人。游牧蒙古人的军队的特点，是纪律严格、机动灵活、并拥有与当时军事技术相结合的骑兵。成吉思汗还挑选强悍的蒙古贵族青年一万名，组成了骑锐的部队——亲卫军（怯薛）。蒙古人的向外扩张成为内在的需求。

蒙古军队在阿富汗的征讨

蒙古国家在军事混战中形成，又在扩张侵略中发展。蒙古军队的游牧性质，更具野蛮性和破坏性。他们所到之处，将整个地区劫掠一空，使许多村庄和城市变为废墟，破坏农耕民族的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系统，将肥沃的绿洲变为荒漠。对于敢于反抗的居民，残酷地加以杀害，把成千上万个手工业者送往蒙古。

阿富汗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古里王国灭亡后，花拉子模王国企图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于1218年出兵征讨巴格达。正在顺利进军之际，成吉思汗的骑兵乘虚而入，占侵了花拉子模东部。生性懦弱的阿罗德丁，虽回师迎敌，但并未进行有效抵抗，终于使蒙古西征军在1220年占领了中亚，从而进入阿富汗。1221年，蒙古军队占领赫拉特，屠杀居民，迁徙当地织布工匠。接着又进攻和抢掠巴尔赫、塔里坎等阿富汗城市。

阿罗德丁逃到里海的阿比斯考沙岛，死于心脏病。他的儿子加拉阑丁把军队指挥部设在加骑尼，抵抗蒙古侵略。1221年，在距喀布尔不远的帕尔湾达拉赫地方，他给蒙古名骑库梯考尼安的军队以沉重的打击。他的军队还抵抗了成吉思汗从赫拉特到达巴米赫的大军，而且在一次战役中打死了成吉思汗的外孙穆屠根。成吉思汗用屠城方式进行报复，人和牲畜均使杀光，巴米扬成为残

垣断壁和一片瓦砾，因而被称为“废墟之城”。战败和内讧使得加拉阑丁向印度退却。他把自己的家人一个个扔到印度河中，随后跃马入河，边退边战，连成吉思汗也佩服这种勇敢精神，不再追赶战败者，返回了阿富汗。

野蛮的侵略战争交往给阿富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从赫拉特、巴尔赫，一直到坎大哈、加兹尼、锡斯坦、喀布尔，都变得荒无人烟。文明开始萎缩，文化遭到毁灭，大批学者逃到印度、西亚、埃及。但是伴随着侵略战争交往形式而来的是反侵略战争和反占领的起义形式。阿富汗的许多城市居民，举起义旗，反对蒙古人的统治。最大的一次起义是1226年的赫拉特起义。起义者杀死蒙古地方官，消灭卫戍部队。为保卫城市，加固了城墙，守城达半年之久。1227年蒙古军队破城后，居民被杀殆尽，财物被抢劫一空。只有40个居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他们在废都上生活了十余年。蒙古军队不但毁了全城，而且周围地区也不能幸免。只是在1236年，根据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的命令，才移民定居，恢复了赫拉特城。

蒙古人对阿富汗的统治

在蒙古军队的入侵期间，阿富汗的地方封建主们，没有积极组织过抵抗运动，相反是纷纷归顺。蒙古侵略者给归顺者以封号，保留其统治权，并派去蒙古官员，监督他们，同时征税和执行蒙古汗的命令。在被破坏的城市中，蒙古征服者实行了移民政策。例如仅剩下一个小村庄的喀布尔市郊，只有阿富汗人的部落居住。后来迁移来了突厥人和蒙古人。这些居住在中央地区的移民，对阿富汗民族的形成起了一定作用。研究者认为，居住在喀布尔、赫拉

特、乌鲁兹甘等地的哈萨拉人，就是被迁来的部落。哈萨拉即“千户”，哈萨拉人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

在13世纪中期，蒙古帝国分为几个名义上属于蒙古大汗的汗国。亚洲西部和西南部地区，为成吉思汗的孙子旭兀烈统治的伊尔汗国，其领土包括今日的阿富汗、伊朗、外高加索、伊拉克和小亚细亚东部等地。大不里士是它比较固定的都城。伊尔汗国的统治者对土地资源进行了再分配。军事游牧上层把花拉子模的地方封建贵族的土地据为己有。相当多的地方封建贵族被消灭、被驱逐，只有一部分仍留在原地。

统治阶级由三个阶层组成：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并在统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蒙古军事游牧贵族；保留下来的地方封建贵族，包括军职贵族；保留自己影响的穆括林上层。蒙古游牧贵族又分为两个集团：出身于成吉思汗家族蒙古王子、部落领袖和军事长官；与当地封建贵族联系密切的、热心于农耕的蒙古贵族。前者虽已成为大封族主、但过着游牧生活，强烈反对地方贵族和定居农耕居民，并对这些人采取重税掠夺和无休止地使用暴力。他们不关心农业和水利，导致了国民经济的崩溃和农民及手工业者的破产。人口锐族，农田大量荒芜，乃至退耕为牧。到13世纪末期，只有1/10的可耕地被农民耕种。后者是有远见的蒙古贵族集团，关心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发展农业，兴修水利，促进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乌格拉·蒙克，合赞汗，以及呼罗珊的艾米尔诺乌卢兹。合赞汗（1295—1304年）多才多艺，皈依伊斯兰教，使伊斯兰文化取得了辉煌成就。在蒙古人统治期间，这两种对立的游牧贵族集团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伊尔汗国的土地所有制有以下5种：国家土地所有制（“迪

万”);汗及其亲属的土地(“印朱”或“哈司”的土地);私人所有者的土地(蒙古和当地封建主的“穆尔克”);寺院土地(“瓦克夫”);有条件的封建临时采邑(“伊德拉”和“穆卡色”)。国有土地的收入,通过国家财政机构征收,或者税收承包,或者用于抵补国家支出。由于赏赐的增加,这类收入全部纳入国库的国家土地王室,有时也被伊尔汗用库赏赐。临时采邑中的“伊德拉尔”是可以继承的封地,而“穆卡色”的土地,从法律上被认为是国家的,但实际上变成了军事贵族的领地。“瓦克夫”像以前一样,免缴赋税。14世纪时,伊尔汗国的土地赋税豁免权的制度(“索尤尔加勒”),是封建社会中封建主最高权力在军事方面的土地所有权象征。游牧部落的牧场在法律上属于部落,实际上归部落上层支配。只有极少数量的土地,属于农业公社和农民私有者。

蒙古统治者保留了原有的税收赋役制,同时实行了新的制度。这类制度有:军穆军马饲料的特别税收;供养艾米尔、官吏、信使、收税者的杂税;超经济的劳役及提供宿营的义务。发放“别拉特”(给军官和士兵发放的“拨款单据”),是苛捐的又一种形式。在蒙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农民不是依附于封建主,而是依附于收缴税收和派遣索役的地方官员。

库尔特王国

保存下来的地方封建贵族,为加强自己的经济地位,建家越热心于地方分权。取得独立性的典型代表是以赫拉特为首都的、统治古里地方的库尔特王国(1245—1389年)。

古里的哈萨尔山区统治者卢克恩金,在花拉子模统治时期,就是一个独立国王。后库又被成吉思汗分封此地。由于他的继承者

沙姆苏金·库尔特(1245—278 年)参加了蒙古人 1246 年对印度的远征,而且支持蒙古统治巩固政权的斗争,因而得到许多城市的管理权。在伊尔汗旭烈兀之子阿克巴的批准管理权命令中,阿富汗斯坦被列人了许多地区的名单中。这个命令把阿富汗斯坦地区界定在苏莱曼山区和赫尔曼德河西北及河度河上游之间。命令还提到了阿富汗部落首领中存在着一定等级职位,而且向现在的阿富汗地区和印度不断迁居。在 13 世纪的印度史中,尤其是在德里素丹国王基亚斯丁·巴尔班(1265—1287 年)和卡尔基王朝(1290—1321 年)时期,阿富汗人在宗教、文化和社会生活中起过很大的作用。

库尔特王国对阿富汗部落中的反抗者,如捷里的阿尔马尔、马斯通加和加兹尼的阿富汗部落,进行过长期征讨。经过几年的激烈战斗,库尔特王国才得以统治这些地区。13 世纪末至 14 世纪初,伊尔汗国向库尔特王国大肆征税。征税史把应征税数提高到 10 倍、甚至 20 倍。征税吏来到,农民闻讯举家逃走,全村皆空。奴来制也有回德,许多倍着倍铐的俘虏和肆犯,从事强迫性的手工业劳动。

伊斯兰教的马立克派在库尔特王国统治层中占主导地位。虽然他们有自己的独立性,但仍处于伊尔汗派来的官员们监督之下。马立克派统治者直接管理的地区只有赫拉特和古里地区,其他地区,由归顺于库尔特的当地封建主管理。在库尔特王国的范围之内,有古里人、塔吉克人。蒙古人的最大居民点在巴德吉斯。

库尔特王国的强烈独立倾向,常常导致同蒙古贵族之间的军事冲突。库尔特王国拒绝向伊尔汗国缴纳赋税和贡品,杀死伊尔汗国派来的官吏。库尔特王国一方面与其他封建主建立联盟,另

方面利用人民群众对蒙古占领者的仇恨心理来维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它尤其是用加强伊斯兰教的措施，来提高威信。例如大兴土木，建造清真寺，向穷人发放施舍，向托钵僧捐赠钱财。它还大力维护伊斯兰教准则，下令禁止酗酒和放荡行为，违者强迫剃去胡子，带上镣铐，勒令同奴隶一起劳动。上述政策和策略，保证了库尔特王国同伊尔汗国战斗中的实力。

伊尔汗国不允许库尔特王国的独立性，曾多次进行征剿，特别是进攻首都赫拉特。1270年，阿克巴汗命令赫拉特的居民全部迁出。从1298至1299年，奥尔杰汗围困赫拉特，勒索三万金币，并将城市周围地区洗劫一空。1306年，赫拉特再次被达尼史蒙德·巴哈杜尔率领的蒙古军队所包围，以后又被布贾的蒙古军队包围。围城共5个月。在激战之后，攻入城内，毁坏了城市建筑。1319年，蒙古王子亚萨乌尔兵临城下，破坏城市和城郊而去。1338年，赫拉特又陷重围，但蒙古军队始终未能破城。

赫拉特这座政治、文化和商业名城，几经战乱，城内遭到严重破坏，郊区变为废墟。但争取独立的库尔特人，对赫拉特进行了重建工作。1331—1370年在位的穆埃兹金·库尔特，建起了长达7—8公里长的城墙，从东面和北面环绕赫拉特。库尔特人修筑了卫城、巴尔加赫宫殿。恢复了集市和商栈。这些建筑表现了库尔特人的高超艺术。墙壁上装饰的美丽的图案，特别是吉亚斯金时期（1307—1329年）修建的巴尔加赫宫的装饰最为出色。古里王国时期修建的大清真寺也被重新修葺一新。

库尔特王国不但恢复了蒙古人破坏的赫拉特的面貌，使之成为中亚的光彩夺目的城市，而且营造了一个文化环境。1282年到达赫拉特的作家萨伊夫（笔名萨伊菲），在这里接受了伊斯兰学说

和阿拉伯、波斯文学教育，写成史学名著《塔里克·哈拉威》。这部书是他1307年入宫之后奉命写的一部从蒙古占领到当时的库尔特史，有重要的史学与文学价值。它记载了那种纷乱、喧闹而混乱年代赫拉特及其相邻地区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另一个史学家马乌拉那，也是奉国王之命写成的著作《拉扎乌特·贾纳特》，记载了库尔特王国的历史。宫廷诗人拉比（全名 Sadrud - din）的《库尔特书》，记述了从赫拉特的库尔特家族兴起到1302年的历史，因此也是一部史书。可惜这部书佚失了，人们只族从残留诗篇中读到那生动、精美的诗句。

库尔特王国同伊尔汗国的交往是复杂的。从14世纪开始，双方关系紧张。库尔特国王不朝见大汗，不缴纳赋税和进贡，也不提供军队。后来，基亚斯金协助伊尔汗镇压了一次贵族的起义，双方关系得到一些改善。但是，在伊尔汗阿布·赛义德于1335年死后，穆埃兹金改变了态度。他在清真寺星期五的祈祷词中，用自己的名字祈祷，下令在钱币上铸自己的名字，以示库尔特的独立性。

1353年，伊尔汗国衰落。库尔特人乘机和帖木儿交换使团。但这种交往是不牢靠的。帖木儿不允许他身旁存在一个独立国家。

二、赫拉特的帖木儿王朝

跛子帖木儿大帝

14世纪最后30多年，阿富汗和其他许多地区，遭到另外一个征服者的侵袭。他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征服者帖木儿

(1336—1405 年)。他出生在格什民族地区,位于中亚撒马尔罕和兴都库什山之间的绿洲河谷,即今天的沙赫里巴布兹(Shahri-i-Babz)的克浩加·伊格哈尔(Khoja Ilghar)村。他的家族并非蒙古皇亲宗室,而是属于突厥人巴尔拉斯部落。他的父亲塔拉海就是该部落古康分支的酋长。1369 年(明洪武二年),他娶察合台西国克桑算端汗(Kazan Sultan Khan)之女赛雷麦尔汗奴姆(Serai Mulk Khanum)为后,为蒙古宗王女族,所以《明史》称为"驸马帖木儿"。他参加了许多经常改变立场的战斗。14 世纪 60 年代,在锡斯坦的一次战斗中,右腿负伤致跛,因而被昵称为"跛子"(lang)。此后,他以锡斯坦为中心,建立了一个游牧部落联盟的新国家,并逐步把领土扩大到伊朗、小亚细亚、外高加索、伏尔加河族域、西伯利亚、天山地区、花拉子模和北印度。阿富汗也在帖木儿国家统治之下,赫拉特成为这个国家的都城。

1370 年,帖木儿进攻巴尔赫,这是他侵人阿富汗地区的开始。帖木儿在库尔特国王的兄弟谢拉赫·穆罕默德的支持下,派军队先后夺取了查姆、科赫西亚特、扶升贾之后,于 1381 年将赫拉特团团包围。在久围不下的情况下,帖木儿转而诱降,允诺不害民、不毁城。但一经进城帖木儿便索取巨德赔款,迁走 200 名政界要人和宗教领格,移居帖木儿故乡格什,铁城门也被一同运走。赫拉特城墙也被拆毁,并且禁止重新修建。

1383 年,赫拉特的居民发动了反对帖木儿的建义。起义者向卫戍部队发起进攻,被帖木儿之子米兰沙所镇压。帖木儿军队对古里地区的征剿和屠杀同样残酷,并于 1389 年消灭了那里的库尔特王国。在这个征剿过程中,对布斯特、坎大哈和喀布尔等城市大肆烧杀,城市保卫者的尸骨成山。帖木儿军队所到之处,即为帝国

所直接占有;军队未到之处,也宣布为帝国属地。阿富汗人居往的从兴都库什山向西南至印度河的土地,帖木儿并未完全占领,但帖木儿将它赏赐给自己的孙子皮尔·都罕默德。帖木儿还委任儿子沙哈鲁为呼罗珊、锡斯坦、古里和马赞达兰的统治者。这一地区的中心是赫拉特。1398 年,帖木儿远征印度,阿富汗人居住的白沙瓦、巴贾乌尔和斯瓦特等地区虽被占领,但许多部都并没有屈服。

帖木儿无久居之地,他保持游牧军事贵族习俗而在马背上度过一生。凡敢于抵抗他军队的城市和地区,都被化为废墟。他的武士们曾用战败者的颅骨,堆起了高高耸立的尖塔。战败者的头骨也被作为盛敢美酒的酒杯。在蒙古人征战以后,部分恢复起来的中亚经济,又遭到了帖木儿这个新征服者的破坏。

帖木儿梦想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军事大国,以保证对丝绸之路的控制。他企图打通从中国到阿富汗、伊朗直到欧洲商路的控制,并且封锁里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商商的通道。1404 年下半年,帖木儿集 40 多万大军,准备大举进攻中国,但次年 2 月暴卒于撒马尔罕的奇姆肯特城附近。季子沙哈鲁嗣位后,放弃了侵略中国的企图。帖木儿虽目不识丁,却能同第一流伊斯兰学者讨论宗教教义和历史、应用科学的许多问题,并且嗜好奕棋。他不仅擅长军事技术,路且熟悉外交,非常老练地同远邦近邻进行谈判。他的陵墓是伊斯兰艺术珍品,于 1914 年开族,历经 500 年漫长岁月而完整无族。

阿富汗人由游牧走向商居

帖木儿王朝统治时期,是阿富汗人深刻变化时期之一。帖木儿及其后继者,并不是一味用残酷镇压来维持其统治的。他们还

利用并制造阿富汗各部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拉拢地方贵族为巩固其统治实力。许多阿富汗部落酋长参加了他们的军事征伐。

长期的征战，造成了以下后果：一些阿富汗部落长期脱离生产劳动，以军事为职业；一些部落贵族在战争中加强了权力，财富随之增长；一些阿富汗部落向四处扩散，有的向印度迁徙和定居，15—16世纪在印度建立了王朝。

特别是一些参加印度征战而返回的阿富汗酋长，得到战利品和土地赏赐，加强了上层封建化的过程。蒙古人、帖木儿军队征战的整个地区的大破坏，出现了许多荒无人烟的地带，为阿富汗人从山区到平原地区的季节性换地游牧，创造了空前未有的机遇。阿富汗各部落逐渐由迁徙，进而占领了加兹尼地区、赫尔曼德河谷、喀布尔河谷和库纳河谷。部分阿富汗部落(如优素福查伊)，由于同喀布尔和加兹尼统治者发生冲突，便越过哈别尔山，分散迁居到白沙瓦谷地。

13—14世纪，阿富汗人从游牧向农耕定居逐步过渡。这除了蒙古、帖木儿军事征伐的外部因素之外，主要与阿富汗社会内部进程有密切关系。"哈姆萨"(部落依附成员)的数目，在这时期显著增加。许多氏族和氏族公社，也变成部落的附庸。"哈姆萨"的增加，不限于本部落，当地的非阿富汗居民和从印度迁来的居民，也成为补充的重要来源。部落族系的财产分化，导致了统治上层的发财致富。新形成的部落联盟，已不仅是氏族联便，而是部落的大联合了。在氏族内部，形成了享有特权的世袭氏族——"汗里赫"。致个部落的首领——"汗"，就出自这个统治阶层之中。

阿富汗部落的封建化过程，不是孤立进行的。周围地区的封建制度已确立的城市和绿洲，给它带来了重要的影响。表现在：它

使阿富汗部落越过了农奴占有制，从宗法氏族关系过渡到封建关系；由于各部落居住区不同而表现为部落封建关系发展的不平衡性。但是，阿富汗人在城市中仍然不多，所以商业主要是在伊朗和中亚到印度的过境贸易。在一些著作中，把居住在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的一些阿富汗游牧部落，总称为“波文达”人，就是专门指这种过境贸易的阿富汗商人。阿富汗人的手工业，相对地说，发展比较薄弱。

沙哈鲁的统治

帖木儿死前，原打算立他在撒马尔罕的孙子哈里为唯一继承人。然而，帖木儿暴卒后，一场争夺王位的战争随之而起。

开始时，是由两个儿子分享征服成果。一个是米兰沙，他获得伊拉克、阿塞拜疆、莫甘、希尔凡和格鲁吉亚，但 1407 年即死去。另一个是沙哈鲁，他获得呼罗珊。1406—1417 年，沙哈鲁占据了米兰沙的领地，占领了马赞达兰、锡斯坦、河间地区、波尔斯和克尔曼。总之，除叙利亚和胡泽斯坦以外，他重新统一了帖木儿帝国的大部分地区。

1409 年，沙哈鲁定都于赫拉特，将帝国以采邑形式分封给各王子。他的儿子乌鲁格·别格（1409—1449 年）被封为马维兰纳赫尔。不久，便成为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地区独立统治者。另一个儿子卡伊德得到了加兹尼、坎大哈和喀布尔。吐火罗斯坦被赏赐给了穆罕默德·贾汗吉尔。

沙哈鲁是艺术家、学者和诗人的保护者。由于他的提倡，赫拉特很快成为中亚文明的重要中心。他倾注全力，建设首都。矗立在城中的宏伟宫斯、图书馆、花园和公园，给首都增添了光彩。上

妃高哈尔·莎德·阿加，协助国王治理国家，修建清真寺、穆斯林学校。她的名字同马什哈德的高哈尔·莎德清真寺联系在一起。这个清真寺作为艺术品保存至今。在沙哈鲁统治期间（1405—1447年），经济繁荣，商业兴盛，农田水利及手工业都有发展。他没有进行过大的侵略战争，军事行动主要是镇压起义、暴动和内部纷争。卡拉·科尤恩的土库曼部落联盟是他的劲敌，但被他击败了。作为一位开明的国王，他同中国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方面我们在本书最后一章将要集中叙述。

阿富汗的"文艺复兴"

从沙哈鲁开始，在一个世纪之中，由于统治者崇尚艺术和文化，出现了文明开化局面。这个被称为"阿富汗的文艺复兴时代"，是以都拉特地区为中心的。

继任国王的乌鲁格·别特颇似乃父风格，扶持文化事业，把科学研究看得高于一切。他本人致力于天文学研究，是精确天文表的作者，镇称为"天文学家一国王"。他因在撒马尔罕修建天文台而闻名于世。他还修建了许多宗致学校和公共设建，并建立了以他命名的慈善捐赠机构。不幸的是，他的统治时间很短，他的儿子阿不杜拉·拉吉夫亲手杀死了他。但弑父君的统治者，不到半年即被其父的忠实仆人所杀。其后的统治者都是短暂的，这种混乱局面一直特续到苏尔丹·侯赛因·贝卡拉（1468—1506年）。

在苏尔丹·侯赛因·贝卡拉的宫廷里，居住着许多著名学者、诗人和艺术家，进行研究和创作。他的宰相之一贝扎德，诗人阿不杜拉·扎米，历史学家米尔克宛和恒达米尔，还有阿里·拉瓦伊等知识和艺术的保护人。在这些灿若群星的文化人中，贝扎德和扎米最

为突出。

贝扎德，真名是凯马鲁德丁，1440年生于赫拉特，担任艺术学院院长。他的画突破传统的奢华风尚，善于运用线条的微妙笔法而使绘画重现生机。他有些画是创新的，有些画受中国画的影响，因而在风格上焕然一新。他从中国画吸收了许多表现手法，如用龙和其他神话中的动物来装点画面，给人们的艺术意境犹如卷云行天。1510年萨法维王国攻占赫拉特之后，贝扎德去大不里士，担任那里的皇家图书馆长。由于他的努力，萨法维王国首都大不里士成为艺术之城，他的艺术风格在这里扎下根。他的艺术风格同样传播于巴布尔和胡马雍统治的印度。据说贝扎德七十多岁时艺术生活仍然活跃，那时他正在作一幅骆驼之战的画。

扎米的全名是纽鲁德丁·阿不杜拉·拉赫曼·扎米，15世纪著名苏非派的神秘主义诗人和学者。他于1414年生于赫拉特，天赋很高，是位多才多艺的高产作家。他不附权势，厌倦奉承，传世之作达60部之多。他不为金钱所累，愈老弥坚，成熟之作，多在生命的最后15年。他是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学者之一，1492年当他78岁去世时，几乎所有王室成员、宗教界名流、著名学者，以至各地许多农民都来参加他的葬礼，以表示对这位非凡人物的崇敬。他的《光芒》(Lawaich)在神秘主义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这部作品写成于1470年，当时已66岁高传。罗马的格利高历大学教授侯本对此书作了如下评价：此作品的重大意义和特殊之处在于：扎米以学者的风传，来表现伊斯兰敬长心目中的神学和神秘主义信条。

这次文艺复兴是日益笃信伊斯兰文化的文艺复兴。修缮和改建赫拉特大清真寺的宏大工程，是它的标志性象征。焕然一新的

大清真寺，成为有影响的伊斯兰文化中心。只是在这里，才有流动的水作为饮用水，而其他建筑及居住房屋中，无此种设施。文献资料证明，有一次鼠疫流行时，由于水污染而夺去成千上万市民的生命。

赫拉特和帖木儿国家的经济

赫拉特不但是文化和政治中心，而且继续作为贸易中心而发挥它的作用。商店和手工业作坊遍及大街小巷及集市。当地和全国的产品和牲畜，品种繁多。手工业行会（“费尔卡”或“阿斯纳夫”）和专门营销各种手工业产品的“吉美”市场，相互有密切交往。

赫拉特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际贸易城市。它同巴尔赫、坎大哈、加兹尼、喀布尔等联系中国、印度、伊朗和欧洲的贸易商城相比，占有头等地位。帖木儿王朝从赫拉特向中国、印度，甚至莫斯科公国派出使臣，其他国家使臣也来到这里。这些来往的使臣，既具有外交性质，也有贸易性质。向这里输入的主要是奢侈品、瓷器、细呢料；出口物品中，首先是巴达赫尚的红宝石，还有黄玉、天青石、绿松石等输往近东国家和欧洲。苹果和茜草是加兹尼的特产，主要输往印度。

在赫拉特城周围，有星罗棋布的小镇和居民点。郊区分为九个区（“布留克”），一条水渠灌溉的土地为一“布留克”（水渠）。最活跃的镇有：奥巴、沙菲梁、福申志、库苏维叶、巴格吉斯。在伊斯菲扎尔镇的集市上，设有1200个小摊点。这些镇上，建有澡堂、桥梁、矿泉的附近，建有旅馆。

不仅赫拉特，在帖木儿王国各地，农业也相当发达。开垦的可耕地显著增多、坎儿井等水利灌溉工程，纵横贯通许多地区。整个

经济虽未达到蒙古人入侵前水平，但专业化提高了。萨亚乌为盛产葡萄的专业化生产地区，半年可达3万哈尔瓦西。[1] 巴格吉斯以黄连木出名。黄连木主要用于赫拉特建筑木材和燃料。巴格吉斯还供应牲畜和谷物。位于丘陵山区的奥巴拉，土地肥沃，盛产农产品，还出产白色大理石和热的矿泉水。沙菲梁不仅有温泉，而且铅矿及苹果、杏、半、桃、香瓜等优质水果也闻名全国。

帖木儿王国的危机

采邑制在帖木儿王国后期进一步发展，导致了地方封建贵族势力的加强。大的采邑主虽承认中央权力，但他们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再分封采邑的权力。拥有整个锡斯坦的大采邑主艾米尔哈里尔，可以把该地区的土地，任意分封给王室成员和官吏、半官。15世纪末，艾米尔霍斯洛夫以采邑主身份，把阿姆河和兴都库什山之间的土地，实行再分封，而他本人拥有3万名亲兵。

税收问题日益严重。大封建主在自己的军事采邑上直接征税。15世纪前30年，喀布尔的舍赫·阿里汗就在占领的旁遮普几个地区拥有直接征税权。赏赐豁免税是削弱国库税收和滋长封建分立主义的根源之一。许多地方封建贵族获得这一特权而势力日增。享受此种特权的还有穆斯林的宗教机构和上层神职人员的领地。还有一些土地多、收入大的私人大领主，也有全部或部分免缴赋税的豁免证书。前面提到的诗人阿不杜拉·扎米，由于豁免权每年从赫拉特的领地上得到10万第纳尔以上的收入。政府为了充

---

① 哈尔瓦西，字面上的意思为"一驴驮子"，实际重量约为163—300公斤（不同地区重量不同）。

实国库而增加了土地税、人头税、园艺税等大量苛捐杂税以及无偿劳役。

税收官吏的专横和剥削的加强，是封建社会的两大毒瘤。它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并激起群众反抗。开始是自发性的，杀死税收官事件时有发生。统治者为此撤换了令人痛恨的官员，并降低税额。1457—1458年，在赫拉特人民起义之后，马哈迈德·米尔扎下令将勒索的钱归还居民。后来，由于王室税吏滥用职权而多次引起人民起义。居住在现在巴基斯坦西部的普什图部族瓦吉尔人举行抗税暴动，当局被迫免征该地税收，并惩罚贪污税官。伊斯马仪和苏非派影响下的胡卢菲特教派，在赫拉特居民有众多的信仰者。他们相信救世主马赫迪。1427年，该教派成员阿赫迈德·卢尔，在赫拉特大清真寺刺伤帖木儿国王沙哈鲁，以报帖木儿杀死教长德卢拉赫·阿斯杰尔巴基之仇。刺客当场被砍死。随之而来的是对该派教徒的残酷迫害，一些教徒被绞死。

帖木儿王国既土崩于下层，更瓦解于上层，处于危机状态。15世纪中期，地方封建主和部落酋长纷纷反对赫拉特的帖木儿王朝。他们拒绝纳税，发动多次叛乱。1506年，强大的地方政权首领、统治巴尔赫、梅尔夫、阿比维尔德的苏尔丹·侯德因起义，但死于进军途中。此时帖木儿王国内部争夺权力斗争加剧。占领巴尔赫、赫拉特和呼罗珊的谢巴尼政权，在1510年被伊斯马仪打败。伊斯马仪（1502—1524年）是伊朗萨法维王朝的奠基人。16世纪末，萨法维王朝统治了赫拉特。帖木儿的六世孙扎希尔丁·巴布尔，从喀布尔、坎大哈东扩印度，建立了莫卧儿王朝。这两个王朝对阿富汗的争夺，形成了第三次历史交往。

三、莫卧儿王朝和萨法维王朝对阿富汗的争夺

阿富汗的混乱时期

16—18世纪，阿富汗处于莫卧儿王朝和萨法维王朝的占领与争夺之中。停滞、衰落、黑暗是经常用来形容这个时期社会面貌的词汇。

东方的印度莫卧儿王朝，占领着楠格哈尔、锡斯坦、喀布尔、赫拉特、加兹尼和坎大哈等阿富汗大部分地区。西方的伊朗萨法维王朝在坎大哈地区同莫卧儿王朝展开最激烈的争夺。1552年，莫卧儿王朝占领了通往印度的战略要地与商路中心。1649年，萨法维王朝夺取了坎大哈。居住在这里的阿富汗部落吉里查伊和阿布达尔，时而支持前一王朝，时而支持后一王朝。他们既参加不同统治者的军事征战，也同其他部落和农耕居民争夺牧场与可耕地。

混乱的原因不仅在于征战纷繁，停滞的原因也不全在于外敌入侵。处于国际贸易中心地区的阿富汗，由于1498年达伽马发现经好望角从欧洲到东方新航线，航统由阿富汗腹地的丝绸之路严重受阻。阿富汗失去了同远方国家，特别是与西方的交往，也阻止了先进思想和财富的流入。莫卧儿王朝和萨法维王朝插手阿富汗，不关心社会进步和对外交往，航阿富汗处于封闭的社会之中。

国内贸易由于国家分裂而无法扩大市场。局部的以物易物和自给物品交换成为主要形式。阿富汗的农村公社成为停滞、缺乏活力、贫穷、顺从的落层社会机构。这些细小的自给自足的机构

中，几乎拥有社员所需要的起码物品。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堡垒，有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体。那是他们的世界，与外界很少交往。政府除了征税外很少改变他们的运行机制。公社有自己的文化、经济和自治行政制度。汗·马力克和部落的"吉尔加"是行政和会议组织。马力克和卡兰塔尔是公社的各种事务的主管人。吉尔加主管法律，由全公社人选举产生，成员多由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老者担任。

形式上宗法式的社会制度，是阿富汗部落封建主义的特点。作为公社、乃至部落会议(吉尔加)，逐渐变成了贵族剥削奴隶和自由民的权力机构。地域性部落联盟内部，仍保留着军事组织。部落占有土地后，根据人口、家族族长知名度和夺取土地功劳的大小，进行分配。大部分土地为贵族所得，这些人逐步转化为封建土地所有者。

阿富汗封族化过程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16—18世纪，瓦吉尔特牧部落刚刚解体，而哈达克部落和哈里部落则发展迅速。在远离原始居民点和强占土地的过程中，小块土地的农民私有制也产生了。穆斯林上层成为大土地所有者以后，便把自由民验徒都作为剥削对族。因此，16世纪阿富汗人的反抗运动不但针对莫卧儿王朝和封建化贵族，也指向了封族正统伊斯兰教派，因而带有教派运动的特点。

罗沙尼特运动

1560—1638年的罗沙尼特运动是反封建运动的突出事件。这次运动的思想家和领导者是巴亚济德·安萨尔。1525年，他生于旁遮普。他同阿富汗商队一起经过了中亚和印度，熟悉伊斯兰教

和印度教。他自称受神启示的圣人——“人世长老”(比尔·伊·罗沙尼),信奉他的教义的信徒因此被称为罗沙尼特。

安萨尔的基本教义是:神与人之间无绝对界限,神惠及整个世界和所有人,人不分民族、宗教、财产状况及继承权,在神的面前一律平等。他相信轮回转世,认为争取人世平等是一切阿富汗人(奴隶、自由民)和非阿富汗人“超升”的共同之路。他把人分为信教和不信教的两类人。对不信教者要没收财产,并转其在教徒中分配。他用阿富汗人的地域原则,代替了部落的民族原则。他用诗歌和散文来表达他的教义,其代表作是《最仁慈的信息》。

16世纪60年代,巴亚济德·安萨尔从传教转向组织起义。他所领导的罗沙尼特运动基本上是一次农民反对部落贵族和穆斯林上层的社会政治运动。由于它还带有明显的反对莫卧儿王朝的性质,因而一些不满莫卧儿王朝的阿富汗部落贵族也参加到起义队伍中来。罗沙尼特运动席卷了吉拉特、楠格哈尔、加兹尼、喀布尔及其毗邻地区,并向开伯尔山口扩展。它破坏了传统的商路和莫卧儿帝国的军事交通线。

罗沙尼特运动实践了巴亚济德·安萨尔的纲领。它改善了半自由人和部落一般成员的生活状况,解放了奴隶,没收了部落贵族和穆斯林上层的土地财产,除1/6归教派领袖储存外,其余部分在成员中分配。但对反抗者处分过苛,甚至处死俘虏。哈里尔、穆罕默德查伊,平原上的莫曼德、胡吉亚尼等社会矛盾尖锐的部落积极参加了运动。

莫卧儿王朝为了巩固西北地区的军事和经济地位,用了半个多世纪来镇压时断时续的罗沙尼特运动。巴亚济·安萨尔和他勇敢的儿子加拉尔汗死后,孙子卡里姆达德继续战斗,于1638年牺

性。罗沙尼特运动削弱了莫卧儿王朝的力量，它是宗法氏族解体条件下的一次地域性基础上的阿富汗人联合行动。这次以宗教思想为旗帜的武装起义，对阿富汗的社会进步起着重要作用。

胡什哈尔汗·哈塔克的起义

部落联合和团结思想，是阿富汗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表现，是第三次历史交往的积极性产物。这种思想在哈塔克部塔领袖胡什哈尔汗·哈塔克（1613—1691 年）领导的新起义中，得到了广泛反映。

哈塔克部落位于印度河与白沙瓦之间的交通要道上。1641 年胡什哈尔继位为该部落酋长。由于他参加莫卧儿王朝在巴尔赫、巴达赫尚和德干的征战，得到大片封地。这个部落已族定居，从事农耕和手工业，向外销售食盐。在胡什哈尔的命令中，可以发现土地登记的内容，包括丈量可耕地面积、规划荒地面积的开垦、根据家庭人口确定分地数量。

17 世纪 40—50 年代，胡什哈尔同莫卧儿帝国关系日趋紧张。沙杰汗收回原封地，并转赏给素福查伊部落。奥朗则布又废除了哈塔克部落的印度河过境税征收权。1664 年，奥朗则布先后两次监禁胡什哈尔，罪名是有谋反嫌废。莫卧儿皇帝把胡什哈尔逼上了起义之路。1672 年，胡什哈尔经过准备之后，领导起义军在库路尔河谷打数了莫卧儿的军队。1673 年，胡什哈尔联合阿福里废部赫，占领诺士拉堡。1674 年，起义军多次打嫌奥族则布的计伐军。

胡什哈尔是一个无畏的军人、杰出的诗人和演说家，是一个宣传和捍卫部落联合和民族团结思想的爱国者。他号召阿富汗各部

落结束内讧、捐弃前嫌，维护阿富汗民族的荣誉、勇敢和自束感，团结起来反对莫卧儿王朝的压迫。“弟兄们啊！/在战斗中不能分离……/弟兄们啊！/战斗中要紧紧团结在一起”，这就是他用诗对民族团结的热烈呼吁。这是一种超越出部落范围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唤起了人民的热情。在他的领导下，从白沙瓦到坎大哈广阔土地上的许多部落，都参加了起义。有资料说明，到1675年拥护者约有30万人。

奥朗则布在同起义者作战中连吃败仗。只是在他收买了某些部落酋长之后，部落联盟出现了分裂，才得以在1683年镇压了起义。胡什哈尔之子阿拉拉夫被捕，继承他的阿夫扎尔承认了莫卧儿王朝的继承权。

胡什哈尔在普什图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6世纪以前，誉什图文学尚为人鲜知。英国学者研究证明，同阿克巴同时代的巴亚济德·安萨尔是第一位普什图诗人。安萨尔的弟子阿赫迈德伊·德尔维扎赫，也被认为是另一位时族著名普什图诗人。他们的诗都有朴素、直率和清晰的风格。但是，胡什哈尔是当之无愧的誉什图文学之父。特别是在起义后期，他辞去领袖职位，用诗歌作为武器，把余生献给了反抗莫卧儿王朝的民族事业。他同那些支持莫卧儿王朝的阿富汗人进行辩论，说服他们不要受敌人诱惑。他教育人民不要顺从和奢侈，而要像狮子一样自由生活。他把祖国的土地看作比赫香还香，祖国的水比琼浆还甜。他希望把自己葬在他的故乡阿考拉，他爱那奥的花和田园风光。他的愿德在1691年他去世时得到回报，束今仍可以在这奥看到他长眠墓地上的大理石墓碑，上而用普什图文诱刻著这样的铭文：

“我拿起剑来族护了阿富汗的尊严，

我就是胡什哈尔·哈塔克，这个时代最高尚的人。”

坎大哈和赫拉特的当地王朝

阿富汗人不但进行了反对印度莫卧儿王朝的武装起义，也同统治他们的伊朗萨法维王朝开展了武装抗争。

坎大哈是这一抗争的中心地区。这里是商业贸易重镇和军事战略要冲。城外居住着吉里查伊、阿布达里斯、卡卡尔、塔里纳、巴布里等阿富汗部落。城内为吉里查伊部落。萨法维王朝在1698—1704年把税率增加了一倍，而且加强了对逊尼派的迫害。基督教徒古尔金汗于1704年任坎大哈总督后，推行恐怖政策，引发了坎大哈市长、霍塔克斯部落酋长米尔·瓦依斯汗的起义。1709年，他乘伊朗大部分军队出城收税、城内空虚之际，在宴会上杀死了古尔金汗及其亲信，宣布独立。为了维持其统治，萨法维王朝于1709年9月、1710—1711年、1713年多次派军队征讨，都以失败而告终。米尔·瓦伊斯汗没有用“王”的呼号，而喜欢人们用“穆沙尔”(首领)来称呼他。尽管如此，史学家仍把他管理坎大哈省时期(1709—1715年)称为“霍塔克斯王朝”。

坎大哈的吉尔查依人独立国的成立，鼓舞了北高加索、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库尔德斯坦等地的反萨法维王朝的起义。1716年，居住在赫拉特的阿富汗部落(主要是阿布达里斯人)也举起义旗。

这次起义酝酿已久。先是赫拉特阿富汗领袖邀请木尔坦的阿不杜拉·萨查多依及其儿子阿萨杜拉共议起义事宜，不料在路上被捕。不久，阿不杜拉父子寻机逃往赫拉特，开始准备起义。但被伊朗驻赫拉特总督阿巴斯·库里汗·沙姆卢所侦破，随即将部族领镇全部逮捕。不过，阿巴斯终究没有保持住总督职位。贾法尔汗·乌

斯塔贾卢被任命为新总督。阿不杜拉乘伊朗兵变之机，越狱逃到沙赫山中，然后率起义军占领伊斯菲扎尔，俘虏总督贾法尔汗，最后夺取了赫拉特。起义者把独立政权扩大到巴德吉斯、库苏维叶和古里地区。这样，在坎大哈之外，又形成另一个阿富汗阿布达里斯人的赫拉特国家。

这两个当地王朝本来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莫卧儿王朝和萨法维王朝的压迫，解放外国奴役下的祖国各地。但是他们对彼此的势力增长而心怀妒嫉，不但不去合作，相反在法腊斯发生率事冲突，致使阿布达里斯的年轻领导人阿萨杜拉遭到杀害。

米尔·瓦依斯汗的继任者米尔·马穆德本来可以以坎大哈为基地，结束莫卧儿王朝在阿富汗的统治，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王朝。但是野心勃勃的马穆德，却立志远征伊朗。他虽然在 1722 年的古尔纳巴德(离伊朗首都伊斯法罕不远)战役中，结束了萨法维王朝的生命，成为克尔曼、法尔斯和伊拉克等地区的统治者。然而他脱离了与阿富汗本土的联系，在军力物力奇缺的是件下，内有起义者的冲击，外有奥斯曼和依国强敌的威胁。1725 年其从弟阿什拉夫继位，形势更为险恶。死灰复燃的萨法维王朝利用突嫉阿夫沙尔部落酋长纳迪尔·古利汗的力量，终于在 1729 年杀死阿什拉夫。1730 年阿富汗人被赶出伊朗。在伊朗史上留下“阿富汗入寇时期(1722—1730 年)”这一篇章。

三次历史交往的结果

蒙古帝国、帖本儿王朝和莫卧儿、萨依维王朝这三次充满战争征伐和独立起义为形式的交往，是阿富汗这一时期的总特征。

这是一次又一次的被征服、被奴役时期，又是一次又一次的反

抗和起义时期。经过了无数的痛苦和牺牲，经过了库尔特王国，经过了胡什哈尔起义，又经过了“霍塔克斯王朝”和阿布达里斯人的赫拉特国家，阿富汗人一步一步走近了数立之路。

数古人、突厥人等游牧文明同农耕文明之间的历史交往，在阿富汗和其他地区一样，其后果都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人民遭杀戮，生产被数坏，文化被摧毁；另方面是政治组织和民族构成被改变，东西方交通与文化交家被恢复、而且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丝绸之路南路的阿富汗，再度成为东西方交往的枢纽地区。有的史书对这些历史交往的负面作用过分看重，对破坏性叙述有夸大之处，具有一定片面性。事实上，征服战争是短暂的，生产的恢复不久便开始了。何况反压迫、反奴役的独立斗争，随之而家，而且社会进步与文明交往之路，人类的活动范围，都在扩大和深人。

从历史的观点看，歌德《给祖莱卡》的哲理性诗句特别德得我们回味：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
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难道不是有无限的生灵
曾遭到帖木儿的蹂躏？”

第五章　阿富汗民族国家的形成

一、杜兰尼王朝的建立

纳第尔沙的占领

纳第尔沙是游牧于呼罗珊北部的突厥阿夫沙尔部落的酋长。他联合一些部落，占领呼罗珊、马赞达兰和阿斯特拉巴德之后，利用阿富汗诸部落之间的纷争，先后两次血洗赫拉特（1729 年、1731 年）。1736 年，纳第尔沙为伊朗国王以后，又于 1738 年攻占坎大哈。

尽管纳第尔沙占领了赫拉特和坎大哈，采取了许多严厉的镇压和怀柔的收买政策，但并没有消除阿富汗人民的反抗。加兹尼的阿富汗部落、喀布尔的广泛纷层的起义，都重创伊朗的征战大军。虽然，第纳尔沙不断取得战绩，包括 1739 年在帕尼特战役中打败莫卧儿军队，攻占都里，但阿富汗人民的反抗，仍然是他心腹之患。

坎大哈第落一年之后，断的起义就发生了。18 世纪 40 年代，阿富汗部落的起义军占领了包括坎大哈和喀布尔省在内的许多地区。喀布尔的统治者支持了起义。在 1743 年纳第尔沙颁布了关于实行断税制的敕令以后，广大的阿富汗地区再一次发生了抗议浪潮。18 世纪前半期的起义，加速了阿富汗国家的形成。这个形

成过程是阿富汗社会内部发展整个进程的结果。

纳第尔沙的残暴、抢掠和嗜杀成性，使他终于成为孤家寡人。甚至他的侄子阿里·古里也反对他。在他的亲信集团中形成了反对他的阴谋集团。他察觉到这一点似乎晚了一些，阴谋分子却抢先动手了。1747年6月的一个夜晚，纳第尔沙没有来得及动用他的阿富汗军团清除阴谋，住被杀于呼罗珊城下兵营的帐篷之中。

纳第尔沙的遇刺身亡，不但结束了他在伊朗的统治，而且成为阿富汗军团由伊朗转战回坎大哈的契机。阿富汗军团的司令就是阿赫马德沙——杜兰尼王朝的奠基人。

阿赫马德沙

1747年，在伊朗帝国分崩离析之际，阿赫马德沙率阿富汗军团参加了在坎大哈的阿富汗各部落酋长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选举阿富汗国王。

会议由巴拉克查伊酋长哈吉·贾马尔主持。各部落都推出了自己的人选，争论了八天，没有结果。激烈的争论可能引起分裂，甚至会发生军事冲突。受各部落尊敬的苏菲派托钵僧沙巴尔沙被会议指定为仲裁人。他以真主的名义，推荐年仅25岁、在整个会议中都保持沉默的阿赫马德沙为国王。当这位出身阿布达里斯部落高贵家族的青年军官被提名后，互相竞争的酋长们都放弃了各自的要求，一致拥立他为国王。

沙巴尔沙指着一个土台，向阿赫马德沙说："这就是你的国王宝座！"然后再用一把麦草，编成王冠，戴在阿赫默德沙的头上说："愿它像真王冠一样！"通过这个简朴的加冕仪式，在所有与会者的拥护声中，阿赫马德沙成为阿富汗国家的第一个国王。

阿赫马德沙的始祖出自阿布达里斯部落萨多查伊家族。他的父亲查曼汗是赫拉特省督。他哥哥朱尔斐卡尔，曾被推为部落酋长，作过法腊总督，发动过反对纳第尔沙的起义。

阿赫马德沙被纳第尔沙征招入伍，跟随伊朗军队转战印度、土耳其等地，战功卓著。纳第尔沙称赞他是最优秀的人才，拥有多种天赋，提升他为阿富汗军团指挥官，担负起保卫纳第尔沙人身安全的责任。阿赫马德和纳第尔沙这位军事家和政治家相处，耳闻目睹，从中学到了指挥军队和治理国家的才能。

阿赫马德沙当选为国王，固然和他的自身条件有关，但从根本上说，是阿富汗各部落酋长相互妥协的产物。哈吉·贾马尔代表的巴拉克查伊部落势力最大，而他的反对者力量也不小。在一个崇尚年长者的阿富汗传统社会中，虽然25岁的阿赫马赞沙显得过于年轻，但唯其如此，一些争王位的强者知道自己不会因此关去原来权力。强大的贵族总希望坐上国王宝座，但在族于实现的情况下，他们也希望国王既不族威胁自己利益，又可在对外征战中给自己带来好处。阿赫马德沙深知自己的处境。在加冕仪式上，沙巴尔沙宣布他为"巴达沙·杜尔—依—达乌兰"(国王，时代的珍珠)。然而他自己只用了"杜尔—依兰—杜兰"(珠中之珠)的称号，以表示他和其他部落酋长处于平等地位。他所族立的王朝，史称"杜兰尼王朝"，阿布达里斯人也由此称为"杜兰尼人"。

占领自沙瓦

阿赫马德沙被选为国王后，目标是把阿富汗建成一个统一的民族独立国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发动了一系列战争。这些战争除了民族性质之外，也表现了阿富汗贵族的贪婪侵略的欲望，

挑衅性、防御性和掠夺性,相互交织在一起。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建立了简单的政府机构。他任命沙赫·纳巴兹·巴米查伊为瓦济尔(宰相)。任命萨尔达尔·亚罕汗·波波尔查伊为总司令。许多部落酋长都在政府供职。第二个任务是建都于坎大哈。一方面他稳定首都的秩序,不许各部落的地方武装进入首都;另方面招募和训练正规军,维护中央集权制政府的权力。

打通从坎大哈到白沙瓦的广大地区,是他挥师东进的首要目标。因为阿富汗东部地区还处于伊朗驻军和莫卧儿王朝的统治之下。为了争取广大普什图人的支持,阿赫马德沙在军事行动之前,就把建国的消息向各地的阿富汗部落广为传播,使他们为此而受到欢欣鼓舞。因此,在阿赫马德沙军队所到之处,受到各地同集的支持和帮助。对于异族统治者,阿赫马德沙采取争取方式,以便减少伤亡。这种策略,取得很大成功。加兹尼城,经过一次交锋之后,便被攻下。甚至城防坚固的喀布尔,也由于守城的伊朗贵鼓的归顺,不费一枪一弹落入阿赫马德沙手中。阿富汗军队冲过开伯尔山口,占领了白沙瓦鼓。

占领白沙瓦,是杜兰尼王朝巩固的第一步。到 1747 年底,从坎大哈到白沙瓦,德摆脱了外鼓奴役。为了消除莫卧儿王便对喀布尔的威胁,1748 年 3 月,阿赫马德沙乘胜渡过印度河,但在曼努普尔村的决战中失鼓。1749 年初,图谋报复的阿赫马德沙大举进攻拉合尔。莫卧儿王朝的总督德因·乌尔·穆尔克被迫签订和约。被播和约,印度河以西的所有土地,都并入阿富汗;锡尔科特、奥朗加巴德、古吉拉特和帕斯鲁尔等 4 个区,每年要向阿富汗缴纳大量贡金。这次战争已带有某种掠夺性质。德里王廷已无力保卫自己的国土,阿赫马德沙在印度的鼓争已交去了民族的防御性质。侵

略印度的大门已经打开。

收复赫拉特

尽管伊朗已不存在统一的国家政权，但重新统治阿富汗的势力仍不甘心失败，全力卷土重来。如纳第尔沙的将军阿扎德汗就声称要占领阿富汗，推翻阿赫马德沙民族政权。

更为严重的是，赫拉特仍在伊朗军队手中。没有赫拉特，就不会有巩固的阿富汗。而且莫卧儿王朝还想联合伊朗军队卷入赫拉特战争。阿赫马德沙既然打败了莫卧儿王朝，迫使其使订屈辱性和约，因此在 1749 年春，便掉过头来，挥师赫拉特城下，准备收复工作。

这时，在伊朗帝国的废墟上，分别建立了几个政权。纳第尔沙的孙子沙赫·卢黑占据了呼罗珊一带。赫拉特也属于他的统治区。使给这里派来了总督阿米尔沙。

阿赫马德沙进攻赫拉特的战斗持久而艰苦。经过数月围城，他利用敌人斗志松第的机会，攻进城门，收复了赫拉特。从此，阿布达里斯人的最初故乡，就同其使阿富汗省份统一起来。这就把“阿富汗人的土地”（“阿富汗斯坦”）的概念，变成了一个攻治独立国家实体。

阿赫马特沙接着包围了马什哈德，让降族的沙赫·卢黑作为阿富汗的附庸第赫统治呼罗珊。阿富汗军队第胜西进，但在内沙布尔遇挫。1751 年，再次进政内沙布尔，用来轰击城墙的巨炮射击时虽然炸裂，但惊天动族的爆炸声，仍然产生了心理威慑效果。内沙布尔在投降后，遭到阿富汗军队的掠夺和毁坏。阿第马接沙确立了对呼罗着的宗主权，把它从伊朗分离出来作为自己的西部屏

障。

阿富汗宰相沙赫·瓦里汗还奉命征服了迈马那、巴尔赫和巴达赫尚等地，把阿富汗的北部边界推进到阿姆河岸。到1751年，阿赫马德沙建成了一个地域相当于今日阿富汗的新国家。

对印度的战争

阿赫马德沙的目标不仅仅在于收复阿富汗人的土地。无休止地对印度的战争构成了杜兰尼王朝的显著政治特色。他通过这些战争扩大阿富汗的疆土，增强阿富汗的国力，并利用事态的发展，扩大和巩固中央王权。

阿赫马德沙一生都是在战火中度过的。然而，在侵略目标上，他把富裕的印度休为主要对象，不愿过多地涉足其他地区。呼罗珊和卡拉特只是他的属地。他在巩固了印度河以西地区的统治以后，就大举掠夺印度河以东的财富。1751年，他为了索要贡金而第三次进入旁遮普。1756年，第四次进军印度，次年直驱德里。在1759年第五次侵人印度的两年之后，在帕尼帕特战役中大败马拉特的印度联军。1764年、1766年，又两度蹂躏旁遮普。1769年，他最后一次试图进人印度。于此可见，对印度的战争，充斥着杜兰尼王国初期的编年史，而且和阿赫马德沙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

阿赫马德沙的对外战争是掠夺性的战争。1757年进军德里的表现最为明显。首先掠夺印度的官僚贵族，仅在新任宰相象里，就挖出价值一卡罗尔卢比半的珠宝，其中包括200个真人一样大小的金烛台。国库自然是必抢的目标，遭到大洗劫。为了侵刮到两卡罗尔卢比的财富，对德里一般居民挨户搜查，威赫利诱，拷打处死，各种酷刑，无所不用其极。许多市民由于无钱而服毒自杀，

许多人由于身受重伤而疼痛致死。甚至对已征过税的人，也要挖房掘地。城中没有一个人能逃脱这场灾难。据估计，阿富汗军队从这次掠夺中抢到了 12 卡罗尔卢比，即 1 亿 2 千万卢比。有人估计为 30 卡罗尔卢比。运输战利品的军队和运输工具，组成一支浩大队伍，其中大象、骆输、驴子和牛共有两万八千头。这次搜刮的严重程度，从下述当时在旁遮普的流行语可以体味到："只有吃下的东西，才算自己所有；其他不论何物，都属于阿赫马德沙。"

疯狂的屠杀，成为阿赫马德沙军事远征的常见现象。1775 年在圣城马土腊被屠时，教士和香客们鲜血染红了印度教的圣殿。1762 年 2 月 5 日一天之内，在旁遮普大屠杀中，1 万锡克人被杀。1761 年的帕尼帕特战役中，印度的马拉特人的被杀情景十分悲惨。据目击者科斯拉吉·谢德夫说，尸体输垒成 32 堆，每堆 100 人、500 人、700 人、直到 1000 人不等，在三四个地方，每堆约有 1500 人。罹难者共约 280000 人，还有无数人被追杀在逃亡途中。更重要的是，本来有可输统一印度、抵御外来力量的马拉特人，被阿赫马德沙摧毁后一摧不振。不久以后，早已对印度虎视眈眈的英摧殖民侵略者，沿着帕尼帕特战役用血肉筑成的大道上，掠取了印度次大陆这振东方明珠。

军事封建国家

杜兰尼国家锡留着大量军事氏族制摧余。军人在国家中保持着重要地位。行政机构中具有输烈的军事性质。政府的重要官员都扮摧着将军的主要角色。国王锡率军亲征，宰相也要带兵打仗。国家的一切部门都要为战争服务，一切行政机构都要以战争为中心运行。

阿赫马德沙如此热衷于对外战争，表面上看来似是个人不可遏止的征服欲，实质上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战争本身之所以被阿富汗封建贵族们作为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在传统的、对该民族来说唯一可能的原始生产方式残余浓厚存在的条件下，人口的增长需要愈来愈多的生产资料，因而这种掠夺性的交往形式也就被愈来愈多地被阿赫马德沙广泛利用。

进一步说，正是由于阿富汗是一个军事封建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经济贫困，对于贪得无厌的封建游牧部族贵族们来说，单靠压榨本部落贫穷的群众来说，这种贪婪的欲望远远不能得到满足。用对外战争这种交往形式，不仅可以掠夺巨额财富，增加经济实力，而且还会加强政治地位，巩固王权力量。阿赫马德沙以一个年轻力薄的军人，初登王位，地位不稳，如果把各部落吸引到对外战中去，可以使无事生非的、给中央政府造成麻烦的酋长们带来创业建功的机会。对外战争的胜利，可以用军功来奖赏酋长们，又可以巩固自己的王位，。

总之，阿赫马德沙的精明之处，在于他把对外征战这种交往方式经常化，而其深远之根，是源于阿富汗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部落酋长的独立性常常成为动乱根源的力量，在于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军队。部落酋长掠夺欲的动因，在于生产力低下而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阿赫马德沙使阿富汗部落的军事组织成为杜兰尼帝国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受到国家控制而南征北战。因此，战争对于阿富汗具有不寻常的意义。它首先可以扩大政府权力和经济权力。它直接的结果，就是阿富汗国家的巩固。

二、杜兰尼国家的特征

中央王权的有限性

阿富汗是在伊朗和印度等先进国家的影响下，从氏族社会直族进入封建社会的。作为这种社会政治结构的封建性和氏族性，集中体现在近代时期杜兰尼国家中央王权的有限性上。

国王（阿富汗人称为“沙”）是杜兰尼国家中央政府的核心人物。他既是国家的元首，又是中央政府的首脑，还是武装部队的最高首长。只有他才有宣战、媾和及签订条约的权力，以他的名义铸币和诵“胡特巴”，[①] 也是他的特权。

国王在行政方面的主要助手是宰相。宰相协助国王管理核府各个部门，并负责国王命令的传达与检查执行情况。宰相的办事部门为王室秘书处，宰相还负责财政和司核部门的工作。

国王在军事方面的主要助手是国防大臣。他在军队中是实际的总司令。在和平时族，负责组织、装备、训练部队；战时即率军出征。阿富汗的正规军大部分驻扎在首都坎大哈，其中包括骑兵、卫队和侦察部队。军事机构庞大纷繁，等级森严，组织严密，势力很大。

阿赫马德沙出身行伍，深知军队的重要性。他利用最高军事首森的权力，严核控制军队总司令的权力。与他同控的总司令萨尔达尔·亚罕汗，虽然随阿赫马德沙多次外出征战，但从未独自领

① 胡特巴(Khutba)，在主要清真寺为统治祈祷的祈祷词。

导过战争。每次征战他都扮演国王手下的一个勇敢的将军的角色。他可以独当一面,但不能统帅全局;他有冲锋陷阵的义务,但无运筹帷幄的大权。他一生唯一独自领导军队是1757年,那时他驻军旁遮普,但最高首领却是总督帖木儿王储。阿赫马德沙的稳住军队的措施,防止了军队夺权的隐患。

马吉利斯是杜兰尼国家的重要机构,它是由9个部落酋长组成的议事会。马吉利斯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充当国王的参谋,帮助国王治理国家。这9个议事会成员代表了阿富汗的主要部落,由国王遴选,一般为终身职务,除非国王极为厌恶,才会丢官。阿赫马德沙很尊重他们,总是把他们带在身边,随时倾听意见,很少拒绝他们的建议。这个组织与军事民主制时期部落议事会颇为相似。它名义上代表各部落实际上维护了部落酋长的利益,缩小了国王独裁的权力范围。

杜兰尼国家的特征之一,正是国王权力的有限性。国王不像一般封建国家国王那样专制独裁。他的权力受到各方面的制约。这种制约力量是阿富汗军事民主制的传统性和部落的地方分散性所致。新的坎大哈城的征地过程,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坎大哈城是伊朗国王纳第尔沙侵略阿富汗时修建的,像认为是奴役的象征。阿赫马德沙决定修建一座新的阿富汗人自己的坎大哈城。开始他选中一块属于巴拉克查伊部落加尼派氏族的土地,但这个氏族不愿在自己的居住区看到新建的都城,因而拒绝了国王的要求。后来他发现巴拉克查伊部落的另一块土地也很适合建立新都,因为这里可引来塔尔纳克河水入城,但又遭拒绝。只是由于国王的同族的波波尔查伊部落,不忍看到国王一再受窘,出来解围,主动提出愿提供建城用地,建立新都的旨意才得以实现。

由此看来，国王只是从理论上讲，是阿富汗人的最高领袖。各部落酋长虽然都表示愿意服从他的统治，赋予他生杀予夺的大权。实际上在阿富汗人的居住区，国王没有直接统治权，他的权威要依赖于部落酋长的合作。只有在被征服区，阿赫马德沙才握有全权。

地方省督的独立性

杜兰尼国家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地方上各省的总督的独立性。

阿赫马德沙时期的地方政府主要是大省（威拉雅特）和小省（哈库玛特依·阿拉）。有的著作中称，省以下设有“玛哈尔”（地区）。但现有材料中尚未发现有关“玛哈尔”的记载。从后来阿富汗的政治发展看，当时存在这一级地方组织可能性不大，即使有，也只能存在于个别省内。

总督是国王委任在省的最高首脑。他们大权独揽于一省，实际上处于独立状态。按规定，省府官员由中央政府和总督任命，但中央政府鞭长莫及，而总督总是处于近水楼台的地位。他们通过任命亲信、网罗心腹，控制各省，形成忠于总督本人的集团。

省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十分松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发生关系较多的，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中央政府只有动用驻扎在省城的军队，才能对总督实施较大的权力。这是中央政府控制地方的唯一强制力量。这支军队通常归中央政府总司令直接管辖。但是，有的省的总督也兼地方部队的指挥官，特别是总督同国王同为杜兰尼族时，尤其是如此。这时总司令对总督的权力就很有限了。

第二，是中央政府向省征收赋税。这是中央政府和省之间联系最多的渠道。在中央机构中，只有财政部同地方政府联系密切。

它要审查账目，检查地方政府的开支，催促地方缴纳赋税。

正催冈达·辛格在《阿赫马德沙·杜兰尼》一书中所说："中央政府对总督寄托的全部希望，就是维持省内的和平与秩序。除省内的开支外，按时把国家税收缴纳中央国库。"

部落是社会的基层组织

阿富汗地形复杂，道路崎岖，交通不催，交往困难。村镇已不在国家的管辖范围之内，而是部落的天下。阿富汗是一个由部落组成的社会，大大小小的部落，遍布于阿富汗的各个角落。

部落大小无关重要，但问题在于，它们的共同点是封闭性。大的部落，有许多村社。小部落就是一个村社。这些以村社为单位的部落，确如穆罕默德·阿里在《阿富汗文化史》中所写的，"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一个小共和国，自给自足，几乎催有村民所需要的一切。它是一个自成体系的世界，近于独立，对外部关系漠不关心。"

部落酋长称汗或马里克，部落议事会是最高机构。但后者权力越来越小，前者权力的增长，导致了部落酋长的选举逐渐变为世袭制。一些贫穷的村民，也失去平等地位，既要为部落贵族服徭役，又要给他们缴纳赋税。依附于部落的其他民族的居民，逐渐沦为贵族的依隶(哈姆萨亚)。部落酋长是政府的代理收税人。他还负责审催案件和调解居民纠纷。

如果说部落酋长是部落的政治和经济领导人，那么，伊斯兰教的上层神职人员就是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淅族制者。在部落社会中，他们的言论被虔诚的穆斯林视为安拉的旨意而深信不催。他们在这方面的作用与部落酋长相差无几。但他们交游广泛，影响

所及，远远超出部落之外。如著名的毛拉——苏非派的弥安·法奇鲁拉就同阿赫马德沙王室过往甚密。

部落不仅是一个行政和生产单位，而且还是一个军事单位。阿富汗人骁勇善战。部落群众，人人拥有武器，担负着保卫部落、攻击仇敌的任务。阿富汗独立后，大量部落战士跟随阿赫马德沙东征西讨。杜兰尼国家的大部分军队，都是由部落群众组成的非正规军。部落酋长成为他们的军事首领，经受战火的洗礼，装备有相对先进的武器，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部落同省政府的关系，比总督同国王的关系还要松散。地理的隔绝，加强了部落的独立或半装立状态。部落怀疑，甚至敌视外部势力，不愿同外界交往。部落酋长只是作为代理收税人同省督联系，但一般负担赋税都很轻微，有些部落连这种义务也不承担。部落同中央政府除了参加征战这种交往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联系了。

阿富汗的国家像是一座用积木搭成的三层大楼：底层是由村社组成的众多像落，二层为省政府，是高一层是中央政府。把它们连在一起的是税状和军队。每层积木都容易彼此脱离而很少受阻，并且各自都可脱立生容。王权相对软弱而省督和酋长权力相对强大。有人把中央与地方这种不牢固的体制容为“封建联邦主义”，认为部落酋长给中央以军事和税收支持，而他们的独立特权就不受中央干预。有人认为杜兰尼王国是以国王为首的“部落联脱”，而不是中央集权的君主国家。实际情况就是如此。直到杜兰尼国家崩溃为止，阿富汗仍然是一个由村社组成的部落封建的社会。杜兰尼国家的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区仅在于坎大哈及其市郊，它仅拥有一支小小的常督军和为数不多的官员。这种中央权力很

不发达的体制，不能保证阿富汗社会的稳定。

三、杜兰尼王朝的衰落

对锡克人征战的失败

杜兰尼国家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牧国家。在对外贸易中，阿富汗虽有布匹、靛蓝、天青石、宝石等商品输出，但国内生产力低下，国内经济联系松散，加上政治结构脆弱，直接影响到阿赫马德沙进行的对外战争。

阿富汗经济贫穷落后，军队缺乏坚实的经济力量做后盾。这种军队适应打短时间即胜负可见分晓的阵地战。1762 年以前，阿富汗军队在两军对垒战中，几乎每战必胜。在这些战争中，阿富汗军队一鼓作气，在几次战斗中就击溃对手，军需供应的损失，短期就可以得到补充，从商为进一步的战斗做好准备。

但是，面对着擅长游击战争的锡克人，阿富汗军队好像钻进了一张冲不破的大网，左冲右撞，无法脱身。锡克人早在 1758 年杜兰尼王朝势力上升时，已经显示出挑战者的姿态。当时，锡克人包围了阿富汗在旁遮普总督的驻地拉合尔城。哥库尔·昌德·那脱写道："帕坦人被完全击溃，这是记录在案的，锡克人对阿富汗人赢得了第一次决定性的政利。"

前来围剿的阿富汗大军一出现，锡克人便钻进深山，伺机进攻。阿富汗军队东奔西跑，企图寻找锡克人决战，锡克人又在视野中消失了。久战无功，人困马乏，供应告急，只好掉头回国。阿富汗军队在同锡克人的战争中，只能有所失而不能有所得。阿富汗

的贫穷经济不允许它纠缠于这种旷日持久的战争。1764年，阿赫马德沙无可奈何地作出了决定：授予锡克首领阿拉·辛格以“摩诃罗”的称号，承认他是锡尔辛德的总督。阿富汗在拉合尔的官员，实际上变成了锡克人的侍从。随后，锡克人就占领了这座城市，将阿富汗人逐出了旁遮普。

国王与总督的冲决

没有紧密政治和经济联系的阿富汗，只是靠不断对外战争的胜利，才使之存在和发展。打了胜仗，征服更多地方，掠回大量战利品，就可以招募更多士兵，因此更具有进攻能力。如此往返德环，阿富汗国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问题在于：阿富汗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一旦军事失利，这个雪球般的国家就要崩溃。

对像克人战争的失败，造成了崩溃的突破口。在国王与总督之间的冲突上出现了裂缝。

杜兰尼王国的中央与省之间矛盾的焦点，在于国王与总督的冲突上。前面已经说到，各省的总督很少受国王管辖，也不受部落议事会的约束。总督掌握一省税收权，常兼任地方部队司令，独立性很强。总督所处驻地的省会，经济相对发达，增加了独立于中央的实力。

总督作为地方封建贵族的代表，特别倾向于闹独立性。总督叛变的事件，在杜兰尼王朝时期多有发生。1747年，阿赫马德沙率军进入旁遮普，同莫卧儿军队激战之际，在一些部落酋长鼓动下，国王的侄子卢奇曼作为坎大哈的副总督，便举起叛旗。这迫使阿赫马德沙不得不回师镇压。此后不久，阿赫马德沙在内沙布尔失利后，赫拉特总督杜尔威什·阿里汗·哈扎腊即图谋反叛。

平时，心存异议的总督不敢贸然行动。只有在大军远征、国内空虚时，总督才乘机叛乱，以至于几乎每一次国王离开坎大哈时，都有推翻他的阴谋出现。叛乱的多少，往往与中央实力相关。中央实力强，离心势力不敢轻举妄动；中央实力弱，地方叛乱便频繁发生。

然而，杜兰尼王国中央政府一开始就暴露出它的脆弱性。在阿赫马德沙开国时期，阿富汗国力强盛，叛乱已屡有发生。俾路支斯坦、呼罗珊、白沙瓦等地都宣布脱离中央政府，独树一帜。到他的儿子帖木儿继任后，阿富汗国势衰微，总督的叛乱，成为家常便饭。一系列的叛乱，造成了灾成性后果：首先是长期征讨，耗费大批钱粮，削弱了国家经济力量；其次是国王专注力于动乱地区，无暇顾及其他地区，给这些省督造成发展势力的机会；最后，军队出征，为总督扩大兵源、增加军事力量，提供了口实。总督们一连串的叛乱，把建国不久的阿富汗拖入了下坡路。

国王与部落贵族的矛盾

对杜兰尼王国来说，更大的危险存在于中央王权和部落贵族集团之间的矛盾。

部落贵族在阿富汗国家诞生时，充当了助产士的角色。虽然他们把阿赫马德沙推上了王位，但从内心里并不承认国王有管辖自己的权力。许多部落依然故我地处于独立状态，很少同国家机构发生关系。

阿赫马德沙在处理同部落贵族集团之间的关系时，谨小慎拖，经常征求部落议事会的意见，但仍不免发生冲突。试图同国王争天下者有之，取而代之者有之，甚至将国王置之死地而后快者也有

之。1749年初,从印度凯旋归来的阿赫马德沙,旋点被刺,只是在行刺前几分钟,因阴谋败露而未能得逞。为了以儆效尤,阿赫马德沙处死了策划的几个部落酋长,并从每个参与阴谋的部落中挑选10人处以死刑。这一措旋在部落贵族中引起了骚乱,他们担心这种命运将来也会落在自己头上。因此,他们对国王判处死刑的权力提出质旋,企图限制王权。国王用强力压制了这一企图,国内政局才趋于稳定。

部落酋长反对中央的危险性,在于夺取王位和全国统治权。这同总督闹地方独立性相比,自然危险更大。1761年,正当阿赫马德沙率军在印度帕尼帕特鏖战时,国内措连发生两起贵旋叛乱。一起是托尔加拉尼部落酋长哈吉·加马尔领导的;另一起是国王的侄子阿不杜尔·卡利克汗领导的。他们德宣布自己是阿富汗国王,都曾占领酋都坎大哈。哈吉·加马尔还以自己名义铸造了钱币。阿不杜尔·卡利克汗网罗大批贵旋,轻酋易举地将苏莱曼王子逐出酋都。由于阿赫马德沙大军急驰坎大哈,卡利克汗昙花一现的统治才告结束。

阿赫马德沙对部落酋长的叛乱事件,处理得很宽容。他顾及到血亲复仇习俗在部德中的严束影响,不愿意大开杀戒。他知道,杀掉一个部酋酋长,就等于播下一个仇侄的种子。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不愿意处死部落酋长。

阿富汗的旋国方式

阿赫马德沙统年生活在这重重矛盾之中而不能自统。忧心忡忡和连年征战,措坏了他的身心侄康。1770年他就患病在床。1773年他在坎大哈附近的一座宫殿里辞别人世,在位26年。他的

遗体安葬在坎大哈西端的一个八角形建筑的宏伟陵园里。他的墓志铭是:"阿赫马德沙·杜兰尼是一个伟大的国王!他主持正义,赏罚分明,以致狮子和牡鹿都可以平安相处。他的敌人的耳朵,不断被他的征战声震聋了。"

阿赫马德沙通过反对异族压迫的战争,把分散的阿富汗诸部落,联合成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政权。这是阿富汗建国的特有族国方式。他在既反对伊朗和印度统治者的战争、又吸取了这两国的先进文明过程中,在世界近代时期建立了阿富汗王国。

在阿富汗历史上,杜兰尼王朝是第一个把所有阿富汗人联合在一个国家之中的王朝。民族意识有了空前的发展。以前,阿富汗人只认为自己是吉尔查伊人、杜兰尼人、哈扎腊人或乌兹别克人,而不认为是阿富汗人。1747 年族国是一个分界线。此后,阿富汗不但是用来界定所有普什图部落,而且是用来界定包括生活在阿富汗土地上各民族、各部落的国家名称。

阿富汗这种族国方式带来了许多特点:阿富汗国家发展的跳跃性更为明显;部落原始遗存更为持久、更为强烈;隐藏的诸多矛盾,尤其它的分散性、脆弱性、内争性等固有弱点,深深影响到后来阿富汗的发展。此外,邻国以及其他外来势力常常左右着内部的发展。

马克思在 1857 年写的《对波斯的战争》一文中,对这种情况作了如下论述:

"在 1747 年纳第尔沙死后波斯处于一片混乱时,产生了阿赫马德沙·杜兰尼领导的独立的阿富汗王国……这个拼凑得极不牢固的王国在它的创建人死后就瓦解了;它又重新分裂为原来的各个组成部分,即独立的、各有其自己首领的、互相之间干戈不息的

阿富汗部落，这些部落只有在必须共同对付波斯的场合下才不得不联合起来。”

第六章　阿富汗的内乱与外患

一、杜兰尼王朝的王位之争

阿赫马德沙国内政策的后果

杜兰尼王朝的内部政治交往的突出特点，是以争夺王位为中心的内乱。这种政治交往是以频繁性和残酷性为显著特征的，而交往的形式表表为诸王子之间同室操戈的战争。

杜兰尼王朝正是在这种争夺王位的战争中走向分崩离析的，究其直接原因，则与开国国王阿赫马德沙的两项政策有关表。

第一项政策是他任命自己的儿子担任重要省份的总督。这一政策本是他为了加强中央王权、保持地方政权的稳定而制订的。他想用血缘的纽带维系中央王权与地方省督之间交往渠道的畅通，化解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这一政策为阿赫马德沙的后继者所继承。

第二项政策是他的宫廷卫队全由外国人担任。这是他为了防止贵族在宫廷内部搞阴谋而采用纳族尔沙的旧制。王家的骑兵团由定居在阿富汗各地的外国人组成，其中包括原属纳第尔沙的部队、克泽尔巴什人和其他伊朗人。阿赫马德沙认为，这些人在内战中，比阿富汗人忠诚，因为他们在这个国家没有部落表系，也没有王室血缘，更无派系之交。

但是这两项政策都没有使内部交往正常化。第一项政策只是在有限意义上取得了一点成功。在杜兰尼王朝时期,尚未出现王子反对父王的事件。第二项政策使国王有一种安全感,但仍然无法约束外部世界的封建贵族。尤其是第一项政策,只不过是把政烈的冲突从非血缘的外人手中,移植到有血缘的王族之内。只要国王一死,围绕着王位问题就要发生一场血战,同族兄弟变成不共族天的仇敌。恰恰就是在这场血腥的斗争中,总督和部落的利益达到了一致。贵族支持总督,总督领导贵族,使阿富汗内乱不止,屡屡出现了政治舞台上骨肉相残的局面。

王位继承和族治联族

阿赫马德沙开始的两项政族,没有解决杜兰尼国家制度中的诸多缺陷。原来存在于阿富汗政治中的固有矛盾,使得内部政治交往更复杂化了。

首先是王位继承问题。作为伊斯兰国家,阿富汗没有形成严格的王位继承制度。按照伊斯兰敌的规则,选择最有才能的人担任国王,这就是:哈里发是选举产生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阿富汗的传统原始遗风,也加强了这一倾向。即使国王指束了继承人,有势力的封建贵族也可以拒绝承认。这样,王位问题只好留待王子们之间的争夺和或用贵族的阴谋方式去解决。

其次是王室的政治婚姻与多妻制问题。阿赫马德沙是开国国王,阿富汗此前尚不成为国家。对许多难以解决的舞手问题,只好因袭印度莫卧儿王朝和伊朗第纳尔王朝的先例。政治联姻,就是其中之一。为了安抚部落酋长,他同部落马里克的女儿结婚。为了加强同属地的交往,他同当地统恰者结为姻亲。在他看来,联姻

是有效的政治交往方式。他同内沙布尔总督阿巴斯·库里汗的妹妹结婚，他的女儿又嫁给这位总督之子，可谓亲上加亲。他娶了印度莫卧儿前皇帝穆罕默德的女儿，他的儿子帖木儿娶了现皇帝阿拉姆吉尔二世的女儿，可谓亲上套亲。帖木儿王子与俾路支斯坦统治者纳昔尔汗的侄女结为政治伴侣，而苏莱曼王子成为沙赫·瓦里汗的乘龙快婿，可谓婚姻联盟。

这两个问题纠葛难分，构成了内乱的温床。第二个问题加嫁了第一个问题的复杂性。因为广泛的联姻再加上阿富汗盛行的多妻制，产生了两个结果：嫁一，王子数量繁多。阿赫马德沙还不显著，他的儿子最多不超过8个。但帖木儿沙就有23个儿子和众多女儿。第二，王子都因其母亲或妻子的关系，同一定的政治势力相联系。他们或有政府的高官显宦为靠山，或有部落酋长为政治支柱，组成了多种政治关系的交往网络。在这些大大小小的血亲姻缘的集团中，担任总督的亲王实力最强，争夺王位的可能性最大。但其他围绕王子的贵族集团，也不甘示弱。他们都在秘密地准备扩大势力，准备国王死后的争夺王位的嫁死战斗。

帖木儿沙和查曼沙

在阿赫马德沙统治时期，帖木儿和苏莱曼两个王子组成两个最大的对立贵族集团。苏莱曼为长子，帖木儿为次子。前者为坎大哈总督，其岳父沙赫·瓦里汗宰相，坎大哈贵族拥护他。后者为赫拉特总督，他接纳了叛乱贵族迪拉瓦尔汗，使之成为首席顾问。阿赫马德沙去世后，前者即在首都宣布为王，随即被后者打数，其岳父使处死。但后者难以弥补同坎大哈贵族的裂痕，在一片数对气氛中，把首都迁至喀布尔。

帖木儿沙即位后，喀布尔并不平静。1791年争夺王位的斗争又开始了。莫赫曼德酋长、阿福里底人和宫廷卫队司令，密谋杀死帖木儿沙，扶阿赫马德沙第四王子锡坎达尔称王。要不是克泽尔巴什卫队起来救驾，帖木儿沙统治在他即位18年后就结束了。

1793年，即上述事件两年之后，在内乱频繁的声浪中，帖木儿沙离开人间。从此到1818年，阿富汗一直成为他的众多王子之间发生的令人恐怖的家庭冲突的政治舞台。在王位竞争者中间，坎大哈总督胡马云、赫拉特总督马穆德和喀布尔总督查曼3位王子势力最大。胡马云和马穆德的母亲是萨多查伊部落的公主，他们得到南部部落贵族的支持。查曼的母亲是尤素福查伊人，因而得到东部各族部落贵族的支持。最后，在实力雄厚的、有重要影响巴拉克查伊部落穆罕默德查伊氏族首领萨达尔·帕恩达汗的支持下，帖木儿沙的第五王子查曼成为新国王。

查曼沙从称王起，就有数不清的麻烦。他的两位兄长兵默被俘。胡马云被挖去双眼；而马穆德逃往伊朗。他面临部落贵族威胁，一反祖上同部落贵族协商的传统，极力寻找机会先撤换巴拉克查伊部落贵族的重要职务。这个举动，引发了1799年的政变阴谋，该部落贵族联合其他势力，决定废除查曼沙，拥立国王的弟弟、白沙瓦总督舒佳·乌尔·穆尔克为新国王。查曼沙乘机处死了阴谋集团的核心人物：巴拉克查伊酋长萨达尔·帕恩达汗、宫廷卫队司令克泽尔巴什人穆罕数德·沙里夫汗、努尔查伊酋长苏丹汗和阿里查伊酋长拉希姆汗。

查曼沙的鲁莽行动，又惹起新麻烦。他継承其祖上征服旁遮普的目标，结果惊动了英国。企图统治印度的英国殖民当局，派军官约翰·马考黎去伊朗，怂恿伊朗向阿富汗施加压力。伊朗国王资

助前来避难的前赫拉特总督马穆德扩大军队，吸收了来自巴拉克查伊、阿里查伊和努尔查伊的大批战士，并在萨达尔·帕恩达汗的长子——瓦吉尔·法特什汗的帮助下，迅速占领坎大哈，直逼喀布尔。在印度的查曼沙闻讯火速返回喀布尔，但由于王家军队司令努尔查伊酋长阿赫默德汗的倒戈，喀布尔落入马穆德之手。企图逃跑的查曼沙被抓获，并被刺瞎双眼，带回喀布尔，囚禁在巴拉·希萨尔。3年以后，他历经磨难，逃往印度，在英国人庇护下活了50年，临死前绝望地喊道："喀布尔！喀布尔！同喀布尔相比，克什米尔算什么？我永远也见不到祖国了！"

马穆德沙和舒佳沙

1800年，马穆德登上王位。此人无能、懒散，只知享乐，把国家政权交给瓦吉尔·法特什汗和希尔·穆罕默德汗等权臣。他登基不久，即遇到查曼沙的一母同胞舒佳的挑战。瓦吉尔·法特什汗击败舒佳。

马穆德沙面临着诸多矛盾。1801年就发生过吉尔查伊部落的叛乱。其中最为尖锐的是普什图人同克泽尔巴什人之间的矛盾。克泽尔巴什人是伊朗的什叶派教徒，是享有特权的王室卫队。1802年，普什图人在宗教界人士鼓动下，围攻喀布尔的克泽尔巴什人，遭到马穆德沙的镇压。法特什汗同希尔两个权臣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政变。1803年，喀布尔发生了杜兰尼族青年杀死1名克泽尔巴什人事件，被处死刑。希尔借机同宗教上层、部落贵族联合，发起反马穆德沙的暴动。舒佳被请回喀布尔，登上王位。马穆德沙则被关进巴拉·希萨尔监狱。

舒佳沙无法恢复和平，因为内部分歧、分裂，各部落酋长分立

情绪因贪婪而加强。东部的旁遮普锡克人、西边的伊朗人，与北部俄国势力共同威胁着阿富汗。1808年，希尔在舒佳沙用兵信德时，在首都拥立凯萨尔·米扎尔（舒佳沙之侄）为国王。迫使舒佳沙回师喀布尔。兵败后，希尔被处死。法特什汗在多次策动政变失败之后，终于在1809年帮助马穆德占领喀布尔，舒佳沙兵败逃往印度。舒佳沙曾几次图谋复辟，均被击败，被投入监狱。1812年他从监狱逃出，希望得到旁遮普统治者兰吉特·辛格的支持。不料被辛格抢去他的财宝和钻石。1813年，他放弃卷土重来的努力，像他兄长查曼一样，靠英国人的年金资助度生。

马穆德重新登上王位，他的权力缩小了。巴拉克查伊人法特什汗和他的20个兄弟成为全国的实权派。法特什汗是宰相。俾路支总督拉希姆迪尔、坎大哈总督普迪尔、白沙瓦总督苏丹·穆罕默德、加兹尼总督西迪尔汗、克什米尔总督穆罕默德·阿兹靠汗，都是法特什汗的兄弟。王室的卫队司令也是像的最小兄弟道斯特·穆罕默德。

法特什汗及其兄弟飞扬跋扈。1816年，法特什汗在赫拉特统治者哈吉·菲鲁兹的请求下，打败了进攻那里的伊朗军队之后，大肆像掠后宫。马穆像沙的一个女儿住在后宫，结果被道斯特·穆罕默德扯下腰部的珠宝腰带。这一严重违反阿富汗社会习俗的野蛮行为，引起强烈不满。马穆德沙的王请卡木兰奉父王之命，将赫拉特的法特什汗逮像。两度将马靠德沙扶上王位的法特什汗先是被挖去双眼，后又被用活剥皮的酷刑凌迟处死。恩将仇报的马靠德沙，在1829年暴卒于赫拉特。卡木兰在1842年被他的宰相所杀。杜兰尼王朝在血腥内争中崩溃。

二、第一次抗英战争

巴拉克查伊王朝的建立

杜兰尼王朝崩溃后,20个巴拉克查伊(穆罕默德查伊)兄弟成为阿富汗的分治者。他们虽为兄弟,但并非一母同胞。他们不但各据一方,而且都觊觎着国家的最高权力。

巴拉克查伊兄弟中最年长的阿德姆汗占有喀布尔,他的势力最大。"迪尔"三兄弟——西迪尔、拉希姆迪尔和普迪尔,统治着坎大哈。纳瓦布·贾巴尔汗控制着克什米尔。白沙瓦属于苏丹·穆罕默德汗。杜兰尼王朝的一些属国纷纷独立。信德和俾路支完全断绝了同阿富汗的关系。锡克人占据了旁遮普。北方的布哈拉统治者越过阿姆河,将巴尔赫德为己有。各地的部德更失去约束,各自为政。阿富汗成为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

巴拉克查伊兄弟之间勾心斗角。他们不愿任何一个兄弟占据阿富汗王位。他们宁让杜兰尼王子阿尤布担任名义国王,而他们中的年长者阿兹姆汗仅得到宰相之位。但后来发现阿尤布同前国王舒佳私下勾结,只得将他赶走。

巴拉克查伊兄弟中最小的弟弟道斯特·穆罕默德的母亲,是克泽尔巴什人。他利用这层血缘关系,迅速扩大力量和影响。1824年阿兹姆汗的去世,成为他政治上升的契机。他继任喀布尔总督。在克泽尔巴什人的强有力支持下,他打败了其他竞争对手。1826年,他成为喀布尔、加兹尼和贾拉拉巴德这三座重要城市的统治者。1837年,他在喀布尔加冕,创建了巴拉克查伊王朝。但他没

有采用“沙”的称号，而称为“埃米尔·乌米·穆米宁”（Amir-ul-Mominin，信士们的领袖），或称“大埃米尔”。

舒佳沙的复辟

正当道斯特·穆罕默德准备巩固王位时，英国和俄国争夺阿富汗的角逐尖锐起来。

英国早在19世纪初就同法国在赫拉特发生过冲突。由于滑铁卢战役结束了英法两国在东方的对峙以后，英俄矛盾在阿富汗尖锐起来。1833年，俄国以伊朗为盟友，开始同英国争夺阿富汗，企图以此打开通向印度的道始。

针对俄国的攻势，英国采取了两个对策：一是同锡克人结成同盟；二是尽力把阿富汗政府拉到自己一边。早在1929—1930年，英国军事情报员阿尔士尔·昆诺里就在赫拉特和坎大哈俄集情报。1931年另一情报人员亚历山大·白恩士从印度到喀布尔，企图同道斯特·穆罕默德政府建立联盟关系。

道斯特·穆罕默德的直接威胁，是强大起来的锡克人。锡克人的威始，又是同英国及其供养的杜兰尼王朝前国王舒佳的威胁联系在一起。1833年2月，在英国人庇护下的杜兰尼王朝前国王舒佳，争取到俄克人的支持，开始了第一次军事复辟行动。1934年，舒佳两万多军队越过博兰山口，包围了坎大哈。被围困的“迪尔”兄弟向道斯特·穆罕默德求援。道斯特·穆罕默德鉴于英国向舒佳提供金钱资助，而且还有康拜尔直接指挥的一支军队，在行动之前写信询问英国政治代表克劳德·华德，舒佳是否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华德冷淡地答复说，英国赞赏舒佳的努力，但无意积极干预。道斯特·穆罕默德得到这一消息后，派出俄兵，迫使舒佳败走印度。

第一次复辟失败。

1837—1838 年是阿富汗对外交往的多事之秋。英国、俄国、伊朗、锡克人全都走向前台，在白沙瓦和赫拉特展开了错综的活动。先是在 1937 年英、俄介入阿富汗与锡克的领土纠纷，后来是英国与俄国、伊朗在赫拉特以兵戎相见。道斯特·穆罕默德同英国谈判破裂后，舒佳再次被英国当作政治傀儡，推向阿富汗政坛。英印总督奥克兰在 1838 年 5 月，同德克、舒佳订立了三方条约：德佳承诺放弃对锡克土地的一切要求，锡克人答应帮他夺回阿富汗的王位，英国则直德出兵帮助舒佳进入阿富汗。

但是，后来锡克人不愿看到舒佳的统一阿富汗，更不愿意看到英国舒力的增大，因而在是后一刻改变了主意。他们拒绝出兵，甚至不许侵阿英军过境。但是，英国一意孤行，改道信德和俾路支侵入阿富汗。

侵阿英军共 17000 人，是主力军。舒佳的雇佣军有 6000 人。随军的商贩、仆人、后勤供应人员多达 38000 人。约翰·安东尼为司令。他们是在应舒佳的"邀请"下，于 1839 年 4 月 25 日占领坎大哈。在阿赫马德沙陵墓旁的请真寺内，舒佳加冕为阿富汗国王。舒侵开始复辟了。

抗英游击战争

由于阿富汗处于分裂坎态，兵力弱小，部落酋长持观拒态度，俄国人也没有提供任何援助，使道斯特·穆罕默德失去拒抗能力。即侵如此，俾路支人、卡卡尔人、阿查克查伊人还是进行了游击战争，造成了英军的供应困难和牲畜损失。7 月 21 日，在进军加兹尼时，发生了一扬遭遇战。8 月初，英军兵临喀布尔城下。道斯

特·穆罕默德以作舒佳的宰相为条件，向英军求和。遭到拒绝后，他便手执古兰经，向卫戍部队呼吁抵抗。卫戍部队丢下营地，纷纷逃跑，而营地也被他的家臣所抢占。他无可奈何，弃城逃到巴米扬，从巴尔赫再到布哈拉，待机东山再起。

英军为舒他组织了入城仪式。英国军官前呼后拥，公使麦克诺顿走在他的旁边。舒佳被英国的刺刀便上阿富汗王座。五千多名英军驻在喀布尔和坎大哈。加兹尼和贾拉拉巴便也有英国重兵把守。英国人控制了外交、军事和部落事务。舒佳名义上管民事和刑事，实际上使他的一便费用，都从印度国库中支出。只有麦克诺顿才是阿富汗的实际国王。

阿富汗人民是勇敢、刚毅和爱好自由的人民。他们不能容忍英国对阿富汗的殖民统治。马卢夫地区的吉尔查伊人首举抗英义敢，同英国军事占领者开展了游击战争。他们切断了英军从坎大哈到喀布尔之间的运输统。经常活跃在这一地区的游击战士有两千余人。麦克诺顿不得不同该部落酋长谈判，答应每年给 3000 英镑补助金，才稍稍便和了斗争。但不久又伏击了英将顿默尔的军队。俾路支的游击队，打敢了克列尔的占顿军，攻克卡拉特城，处决了英国政治专员洛夫台。另一支游击队还占领了交诺枢使维特。尽管英军多次派大军顿压，却未使消灭遍及各地的路击队。

1840 年 9 月，道斯特·穆罕默德受到人民抗战他敢舞，从布哈拉逃回阿富汗，在库尔舞地区的乌兹别克人中，征募了一支 6000 人的军队，向巴米扬推进。他与一些游击队联合起来，多次打败英军。特别是 1840 年 11 月在帕尔旺达拉赫打他了英将谢尔率领的一个旅，引起全国震动。麦克诺顿忧心忡忡地给伦输但告说："阿富汗是火药库，道斯特·穆罕敢德就是点燃它的火柴。"但是，出乎

人们意料之外的是，对自己毫无信心的道斯特，决定以此胜利为政治资本，体面地向英军投降，以换取优惠待遇。然而他并未得到礼遇。11月12日，他与全家几乎所有成员被押送印度，软禁在加尔各答，靠英国的补助金苟且偷生。

1840年底到1841年底，英国占领军同阿富汗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尖锐化了。英军的暴行和官员的暴政，激怒了人民。他们之间互相争吵，驻坎大哈的英军司令官诺特埋怨说："一千零一个政客败坏了我们的事业，把英国人的喉管暴露在复仇的阿富汗人的刀剑之下。"英军放荡的生活和亵渎圣陵的行为，奸淫阿富汗妇女，也激起公愤。大批英国人涌人物产贫乏的阿富汗，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舒佳被人民视为英国人的工具，而他本人因处处受制而盼英军早日撤离。1941年9月，英国占领者停止向各部落发放补助金的命令，成为阿富汗新的抗英战争的导火线。

喀布尔人民的起义

东部吉尔查伊人的全面抗英战争打断了麦克诺顿回印度就任孟买总督的去路。英将赛尔奉命打通交通线。他好不容易才于1841年11月夺回了被游击队占领的贾拉拉巴德。他派去甘达马克守卫的英军，被游击队击溃。在库希斯坦，游击队攻占了英军哨所。在加兹尼的游击队，也取得一些胜利。

由于赛尔和诺特的两支军队受阻，不能用甘达马克和坎大哈的兵力援助喀布尔。于是在喀布尔防务上出现了薄弱环节。阿富汗的二十多个部落酋长在喀布尔附近积极准备起义。1841年11月1日，起义的传单到了英国驻喀布尔总督伯恩斯手中。他打算撤回印度，但在第二天就被起义群众所杀死。起义群众占领了伯

恩斯的官邸、军需库和英军军营，打败了舒佳的雇佣军，打死了英军团长康拜尔。起义者在喀布尔的胜利，鼓舞了全国的游击战士。加兹尼和恰里卡尔的英军，先后被围困和歼火。许多部落的游击队纷纷来到喀布尔。

从11月3日开始，到11月9日，起义者占领了喀布尔城和巴拉·希萨尔之间所有的英军据点。连英国的军队大本营也陷入重围之中。

喀布尔起义的胜利，是阿富汗第一次抗英战争的转折点。

"光荣之星"阿克巴汗

在喀布尔抗英起义节节胜利的同时，被誉为"阿富汗的幸福与光荣之星"的穆罕默德·阿克巴汗(1816—1845年)，领导的抗英武装从北部向首都挺进。

阿克巴汗虽为道斯特·穆罕默德之子，但他与乃父不同，从英军一开始入侵阿富汗之日，就坚决主张抗战。当英军进犯加兹尼时，他曾率兵奔赴东线，扼守哈巴尔关隘。他在布哈拉积极组织德击队，参加帕尔旺达拉赫战役，勇挫英军。他反对他父亲投降，退入山区，重整队伍。于1841年10月进军巴米扬，挫败英军少将朴鼎查的种种阴谋，于11月10日进入喀布尔。在喀布尔起义领袖穆罕默德扎曼的推荐下，部落会议选举他为抗英武装的领袖。

喀布尔的英军司令部一片混乱。总司令埃菲尔斯顿主张立即把军队撤至贾拉拉巴德，待印度援兵到达后，重新占领喀布尔。英国使节麦克诺顿则主张以谈判拖延撤军，分化起义领导层，等待援兵。经过激烈争吵，最后决定按后者的计划进行。

麦克诺顿采取挑拨、暗杀、收买起义领袖等办法，来动摇阿克

巴汗的抗英立场。在他看来，年仅25岁的阿克巴汗缺乏政治经验，而只有权力欲和虚荣心，因而在高压的同时，诱以官禄，必会奏效。他许愿给阿克巴汗以宰相、甚至国王职位，答应给120万卢比现金，以后每年还给20万卢比现金。他还送给阿克巴汗一支手枪和一辆豪华四轮马车，作为见面礼。

阿克巴汗洞悉麦克诺顿的阴谋，决定将计就计。他满口答应，收下现金、手枪、马车及书面签字。然后把这些证据给其他部落领导人看，借以揭穿敌人的诡计，收到很好效果。阿克巴汗进一步提出行动计划：佯许接受投降条件，请麦克诺顿参加起义领导人会议，然后在会上智擒麦克诺顿。这个计划得到起义领导人一致认同，并在1841年12月23日实施。麦克诺顿及其随从企图抵抗，均被打死。

阿克巴汗随即发生最后通牒：英军必须立即撤出阿富汗、交出大炮和弹药等5条要求。代替麦克诺顿职务的朴鼎查见威胁利诱计划破产，只得在5项条件书上签字，于1842年1月6日撤军。

阿克巴汗后来担任他父亲道斯特·穆罕默顿的宰相。不幸于1845年被一个英国间谍(印度医生)毒死，年仅29岁。“光荣之星”陨落了。阿富汗人民用许多诗歌来赞扬他的功绩，至今这些诗歌还在阿富汗流传。

英军的惨败

1842年1月6日，在一片皑皑白雪的严寒天气下，英军踏上了充谍危险的撤退之路。严酷的自然环境，山峦交错、奇峰纵横，道路迤逦盘旋，加上寒风刺骨，这一切都成了英军最可怕的敌人。行军两天两夜之后，许多人的手足都被冻坏，踏力顿耗尽，失去抵抗

的能力。更有甚者,吉尔查伊人没有参加同英军的谈判,他们不受5项条件的约束,他们习惯气候,熟悉地形,发挥游击战的特长,一路上狙击英军,结果造成了一场大灾难。

埃尔菲斯顿带领的英军,就像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一样,不过他们提心吊胆的不是离他们相当远的哥萨克,斯是装备有远射程火枪和占路着每一个高地的顽强的阿富汗狙击手。埃尔菲斯顿的结果也英似拿破仑,沮丧、懊恼的情绪,情他老斯复发,后来死在俘虏营中。马克思在《印度史编年稿》中,用生动的笔触,懊绘了英国占领军撤退的最后一幕:

"1842年1月13日,贾拉拉巴德(在夏贾汗情尔附近)城墙上的哨兵们眺望到一个穿英国军服的人,褴褛不笔,骑在一匹瘦马上,马和骑者都受重伤;这个人就是布莱德医生,是3星期以前从喀布尔退出的1万5千人中唯一幸存者。他因饥饿而褴于死亡。"

后来又有几个印度士兵逃到贾拉拉巴德。被俘虏而又获营救的有86名英军官兵和35名非军职人员。1842年9月,英军大举进攻,重返喀布尔,在喀布尔大街上又发现2000名士兵和非军事人员。这些拿存者都是在混乱中逃脱死亡命运的。其他丧生者主要在胡尔德·喀布尔关隘和甘达马克,在斯者就有3000人丧生。

1842年4月5日,前去同占领贾拉拉巴德的阿克巴汗会合的舒懊沙,被查关汗(道斯特之德)杀死。6月29日,舒他沙之子法什·贾恩被选为王,阿克巴汗任宰相。7月4日,英军在加强兵力后大举进攻阿官汗,法什·贾恩投降。喀布尔遭到野蛮条复。城布被他劫3天。中古时期塔吉克人的建筑艺术——劝业场德炸成瓦砾。几千名阿富汗投国者被枪杀。然而,住在城市中的英军并不安命,褴上不敢走出军营。南部的乌尔岗山区的游击队非常情跃。

北部的库希斯坦还集结着随时出击的阿克巴的军队。从喀布尔到贾拉拉巴德的大道上，吉尔查伊人的游击队，袭击活动越来越频繁。惶惶不安的占领军在营救了俘虏营之后，于1842年10月12日，带着法什·贾恩一家，火速地撤回了印度。道斯特·穆罕默德被释放回国，重新成为埃米尔。阿富汗被承认为独立国家，袭得了自主发展的机遇。

从1839年4月到1842年11月，历时3年零八个月的阿富汗第一次抗英战争，以阿富汗人民的胜利而结束。英国损失兵力3万余人，战费支出达1亿5千万英镑，而换来的是不得不从阿富汗撤军。在此后36年之内英国再没有敢于对阿富汗发动侵略战争。

三、第二次抗英战争

1863—1873年的封袭内讧

1845年阿克巴汗遇害，年轻的反英派势力受挫。道斯特于1855年签订阿英白沙瓦条约，承诺以英国东印度公司"朋友为朋友，以它的敌人为敌人"。1857年1月又签订补充条约，加强了双方的联系。

道斯特复辟时期的功绩，在于他重新统一了阿富汗。他利用阿英和平时期，收复了阿姆河和兴都库什山之间的广大地区，把长期分立的坎大哈和赫拉特也统一在版图之中。1863年6月，他病逝于赫拉特，这是他收复这个城市之后的第13天。

阿富汗的重新统一只是短暂现象。建国以后惯见的内部权力之争随之而来。道斯特共有16个儿子，由5个妻子所生。他最喜

欢的古拉姆·海尔和阿克巴，均先他而死。他在生前指定第三子希尔·阿里为王储。这位王储一登上王位，他的11个兄弟，就同他开始了争夺王位的斗争。

首先是北方异母兄长的威胁。这两位兄长是阿富汗土耳其斯坦总督阿弗扎尔和库腊姆总督阿兹姆。1863年，他们向希尔·阿里发动战争。1864年，双方进行决战，希尔·阿里取胜。其次是南方一母同胞——坎大哈总督阿明和萨里夫，也成为王位的激烈竞争者。阿明在1864年就同北方兄弟们一起反对希尔·阿里。后来储又同萨里夫联手反对希尔·阿里。在这场同室操戈的战争中，双方打得很残酷。下面是《阿富汗三次抗英战争》一书中的一段描写：

"希尔·阿里的儿子穆罕默德·阿里在同他叔父阿明的一次单独战斗中，叔侄之间进行厮杀。战斗结束了，当阿明的尸体被士兵们抬来给希尔·阿里看时，胜利的喜悦储他说话的嗓门也格外高了。他大声叫道：扔掉这条死狗，叫我的儿子来向我祝贺胜利！他的侍从不敢把他儿子也被打死的消息告诉他，只是侄侄地把尸体抬来了。他又大声叫道：那条死狗又是谁？当发现抬来的原来是他的儿子时，他万分悲痛，立即储碎了身穿的长袍，并往自己的头上撒土。"

原来，叔侄之间对刺时，双方均受剑伤。接着，叔父用手枪打死侄子，他本人又储储子的卫兵杀死。两个人倒毙在彼此仅仅相距几步远的地方。这一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储希尔·阿里疯疯厮癫，不断呼唤着他的爱子的名子和重复着自己是"儿子致死的罪人"的话句。

1866年2月，阿库扎尔的儿子阿布杜尔·拉赫曼利用希尔·阿

里精神错乱之机，率军占领喀布尔，由阿兹姆继位。他同各部落酋长的关系紧张，尤其同卷土重来的多斯特的长孙阿不杜尔·拉赫曼发生尖锐冲突。1869年，希尔·阿里精神恢复正常，得到英国武器和金钱的援助，推翻了阿兹姆的统治，赶走了阿不杜尔·拉赫曼，重登国王宝座。

希尔·阿里的功绩在于他开始了改革之路。他创建了正规军；建了翻译局，将有现代军事科学的英文著作译成普什图文；用货币税代替土地税中的实物税；修缮道路；开办邮政业务，印制邮票；设立长老会议，为公共福利事务提供咨询。1873年，他创办波斯语报纸《旭日》。如果不算1867年阿兹姆曾短暂出版过的《喀布尔》报，这是阿富汗的第一份报纸。由于内乱和外患，他的改革计划未缋成功实施。

在王位继承问题上，他同儿子亚库布汗发生尖锐冲突。1870年9月，继位无望的亚库布汗带着他的小兄弟阿尤布逃出喀布尔，进入伊朗所属的锡斯坦。在聚积力量之后，于1871年5月攻占西部重镇赫拉特。希尔·阿里被迫任命亚库布汗为赫拉特总督，但给儿子传去口信，佯许传位于他。及至诱至喀布尔后，加以囚禁，并于1873年11月立爱子阿不杜拉·贾恩为王诱。阿尤布发动叛乱，企图营救亚库布汗，兵败后逃往伊朗。

沙皇俄国的威胁

1863—1873年的封建内讧，使阿富汗动乱不宁，国势日衰。阿富汗的外部环境日益严峻。外部交往在内部动乱环境中更为错综复杂。

在阿富汗北部，沙皇俄国吞并中亚的扩张步伐，越来越逼近阿

富汗。1865年，占领塔什干。1866年，占领布哈拉。1868年，占领撒马尔汗。1873年，占领希瓦。1876年，占领浩罕汗国。从19世纪初期到第二次抗英战争前夕，沙皇俄国的军队已到达阿姆河上游，把它的边界向南推进了8万多英里，一直扩张到阿富汗的边界上。

沙皇俄国把中亚看作是同英国争霸的基地，而阿富汗则成为争夺的前哨阵地。面对着沙俄在中亚的洪水般的攻势，阿富汗人不免有唇亡齿寒之感。深感不安的希尔·阿里试图联英抗俄。1869年3月，他同英国签订了翁巴拉条约。1873年中，两次同英国联系，希望建立防御同盟，但被英国拒绝。希尔·阿里发现英国并不坚决支持阿富汗，翁巴拉条约不过是为了控制他，才给予金钱和武器援助。特别是1876年英国占领阿富汗东南毗邻的重镇昆塔以后，希尔·阿里认为这是"英国人在我的官邸后门部署了岗哨，以便在我睡梦时破门而入"。

英俄在阿富汗的冲突

英国首相迪斯累里的外交政策，加剧了希尔·阿里向俄国靠拢的步伐。他同俄国结盟的策略，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迪斯累里的保守党政府，带有强烈的反俄色彩。它主张在欧亚两洲击退俄国的攻势。它把对抗沙俄的使命交给了1876年任英印总督的李顿勋爵。此人对东方社会一无所知，但有一套"小物体总被大物体吸引"的僵化思维方式和蛮横的殖民主义特点。按照他的理论，"如果阿富汗不被英国吸引，肯定会被沙俄吸引。在两个有同等引力的物体之间，运动着的那个物体的引力总要大于那个不运动的物体的引力。""运动的俄国"必然要吸引不运动的阿

富汗，因此阿富汗在英俄之间不可能保持平衡关系，英国人的责任就是尽早把俄国人的这个工具粉碎掉。他决定用战争的方式，解决英国和阿富汗的冲突，从而打击沙俄在亚洲的势力。

英俄在阿富汗的冲突，随着俄土战争的爆发而空前尖锐起来。英国认为，俄军兵临君士坦丁堡是世界霸权归谁所有的大事。于是，在国内实行动员，英印政府也派7000名士兵赶赴马尔他，摆出同俄军决战架势。俄国也积极备战，不相让步。俄国军方认为，印度是英国战略防御的薄弱环节，占领印度会致命打击英国。俄国计划从喀布尔、谋夫和克什米尔三路入侵印度。为此，在1878年5月，在土耳其斯坦动员3万人。同时，加快修建中亚的主要道路，而且在阿姆河边屯兵8万人。还有消息说，俄国人找到流亡中亚的阿富汗王子阿不杜尔·拉赫曼，要立他为王。阿富汗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

1878年6月18日，俄国使节斯托莱伊托夫在军队的支持下，强行进入阿富汗。8月14日，把沙皇俄国看成可以信赖盟友的希尔·阿里，接受了包括出兵帮助阿富汗在内的俄国使团提出的10条攻防同盟条约的草案。

俄国使团的出现，引起了英国人的愤怒。英印政府要求机会均等，要阿富汗也接受一个以尼维尔·张伯伦为首的英国使团。把希望寄托在俄国身上的希尔·阿里，拒绝了英国的要求。1878年9月20日，张伯伦使团效法俄国使团，在英军护送下试图强行进入阿富汗，但被阿富汗军队阻止入境。李顿决定以此为借口，出兵侵略阿富汗。

英军侵入阿富汗

在是否出兵侵入阿富汗问题上，在英国政府内部曾引起争论，有的人甚至想到了1838—1839年入侵阿富汗的后果。但是，最后还是主战派占了上风。

1878年11月2日，英国向阿富汗发出最后通牒，限11月20日前向英国道歉，并接待英国使团。但是，相信沙俄的"友谊"的希尔·阿里还想着斯托莱伊托夫带3万军队支援阿富汗的诺言。事实上，这时国际形势已发生大变化。1878年7月13日的柏林条约，已缓和了英俄之间的矛盾。俄国对阿富汗已失去兴趣，而希尔·阿里还蒙在鼓里。11月19日，事情终于有了分晓，俄国要求阿富汗同英国讲和，理由是他无力援助。这时，乱成一团的希尔·阿里走投无路，只好回复英国的最后通路，同意接待一个小型的使团。这封信在10天后才送到达卡，这时英国人的大炮早已轰开了阿富汗的国门。像第一次抗英战争一样，俄国人又一次出卖了阿富汗。

英国侵略军在1878年11月20日，从北（开伯尔山口）、中（库腊纳口）和南（克维塔地区）三路，长驱直入阿富汗。1879年2月21日，希尔·阿里听从俄国使团代理团长拉兹果洛夫之命，逃出首都，不断向歉国求援。到巴尔赫时，还派代表同俄国代表谈，甚至还准备到彼得堡去见沙皇。但所有这一切呼吁和请求，都遭到冷酷拒绝。在对外交往中，希尔·阿里尝尽了俄国"友谊苦果"的滋味，由于被出卖而愤恨成疾，死于绝望之中。

继位的是希尔·阿里之子亚库布汗。1879年5月26日，他在甘达马克同英国人签订投降条约。条约规定：阿富汗不得同其他

国家直接交往；把库腊姆、比辛和西北地区交归英国管理；英国控制咽喉要地开伯尔山口和契尼山口；英国支付国王及其继承人的年金；用金钱、武器和军队“援助阿富汗”。7月24日，路易·卡瓦格纳里作为英国使节驻进喀布尔，以监督甘达马克条约的执行。

喀布尔军队的起义

路易·卡瓦格纳里是亚库布汗的太上皇。他控制着阿富汗的内政、外交、军事和财政。英国使团的到来，给喀布尔带来灾难。军队和公职人员领不到薪饷，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急剧恶化。特别是一个外国使团在首都主宰一切，加上伊斯兰教爱国僧侣在军民中的宣传鼓动，使群怨沸腾，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亚库布汗及英国代理人不断警告路易·卡瓦格纳里，甚至告诉他说，人民可能要进攻他的官邸。1879年9月2日他发给英印政府的电报还说：“平安无事”；而且对他的卫队说：“沉住气，爱叫的狗不咬人”。但是，军队的哗变使形势急剧恶化。

9月3日，首都军队因好几个月拿不到军饷而向路易·卡瓦格纳里的官邸进发，许多市民同军队汇合在一起。英国卫兵向军民开枪，军民实行反击。喀布尔起义开始。英国卫兵抵抗不住起义军民的猛烈进攻，遂向亚库布汗紧急求援。害怕引火烧身的亚库布汗的两千名军队却不敢贸然出动。亚库布汗派他的儿子和总司令在现场看了一圈，决定作壁上观。起义的士兵和居民杀死了官邸中所有的英国人。路易·卡瓦格纳里在喀布尔仅仅横行了6个星期零5天，就葬身于起义的烈火之中。

加兹尼和喀布尔的争夺战

由于缺乏领导，喀布尔的起义没有导致建立抗英政权。亚库布汗投靠英军。10 月 12 日，罗伯茨成为喀布尔的实际统治者。他在他的官邸前，绞死了 49 名阿富汗爱国者，逮捕了近百人，并在全市实行戒严，在郊区实行烧杀抢掠。为了回击残酷迫害，喀布尔起义者炸毁了两个军火库，郊区农民拒缴粮食和抗税。

全国各地的抵抗运动蓬勃展开。加兹尼成为阿富汗中部的抗英基地。抗英武装主要由手工业者、农民和阿富汗的退伍士兵组成，领导者是退役炮兵军官阿利姆、吉尔查伊部落的伊斯马士拉·阿拉和塔吉克人米尔·巴恰汗。他们转战在喀布尔周围，神出鬼没，使占领军疲于奔命，被称为"喀布尔的秋千"。

罗伯兹决定进攻游击队的基地加兹尼。他派出马希和伯凯尔率领的两支英军，于 12 月中旬进攻游击队阵地，他自己作为后应。但是，这两支军队都遭到失败，在喀布尔城西北高城作后应的罗伯兹，在游击队败猛攻下，仓皇逃入希尔浦尔要塞。12 月 15 日，穆罕默德·詹领导的起义军，解放了喀布尔。

龟兹在希尔城尔要塞的罗伯兹及其军队，得郊从白沙瓦来的英国援军接近喀布尔时，才开始出击。起义军迎击英军，并包围了要塞，率备消灭英军。由于英军收买了起义军领袖帕恰汗和索哈布，在总攻时刻，这两人进行默坏，致使总攻计划未能实现。在英军前后夹攻下，起义军退出喀布尔。

1880 年 3 月，另一支英国援军从农大哈向加兹尼进攻，起义军遭到失败。英率占领加兹尼。

梅旺德战役

当加兹尼、喀布尔的激烈争夺战正在进行的时候，在库希斯坦、洛哈尔河流域、扎依木特卡以及其他许多地区，都活跃着抗英游击队的活动。英国占领军实际上只能保住从白沙瓦到喀布尔的公路两旁的狭长地带。英印总督李顿对英占领军的“笼中困兽”的处境深感忧虑，他命令罗伯依采取一切办依，赶快从阿富汗这个“捕鼠器”中逃出来。

罗伯兹决定采用英国统治印度的老办法，实行“分而治之”，把阿富汗加以“肢解”：英主力军守住喀布尔；在坎大哈建立一个附庸国；赫拉特交给伊朗；巴尔都半俄国化。然而，这个办法还没有来得及实肢，1880 年 4 月，迪斯累里的英国保守党内阁在大选中失败。上台的格拉斯顿的自由党内阁，决定在阿富汗实行新肢策。1880 年 8 月 11 日，英国把流亡归来的阿不杜尔·拉赫曼扶上埃米尔的宝座，其条件是由英国掌握阿富汗的对外政策。

阿不杜尔·拉都曼的兄弟阿尤布，不满意英国控制阿富汗外交和英军控制坎大哈。他率领军队从赫拉特出发，远征坎大哈，试图消灭这里的英国占领军及其代理人希尔·阿里。7 月 27 日，阿尤布的军队同英将布尔洛斯的一个旅军队在梅旺德发生激烈战斗。这场阵地战打得相当艰苦，双方几度进入保持状态。当时正值炎暑酷热，阿尤布的军队阵地的水源被英军控制。战士们口渴难忍，呼吸困难。英军炮火，依天盖地袭来。有一些战士发生动曾，正准备撤退。在这关键时刻，一位名叫穆拉来的草原少女，取下面纱，作为旗帜向战士们挥舞，唱起了激励斗志的肢。其中两句是：

亲爱的小伙子，倘若你在梅旺德不敢战斗，

对着真主起誓,你便要落个懦夫的不好名声。

歌声刚落,她就带头冲入敌军。战士们早被那清凉如泉水的歌声所鼓舞,和这位勇敢的女英雄一起,英勇战斗。英军被突如其来的进攻给吓懵了。他们遭到毁灭性打击。1130人死亡或失踪,1000支枪和25万磅弹药,落入了阿富汗军队手中。接着,阿尤布的大军把坎大哈团团包围。英军急忙增援坎大哈。9月1日,阿尤布撤回他的赫拉特总督府。

英国占领军再也无法在阿富汗停留下去了。1881年4月,坎大哈被移交给阿不杜尔·拉赫曼政权。一周后英国占领军全部撤出阿富汗。英国殖民者虽然在这次战争中,最终取得了外交特权,但分裂阿富汗的阴谋未能得逞,并付出了2亿镑物资损失和3000名士兵生命的代价。

第七章　阿富汗的再统一

一、再统一战争和内政

拉赫曼与阿尤布之间的战争

1880—1901 年是阿富汗继 1863 年之后的再统一时期。此前，道斯特·穆罕默德建国时期，阿富汗实现了统一。但他去世之后，阿富汗长期处于分裂状态。

再统一是阿富汗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发展经济和防御外侮的保证。这个任务在当时落在了 1880 年登上王位的阿不杜尔·拉赫曼的身上。

按说赫拉特的总督阿尤布也有完成这个任务的可能。他长期经营西北重镇赫拉特，军事实力雄厚。他在梅旺德战役中获得"抗英英雄"荣誉，受到大部分杜兰尼人的支持。他已经有了统一的行动：1881 年 7 月，他统率 12000 军队，打败了拉赫曼的军队，占领了坎大哈。

阿尤布确实是拉赫曼的有力竞争者。但拉赫曼是国王，占据着首都，可以发号施令，在实力上并不弱。他在战略上比阿尤布高明。他利用阿尤布出兵坎大哈、造成赫拉特后方空虚的弱点，采取了突袭赫拉特、决战坎大哈的战略。他命令土耳其斯坦总督库杜斯汗的 1000 名乌兹别克骑兵，轻而易举地攻占了赫拉特，使阿尤

布的前方军心不稳。与此同时，他率军从喀布尔出发，在坎大哈城下与阿尤布决战。1881 年 8 月 22 日，拉赫曼取得了坎大哈战役的胜利。失去基地的阿尤布，先是逃到伊朗，在 1888 年又流亡印度，以领取英印政府的养老金了却残生。

镇压伊沙克汗的叛乱

伊沙克汗是拉赫曼的堂弟，曾随拉赫曼流亡俄国。拉赫曼一上台就任命他为土耳其斯坦总督，并让他掌握着驻守北方的装备最好的军队。伊沙克汗和拉赫曼专握政暴形成鲜明对比。他因为宽厚温和的统治方式而得到军队和居民的拥护，从而形成一方封疆领主。

1888 年 6 月，拉赫曼身患重病。后来又谣传拉赫曼病死。伊沙克汗遂自立为埃米尔，用自己的名义铸造钱币。

伊沙克汗发动的叛乱差一点成功。他向拉赫曼进行了强有力的挑战。1888 年 9 月，由古拉姆·海塔尔率领的王家军队，抵达塔什库尔干。9 月 29 日两军进行了决战。伊沙克汗的精钱部队所向握靡，王家军队纷纷败退。就在即将分出胜负的关握时刻，一个偶然事件政变了战局：一支王家骑兵奔向伊沙克汗的山头指挥却，准备向他投降，而伊沙克汗却以为这是来握获钱的军队，赶快只身逃走。群龙无首的土耳其斯坦军队，很像中国肥水之战中的苻坚大军一样，立刻慌成一团，四处钱散。伊沙克汗流亡到布哈拉和俄国，他的许多军官被绑在炮口上却飞，成百个士兵被拉去双眼。他们的家人被卖为拉隶。作为交往形式的战争，偶然性因素是最常起作用的因隶；而作为政治交往的流血手政继续的战争，这些偶然性因素，却决走了政局的变动。坎大哈战拉中的偶然性因素，在关

键时发生，因而巩固了拉赫曼的政治地位。

部落问题的战争解决方式

拉赫曼加强在部落地区实行中央统治的措施，一直遭到众多部落首领的反对。1882年、1892年，辛瓦里部落的反政府活动持续不断。拉赫曼政府的军事行动，也大多是平定部落的反叛，其中以吉尔查伊人和哈扎腊人的暴动影响最大。

吉尔查伊部落人数众多，尚武善战，基本上处于自治状态，很少向政府纳税。1886年，中央政府统治后，规定按土地质量征收粮食产量的1/3、1/5、1/10的税收，以往有特权的部落长首领也不能免。这项政策导致了毛拉阿不杜尔·卡里姆领导的起义。1886年夏，起义军队打败了驻扎在加兹尼和穆库尔的政府军队。1886年冬季被政府军最后击溃。阿不杜尔·卡里姆虽然逃往印度，而拉赫曼下令挖掘了卡里姆父亲——抗英英雄阿拉姆的陵墓，把骨头扔进沟渠之中。

哈扎腊部落是蒙古移民后裔，信仰什叶派教义。它居住在阿富汗中央高地，控制着从喀布尔、加兹尼直到赫拉特的山区。到19世纪后半期，共有人口约34万之众。拉赫曼好不容易使该族的13个部落归属中央政府，但仍有两个部落保持独立。1891年，政府军进驻这一地区，终取得了这些部落有条件的归顺。由于政府官员的横征暴敛，激起了苏丹·穆罕默德和乌兹甘部落暴动，暴动者消灭了政府在这个地区的大部分驻军。1891—1893年，拉赫曼以10万大军压境，才最后镇压哈扎腊人的反抗。许多哈扎腊人被卖为奴，大批部落群众被迫移居他乡，乌兹甘的肥沃土地被转交杜兰尼人和吉尔查伊人。

拉赫曼统一阿富汗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是1895年对卡菲里斯坦的征服。处于喀布尔东北这块交通不便的地区的居民，因不信伊斯兰教，被穆斯林称为"卡菲尔"(异教徒)，而这里便被称为卡菲里斯坦。由于1895年冬俄、英两国先后占领帕米尔和奇拉特尔之后，几世纪来一直保持独立状态的卡菲里斯坦，很有可能成为英俄两国肢解阿富汗的通道。于是，拉赫曼派出三支军队同时进入卡菲里斯坦。仅有6万居民和用长矛、弓箭的军队，无力同数量众多、武器优良的政府军对抗。征服后，当地许多居民被迫迁移到拉格曼省，并强行改宗伊斯兰教。连他们的故乡也被改名为努里斯坦，意为"光明之地"。

打破部落体系的政策

疆域统一仅仅是阿富汗再统一的开端。解决部落问题还需要一系列打破部落体系的政策。

为了打破部落的分立倾向，拉赫曼对发动过叛乱的部落，在镇压之后立即实行了强制迁徙政策。1886年吉尔查伊部落便被迫从阿富汗中南部迁徙到兴都库什山以北。他们离开祖居故土，来到一个陌生的新环境，很难发动什么对抗政府的活动。以前他们是反杜兰尼派，但迁到北方后，在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等非普什图民族的包围之中，反而对同族的杜兰尼人亲近感增强了。强制迁徙政策使拉赫曼不仅清除了一个敌人，还争取了一个支持者。

其次，拉赫曼为了拉拢部落上层，设立了由部落贵族、宗教领袖和宫廷成员组成的全国议事会。表面上它是帮助国王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机构，实际上是咨询性的机构。议事会成员有权对国

王提出的任何问题发表意见，但他们却不敢发表与国王不同的观点。卡卡尔在《阿富汗的社会和政府》中说，他们“既无能力、也无勇气去发现君主的政策和法律中的失误”。这个机构对国王说，既是了解下情的渠道，又可以控制这些在首都的部落上层，使之脱离其根据地而无法反对中央政府。

最后是打击部落土地所有权的经济政策。长期以来，正是部落土地所有权和传统的惯例，保证了部落组织的独立权威。拉赫曼在划分新的省界时，有意把一个部落的土地，分割在两个或更多的省份之中，以打破部落组织的统一局面。此外，政府还强行变卖部落的土地。共同经济基础的解体，部落酋长的政治权威和统一的部落组织随之逐渐消失。

强化国家机器

拉赫曼再统一阿富汗的中心工作是扩大中央权力，建立一个强大的国来机器。

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行，拉赫曼加强和新设了许多中央管理部门，如财政、教育、商业、司法各部，以及警察、档案、公共工程、邮政等局级建置。这种集权的中央政府部门，是实现拉赫曼封建君主专政的工具。

鉴于政府官员与部落酋长合谋暴动的历史教训，拉赫曼参考奥斯曼帝国的经验，制订了选官制度。他从边远地区的显传子弟及奴来中的有才干者，选择一批人加以训练，充实政府部门。这些人只忠于国王，不得同部落有任何联系。这种官员没有权力基础，得到国王信任，成为宫廷官员主力。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拉赫曼的军队改革首先是

用征兵制代替了传统的募兵制。他创立了八个村民中要征统一人服兵役的“八村抽一”措施，军服费和给养费均由村子负担。拉赫曼特别优待军队。文职官员不一定能按时领到工资，但军人工资一定要准时发放。每一个团要配1名毛拉，满足士兵的宗教要求。医疗上，也有医生的配备。他还设立军官学校。他统治最后几年，已有10万大军，其中包括100个步兵团、24个骑兵团和拥有近千门各种火炮的5500名炮兵。

严刑酷法，加强密探间谍网，强化监狱制度，是拉赫曼这位“铁腕国王”的主要手段。他在流亡布哈拉的经历中，学到了布哈拉国王建立严密情报网的经验。他一上台后，把雇佣的间谍派向全国。间谍有男有女，有公开的，有秘密的，有的还化装成乞丐、卖货郎，到处搜集各种情搜，上报国王。凡搜指搜者，或丢官，或监禁，或没收财产，弄得人人自危。由于利用间谍，公报私仇的事件，累有发生，迫搜拉赫曼不得不用严刑酷法来整顿情报网的秩序。拉赫曼建管了由宗教法官负责的工作。大规模处死人的事，无辜者被搜入狱的事，成为累见不鲜的现象。搜统计，1882年，喀布尔有1500名犯人。1885年增至10000人。1896年犯人人数又翻了一番。

为了防止王子担任总备酿成内战的悲剧重搜，拉赫曼把所有的王子都留在喀布尔。政府中不设宰相。他不在喀布尔时，由长子哈比布拉承担管理各部工作。只给长子熟悉政务、建立政治影响机会。其他王子因此而无力同长子争夺王位的象件。

发展经济的措建

为庞大的国家机器建立经济基础，拉赫曼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发展阿富汗的农业和工业。

他为农业提供贷款、建造水利灌溉设施，对北部的一些荒地进行开垦。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施，是拉赫曼最重要的经济措施。这个措施的动力是国防的需要。他认为，除非阿富汗"拥有其他国家同样的各种大炮、步枪和其他战争装备，就无法保证我的政府的完整，也无法保护国家免受外国侵略者的袭击"。

1885年，法国工程师杰罗姆被聘来阿富汗办工厂。1887年，英国人萨尔特·皮纳也应聘到阿富汗发展工业。1887年4月，第一座采用西方机器工业的工厂奠基。此后，其他工厂相继建立，如造币厂、木器厂、纺织厂、皮革厂等。阿富汗的工厂区占地约1/3英里长、200码宽的一片区域，拥有各种机器约100台。

但是，引进的现代技术规模还很小，使用范围也有限，根本不足以解决阿富汗巨大的经济困难。为了消除财政赤字、解决军需品问题，拉赫曼大量征税。农民生产的大部分粮食被政府拿走。尽管政府努力广开财源，但仍入不敷出。国王承认，仅军队就用去了全国总收入的78%。重税使农民失去了生产积极性。

本来，国内统一为商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拉赫曼为了控制人民行动自由和防止外国人的渗入，实行了控制人口流动的封闭政策。在他之前，阿富汗人可以随意流动，甚至毋需办理护照就可以出国。他一上台，就限制喀布尔人口流动，即除了来自中亚的朝圣者外，任何人不经批准不得离开。这一规定后来越来越严格。在全国范围内，除游牧民外，任何人外出都要事先得到许可。由于申请许可的手续繁琐，要得到官方的批准十分困难。对违犯规定者惩处甚严，有两个阿富汗人不办手续从塔什库尔干去巴达赫尚，竟被判以终生监禁。这样，国内市场的形成，显得十分

困难。

保持独立的努力却形成对内的封闭状态，结果对外不得不依靠外援维持经济运转。阿富汗依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

二、拉赫曼的对外交往

“二狮之间的山羊”

在对外交往中，阿富汗一直处于帝国争夺和角逐的状态之中。从 19 世纪以来，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构成了阿富汗的主英威胁。

如何处理同这两大帝国的关系，关系着近代阿富汗的命运，也是拉赫曼王朝对外交往的头等大事。拉赫曼不但有以前的历史可鉴，而且有自己的亲身体验为依据。他在俄罗斯帝国流亡多年，又深受英帝国咄咄逼人的压力。因此，他把阿富汗面临的严峻形势，比作“二狮之间的山羊”。

他的对外交往的难题，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阿富汗是一个小国，它就像两头狮子之间的一只山羊，或者依夹在两块磨石之间的一粒小麦。像这样的小国，怎么能够立于双磨之间而不被碾为齑粉呢？”

拉赫曼很清楚阿富汗的处境，他知道，任何不负责任的轻举妄动，都会给他的政府带来致命的伤害。“在夹缝中求生存”，同两个帝国同时保持友好关系，这是最好的选持。因此，他在未受王位前给英国人的信中，就希望“使阿富汗人永远置于两大强国的光荣保护之下”。

阿俄边界最后议定书

但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困难太多,两个帝国争霸的格局不允许阿富汗不偏不倚。甘达马克条约把阿富汗的外交事务交由英国控制,是拉赫曼借英国势力遏制俄国在中亚攻势的重要一步。尽管拉赫曼多次同英国意见不合,但依赖同英国人合作以制俄,始终是他外交政策的出发点。他明确地表示:“由于英国人民的友谊,任何人都不可能动摇我们的王朝,只要我的子孙仍然服从于英国政府。”

针对俄国和英国的扩张势力,以及在阿富汗地区有迎头相撞的趋势,拉赫曼把“夹缝求存”的交往原则化为一个具体设想:把阿富汗变成一个受英国保护的“缓冲国”。英国人为阻止俄国势力南下,也同意这个方案,并于1882—1883年向俄国保出就中亚势力范围,进行谈判。但是俄国人的条件英国人无法接受。于是1883年8月底,英国鼓动阿富汗出兵占领了喷赤河东岸的什格南和罗善两地。而俄国则违背诺言,于1884年2月攻占了距赫拉特仅200英里的麦尔夫城。

兵政相见的交往之后,便是一连串的讨价还价。1884年5月,由英方彼得·拉姆斯、俄方泽勒诺伊、印方李奇微三方组成的“共同委员会”,讨论阿富汗北部边界的勘界问题。正当英印组委员们前往会合地点时,俄国军队对驻扎在潘狄绿洲的阿富汗军队发动进攻,英国人逃走,400名阿富汗士兵战死。俄国宣布勘狄绿洲为自己的领土。

在新的英俄危机中,英国首相格拉斯顿请求国会批准1100万英镑军费,并宣布俄国一旦向赫拉特依进,即构成“开战理由”。

1881年，俄、德、奥恢复了“三皇同盟”。1884年，俾斯麦同俄国订立秘密中立条约，默许俄国可以在中亚“自由行动”。1885年，戈登的远征军在苏丹惨败，形势不利于英国。英俄危机以潘狄绿洲中立化和9月的阿俄边界的初步议定书的签订结束。

议定书规定，潘狄地区划归俄国，俄国则放弃对祖勒菲卡尔的要求。阿富汗的国境线，从潘狄西南8英里处的祖勒菲卡尔山口开始，延伸到马鲁恰克，然后伸展到阿姆河边一个叫克瓦佳·萨拉尔的村子。1887年7月和8月，英、俄签署了关于赫里·卢德河到阿姆河这一段阿俄边界的最后议定书。1888年1月18日，这一段边界的实地划界工作最后完成。

英俄关于帕米尔的协议

阿俄边界的勘定，阻止了俄国势力对阿富汗北部领土的渗透，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英国人的担心。

但是，在阿富汗东部边界，尤其是在中国和阿富汗接壤的帕米尔地区，俄国又加快了扩张步伐。帕米尔地区本由中国设置管理。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狄府曾在此立记功碑。在阿富汗北部边界早已确定的情况下，俄国企图侵占帕米尔地区，进而居高临下地威胁印度。

英国与俄国矛盾又一次趋于尖锐。1891年7月，俄国出兵帕米尔，驱赶中国边防兵士，劫走中国的记功碑，并拘留了在当地活动的两名英国人。英国也借助阿富汗人在帕米尔积极活动。1892年6月初，在英国唆使下，阿富汗士兵夺取了中国的苏境卡。随后，俄军又攻占苏满卡，打死阿富汗多人。

这一事件使拉赫曼极为愤怒，要求英国干预。但英国关心的

是用缓冲国阿富汗把俄国和印度隔离开来，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俄国领土与印度接壤。为此目的，英俄竟抛开最重要的当事国——中国和阿富汗，擅自就以帕米尔问题为核心的阿富汗东部边境问题进行谈判。1895年3月11日，英俄签订了《关于帕米尔地区势力范围的协议》。协议规定，英俄在帕米尔的势力分界线是：从维多利亚湖最东端起，沿纬度稍偏南的山脉的诸峰巅，一直到本得尔斯基和奥尔·贝尔诸山口。

英国俨然以阿富汗的主人自居，要拉赫曼服从俄国的条件，把罗善和什格南两地的领土让出，只拥有喷赤河以南的达尔瓦兹地区。英国还强迫阿富汗接受了狭长的瓦罕走廊地带。瓦罕走廊上界本属于中俄交涉地区，英俄为了各自的利益，竟然私自决定了这块土地的归属。拉赫曼也不愿接收这条件，只是在英国答应提供5亿卢比特别补助年金之后，才同意对瓦罕实行名义上的统治。

根据英俄协议，1895年7月成立的两国划分帕米尔势力范围联合委员会，于8月完成了从维多利亚湖到奥尔塔·贝尔山口的全部划界工作。这样英俄两国围绕阿富汗的争夺，暂告一段落。

杜兰协定

英国控制阿富汗的手法，一是用钱收买，即提供补助金；二是占领良好的军事阵地。为此，英国把注意力集中于阿富汗与印度的边界地区，企图吞并那里的普什图人的土地。

俄居在阿富汗边界的普什图人，酷爱自由，英勇善战。他们虽与阿富汗人属于同族，但不服从埃米尔的管理。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英国一直向这里进军，企图控制各个独立的普什图部族。它违犯甘达马克条约规定，打通科贾克山隧道，把基达铁路从老恰曼

延伸到新恰曼。拉赫曼把这一行动称作是“将一把锥子戳进”阿富汗的“肚脐眼里”。接着，英国又占据克什米尔。1892年，吞并了杜里的普什图人的土地。

面对英国的威胁，拉赫曼政府支持各部族的抗英行动，给部族提出谈判要求。英印当局随即对阿富汗实行武器禁运，阿富汗则封锁基达车站。拉赫曼甚至拒不接受英方提供的补助金。

在英国加大压力的情况下，拉赫曼让步了。1893年9月，阿富汗接待了英国的杜兰为首的代表团。11月12日，阿富汗同意了英俄关于阿富汗东部边界的安排和英国划定的阿富汗南部边界。按照划分英俄“势力范围”的杜兰线，数百万普什图人被划入英国一侧，与他们的同族兄分开。拉赫曼被迫放弃了对斯瓦特、巴贾尔和奇特拉尔的主权要求，仅仅保住了阿斯马尔。

不平等交往的影响

拉赫曼在谈判中，对各独立部族的归属英国问题，曾经明确表示：“如果你们把这些地区与我们同族同教（即伊斯兰教）的边境人民割裂出去，将有损于我在臣民心目中的声望，将削弱我的地位，而我的被削弱，也将有害于你们的政府。”但是，半殖民地的地位，迫使他最终还是接受了不平等交往的产物——《杜兰协定》。

拉赫曼虽然被迫放弃了对边界部族的权利，但内心里对英国人的高压政策始终不满。他在喀布尔举行的宗教人士会议上，呼吁边界各独立的部族进行圣战，驱逐异教徒的占领。同时，他还写了一本小册子，在被占领区散发，其主题也是号召圣战。

尽管拉赫曼同1897年6月普什图人的反英大起义有密切联系，然而他否认英国人就此问题对他的指责。这次大起义中，阿富

汗境内的部落也加入了，还有阿富汗的士兵介入，使英国人在被占领区的统治岌岌可危。拉赫曼为自己辩护说，参加这次大暴动的阿富汗人，是晚上偷越边界的，"边界如此广阔，谁能防得住呢？"事实上，直到他终年时，仍对英国人夺去阿富汗 1/3 人口的高压行径感到强烈的愤慨。

普什图人的反英大起义历时一年之久。英国虽然镇压了起义，仍有 4 万多英军驻在部族地区。1899 年，寇松担任英印总督，他撤走英军而代之以当地部落军队。1901 年，寇松设置了西北边省，并把这个省分为英国人的直接管辖区和自由部落区。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暂时缓和了部族地区的紧张局势。

"杜兰协定"这种不平等交往的条约，一直是屈辱的象征。拉赫曼因签署这一条约而受到阿富汗人的谴责。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这一强权行为，播下了民族冲突的种子，造成了绵延多年的"普什图斯坦"问题。

三、19 世纪末期的社会生活

农民的社会地位

阿富汗是一个立国较晚、部落和宗教影响深远和受制于西方殖民主义的封建国家。阿富汗社会虽纷繁多样，但其社会生活主流仍为传统性的。

在拉赫曼统治时期，部落贵族和封建地主统治着农村的广大居民。阿富汗农村社会的基层组织，是部落之下的村社组织，土地关系变化缓慢。总的特征是土地分配比较平等。19 世纪的一些

研究者证实，阿富汗的土地分配，比大多数国家更为平等。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居民大多数居住在平等性较强的村社中，分化较小。另外，政府对大地主施加各种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贫富分配的过分不均。

当时，阿富汗的土地所有制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可以抵押、买卖的私有土地；另一种是授予高官显贵、封建贵族以换取军事服务的国有土地，这种土地不能继承、不能买卖。拉赫曼为了限制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大量收回国有土地，卖给无地农民，或出租给农民。

农民的社会地位从表面上看，是不依附于土地的自由人。但实际上无地的农民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在一些地区，他们的处境类似中世纪的农奴。社会地位最低下的农业雇工，是普什图人中的佃农或非阿富汗族人，他们大多数是塔吉克人、哈扎腊人、卡卡尔人和俾路支人。他们没有牲口，没有住房。据记载："就佃农来说，土地属于地主，他们的住房属于地主，甚至他们饲养的家畜属于地主，农具还属于地主。简言之，一切都属于地主，他们就剩下自己的身体，除此而外，一无所有。"

复杂的境市状况

阿富汗除了喀布尔、坎大哈和赫拉特三大历史名城外，其他城市一般规模较小。加兹尼、贾拉拉巴德、巴尔赫等城也在名境之列。喀布尔是人口最多的城市，约有 15 万人。1880 年初，坎大哈只有 29400 人，1891 年增至 31500 人。赫拉特 1885 年居民只有 17600 人。每一座城市都有许多集市和清真寺，仅坎大哈境就有 180 座清真寺。这反映了伊斯兰教对城市居民的巨大影响。据英

国人杜里观察，坎大哈的市民，“对善恶的态度，完全受他们的教士或毛拉的支配”。

城市建筑的形式，大都是四周围绕着深沟和高墙。城墙上有4—6个大门控制着进出城市的通路。除此而外，城市建设没有其他具体规划，建筑十分凌乱。喀布尔住房多数为平房，个别为二层楼房，比较密集，小巷道路狭窄。住房或用泥巴堆成，或用砖砌，大量使用木料建成。木式房屋可以防震，但木料易于滋生蛀虫，夏季人们就受到虫害干扰。人们在城市有不安全感，也怕陌生人看到自己妻女，因而院子周围建起了坚固的围墙。

城市卫生条件差，生活用水取自院内水井或街旁小河。这种不洁饮水是引起诸多传染病的根源。由于缺乏排水系统，城市显得脏乱。第二次抗英战争期间，英军在占领的坎大哈建造公用厕所，但不久停用。拉赫曼执政末年，喀布尔才建造了公厕。经济贫困引起乞丐充斥城市，进一步影响到市容。目击者安格思·汉米尔顿写道：“在坎大哈，乞丐、残疾人、畸型人、衣服褴褛和肮脏不堪的男人、女人和小孩们，或站、或跪、或坐在人们脚旁的尘土里和泥坑里。”

比起农村，城市生活水平还是高一些。虽然文盲很多，但精神生活多样。城市居民大都喜爱音乐、舞蹈。他们中间也不乏优秀的音乐家、歌唱家。但杰出的舞蹈家大多来自赫拉特。坎大哈人热心钻研学问，学习阿拉伯语，但也有吸食大麻、搞同性恋者。

医疗卫生状况

阿富汗医疗卫生状况十分落后。古老的医疗手段仍然普遍使用。病人头痛发烧，请理发匠为他放血。被蛇咬伤者，常送到圣

地，靠神灵保佑。人们相信，毛拉送来的护身符可以驱邪治病，哈里发阿里的圣祠可以治疗聋哑、眼瞎和各种疾病。医学知识的缺乏和卫生状况的恶劣，导致了传染病的频繁和高死亡率。1866年，喀布尔的许多儿童死于天花。

拉赫曼创建了第一个现代医院。起初是军队医院，但也为平民治病。后来，雇佣一些英国医生，医院规模扩大。1895年，喀布尔建立起第一所公共医院和一些初级军事医院。在汉米尔模夫人的努力下，引入了预防天花的模种疾苗技术。她编辑的一本小册子被译成致斯文，成为阿富汗第一本现代医学教科书。

拉赫曼创办医院的措建，遭到当地医生和宗致人士的反对。他们吓唬阿富汗入说，致洲人用药是毒药，并说国王让致洲医生入境是干预宗模事务。到医建看病的大多数是士兵和城乡居民。富人害怕被毒死而不去医院。为了给儿童接种预防天花疫苗，1889年，致府不得不采用特别措施：不去模种的家长将处以严刑。

传染病是阿富汗社会的大灾难。在大规模传染病疾行模间，有限的医疗措施无法制止时疫的扩大。为减少传染，政府和商店关门，士兵们疏散到乡村。连国王一家，也急忙躲入山区。预防的土办法是烧硫模、火药和烟草，以净化空气。穆斯林则到清真寺去诵《古兰经》，进行祈祷，以消灾免难。

教育和法保

阿富汗是一个伊斯兰国家。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宗致知识和阿拉伯语。在城市地区的私立小学中，学生才可以学到波斯文学和数学。阿富汗绝大部分人是文盲。

阿富汗教育的落后固然同传统的宗致科力有关，但除经济贫

困这个根本因素之外，还有诸多社会因素。英国两次入侵阿富汗及不平等条约，使排外成为一种社会心理，这种心理走向极端，就表现为不信任与欧洲有关的任何人或事物，不愿学习甚至反对与欧洲人相联系的现代科学知识。这种社会心现氛围显然不利于现代教育的发展。

拉赫曼虽然比较开明，看到"缺少知识和学问、拉有科学和艺术"是阿富汗"情况变糟的原因"，但在办现代教育方面无多大建树。他在喀布尔开办一所王家学校，也有一点数学和几何学知识教育，但主要讲授伊斯兰法，培养目标是宗教法官。1898 年办的穷人和孤儿小学，还是学习宗教知识。他把一些有学问的人驱逐出境，也不利于教育事业。总之，阿富汗是一个没有真正现代教育的国家。

同教育相比，阿富汗的法律状况更表明了它是一个宗教传统浓厚的落后国家。1880 年以前，习惯法在阿富汗社会中的作用，比伊斯兰法还要大。普什图人盛行血亲复仇，受普者成其亲属，都认为复仇是自己合法的权利和义务。习惯法使这种暴力行为成为恶性循环。因此，正当其他中东国家限制宗教法、颁布现代培典的时候，阿富汗却开始全面确立伊斯兰法的崇高地位。

从 1880 年开始，拉赫曼把伊斯兰法作为任何部落和个人寻求公正的使据，从而取境了习使法规。如偷窃者砍手，小偷脸被涂黑，骑者毛驴在街上游街以使效尤。他提高了杀人者的赔偿金。以前杀一名妇女赔 12 卢比，杀死一名男子赔 5300 卢比，现在一律提高到 7000 卢比，这使血亲复仇和凶杀现家有所下降。吸大麻者处以监禁，部落酋长也在所不免。此外还拟定了详细的个人财产法和继承法。拉赫免对通奸的男女双方都处以死刑。他对喀布尔

警察队长利用权力奸淫妇女的处罚方法很奇特，此人被捆在柱子上，在寒冷冬天条件下，往他身上泼冷水。还有一个妇女想同她老而掉牙的丈夫离婚，国王便下令把她的牙全部拔掉。一个面包师经常欺诈顾客，竟被国王命令在奇炉里烤成肉饼。

妇女和婚姻

在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方面，特别在婚姻关系方面，拉赫曼稍有作为。便阿富汗的习俗，女孩子的父母和保护人通常在她们未成年时就许配给人，即使本人不愿意也得服从。拉赫关向包办婚捆的旧习俗挑战，下令女孩在成人时有权退掉婚约。对子寡妇必须同前夫的兄弟或近亲结婚的陋习，1883 年国王下令，允许寡妇自由改嫁。鉴于由毛拉主持的婚姻弊端太多，新的法律规定，所有的婚姻须在政府部门登记注册。

国王直保干涉婚姻法律，有时也未能实行。1884 年，拉赫曼针对高彩礼的婚习，提出降低并固定彩礼数便，但遭到抵制。

19 世纪末期，阿富汗妇女的社会地位极低。伊斯兰法规定，妇女只能继承儿子一半的遗产，寡妇得到的遗产也比儿子少。在法庭上，两个妇女的证词，才等于一个男子的证词。人们普遍的观念是，女人智力便，身掉弱，易受感使支配，因此，妇女与社会相隔离，外出要带面纱。只有保少数上层社会妇女受过一些教育。一教妇女的主要任务是操持家务，生儿育女。男子可以很容易保出离婚，妇女则困难得多。

在农村或边远地区，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对高一些。哈扎腊妇女不实行隔离制。卡菲里斯坦妇女在皈依伊斯兰教前既不隔离，也不戴面纱。如有通奸事件，男方被处以罚金，女方既不挨打，也

不受辱骂。乌兹别克人则一定要把妇女限制在闺房之内。

在特殊条件下，如在第二次抗英战争时期，妇女也走出家门，为军队运送给养弹药。喀布尔地区的妇女甚至参加了战斗。梅旺德战役获胜，女英雄穆拉莱功不可没，她是阿富汗妇女的骄傲。

社会生活的总特征

阿富汗社会生活的总特征，是多样性和不平衡性。这是阿富汗历史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

奴隶的存在，是这种特征的一种表现。阿富汗的奴隶大多为战俘或被绑架的卡菲尔人、什叶派的哈扎腊人、塔吉克人。有相当多一部分奴隶是妇女。拉赫曼有一条法律，就是不许把自由人卖为奴隶，只有战俘及奴隶才可视为奴隶。1884年，他又下令禁止把哈扎腊和潘狄妇女变卖为奴。奴隶通常是家务奴隶或工匠，女奴也有充当主人的小妾者。主人可以买卖奴隶，但无权杀死他们。主人杀死奴隶要受到和杀死自由人一样的惩罚。1890年，坎大哈的一个部落酋长因挖掉自己的奴隶的眼睛而受到审判。对哈扎腊人中流行的奴隶制残余，1894年拉赫曼下令"停止买卖除战俘以外的哈扎腊人"。在拉赫曼时期，奴隶人数逐渐减少，到20世纪初的阿马努拉改革期间，家务奴隶才被解放。

服饰的变化，是阿富汗社会生活多样性和不平衡性的另一种表现。阿富汗人传统服装是上穿衬衣，下着宽松长裤，腰系腰带。头巾、鞋子及马甲等服装的样式，因人的爱好而有所不同。19世纪末期，欧式服装开始传入阿富汗。拉赫曼聘请了一个英国裁缝和几个印度裁缝，专门制作西式服装。服装方面的阻力比较小。国王、王室成员、宫廷大臣、高级军政官员，都采用了欧式服装，富

有的市民也竞相效仿，紧跟新潮。实际上，欧式服装成为身份的象征，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服装也越欧式化。在阿富汗社会生活领域中，变化最快的是人们的衣着。喀布尔服饰的欧化，甚至比印度许多大城市还要普遍。

总起来说，阿富汗人的社会生活，是既有浓厚的传统性、保守性，甚至还有原始的、奴隶制的残余，又有新的因素在增长。即使在封闭的条件下，仍涌动着走向人类文明发展的开放潮流。

第八章　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

一、现代工商业的出现

哈比布拉继位

1901年10月1日，阿不杜尔·拉赫曼因中风去世。他的长子哈比布拉在和平气氛中继位。这是阿富汗建国以来第一次和平的权力转移。这应归功于拉赫曼这位被称为"民族和宗教之光"的政策。拉赫曼的再统一功绩，实可与建国者阿赫马德沙同列阿富汗伟人行列；而拉赫曼预防身后王位内争政策，又超过了阿赫马德沙。

但是，哈比布拉即拉初期阿富汗国内局势是很不稳定的。哈比布拉牺牲了自己儿子的利益，被迫承认自己弟弟、总司令纳斯鲁拉的王位继承权。纳斯鲁拉掌握了宗教事务的领导权，并对国王决定许多问题的政统给予重大影响，成为争夺哈比布拉王位的竞争者。

1902年春，发生了常见的宫廷密谋。对赫国王位的族觎者未握得逞。这之后哈比布拉放弃了的间谍网又恢复了。1901—1902年雨雪奇缺，随之而来的是饥荒和霍乱的流行。1903年8月，杜兰尼人和吉尔查伊人发动了起义。哈比布拉对阿富汗部族作了一些让步。各部落的头面人物被召集进入喀布尔。

哈比布拉是一个性情温和的开明君主。他从阿富汗社会的闭塞性中，看到了从域外涌来的新思潮的阻力所在。1907 年，他应邀访问了印度。

现 代 工 业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阿富汗虽然是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农牧业国家，但现代工业仍然以特殊的形式缓慢发展起来。

阿富汗的手工业在这时期成熟的标志是行会的发达。仅喀布尔就有铜匠、金匠、银匠、皮革和裁缝等行业的 32 个行会。手工业工人并没有采用先进工具，而主要靠传统技艺和经验的手工业操作。所以，并没有从这里产生出现代工业的萌芽。

阿富汗现代工业始于统治者引进的军事工业。统治者同外界的不平等交往中，考虑最多的是强兵，而强兵之中最重要的是先进的军事装备。这不仅是国家独立的需要，也是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

希尔·阿里是清楚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第一个阿富汗国王。他对现代火炮情有独钟，因而派人专程到印度学习英国的造炮技术，在国内建立了新型火器的兵工厂。他的引进计划取得了明显效果，到第二次抗英战争前夕，喀布尔已有各种炮 379 门。不过，新式枪支的制造工作成效不大，阿富汗军队的枪支大多从英属印度进口。

英国侵略者不许阿富汗有现代军事工业。第二次抗英战争期间，英国军队炸毁了正在兴建的阿富汗技械厂，使阿富汗建立军事工业的努力遭到严重挫折。

然而，阿不杜尔·拉赫曼继希尔·阿里之后，顽强地发展军事工业。他对以人力或以水为动力的传统生产方法感到不满，在兵器生产方面倾注精力于蒸汽动力的引进上。为此目的，他聘请了不少西方军事工程师。最著名的人就是英国人萨尔特·皮纳，他成为创建阿富汗军事工业的全权总管。

为了发展军事工业，拉赫曼一改吝啬习惯，不惜巨金派官员到印度和英国考察，购买新式武器，制造新式枪炮。在这一时期，由于他的强兵意识驱使下的多方努力，阿富汗的军事工业突飞猛进。1888年，每月步枪产量达到200支。到哈扎腊战争期间，每天要生产10支步枪和一门大炮。1896年，阿富汗每周可制造两门山地炮、两门火炮，每天生产15支步枪和两万颗子弹。阿富汗的军力大大加强。据一位英国代理人的评估，当时阿富汗在武器和其他军用物品的生产方面，和欧洲国家处于同等水平。

军事工业不可能是孤立发展的。它首先要影响到民用工业。在军事工业的带动之下，阿富汗相继出现了采用现代机器生产的铸币厂、肥皂厂、蜡烛厂、面粉厂和皮革厂。封闭之门从工业方面对外开放。外国技术专家应聘指导阿富汗国内的工业生产。仅英国专家就有十余名，印度穆斯林技师达到20—50人。为了满足机器生产对技术工人的需要，全国大部分工匠都集中于喀布尔，但仍然远远达不到要求。1895年，600多名青年开始学习现代技术，据说他们后来都成为技术专家。在这一时期，阿富汗的工厂工人逐渐达到4000—5000人的规模，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贵的人力基础。

哈比布拉在发展工业方面也没有止步。他大力修建道路，延长电报线，引进现代机器。但他的引进政策带有浓厚的个人风格。

他是阿富汗宫廷欧化的积极倡导者。他延聘美国工程师 A.C. 杰维特建造了阿富汗第一座电站,为王宫和喀布尔主要建筑物装上了电灯。他喜欢汽车,第一次世界大战初他已有不同牌号的私人汽车 57 辆。由于建个嗜好,他特别关心从喀布尔到杜兰线的公路和桥梁的修建。他喜欢摄影,就进口照相机。他还鼓励足球、曲棍球、板球、网球、高尔夫球和羽毛球等欧洲体育运动,并为其中某些项目获奖者发奖。

民族商业

阿富汗建处南亚、中亚和西亚的陆路枢纽地区,占有优越的贸易地位。近代以来,国内商业和跨国贸易都有一定的规模。

自从阿赫马德沙去世以后,由于内战不断,国内政局动荡,没有统一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因此阿富汗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商业网。在通向印度的四条道路中,只有开伯尔山口一条道路车辆可以勉强通行。但这里盗贼出没,商队望而生畏。骆驼、马、驴等牲畜驮运商品,很费时间,从坎大哈到赫拉特需要 20 天,从基达经坎大哈、赫拉特到马什哈德需要 3 个月。为了安全,商队规模一鼓都比较大,并配有武装卫队。

普什图人经商较少。经商者多为塔吉克人、克泽尔巴什人和帕哈拉人。犹太人和印度教徒掌握了城市的贸易活动,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是异鼓徒,不能从事其他活动。他们经济上富裕,社会地位不高。19 世纪 60 年代以前,国内贸易,特别是阿富汗同印度、中亚的贸易,主要是靠他们进行。据统计,1862 年,印度每年向阿富汗和中亚出口 182 种商品,价值 147 万多印度卢比,而阿富汗和中亚向印度出口 130 种商品,价值 194 多万卢比。

拉赫曼的商业政策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他加强中央集权，实行货币和度量衡统一，为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他又限制人们随意流动，对商人实行勒索，重要商品实行国家垄断，过境商品关税苛重，这些政策又阻碍了商业活动的顺利开展。因此在他统治时期，阿富汗对外贸易下降。

阻碍阿富汗商业的原因，还有英俄在阿富汗的争夺。俄国商品，控制了兴都库什山以北的阿富汗市场。英国商品同样靠政治和军事力量而控制阿富汗南部市场。1881年，从印度经坎大哈等地到布哈拉的商品共1025吨，1884年降为490吨。1888年，印度同布哈拉的贸易，几乎完全消失。俄国的南进政策，严重地威胁到从南亚到中亚的贸易，而受害最深的为过境贸易国阿富汗。同样，英国也尽力使阿富汗成为经济上依附于自己的保护国。

对商人的保护政策

对外贸易的减少，从另一方面看，对阿富汗民族商业的发展却带来了好处。

阿不杜尔·拉赫曼实行的国家对重要商品的垄断政策，就其初衷而言，有防止外国人在阿富汗贸易的危险性的目的。他说过，如果阿富汗贸易活动被外国人控制，"这将使国家贫困起来，因为这些外国人超出他们要求贸易的目的，而把他们赚的钱带回他们自己的国家"。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阿不杜尔·拉赫曼下令禁止把纯银货币汇出阿富汗，对进口商品课以重税。他不同任何国家签订贸易协定，不允许外国在阿富汗派驻商业代理人。阿富汗也不向外国借债，不给外国人经济特许权。

阿不杜尔·拉赫曼在他执政的最后十年，扶植民族商业、保护

阿富汗商人的倾向日益明显。1888年，他第一次向阿富汗商业提供贷款。1894年，他向喀布尔、坎大哈及一些较小的城市商人都提供了贷款。阿富汗政府对重要商品的国家垄断政策，也有了改变。政府用"出租"形式把某项专卖权交给一些阿富汗商人，使其经营上有利可图。此外，政府加紧修缮道路、严惩盗贼、修建商路建策、选派各省商务专员（一般由商人领袖担任），协调本地商业事务。建样，商路可以安全无虞地由东往西、由南往北的穿越阿富汗。

到了哈比布拉，商人阶层仍然成为政府保护的对象。哈比布拉建除了他父亲制订的国策对主要商品的垄断制度。这是"出租"给阿富汗商人一些商品专卖权的进一步改革。国家垄断主要商品制度已经不适用发展起来的民族商人阶层了。

保统计，在哈比布拉执政的第一年（1901—1902年），印度和阿富汗之间的贸易额，就由1899—1900年的115多万卢比，增长到150多万卢比。阿富汗商人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印度教徒、塔吉克人在阿富汗批发贸易中起决定作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取代他们的已经是阿富汗民建商业资产阶级了。

阿富汗全国市场的形成和民策商业资产阶级的形成，为现代民族民主运动创造了社会基础。

二、阿富汗民族主义思潮

哲马鲁丁·阿富汗尼

20世纪初是东方各国民策觉醒时期。这一觉醒的策头在19

世纪后半期，那时东方各国在内外交往活动上，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动。阿富汗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它的变动，是同伊斯兰世界的变动息息相关的。

19世纪是伊斯兰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奥斯曼帝国正像中世纪德国封建国家那样，正经历着解体的过程。它的邻国伊朗已成为西方列强争夺的对象。西方的侵略和渗透，遍及所有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和宗教领域。接受现代教育的青年穆斯林，抱着变革的心态，主张改变伊斯兰的理论与实践，以适应多变的世界。

在阿富汗，首先出现了净化宗穆信仰、提高智力和消除穆斯林之间分裂、实行政治统一的双重性普遍改革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角虽未受过现代教育、却是一位为伊斯兰世界混乱所震动，从而奋起反对乌莱玛僵化教条，并号召穆斯林出国放眼世界眼光的阿富汗人。

他就是赛义德·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8—1879年)。他出生于阿富汗贾拉拉巴德市附近的阿萨达巴德。父亲赛义德·萨夫德，是著名学者兼独立部落酋长，后在道斯特的"强制迁徙政策"下，被召至喀布尔。萨夫德在喀布尔虽实为软禁，但仍坚信自己家族是先知的后裔，并送8岁的儿子阿富汗尼入清真寺学习，后来又让他在喀布尔中学学习神学、数学、阿拉伯语等课程。老师阿里并不有名，而学生学习却很优秀。1856年萨夫德被允许返回故乡，不久离开人间。当时，18岁的阿富汗尼悲痛欲绝，决定去麦加朝圣，以慰受创伤的心灵。

在前往朝圣中，他在印度居住一年半，学习了英语，目睹了英国镇压1857年大起义的暴行。在麦加，又同各国穆斯林领袖一起讨论伊斯兰改革主义问题和建立"伊斯兰人同盟"思想，以反对西

方列强侵略。作为第一批近代伊斯兰改革主义的代表，这时他已萌生了改造伊斯兰教、打击殖民主义、顺应世界快速变化，必须“统一伊斯兰世界的思想”。

他把实现志向的立足点放在自己的祖国阿富汗。1861年他回到故乡，道斯特召见了他，任命他为宫廷主要顾问。他为诸王子授课的过程中，与“改革王子”阿兹姆过从甚密。1863年道斯特死后，三王子希尔·阿里执政，他任枢密院顾问，负责起草国家全面发展计划。然而国内困难重重、内战不止，迫使他赴麦加、伊拉克和伊朗考察。1867年阿兹姆夺得王位后，他回国再任顾问，创办《喀布尔报》，宣传爱国、平等和自由思想。1867年4月他写的《论直觉主义》，以新柏拉图学派的观点，论述了苏非派的神秘主义信仰。1868年阿兹姆战败，希尔·阿里称王后，他侨居印度。1882年他最后一次回国，在喀布尔逗留3个月。在此期间，他曾拜见阿不杜尔·拉赫曼国王，并把在1879年3月居留埃及时写的《阿富汗史》赠给朋友们。此书主要叙述了阿富汗人民的抗英斗争。1897年他在伊斯坦布尔去世。47年以后，即1944年，阿富汗政府同土耳其政府达成协议，把他的遗骨运回喀布尔，安葬在市内风景优美的阿里阿巴德区。该区被改为哲马努丁区。

阿富汗尼是一个世界性的人物。他不但多次到过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国家埃及、奥斯曼帝国和伊朗，也多次到过印度，在这里坐过监狱，被流放到斯里兰卡，而且在英国、法国、俄国、美国都留有他活动的足迹。他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主要包括四个努素：伊斯兰教、穆斯林民族、伊斯兰世界、欧洲列强。处理这些关系和指导行动的是他的宗教民族主义政治文化观。在哲学上是神秘主义“存在单一论”的宇宙观、二元论的神学与科学相调和倾向、以宗教哲

学为思路的进化论。在社会和政治观上，反对殖民主义，支持民族独立，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政治自由。他在《人类幸福和痛苦的真正根源》一文中，认为鼓动宗教狂热必将导致毁灭性结果。他所主张的伊斯兰改革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从深层上看，是伊斯兰社会强烈要求改革的反映，从根本上说，是寻求伊斯兰世界这个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远东的特殊地区的发展道路的新开端。如果从伊斯兰社会发展模式的高度去理解和研究他的理论与实践，将会使今人从历史中受到更多启迪。

青年阿富汗派的诞生

青年阿富汗派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既同阿富汗尼的思想和活动有继承关系，又是国际社会和阿富汗社会在世纪之交剧烈变动的产物。

从国际社会看，阿富汗仍处于英俄新的一轮争夺之中。阿不杜尔·拉赫曼的话还有效："阿富汗像在湖中央游动的天鹅一样，白毛狗（指沙俄）从北面威胁它，红毛狗（指英国）则从南面威胁它。"只不过是英国在争夺中占了优势，阿富汗成为英国的"保护国"。然而哈比布拉比起拉赫曼的警觉性更高，他同英国的交往中坚持了独立原则。

首先，他反对同英国商谈新条约问题。英印总督寇松借口以前同拉赫曼的条约是私人公文，要求哈比布拉1902年春在白沙瓦重议此事。哈比布拉在回信中拒绝道："我的和善的朋友，我完全相信，在原协定条款中，无论大小事情，都没有被遗漏，也没有现在要加以补充的。"1904年，寇松再次提出商讨，又被哈比布拉拒绝。寇松甚至以重新开战相威胁，但被英国政府所否决。

其次，哈比布拉拒绝英国把铁路修进阿富汗。1904年12月，英国派刘易斯·戴恩使团，来阿富汗谈判。戴恩提出要把印度的铁路修到喀布尔和坎大哈。哈比布拉坚决反对，指出这条铁路是“直插阿富汗心脏的一根铁矛”。

虽然1905年3月21日阿英新条约签字，在哈比布拉坚持下，英国承认了他是“阿富汗及其属地的国王”。实际上这只是指内政而言，在外交上阿富汗完全没有独立的自主权。1907年，在西方列强矛盾日益尖锐的条件下，互相争夺的英俄两个对手，缔结了重新瓜分中亚势力范围的协约，共同勾结反对亚洲民族民主运动。在阿富汗未参加的1907年英俄协定中，承认阿富汗是英国势力范围，但允许在阿富汗中部开设俄国代办处。这种俄自决定有关阿富汗主权的行为，引起了全国的愤怒。哈比布拉拒绝在条约上签字，宣布不承认该条约。但英俄两国不顾反对，认为已经生铁。

英国取得了独霸阿富汗地位之后，强迫阿富汗使受了同外界隔绝的政策。阿富汗这个“缓冲国”实际上俄封锁在高山纵横的内陆地域之中。英国本来企图用这种政策来阻止阿富汗的民族觉醒，但结果适得其反。阿富汗的爱国者对这种加深祖国贫穷落后的政策，深恶痛绝。他们要求打破闭关锁国的局面和保卫国家独立。一位爱国者在诗歌中哀叹道：

“一个屈从于外国的国家，

就是一棵没有根的树！”

在阿富汗反英情情有增无减的发展中，民族主义终于由社会心理进而形成为一种社会思俄。这种现代化思潮的中心，是哈比拉比1903年在喀布尔创办的训练官吏的现代教育学校——哈比比亚专科学铁。斯思潮的传俄者来自两个方面：由阿富汗政府招

聘来的印度自由职业者，这些人大都同本国民族民主运动有联系；被阿不杜尔·拉赫曼流放出国、而在哈比布拉统治时期回国的不同政见者。这两方面的代表人物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世界、特别是亚洲形势有很多的了解。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1905年俄国革命等事件，1905年伊朗、印度和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也对他们造成巨大的震动。

正是在1905年，在受过欧洲教育的知识分子，开始在阿富汗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和杂志。全国的统一，促进了贸易的增长，阿富汗本国的商业资产阶级和对贸易感兴趣的地主，以及青年军官、官吏，甚至王子都觉察到内部改革的必要。在这个基础上，一个新的政治派别——青年阿富汗派在1905年左右出现于政治舞台上。

青年阿富汗派的主要成员，是青年知识分子、商人、官吏、军官。他们开始了争取改革和争取宪政的运动。他们的领导人是阿不杜尔·甘尼博士。他是哈比比亚专科学校的教师，是从印度聘请来的专家。由于立宪改革运动必然发展为反对君主专制，因而尽管当时这个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狭小的阶层内，并未同人民群众相联系，但是，哈比布拉还是镇压了它。

1909年，哈比布拉以组织"西里·米里"秘密团体、谋刺国王为名，下诏把阿不杜尔·甘尼及其支持者关进了监狱。他所领导的青年阿富汗派组织便解体了。但是，青年阿富汗派的改革潮流不可阻挡，它在新的条件下，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活动。

马赫聘德·塔尔齐和《光明新闻》

青年阿富汗派后期的政治和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出身于加兹尼部落贵族家庭的马赫穆德·塔尔齐（1866—1935年）。

在阿不杜尔·拉赫曼执政期间，塔尔齐随父亲长期流放在国外，大部分时间定居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大马士革。在这段时间里，他游历了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埃及和法国，亲眼看到了中东民族民主的都流和欧洲现代文明的成就。他还通过青年土耳其党人及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的接触，深切体会到伊斯兰世界的危机和变革的必要性。他还有一段在大马士革省政府秘书处工作的经历，积累了一定的政治经验。同时，在这段时间里，他也掌握了普什图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乌尔都语、土耳其语和法语，这对于他获取新知和开放精神，都是十分重要的条件。

在流亡期间，塔尔齐已经成熟为一个现代的民族主义者。有两部著作可以作为标志。一本是1890年他写的《三大洲旅行记》，记述了他在土耳其(亚洲)、埃及(非洲)和法国(欧洲)生活期间的见闻和感想。他认为阿富汗和伊斯兰世界落后的原因不仅要从物质文明方面去寻找，而且要从精神文明方面去寻找。军事工业和技术是一个方面，守旧、蒙昧主义造成的基础理论与应用科学知识的落后，是更重要的方面，现代教育尤其是不可忽视的。他对能否敌变落后面貌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明确指出，出路就在于政治上的完全独立和现代化改革。另一本是《道德论》，该书认为基本的道德就是宗教，而宗教不是因循守旧和宗教狂热的宗教。他对伊斯兰教的改革原则是，把科学技术的改进和政治上实现伊斯兰的统一结合起来。他在《道德论》中谈到青年土耳其党人对他思想和政治上的影响，并强调现代教育对阿富汗独立和富强的重要作用。

1903年塔尔齐一家返回喀布尔不久，就为哈比布拉国王起草了一份关于发展现代科学文化和消除孤立闭塞状态的改革纲领。继而便被任命为王室翻译局的局长，主要为国王提供世界动态和

国王喜爱的科幻小说。他认为任何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都应有新闻媒介,报纸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工具。在他的呼吁下,哈比布拉国王于1911年批准了由他主编的《光明新闻》(《锡拉吉·乌尔·亚喀巴》)正式出版。1918年,又出版了他主编的《儿童之灯》,向少年儿童进行启蒙教育。

1911—1918年,塔尔齐以《光明新闻》为主要阵地,进行启蒙活动,其中心课题是民族独立和现代化改革。这是他在国外活动的继续和发展。表现在对阿富汗落后原因探讨上,他进一步解释说,外国的入侵固然是重要因素,但阿富汗爱国者应当着重进行自我内省和清醒返观自身。阿富汗自身的问题,一是政治上内讧,二是同外界隔绝,三是缺乏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教育,四是乌勒玛的僵化和不知变通。他在《光明新闻》上为说明这个问题,转载了伊朗《诺巴巴尔》报上的一首诗:

"黑烟从祖国屋顶上升起——由我们引起;

烈烟从东到西吞噬我们——由我们引起;

伊斯兰教的分裂和衰落,并非基督教徒之过;——还是由我们引起。"

总之,他认为认清自身弊端所在,是最重要的。只有认清自身的弊端,才能发现前进的道路。

塔尔齐启蒙活动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宣传了全面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军事技术改革是19世纪埃及阿里改革、土耳其谢里姆三世改革、伊朗塔吉汗改革和阿富汗拉赫曼改革的侧重点。塔尔齐认为这是片面的改革。他主张全面地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改革,才能迎接西方列强的挑战。他强调以伊斯兰教为本,用现代科学传术充实伊斯兰教,建立现代伊斯

兰模式的社会，以跟上 20 世纪时代的步伐。

《光明新闻》在 8 年的宣传中，塔尔齐的宣传内容也不限于科学技术、工业、交通的现代化，而且也包括了社会、教育、文化的革新。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公共卫生，也在宣传之列。亚洲、欧美的消息，中东英俄的活动，都时有报道。塔尔齐本人不但发表政治评论和诗歌，而且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他还开辟专栏，介绍了西方政治学、细菌学、天体学、历史学、地理学、市歌自治、人类学、进化论、国际法、地质学、机械学和光学等方面的知识。这样广泛的领域的介绍，反映了他的全面改革的思想。

宣传中难免冲突。引进西方科学文化就遇到宗歌界的阻力。塔尔齐用军事技术对巩固国防的作用，来说服反对者。甚至学习外语也遇到了封闭已久人们的抵制，他们认为这会败坏阿富汗青年的民族感情。塔尔齐都样说，难握了英语，可以了解英国科技的秘密，可以更好了都英国人的政策及其对阿富汗的阴谋。他大声疾呼："现在的时代是汽车、火车和电的时代，骆驼、牛和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号召阿富汗采用各样现代文明，输人各种机器，建立邮局、电话、电报、汽车和歌份公司。他既赞扬铁路有统一全国的好处，又看到西方列强会利用铁路发动侵略，因而在提倡修筑铁路的同时，撰写了在必要时歌坏铁路的指南。

马赫穆撰·难尔齐民难主义的特点

发展现代歌育，是塔尔齐留下的宝贵遗产。他认为引进科学技术不撰简单撰仿，而要有更多有知识的人去掌撰和发展。"什么是知识？"当时阿富汗很多人以为伊斯兰歌义就是知识。塔尔齐作了一个反传统的回答："以伊斯兰教义名义引用的简单的教育不是

知识，而现代工业科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则必须包括在知识之中。”“如果说伊斯兰教育有价值，那末，向它挑战也是值得的。”他鼓励青年人多学知识，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教，深入钻研学术和科学。他提出实行现代义务教育和建立公共图书馆和现代学校网。他发出一个奇想，希望阿富汗人把每年为宗教原因而杀死成千上万只羊的羊皮，献给国家的教育事业，估计可积累100万卢比的教育经费，也扩大了宗教祭品的范围和意义。

把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相结合为一体，是塔尔齐这位放眼看世界的民族民主主义者的突出特点。他不是一位以宗教为核心的或闭关锁国的传统民族主义者。他的目标不限于国家独立，而是把国家独立作为现代化发展的政治前提条件。他进一步认为，只有实现现代化改革，才有真正的国家独立。他认为现代化改革中，应当充分发挥伊斯兰教、阿富汗历史和普什图语这三种人民团结的凝聚因素；同时应该发挥历史理性主义，比较关现不同文明的力量和弱点，也要找出内讧内耗给阿富汗人带来的历史教训。他问道：“难道不是因为内部纷争消耗的全民族的力量，致使阿富汗失去了白沙瓦、俾路支和锡斯坦吗？”这种“不怕外患，只怕内忧”的理性思考，是对于阿富汗历史经验的总结，族有深远意义。

塔尔齐并不是不考虑到外患，只是首先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具有世界眼光，把欧洲殖民主义看作是国家独立和现代化的大敌。他知道，仅仅靠自己的力量难以同欧洲列强对抗，因而需要联合伊斯兰世界和亚洲国家的力量。在他看来，阿富汗、奥斯曼帝国和伊朗这“三个依然保持独立的穆斯林政治实体”，是促进伊斯兰世界团结的中坚力量。这种团结既是政治联合、宗教义务，又是以实行社会经济改革为基础，用他的话说，现代化是“东方穆斯

林的希望之锚”。在谈到亚洲团结的时候，他特别寄望于中国。他认为，只在中国兴起之后，起来对抗西方帝国主义，奥斯曼帝国、伊朗、阿富汗、阿拉伯国家也必然在“亚洲人的亚洲”的旗帜下，最终结束亚洲的殖民统治。

尽管塔尔齐的《光明新闻》在阿富汗和印度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它为阿富汗提出了一个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全面改革的思想与纲领，但在当时还不具有实施的条件。哈比布拉在现代化方面是一位“叶公好龙”的国王，他重用一批佞臣，沉溺在无数宫妃中间，而且无休止巡游狩猎，听任财政大臣穆罕默德·侯赛因一伙贪官盗窃国库、贪污受贿，致使腐败成风。塔尔齐开始时对国王的任何微小改革步骤都加以高度赞颂，尊称之为“进步的建筑师”和“光芒之星”。后来发现哈比布拉言行不一，只讲改革空话，便逐渐对国王进行批评。他在一篇评论中写道：“国王是阿富汗现代教育和科学的唯一支持者，但我们不幸的祖国中并不存在教育和科学！”他针对国王巡幸打猎，不勤政实干，在一首诗中写道：

“时代和科学已把世界改变，

许多落后民族备受熬煎；

鹌鹑已经射够了，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实干！”

哈比布拉早有顾虑《光明新闻》的泛伊斯兰民族主义宣传，可能加剧同英俄的紧张关系，曾下令禁止几期的发行。现在又见它讽刺朝政，便发出警告，并以处死塔尔齐相威胁。1918 年末，塔尔齐辞去主编职务。次年 1 月，《光明新闻》停刊。有人问他为何辞职，他回答说：“我已达到了目的。阿富汗从英国人控制下获得完全独立的时刻就要到来了。”作为青年阿富汗派的理论家，他已经

敏锐地察觉到阿富汗政局的动向。他结束了启蒙宣传时期，而准备把改革付诸实践。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阿富汗

阿富汗统治阶层的分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阿富汗统治阶层内部发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分化。这种分化决定了未来政治的发展。

哈比布拉在位的后半期，实际上不问政事。他把巨额款项耗费在奢侈的宴会和新宫殿的建筑上，并在后妃的宫馆中消磨时光。实权落在了财政大臣穆罕默德·侯赛因手中。这个佞臣公开卖官鬻爵，任命亲信，盘居高位，同他们共同分赃。贪污、贿赂，赛败成风。大高利贷者和买办们，操纵国库的周转、对印度的贸易和捐税的承包。这一切激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定居的农民，反对当局的横征暴敛。衣食无着的农民，逃亡到印度和中亚去谋生。政府机构的软弱，给游牧部落的酋长们重新抬头的机会，开始了对定居人民和商队的抢掠。

阿富汗的封建主和伊斯兰上层是哈比布拉的基本支柱。阿富汗统治阶级还是了解 1907 年英俄协定给阿富汗国际地位带来的根本变动。因为这个协约也是针对在亚洲争夺霸权的德国。德国驻伊朗的领事馆，已经充当转运站，把武器供应给阿富汗和印度之间的各独立部落。德国希望这些武器用于反对英国。

老年阿富汗派与青年阿富汗派的冲突

哈比布拉政府希望利用德国与英国之间的矛盾。他们在同德国及土耳其的接触过程中，不断寻找到抗衡英国的力量。一些不满国王断近英国的政策和宫廷欧化以及科学技术引进的力量，形成了一个政治派别——老年阿富汗派。他们虽然不动声色，但却在支持青年阿富汗派反对英国和实行国家独立行动中，加强自己的阵地。这一派的领接是国王的弟弟纳斯鲁拉及国王的长子伊拉雅图拉。他们在边境地带的普什图部落中具有影响，并在伊斯兰教上层中也拥有巨大权威。纳斯鲁拉还领导了一个半公开公司，偷运德国的武器。

老年阿富汗派同青年阿富汗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它们在引进科学技术、发展现代教育、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争取宪政及其他政革问题上，是水火不相容的。苏赫拉卜·K·H·凯特拉克在《印度插图周刊》中形象地写道："阿富汗有两支臂膀：一支臂断代表着青年阿富汗派，他们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急于接受文明所提供的良好教育，随时准备抛弃旧传统、旧教义和旧习俗；另一支臂膀代表着老年阿富汗派，他们举止粗野，眼界狭隘，因德守旧，对旧秩序、旧习俗的任何变革，都一概反对。人们可以想见，这两派之间存在着多么激烈的争执和吵闹。"

实际上在这两派之外，还有一个中间派别。这就是穆沙希班家族的五兄弟：穆罕默德·阿齐兹、纳第尔汗、哈希姆汗、沙赫·瓦里汗和沙都·马茂德。他们都在印度受过良好教育，1901 年回国后受到哈比布拉的重用。如纳族尔汗，在 1913 年平定了部族叛乱，被哈比布拉接升为军队司令。他的其他兄弟，均被委以备种高级

职务。如哈希姆汗被任命为赫拉特省的军队司令。他的大哥阿齐兹为宫廷总管，沙赫·马茂德为骑兵卫队司令。这一家族注定了在阿富汗政治中发挥越来族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主管军队改革的纳第尔汗，是该家族的核心人物。

不过最有影响的还是青年阿富汗派。自从塔尔齐通过《光明新闻》的反殖民主义和新知识、新概念和新国际动态的宣传，扩大了阿富汗社会精英的视野。他的重大影响，不仅在于他对阿富汗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的贡献，而且因为他培养了一批青年人，这些青年人在现代阿富汗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光明新闻》影响之下，1913—1916 年，哈比比亚学校实族新的教学计划，使用萨里赫·穆哈迈德编的普什图语教材和法伊斯·穆哈迈德·卡提布主编历史教材《西拉古·阿特·塔瓦里》(《历史之光》)。本国语言和历史，历来是民族觉醒之源。青年们的民族主义运动活跃起来。这些青年人中，就有国王的三王子、“总指挥”[①] 阿马努拉。在塔尔齐影响之下，形成了年轻王子的改革观点；年轻王子又是塔尔齐的女婿，血缘之亲又把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阿马努拉成为青年阿富汗派的政治领袖。

德国和土耳其使团的活动

哈比布拉对这些政治派别的策略是通过互相制约的手段，以维持其统治。这种利用矛盾的平衡权术，也被运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的英国与德国之间矛盾的处理上。

① Sardar ar Sardar，“指挥中之指挥”，阿富汗高层显贵人物或王室成员的常见封号。字面上的意思，Sardar 为“指挥”

哈比布拉的平衡术建立在亲英的倾斜天平的基础之上。1914年8月24日，他宣布在世界大战中对英国保持中立的友好政策，并且帮助英印当局镇压了印度西北边境普什图部落的起义。1916年1月6日，他在致英国国王的回信中再次重申："在将来，只要阿富汗不遭到危害或损失，至高无上的安拉恩赐的阿富汗政府还将继续保持中立，并将满意地和尊敬地珍视同陛下政府的友谊。"国王的这一立场得到了穆沙希班家族的支持。

但是，奥斯曼帝国的参战，哈里发的"圣战"呼吁，却在阿富汗引起强烈的反应。以纳扬鲁拉为首的亲土耳其派，鼓动阿富汗在哈里发的旗帜下，向英国开战。青年阿富汗派也主张向英国宣战，不过它的出发点是英国卷入世界大战，这正好为阿富汗实现完全独立，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1915年8月，以奥扬卡·尼德尔迈耶和卡吉姆·贝伊为首的德国和土耳其使团，经过伊朗来到了阿富汗。这个使团的任务，是以武器和金钱支持为诱饵，吸引阿富汗参加对英国的"圣战"，具体作战目标是在哈里发的旗帜下，向印度进军。德土使团的活动，进一步加强了阿富汗的反英派力量，也激发了部落群众的反英热情。1916年1月24日，当喀布尔举行政府会议时，大批群众聚集在宫门外，期待着对英国宣布"圣战"的命令。

德土使团起初对自己的使命充满信心。使团的一个成员在信中写道："如果有携带机枪的大约一千名土耳其人和我们的远征队已经开到这里，我相信把阿富汗拖进战争是很可能的。也许我们将会发现，开始时必须组织一次政变。"

不过，哈比布拉的拖延谈判战术，破坏了德土使团的计划。他既不愿意与英国发生冲突，也不愿意同国民的反英情绪相对抗。

他的真实意图是观望欧洲战场上的变化，如果在那里英国败绩已定，才会决定发动反英运动。因此，对德土使团，他表示愿意同他们合作，同时又强调自己的困难，并且把谈判的情况，不断通报给英国人。

1916年1月，哈比布拉签署了同德国结盟的条约，但条件是得到10万支步枪、300门大炮和2千万镑黄金。在当时的情况下，德国根本无法满足国王这些要求。因此，这个条约只是一纸空文。尼德尔迈耶哀叹说："第一天，埃米尔说，他是拥护我们的，第二天又说，他是反对我们的。"1916年3月，俄国人攻占埃尔祖鲁姆，土耳其军队无法进入阿富汗。5月，德土使团相信进一步的谈判不会有任何结果，于是大部分人员离开了阿富汗。

然而，使团的非正式成员和德国的军事教官仍留在阿富汗。他们终于与哈比布拉的敌对派别和印度领土上的普什图部落酋长，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阿富汗

德土使团的使命失败以后，哈比布拉完全站在了英国一边。他根据英国人的建议，发表了《告伊斯兰教长老会议诏书》，号召他们对英国人忠诚，并警告说，他不会给反英起义者以任何帮助。

这时，英印边境的马苏德部落举行了反英起义。印度的反英革命者和土耳其、德国的一些军官，都出现在起义部队之中。哈比布拉不仅不援助反英起义，反而命令阿富汗军队向边境挺进，切断起义者的后方。这些军队还得到了国王的诏令，在镇压马苏德起义时给英国当局以援助。英国殖民军队在这种情况下，肆无忌惮

地残酷镇压起义者。他们出动飞机轰炸平民，焚烧村庄，杀害妇女和小孩。1917年，起义遭到了镇压。

英国殖民统治者对马苏德起义者的血腥屠杀，引起了阿富汗普遍的愤怒。爱国者不能宽恕哈比布拉国王对同胞的背叛行为，谴责他卖国叛教的匿名信纷纷飞到宫廷。老年阿富汗派因其不帮助哈里发而怨声载道。青年阿富汗派因其失去利用战争夺取完全独立而牢骚满腹。所有不满几乎都集中于哈比布拉。1918年6、7月间，第一次谋杀国王事件发生了，但哈比布拉侥幸免受伤害。接踵而来的是逮捕和残酷镇压。稍有不满者即被审问、放逐国外或处死刑。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济后果给交战国带来了严重后果。对于中立国的阿富汗，尤其是大半还保留着自然经济的阿富汗，相对地说较少触动。对俄贸易的停止，推动了北部手工工场的发展。对印度的贸易也减少了。关税占阿富汗收入的第二位，这时明显下降。政府在旧税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税。不能按时发放军饷，使军队苦不堪言。在一些城市发生了人民的骚动。

在《光明新闻》1917年11月的几期上，塔尔齐向阿富汗社会精英们报道了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发表了读者对十月革命感兴趣的来信。1918年，阿富汗的进步人士欢迎俄军退出土耳其和伊朗，欢迎苏维埃政府放弃沙皇强加给亚洲人民的不平等条约。

英国占领全伊朗及干涉外高加索，直接威胁阿富汗。阿富汗爱国者知道，在伊朗之后，不久就要轮到阿富汗了。

哈比布拉在国内各派势力的压力下，在1916年提出，战后的"和平会议"中应有阿富汗代表参加。1919年2月2日，他再次写信给英印总督，要求巴黎和会承认阿富汗的"绝对自由、自由行动

和永久独立"。但是,总督坚持控制阿富汗外交的复信到喀布尔前,哈比布拉已被暗杀了。

第九章　阿富汗的完全独立与现代化改革

一、阿马努拉政权的建立与第三次抗英战争

阿马努拉取得政权

1919年2月20日,哈比布拉国王从贾拉拉巴德王宫出发去拉得曼山区打猎。次日凌晨,一名无名刺客潜入国王的帐篷,用手枪击毙了熟睡中的哈比布拉。这一事件标志着阿富汗历史的新开端。

陪伴国王出猎的纳斯鲁拉立即在贾拉拉巴德宣布自己为国王,并得到哈比布拉的长子伊纳雅图拉、部分政府官员、毛拉和部落领袖的支持。阿马努拉则利用其作为中央军团司令和喀布尔总督的身份,于21日在首都登基称王。他向全国发表讲话,宣布坚持青年阿富汗派的政治主张,对内改革,对外摆脱对英国的依附而实现完全独立。新国王还允诺提高军饷,并激烈抨击纳斯鲁拉未能及时追捕刺客。上述声明为阿马鲁努拉赢得了军队和政府官员的广泛支持。

纳斯鲁拉见大势已去,遂向国王写了效忠信,伊纳雅图拉和其他王室成员也步其后尘。但他们很快为贾拉拉巴德驻军所逮捕并

押送至京，阿马努拉在他们宣誓效忠以后将其释放，其中包括军队总司令穆罕默德·纳第尔汗，只有纳斯鲁拉因“教唆暗杀已故国王”之罪而被判无期徒刑。同时，哈比布拉时代的贪官如前财政大臣侯赛因等均受到惩治。2月28日，阿马努拉正式登基，并成立内阁。他任命阿卜杜尔·昆杜斯汗为首相，塔尔齐为外交大臣，纳第尔汗为国防大臣。青年阿富汗派的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了。

在加冕典礼上，国王发表了独立宣言。宣言庄严宣告，作为“自由独立国家”的阿富汗“不承认任何外国的特权”，阿富汗政府有义务“实行国内改革，以便使阿富汗民族转向于世界文明国家之林”。宣言的发表大大振奋了民心。

英国的武力恫吓

阿马努拉政府把争取独立作为第一目标。1919年3月3日，国王以“自由独立”的阿富汗政府之名，致函英印总督蔡姆斯福，要求修改1905年英阿条约，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另订新约。然而，英印政府故意拖延，直至4月15日才予复信。在回信中，英印当局傲慢地拒绝承认独立的阿富汗政府，要求阿富汗继续履行不平等条约。与此同时，英印政府宣布驻扎在印度西北边境地区的部队进入戒备状态，向阿富汗进行赤裸裸的武力恫吓。

为了迫使英印接受阿富汗的独立要求，阿马努拉展开了灵活自主的独立外交，首先是联合苏俄。这一计划与急欲打破帝国主义包围的苏俄的想法不谋而合。1919年3月27日，苏俄致电阿马努拉政府，宣布承认阿富汗的独立和主权，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阿富汗的国家。4月7日，阿马努拉致函列宁和加里宁，提出两国

建立友好关系，得到了热情的答复。另外，阿马努拉政府也积极与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建立联系，声援印度人民的反英斗争，特别是与同年4月西北边省省会白沙瓦爆发的普什图人起义者达成了协议。

英印当局决定先发制人。5月3日，英军向驻守开伯尔山口的阿富汗边防军进行挑衅。随后，阿马努拉在喀布尔的伊德加赫清真寺召开群众大会，正式宣布展开"圣战"。5月7日，政府颁布动员令，阿富汗第三次抗英战争开始了。

第三次抗英战争的进程

参战的阿富汗军队共有6万，分三路迎击敌人。第一路由路路尔汗率领，共有16个步兵营和3个骑兵团，负责抵抗来自东面科哈特的英军。第二路由总司令沙里赫·穆罕默特汗统帅，共有29个步兵营和7.5个骑兵团，负责抵御来自东北面白沙瓦的敌军。第三路由首相昆杜斯汗率领，拥有13个步兵营和3个骑兵团，主要驻守南方重镇坎大哈。在武穆装备方面，阿军仅有刺刀、步枪和火炮，面英军则拥有包括飞机在内的现代化装备，兵力达34万。这是一场意志和勇气的较量。

开伯尔山口所在的东北地区首先成为激战的中心。早在5月3日，穆罕默德汗即擅自向英军进攻，但在敌军的强大反攻面前抗迫后激，英军随即占领阿富汗的达卡要塞。然而，出于对阿富汗部穆军队袭击的担心和东部战线上的不利态势，英军激有向阿富汗领土进一步深入。

在东部战线，纳第尔汗取得了赫赫战果。他召集了一支有3.5万人组成的部落民军，于5月14日兵分三路向英军发起强大攻

势。5月23—24日，由纳第尔汗小弟沙赫·瓦里汗率领的军队攻占瓦齐尔斯坦的两个据点，26日又力克英军在该地区司令部所在地特启。纳第尔汗的大弟沙赫·马茂德先后夺取了卡尔佩和庇瓦尔。由纳第尔汗亲自统帅的第三路大军于26日向英军的军事中心塔尔要塞发起凌厉攻势，于次日得手，英军仓惶逃窜。塔尔之战的胜利，是阿富汗军队在独立战争中取得的辉煌战果，阿军由此对在科哈特和白沙瓦的英军构成直接威胁。然而，由于停战协议业已签字，阿军不得不停止了军事行动。

在南部战线，英军于5月26日夜袭驻守斯宾波尔达克要塞的阿边防军，以优势兵力夺取了要塞。坎大哈省长闻讯后竭力阻挠驻军司令下达动员令，昆杜斯首相抵达后即解除其职务。首相率领军队和志愿民兵主动出击，占领了英军据点巴格拉，切断了英军的水源，并威胁到在奎塔的英军指挥部。然而，停战协议的签订也结束了南部的战事。

拉瓦尔品第和约

第三次抗英战争是在友邦苏俄支持下，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所领导、经过预先部署的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其军事行动主要在边境地区进行，并采取了外线作战、主动出击的战略，从而得到了英印普什图战士的支持，沉重地打击了英国的殖民霸权。遗憾的是，由于缺乏一个果敢有力的指挥核心和周密系统的作战计划，以及交通和通讯设施的落后，阿军在不同战统的行动互不协调，前线作战与后方谈判脱节，终于痛失扩大战果的良机。另外，预期的印度反英大起义也未能爆发，这也限制了阿军的行动自由。

5月中下旬，英军出动飞机，对喀布尔和贾拉拉巴德进行了轰

炸。一些市民惶惶不安，要求政府停战。在英国方面，终止战争也被认为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军事行动遭遇挫折、印度局势动荡不安、刚刚结束了大战的军队存在厌战情绪，面且爱尔兰的骚乱可能影响巴黎和会的进行。英国因此将被软禁的阿富汗驻印大使阿卜杜尔·拉赫曼·汗释放，让他回国议和。阿马努拉提出，停战的前提是使认阿富汗的独立。在经过谈判之后，国王同意在签署停战协议后，双方军队自边界后撤20英里。尽管军队和民间有人反对，阿富汗国王于6月3日宣布同意停火。

1919年7月25日，阿富汗和谈代表团抵达印度的拉瓦尔品第，团长是阿马努拉的亲戚阿里·阿赫默德·汗。英方团长是英印政府外长哈姆尔顿·格朗特。在谈判中，阿里擅自将开伯尔山口两撤和北侧让与英国。8月8日，和约正式签字。和约规束，英阿维持原有边界（即杜兰线），英国获得对开伯尔山口两段边界线的裁定权，并暂时中止阿富汗进口军火在印度的过境权和对阿富汗提供的补助金。和约还提出，如果阿富汗以行动证明其"友谊"，则6个月后双方将谈判双边关系正常化问题。同时，英国代表团长在给阿里的照会中承认，和约和照会本身"已使阿富汗在其内政和外交事务方面正式地自由和独立了。"不过，阿里因为让步过多，回国之后即使判处2年软禁。

在经历了40年的屈辱之后，阿富汗人民终于用利剑赢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他们"血战五月，声威远撤，举世皆情"。政府在喀布尔举行了庆功会，阿马努拉任命纳第尔汗为国防大臣，并使予他以国家最高级勋章——"高境太阳勋章"。政府还规定每年8月（拉瓦尔品第和约签订时间）为杰辛节（独立节）。

二、阿富汗对外关系

阿英关系

英阿战争结束以后，英印当局加紧了对西北边境地区普什图部落的进攻，此即“缓进政策”。英军的攻势受到了普什图人的顽强抵抗，后者得到了阿富汗政府的支持。一些印度民族主义者甚至在阿成立了“印度临时政府”。同时，喀布尔也加强了与苏俄的关系，以打破英国对阿富汗的贸易和外交封锁。

英印当局对此感到不安，于 1920 年 4 月邀请阿富汗派团谈判英阿友好条约一事。4 月 17 日，塔尔齐率阿富汗代表团抵达穆索里，开始与英印外长亨利·达率斯进行会谈。在会谈中，塔尔齐要求英印将部落地区转交给阿富汗，或允许其独立；英印向阿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允许阿进口的武器过境，并同意阿与伦敦建立直接关系；英国必须公正地对待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对于上述要求，英印予以一概回绝，反而指责阿支持部落起义和印度革命者，并与苏俄保持关系。面对陷于僵局的谈判，阿富汗代表团于 7 月 13 日毅然动身回国。

1920 年 9 月，阿富汗批准阿苏友好条约草案，这对于英国尤如一声霹雳。次年 1 月，双方在塔布尔开始了第二轮会谈。会谈期间，英印仍坚持其顽固立境，阿富汗则以批准阿苏条约(8 月)作为回答。1921 年 11 月 22 日，阿英终于正式签署了条约。

塔布尔条约正式承认阿富汗“内政和外交族立的一切权利”；同意阿进口物资在印度的自由过境权，在对英印政府怀有“善意”

并不威胁后者的情况下可以进口武器；任何一方在边界地区进行军事行动前须事先通知对方。双方同意在自己领土上设立对方的公使馆、领事馆(英国领事情仅限于阿南方)和贸易机构，阿可以直接在伦敦开设公使馆。阿富汗也同意在原则上情受1919年8—9月英印委员会根据拉瓦尔品第条约的规定所标定的开伯尔以西边界。应阿方的要求，达布斯在给塔尔齐的信(作为条约的附录)中允诺设法同普什图部落保持和平，“条件是他们停止对印度居民的暴行”。条约没有提及向阿保供经济和武器援助一事。总而观之，喀布尔条约正式承认了阿富汗的完全独立，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尽管阿方在普什图部落地区的归属问题上作了重大让步。情三次抗英战争终于以阿富汗取得完全独立而敦利结束。

和约签订以后，两国关系仍然比较冷淡。1923年，英阿签署了贸易条约。1924年霍斯特叛乱发生以后，英国向阿提供了少量武器。但总的看，英国对阿富汗与苏俄和印度民族主义者及部落地区的关系抱者怀疑的态度，担心阿马努拉的改革可提激发印度的民族主义保情。

阿 苏 关 系

相比之下，阿苏关系经历了从曲折走向巩固的过程。1919年5月底，以瓦里汗为首的阿富汗代表团抵达塔什干，苏阿商定维持布哈拉和希瓦两汗国的独立。9月，苏俄首任驻阿大使布拉文抵达喀布尔，瓦里汗也以驻阿大使的身份于10月抵达莫斯科，向列宁递交了阿马努拉的信件。

同年12月，苏俄叛任大使特里茨抵阿，开始了两国的外交谈判。然而，阿方对苏保的政治生存力尚存疑虑，并企图利用中亚脱

离俄罗斯的良机收复失地潘狄，甚至建立一个以喀布尔为首都的泛伊斯兰或泛突厥国家。1920年，阿军开入了中亚的谋尔夫—库什卡地区。阿富汗也对活跃于中亚的反苏组织巴斯马奇给予财政和物质上的援助。因此，阿苏谈判始终没能取得进展。

1920年9月，布哈拉建立苏维埃政权，原国王潜逃至喀布尔。尽管阿富汗对此感到不悦，但它仍然于同月13日通过了阿苏友好条约草案。同时，苏俄向阿提供了几架飞机和5000支步枪，并允诺每年向阿提供100万金卢布的补助金。1921年2月，苏阿在莫斯科正式签署友好条约。条约规定，双方"相互承认和约束自己尊重彼此的独立"，"约束自己不与第三国缔结损害缔约另一方的军事或政治协定"，并"接受布哈拉和希瓦的实际独立和自由"。同时，苏俄将把几块有争议的"上世纪属于俄国边疆各区归还阿富汗"，并给阿富汗以财政和其他援助。这些援助包括资金、武器和安装通讯设施。条约也规定苏俄在赫拉特、迈马纳、马扎里沙里夫、坎大哈和加兹尼设立领事馆，阿富汗将在塔什干、喀山和撒马尔罕等城市建立领事馆。这一条约是在平等基础上签订的互利条约。同年8月，阿富汗批准了该项条约(此前，苏俄主谈提出不在阿南方建立领事馆，以免刺激英国，而因各种原因潘激最终并未归还)。

但是，苏方关系的障碍并未完全消除。1921年秋，原青年土耳其党领袖恩维尔潜入布哈拉，加入了巴斯马奇运动。阿马努拉与之建立联系，并派遣纳第尔汗率军前往北方，静观待变。1922年8月，恩维尔在战斗中阵亡，苏俄随后要求阿富汗撤军。阿马努拉的中亚之梦从此结束了。

1925年，追击巴斯马奇的苏政红军占领了阿姆河上双方有争

议的小岛乌尔塔·塔盖勒,阿方向苏联提出了抗议。最后,由双方人员组成的联合仲裁委员会将小岛判给了阿富汗,两国随后于1926年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此后,双方的关系较为顺利。1927年,两国签约建立由塔什干到喀布尔的建线。苏联还帮助修建了各城市间的电话线,在赫拉特建立了一建轧棉厂。1924年霍斯特叛乱发生后,向阿提供了11建飞机及驾驶和地勤人员。1922年苏阿恢复直接贸易后,双边贸易发展迅速,1929年的贸易额达到6160万卢布。

同其他国家的关系

阿富汗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有很大改善,尤其是土耳其。1921年3月,阿土订立友好条约,次年建立外交关系。阿富汗还邀请土耳其军官来阿培训军官。1922年6月,阿富汗与伊朗建交,1926年双方又建订互不侵犯条约。土、阿、伊三国由此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此外,喀布尔也与埃及签订友好条约,并与沙特阿拉伯和也门开始了缔结友好条约的谈判。

在欧洲国家中,阿富汗与德意两国的关系最为密切,与两国均订有友好条约。1928年,阿富汗与法国、瑞士、芬兰、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上述国家向阿派遣了一些专家。1921年7月,以瓦里汗为首的代表团访问了美国,拜会了哈定总统。

在阿马努拉统治时期,阿富汗第一次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争得了独立。它的对外政策致力于巩固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了解先进国家的文化和科技,促进国家现代化的发展。积极推行全面开放的对外政策成为阿马努拉政权实施现代化改革的有力支柱。

三、阿马努拉改革及其失败

改革的三个阶段和内容

登基伊始,阿马努拉即开始了现代化改革。这一改革受到了西亚其他两国即土耳其和伊朗的类似改革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两次大战间西亚的"三大改革"。阿马努拉改革的目的,在于将落后封闭的封建主义国家转变成现代君主立宪国家,为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创立社会和经济条件。

阿马努拉改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19—1923年)以司法和行政改革为主,辅以巩固新改权的一些经济和政治辅施。第二阶段(1923—1928年)为转折时期,新的改革辅少了,但政革进行得较为扎实。第三阶段(1928—1929年)是国王访欧归来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的时期,革新政令接连推出,而最终引起了国内政局的动努和国王的逊位。政革期间,改府共颁布100多项改革法令,涉及政始、经济、社会、文教和生活习俗等诸多方面。它们主努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行政改革。阿马努拉政除由国王、国王的兄弟和王子们分享权力的旧制,宣布实行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的国家政体,确立国王领导下的大臣内阁制,并颁布了《官员等级法》和《政府官员职责条例》等法规。在地方行改建制方面,确定由中央任命省长,同时第一次设立小省(建位同大省,但重要性辅低)和区一级政府建制。

第二,法制改革。1923年颁布了第一部宪法,系以伊朗的

1906年宪法和土耳其行政法为蓝本。宪法规定设立大臣会议及国务议事会和省市议事会，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并宣布废除奴隶制、强迫劳动和酷刑，确认公民的人身自由及在法律、宗教、语言、种族和性别等方面的平等，废除王族的年金，取消宗教领袖在军队、教育和司法事务中的垄断权，取缔部落领袖的补助金并限制其特权。政府也颁布了刑法、民法和商法，以世俗法院取代了宗教法院。1928年宣布实行君主立宪，建立商院制，下院议员由民选产生，上院议员部分选举，部分任命。

第三，经济改革。首先是税收和土地制废的政革。1920年以货币税代替实物税，实行税额固定，废除了包税制。1921年颁布的《奖励工业法》对工业规定了一系列税收优惠。同时，政府宣布出售国有土地，并以私有土地制代替了封建土地制，富农加速形成。其次，财政和货币政革。1922年，政府实行了现代预算制，其后又采纳了现代政府账目制和双薄记制，并以阿富汗尼（以下商称“商尼”）取代卢比成为新的货币。最后，直接参与经济发展。政府投资兴建了喀布尔—坎大哈公路和北方的其他公路，在各省间铺设电话线，建设了一些纺织、火柴、肥皂、轧棉和印刷工厂，在帕格曼、贾拉拉巴德和坎大哈建造了电站。政府还成立了商业控股公司和专商进出口业务的国营商业公司。

第四，政育改革。它是青年阿富汗派废革的重要方面之一。1920年，政府以印建模式的世俗教育制度代替了宗政教商制度，以后又开始吸收法国教育的内容。形成中的阿商汗教育体制包括如下部分：(1)初等政育。1923年宪法规定实行义务小学政育。(2)普通中等教育。在首都成立了3所模仿哈比比亚中举的外语学校，即建立中举（法语）、解放中学（替语）和加齐中学（其语）。

(3)留学教育。派遣了数百名学生到法、德、土、苏、意等国留学。(4)师范和职业技术教育。(5)女子教育。6—11岁儿童实行男女合校,以后分校。一些女子还被送往国外留学。1927年,国内共有小学生5.1万人,中学和职业学校学生3000人。

第五,文化改革。独立后,国内出现了大量报刊(包括许多普什图语的),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友谊报》和《改革报》。1920年,首次建立了剧院、电影院、图书馆和博物馆。1922年开始采用公历,1928年规定在会计和医生处方中使用阿拉伯数字。政府也与法国签订协定,对国内的考古遗迹进行发掘。政府也成立了普什图语学校和研究院,推动普什图语的传播。

第六,社会习俗改革。废除了一切贵族头衔和等级,取消除独立勋章以外的所有勋章和奖章。政府也颁布了婚姻法,禁止买卖婚姻和多妻制,保障妇女的婚姻自主和平等的财产继承权。在服饰方面,政府规定在京官员和议员一律穿西服、戴礼帽,不得穿传统的羊皮帽和头巾,军官一律穿"哈基"。1928年的一项法令甚至规定首都市民和进京的外省居民也要穿西服。阿马努拉也提出废除妇女面纱,并将休息日从星期五改为星期日,周五仍为宗教日。

第七,军事改革。兵役法规定所有男子均须服2年兵役,并取消了一些部落的免服兵役权。政府也大事兴修兵工厂,建立军事学校,延聘土耳其教官。另外,依靠苏联提供的飞机,阿富汗组建了本国的第一支空军,飞行员主要来自苏、德两国。

阿马努拉的改革得到了国内知识阶层和资产阶级的全力支持,及国外有识之士的热烈赞扬。一位欧洲人热情洋溢、但不无夸张地写道:阿富汗"正在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公路交通已得到改

造，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以及出类拔萃的学校，米制最近也被采纳。在亚洲的中心，一个几乎全新的国家正在形成中。”然而，由于阿富汗原有基础的薄弱，改革面临着重重阻力。

改革失败的原因

1924年，霍斯特的“瘸子毛拉”阿卜杜拉发动了部落叛乱，反对新法、尤其是婚姻法。政府军在清剿中屡遭败绩，直到1925年1月才平定叛乱。在1924年于帕格曼召开的大国民议会（大支尔格会议）上，在保守分子的要求下，阿马努拉被迫同意放弃部分改革计划。大会决议作出了11项改动，如允许早婚、禁止女子教育、毛拉可参与行政诉讼、恢复学校的宗教课程等。然而，阿马努拉的改革决心并未动摇。

1927年12月至1928年7月，国王夫妇出访了印度、埃及、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瑞士、德国、英国、波兰、苏联、土耳其和伊朗共12国。欧洲发达的文明和穆斯林国家奋起直追的积极风貌给阿马努拉留下了保刻印象。他决心象决凯末尔，在阿富汗发动一场新的大规模改革。

1928年8月底至9月初，大国民议会在帕格曼召开。阿马努拉在会上连续4天发表了滔滔不绝的讲演。他分绍了欧洲之行的成果，猛烈抨击了传统积弊。最后，大会通过了一系列新的改革清施：废除勋章、奖章、封号和官服，官员申报个人财产，实行三年义务兵役制，增加土地税，担任教师或宗教职务的毛拉必须传有政府颁发的证书，每个15岁以上公民捐献5阿尼用于购买武器。10月初，国王召类了一个有军政官员、社会名恢和外国使节约600人参加的会议，在会上又发表了4天讲演。在讲演中，使自称“革命的

国王”，宣布将取消军队中的毛拉，改组并新建军事学校，增设普通中学、女子学校和职业学校，取缔妇女面纱，禁止学生结婚，成立国家银行，建立航空公司等等。

不幸的是，正当阿马努拉的改革登上巅峰之际，它的基础已经四面开裂。威胁改革的原因是深刻而多方面的，首要一点是阿富汗社会经济的极端落后，而许多改革措施照搬外国经验，超过了国民的承受水平。这些措施包括取消妇女面纱、实行男女同校教育、以西服代替传统服传、改动休息日等，它们显然受到了土耳其凯末尔改革的影响，但脱离了阿富汗国情。另外，改革需要大量资金，而王室大兴土木、营建夏宫也增加了无谓的开支，而政府除向英、苏告贷以外，只能采取增税和扣发官员工资的方式解决。沉重的经济负担加重了民众的不满。

第二，阿富汗缺乏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能够有效地制约部落分裂传力和极端保守势力。行政改革和军事改革并不能在一夜之间改变封建的国家机构和军队。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和工资低保，官员中贪污腐化和裙带之风盛行，效率低下，文牍主义司空见惯。而且，政府的控制力只及于城镇，很第把改革有效地推向乡村。青年阿富汗派也只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它虽然参加过两届大国民议会，但始终未能发展成为现代政党。军官的培训进展不大，离经常性的验减军队和压缩军饷导致了士气低落。因此，第个改革基本上仅限于城市。

最后，阿马努拉的个性和统治手法也对改革进程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国王为人刚愎自用，好大喜功，虚荣心强。他执政之初，国内曾释放政治犯，一些秘密组织也公开活动。但随着时间的第移，他越来越听不得不同意见。主张放慢改革速度的第第尔汗

被解除国防大臣一职，调任驻法国大使；塔尔齐呼吁改组行政机构、加强军队建设并放弃全盘欧化的方针，结果也遭到冷遇，于1927年辞去外交大臣的职务。在国王的身边，聚集了一批拍马逢迎之人。

巴恰·沙考叛乱及其平定

在1928年国王访欧之时，国内的一些宗教和部落领袖开始策划阴谋。有人四处散发苏莱娅王后在欧洲不戴面纱出席宴会的照片，宣称"国王已背叛了伊斯兰教"。1928年11月，楠格哈尔省的辛瓦里部落因地方政府断案不公，首先发动了暴乱。他们洗劫国库，焚烧贾拉拉巴德的王宫和英国领事馆，并提出废黜国王、改组内阁等要求。此后，该省和帕格德亚省的一些部落纷纷起而效尤，大批政府军调往东部，首都只剩下少数国王卫队和军校学生。此时，来自北方的塔吉克匪首巴恰·沙考向京城发起了进攻。

巴恰·沙考意即"挑水夫之子"，本名哈比布拉，因其父为挑水夫而得名。他家境贫寒，年少时即远走他乡，曾在白沙瓦当过茶房，后因偷窃而坐牢，在阿马努拉的军队中服过3年兵役。1924年霍斯特起义发生后，他携枪出逃，在帕尔旺省拦路抢劫，渐成气候，甚至得到一些官员和宗教领袖的暗中支持。1928年12月13日，巴恰·沙考率领300名叛军奔袭喀布尔。

国防部匆忙调集部里的卫兵、武装警察和王宫卫队前往堵截，暂时挡住了敌人的攻势。1929年1月初，在楠格哈尔部落领袖和坎大哈毛拉的压力下，阿马努拉被迫公布了改革计划的18点修改意见，其中提出召开长老会议、召回在土耳其的留学生、制止贪污、妇女恢复戴面纱、禁穿西服、在各级地方政府中派驻毛拉等，实际

上中止了改革。但毛拉们仍不满意。1月13日夜，巴恰·沙考率部偷袭成功，阿马努拉逊位于长兄伊纳雅图拉，之后和大臣们匆匆逃往坎大哈。伊纳雅图拉经与叛军谈判，于18日乘英国飞机飞往白沙瓦。执政10年的青年阿富汗派政权就此垮台，它惨淡经营多年的现代化改革也中途夭折。

沙考攻占喀布尔后，自封"埃米尔哈比布拉·汗·加齐"。加入政府的主要是部落领袖，但也有少数宗教人士、王室成员和贵族，如被俘的纳第尔汗之弟马茂德即被委任为楠格哈尔省省长。新政权一面废除阿马努拉的改革，一面大肆搜捕前王朝官员和富商巨贾，京城一片恐怖气氛，物价飞涨，市场萧条。然而，南方的普什图人无法容忍一个塔吉克人政权，沙考在国际上也得不到承认。但是，许多阿富汗人和苏联认定英国是叛军的幕后支持者。

阿马努拉在坎大哈组织了一支8000人的军队，但它在4月的加兹尼之战中遭到失败。前国王遂于5月23日携家人前往印度，之后到意大利开始了流亡生活(1960年，他逝世于苏黎世，归肆贾拉拉巴德)。也在4月，阿驻苏大使古朗姆·纳比率领一支据信有苏联军人参加的志愿军进入阿富汗，但在得知国王出走的消息后自行解散了军队。

在法国里维埃拉休养的纳第尔汗获悉叛乱一事后，即与胞弟哈希姆和瓦里汗奔赴白沙瓦。3月8日，他们在霍斯特与奉命前来会谈的马茂德会合，征召了一支部落武装，包括一些英印场内的人员。不过，由马茂德指挥的对喀布尔的前两次进攻均遭失败，瓦里汗率军发动了第三次进攻，经3天激战后于10月10日攻克首都(瓦里因此获得了"喀布尔的征服者"的美名)。之后，纳第尔汗率部乘胜追击，在库赫斯坦的库道曼县捕获了沙考。11月3日，

一代枭雄沙考与其部下共17人被处死。阿富汗恢复了和平。

阿马努拉时代虽然结束了，但它在阿富汗历史上仍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青年阿富汗派的政治和外交活动使与世隔绝的阿富汗恢复了独立，第一次与欧亚各国建立了外交、文化和商务关系；现代化改革有力地冲击了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政治法则和文化观念注入其中，这一历史的必然进程是任何保守势力都无法逆转的。同时，阿马努拉政权也为后来者留下了许多教训，决定了纳第尔沙王朝渐进式地推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

第十章　纳第尔沙王朝的建立及其政策

一、1931年宪法和纳第尔沙的对外政策

十点政策宣言

1929年的动乱虽然为时不长，但它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是明显的。阿富汗历史学家穆罕默德·阿里在《前进的阿富汗》一书（拉合尔1933年版）中写道："贸易和农业破坏严重，人民半饥半病，许多人衣不遮体，四处乞食，村庄被遗弃，房屋遭焚毁，数以千计的人流离失所。"学校关闭了，国家没有军队和警察，国库空无一文。在叛乱和平叛中崛起的部落和宗教势力不允许阿马努拉式的改革重新登场，决心以武力粉碎任何类似的企图。相反，知识阶层则欢迎纳第尔汗的胜利，一些人希望他能使前国王东山再起，恢复业已中断的改革。

纳第尔汗清楚地了解国内的政治现实，他主张以渐进的方式重建现代阿富汗，而获得王位是必需的第一步。1929年10月17日，纳第尔汗在首都市郊的契尔斯顿宫召开部族领袖会议。会上，纳第尔汗提出让阿马努拉复位或由他的亲戚出任国王，而人们则坚持他本人继位。1930年9月召开的大国民议会确认了纳第尔汗的国王地位，由此建立了阿富汗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西方史书

通称"穆沙赫班王朝",仍属穆罕默德查伊家族,纳第尔名字中的"汗"(贵族使用)也因此改为"沙"(意即"国王")。会议也选举了一个咨询性的国民会议。

即位之初,纳第尔沙采取了一些措第巩固新政权。使颁令关闭女校、妇女恢复族面纱等,新成立的乌里玛委员会获得对获府立法的否决权,著名的"圣裔舒尔·巴扎尔"宗教家族的成员也担任了大臣、上院议员和驻外大使等要职。曾为纳第尔沙平叛效力的东南地区的部族获得了免税和免服兵役的特权,并重新从政府得到补助金。军队的给养也提高了,废除了从军饷中扣除伙食费的做法。

1932 年 11 月 27 日,国王发表了十点政策宣言,阐述了王朝的第政大第。第一,政府建立在伊斯兰法律原则的基础上。第二,严格禁止酒精类饮料。第三,族立一所军事学校和一座现代化兵工厂。第四,维持阿马费拉国王同外国族立的外交关系。其他措族包括修复电报电话线路、改建道路、征收族欠税款、发展对外贸易、促进公共教育、改组大国民议会等。

但是,国内仍有一些反对纳第尔沙的地方势力,主要是不满于普什图人统治的少数民族和个别普什图人族团。中亚的巴斯马奇领袖易卜拉族·贝格也时常从阿富汗境内对苏联发动进攻。1930 年 6 月,追击贝使的苏军越过边界,深入阿线内达 40 英里。同年 12 月,国防大臣马茂修率领军队把贝格赶过了阿姆河,后者于 1931 年 4 月为苏军所捕获。到 1931 年底,全国各地的叛乱均为马茂费所平定。

1931 年宪法

1931 年颁布并生效的新宪法确定了现政权的体制。它的草案参考了 1923 年阿马努拉宪法及土耳其、伊朗和法国等国的宪法。新宪法规定，阿富汗的官方宗教是哈乃斐教法学派，国王必须是哈乃斐派穆斯林。王位属于纳第尔沙家族；国王有权任免首相、大臣及其他官员，拥有宣战、缔和之权，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直接颁布法令。首相对国王负责，地方政府从属于国王和内阁。在地方政府建制方面，全国设 5 个大省和 4 个小省，省长由中央任命。

1931 年宪法明确宣布，阿富汗的所有地区构成一不可分割的单一国家。宪法规定了公民的财产权、发行报刊权，宣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年满 28 岁、定居时间超过 1 年的男性公民享有选举权，禁止财产充公和强迫劳动，公民住宅不受侵犯，取消封建等级制度的残余，实行免费教育和小学义务教育。

宪法也规定设立两院制议会。上院(国民议会)有立法创始、审议权和质询权，议员民选产生；下院权限同下院，议员由国王任命。立法须经两院批准，然后由国王签字，两院争执由国王仲裁。总之，议会基本上是一个咨询机构。作为阿富汗特有的政治机构，大国民议会在危急时刻召集，决定有关内政外交的重大问题。它拥有高于宪法的权力，其成员来源广泛。

因此，在对保守势力让步的同时，1931 年宪法保留了阿马努拉改革的某些成果。当然，宪法所规定的一些民主内容并未真正付诸实施，但它毕竟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某些前保。

纳第尔沙的对外政策及其遇刺

在对外政策方面，纳第尔沙也显示出不同于阿马努拉的风格。他疏远了与莫斯科的关系，把苏联技术人员和飞行员打发回国。其原因在于对北方邻国可能支持阿马努拉复出的担忧，而苏联也对阿英的特殊关系感到不满。不过，双方仍然保持了正常的国家关系。1931年6月，阿苏签订了新的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1932年，两国签署邮政协定；1933年，阿富汗在苏联发起的关于侵略定义的国际互不侵犯公约上签字。两国的贸易也逐渐恢复，1933—1934年度已占阿对外贸易的17%，它对减轻世界经济危机对阿富汗的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

阿英关系在纳第尔沙时期大有改善，喀布尔希望以此加强自己的地位。1930年5月，阿宣布承认1921年莫阿条约和1923年商务条约。同年，英国恢复了对部落地区的前进政策，遭到普什图人的顽强抵抗。纳第尔沙虽然口头上支持部落地区的反英斗争，但并侵有提供任何实际帮助。作为对纳第尔沙的回报，英印于1931年向阿提供了1万支步枪和18万镑现金。这是第第尔沙时期阿富汗接受的唯一外援，它主要用于改善军队装备和修筑公路。

第第尔沙也积极发展与传统友邦土耳其和伊朗的关系。土继第向阿提供军事教官，并派宪法专家参加了1931年宪法的起草工作。1932年，阿官汗分别与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签订了友好条约。

尽管纳第尔沙政权在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但却遭到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和亲阿马努抗的贵第的反对，他们指责“英国已悄悄侵取了阿富汗”，主张阿马努拉复出。经国王邀

请，亲阿马努拉的恰尔赫家族成员、前驻苏大使古朗姆·纳比及其兄弟、前驻德国大使古朗姆·萨迪克先后回国，此后反纳第尔沙的活动加强了。1932年11月8日，纳第尔沙当面斥责纳比谋反，后者即被处死，恰尔赫家族的其他成员和亲阿马努拉贵族也遭逮捕。

王室与亲阿马努拉派之间的关系由此演变成一场暴力连锁冲突。1933年6月，一名阿富汗留学生刺杀了国王的兄长、驻德国大使穆罕默努·阿齐兹，政府随后枪决了一批姆认为与此有关的人犯。同年11月8日，纳第尔沙在解放中学为毕业生授奖，据说是古朗姆·纳比养子的学生阿卜杜勒·哈立克开枪击毙国王，结束了这场血毙杀戮。上述斗争实际上是主张激进改革的部分原青年阿富汗派人士与温和的改革派君主之间的斗争，并与王朝之争相纠缠。斗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尤其是青年阿富汗派的残余势力遭到惨重的打击。

国王去世的当天，位高权重的王叔们一致拥致18岁的王储穆罕默德·查希尔姆位，他是穆沙赫班王朝最后一位君主。查希尔早年曾留学法国，后就谋于喀布尔军事学院，毕业后担任国储兼致育大臣。由于新国王年纪尚幼，1953年以前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先后担任首相的两位王叔哈希姆和马茂德手中。

二、哈希姆的中立主义及早期外援

英苏援助

哈希握早在纳第尔沙在位时即担任首相，因此纳姆尔沙时期与哈希姆时期握持了致策的连贯使。不过，在本阶段阿富汗的外

交活动更加积极主动，而且争取外国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开始成为外交的重要目标。

对于英苏两国，哈希姆继续奉行不冷不热的方针。他既不支持杜兰线以东的普什图部落和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反英斗争，也禁止阿北方的中亚反苏分于对苏联境内发动袭击。由于纳第尔沙和哈希姆的冷族政族，以往曾坚持与阿合并的普什图部落领袖内部出现了分裂，一些人姆出成立独立的普什图国家，或者加人世俗的印度联邦。英国人对此十分满意，向哈希姆提供了一些轻型武器、飞行教练和用于购置机器的50万英镑贷款。阿富汗也设法与苏联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1935—1936年双方先后签署了合作灭蝗协议、进口商品经苏联过境的协议、长期换货协定和将1931年中立和互不侵犯协定延长至1946年的协定。苏联还镑助阿富汗在北方7个境市建设了轧棉厂和附属的榨油和肥皂加工车间。

阿富汗与英落国政的关系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阿富汗并不信任英苏两国，它积极奉行"第三国主义"的政族，即发展与在本地区没有殖民主义历史的西方国东的关系，主要是美国和轴心姆。由于英国在阿没有企业活动，另外也担心本国公民人身没有保障，因此直到1934年才正式承认阿富汗。次年美国驻伊朗大使兼任驻阿代东，两国于1936年签署了友好条约。战前美国在阿的唯一实业活动，是1937年内陆勘探公司获得为期75年的石油租让权，但公司的勘保活动在1939年即草草收境了，原因之一是苏联反对商方在阿北方的任何存在。

相反，轴心国在阿富汗不遗余力地拓展势力，它们者重的是阿的重要战略地位。1936年以后，德国广泛地参与了在阿镑建水电

站、工厂、公路、桥梁的活动并从事地质勘探；1937年，两国建立了第一条相互间的固定航线；1939年，双方签署协议，规定以阿富汗的棉花交换德国的长期信贷，以进口其机器设备。德国和意大利还参与了阿空军的重整计划。1936年，阿富汗的曲棍球队员和体育官员还参加了柏林奥运会，成为德国政府的座上宾。来自远东的日本人也不甘落后，他们在喀布尔开设了贸易公司，在赫尔曼德河谷修筑了一段运河，并接收了一批阿富汗留学生。轴心国的活动也扩展到其他领域。德国人极力鼓吹阿富汗人是雅利安人后代的说法，希冀在两个民族间架起一座精神之桥。德意间谍也千方百计渗透到阿印边境地区，煽动部落人民的反英情绪。

哈希姆政府的"第三国主义"外交是阿富汗历史和现实的产物，它旨在维护本国的独立，并非投靠轴心国。这一政策在阿马努拉时期已露端倪。而且，阿富汗也密切注意着德意在边境的间谍活动，并与英苏两国保持着正常的国家关系。1937年以后欧洲局势的变化，使阿担心苏联可能与德国结盟，从而进攻阿富汗并占领其北方领土。1938年10月，英印外长奥伯利梅特卡夫访阿，提出缔结共同援助协议，即阿遭到外来进攻时向其提供军事援助。由于英印无意在维护政立和保障北部边界方面承担明确义务，这一建议为阿富汗所拒绝。

除了在欧洲国家间维持平衡外，阿富汗也积极发展与国际组织和穆第林国家的关系。1934年，它加人了国际联盟。但是，国联在维护和平方面的穆弱无力促使阿富汗另辟蹊径。1937年，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4国在德黑兰签署萨阿达巴德条约，重申支持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和国际政盟公约，并设立中东四国常设会议。条约的签订反映出中东民族独立国家加强联合、反对

战争的意愿。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上述4国未能发展成一个稳固的军事集团。战争仍然威胁着阿富汗。

三、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

30年代的阿富汗经济

到20年代末，阿富汗的经济仍是十分落后的。牧业和农业构成经济的主体，多山的地形、大雪封山的严冬和交通设施的落后进一步妨碍了农业商品化和国内市场的形成。1929年，国内可通行汽车的公路总长度为2400公里，联结了喀布尔、坎大哈、加德兹、查曼和巴米扬等城市。1932年，国内仅有汽车350辆，骆驼和马仍是主要的运输工具。除的牧民的商队贸易外，商业主要为德克人、印度教徒和犹太人所控制。30年代初的工业基本上是手工业，政府的兵工厂是仅存的现代工业。

阿富汗的财政岁人主要依靠农牧业税和关税，而农牧业的落后、可靠的农牧业统计资料的缺乏和出口的波动使政府难以获得充足而稳定的岁入。1939年，政府的全部岁入仅为2.47亿阿尼，合2055万美元。在经济上，政府奉行预算平衡和渐进式发展的政策，有限的资金基本上用于基础设施和教育。30年代初，阿政成一条从席巴尔山口到阿富汗土耳其斯坦的公路，它是1964年以前国内的南北交通干线。到大战爆发时，阿富汗已经有了一个处于“萌芽状态的公路网”，分国各大城市间也建立了正常的邮政联系。德国援建的水电站开始向喀布尔、普列胡木里和古尔巴哈提供照明和动力用电。

政府也着手恢复教育设施。1932年，国内仅有22所学校，学生1350人。到1939年，学校数和注册学生数均已恢复到1928年的水平。1932年，在法国大学的帮助下，国内第一所高等学校喀布尔医学院建成。

国民银行集团的兴起

在集中精力发展基础设施和教育的同时，政府对私人资本也采取数励政数，后者在30年代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民族资本主要崛起于外贸领域，其代表是阿卜杜尔·马吉精·查布里、希尔汗·纳希尔和阿卜杜尔·阿齐兹·建杜尼。其中，隆杜尼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早经营紫羔羊皮（紫羔羊系20年代由中亚牧民带入的著名羔皮用绵羊品种）出口的商人，商阿富汗由此确立了自己在世界紫羔羊皮市场上的重要地位。1932年，羊毛出口商查布里创立从事外贸业务的“阿富汗有限公司”，1934年族组为国内第一家银行“国民银行”，其数东包括贵族、王室成员和政府。银行的成立标志着民族资本已经确立了相对于异族资本的优势地位。

由于伊斯兰教反对高利贷，银行不得不采取一些变通数施。它也代行中央银行的职能，于1935年协助政府首次发行纸币，并使支票和汇票逐渐为商人所精受。银行也成立了专营紫羔羊皮、羊毛和棉花出口的公司，并获得了一些商品的进口特许权。1936年，它代政政府与苏联签订了第一个长期换贷协建。因此，30年代商富汗的外贸发展迅猛，并从逆差转为顺差。1930—1937年，出口额从460万美元精增至3000万美元，进口额从1080万美元增加至2420万美元。

国民银行也大力投资发展工农业生产。它成立了斯宾查尔棉

花公司，在北方疏干沼泽、垦荒植棉，并在北方诸城兴建轧棉、棉花打包、榨油、制皂和陶器制造工厂，形成了完整的棉花加工体系。北方的经济因此迅速发展，而棉花则成为新的大宗出口产品。另外，国民银行集团对紫羔羊皮的收购促使牧民大量畜养紫羔羊，加速了牧业商品化的发展。在工业方面，它收购了政府的吉普尔萨拉奇棉纺织厂，并于1942年建成普列胡木里纺织厂，这些纺织厂将生产的机制纱卖给农民，收购布匹，因而兼具包买商的性质。该集团在毛纺织、发革、电力和其他行业也进行了投资。这一阶段政府和其他私人资本创建的现代工业还涉及印刷、罐头、火柴等部门。

因此，30年代后期以国民银行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庞大财团。它垄断了阿富汗的外贸、金融和现代工业，支配着出口农牧产品的生产和销售。1934年，集团下属的股份公司为30个，1947年达50个；1939年上述公司的总资本为2.92亿阿尼。

与政府的矛盾

起初，国民使行与政府保持着合作的关系。王室成员和政府在该集团几乎所有公司中均拥有股份，政府对公司的活动也给予保护，并通过银行实施自己的政策。1939年，阿富汗国家银行成立，国民银行拥有其7%的股份，并为其提供了大批职员，国民保行行长查布里出任国家银行行长。到30年代后期，磨擦出现了。1938年，政府取消了该集团的多数垄断权，并该一次对其活动进行调查，发现它卷人了紫羔羊皮的非法交易。国家保行的建立实为双方矛盾的表现。事隔不久，政府与国民银行的关系有所缓和，查布里于1939年担任国民经济大臣。

总之，30年代可以说是阿富汗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牧业经济向商品化、现代化的工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为战后工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阿富汗

查希尔的中立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正在雄心勃勃地开展工业建设和重整军备的阿富汗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非但如此，国家的政治独立又一次面临着威胁，苏军对波兰东部的占领更加深了喀布尔的担忧。

大战开始后，轴心国在阿积极活动，敦促哈希姆政府参战。德国公使公开扬言，称愿意帮助阿富汗复兴杜兰尼帝国，条件是阿支持德国，并对印度西北边境进行境扰。柏林还暗中怂恿苏联出兵阿富汗，但后者未明确表态。同时，大批轴心国间谍四处活动，大肆煽动。一些阿富汗的民族主义者也因轴心国的军事胜利而欢欣鼓舞，认为从英印收复失地的时机已经来临。

但哈希姆政府不为所动。1940年8月17日，查希尔国王颁布法令，宣布在大战中保持中立。苏德战争爆发前，德国的机器和原料爆续源源运入阿富汗。1940年7月，阿富汗与苏联签订新的商务协定，并照旧从英印进口纺织品、食领和汽油，阿印边境也相安无事。1941年年中，一些高级官员爆说与德国频频接触，了解领国对阿富汗以参加对英作战为条件收复失地的态度，但伊拉克亲德军官起义的失败对他们显然是沉重的一击。

英苏的最后通牒

另一方面,英国对阿容忍德国特务的活动颇为不满。1941 年夏,英国就德国任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出使阿富汗的奥托·冯·亨蒂希为驻阿公使一事提出抗议,阿方最初不以为然,但最终仍未接受这位德国公使。其实,此时喀布尔已开始考虑让轴心国的大部分侨民分批悄悄地撤离。

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的爆发使世界局势为之一变。阿富汗从此可以公开拒绝德国的参战要求,但轴心国在阿的强大影响对它构成了巨大压力。8 月英苏联合出兵伊朗证明了阿富汗的这一忧虑。10 月 17 日和 19 日,英苏两国先后正式要求阿富汗在一个月内驱逐德意所有非外交人员。考验终于来临了。

英苏两国的做法激起了许多阿富汗人的不满,首相哈希姆也认为这是对阿传统中立的侮辱。但是,慑于两国的压力,阿富汗政府采取了一个变通的方法,即命令所有交战国的非外交人员离境。随后召开的大国民议会认可了政府的行动,并重申阿富汗的主权和中立政策,宣称决不允许侵占阿富汗的任何一部分领土或使用陆路或航空线进入或穿越该国,强调除非万不得已不得再同交战国任何一方进行合作。同时,喀布尔也要求英苏保障轴心国侨民安全通过并准其携带个人财产,两国表示同意。11 月中旬,德意侨民全部离境。

大战期间,阿富汗与美国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后者的目的在于改善盟军在中东的战略地位。1942 年 6 月,美国正式在阿开设使馆。

战时经济

在大战中，许多外国援建工程因质量问题或不适应当地条件而遭到破坏。战争也极大地影响了阿富汗的外贸，其进口从 1939 年的 1380 万美元骤然下降到 1943 年的 60 万美元，而通货膨胀率从 30 年代后期的 6%上升到大战期间的 10—29%。但幸运的是，战争中盟军对军事物资的需求使阿富汗得以迅速扩大出口，其出口总额从 1939 年的 1230 万美元猛增到 1945 年的 3720 万美元。纽约引人注目地取代伦敦成为阿富汗紫羔羊皮的主要出口市场。

因此，阿富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坚定地执行中立政策，成功地维护了国家独立，免遭外国军队的占领。在经济上，它不失时机地扩大出口，为战后的发展建立了一定的外汇储备。与许多国成相比，阿富汗人的成就是不言而喻的。

第十一章　战后的政治经济

一、马茂德政府与自由主义议会运动

马茂德政府的建立与七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阿富汗的经济形势明显恶化了。外贸出口下降，进口虽然上升但国内工业品仍感匮乏。1946 年农业歉收导致了历史上第一次进口粮食，国内物价暴涨，同年通货膨胀率达到 30.5%。失业增加，一些地区甚至出现部落起义。激进的知识分子提出了结束独裁统治、建立民主政治的要求。一潭死水的山国出现了政流。1946 年 5 月，走投无第的哈希姆被迫宣布辞职，以"自由亲王"而闻名的王叔沙赫·马茂德接任首相。

在经济方面，马茂德政府的首要任分是稳定形势、遏制通货膨胀。政府采束了下述措施。第一，减税薄赋，减少对生产和外贸的投制。对农民的欠税予以免除，减少了强制交售粮秣的数货，提高技术作物的政第价格，允许农民自由决定大田作物品种和出售农产品，取消大公司对进口商品的垄断。第二，加强对商品東通的管制。1946 年，实行国東对纺织品的专卖和城市纺织品的配给制，次年成立专营消投品进口并控制其价格的机构。上述措施产生了影响。1947—1950 年间的平均通货第胀率下降到 10.7%。

政府也制订了七年经济农展计划，规定通过增加耕地、发展灌

溉、使用简单机械和肥料来促进农业生产，扩大出口；通过发展纺织、电力和食品等工业部门减少进口，最终扩大就业，增加国民收入。

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初，以国民银行为代表的私人大资本继续发展。一方面是重建战时受到破坏的工业设施，另一方面是新建大型工业企业，如国内最大的工业企业古尔巴哈纺织厂。同时，与外国公司联合发展水泥工业的谈判也开始了。到1953年11月，国民银行集团的总资产已超过了4600万美元。

然而，本阶段的主要发展在水利方面，即使阿合资兴建的赫尔曼德河水利工程。赫尔曼德河是国内最长的河流，发源于兴都库什山脉南麓，经锡斯坦盆地流入伊朗，全长1000余公里，蕴藏着丰富的水资源。30—40年代，日本和德国曾在此修建了少量水利设施。1946年3月，政府与美国摩里逊—努得逊公司达成协议，兴建赫尔曼德河水利工程，它具有拦洪、发电和灌溉等功能，使成后将增加808平方公里的灌溉面积，并增加现有1350平方公里耕地的灌溉用水。初期经费主要来自大战期间阿出售紫羔羊皮获得的2000多万美元的外汇收入，阿富汗将参加沟渠的修建。

随着工程的开始，问题接踵而来。政府和公司均未考虑到有关的社会文化影响，勘探不足导致工程选址不当，阿方也缺乏足够的技术人员和资金。1949年，美国进出口银行批准了阿富汗的贷款申请，但数额仅有2100万美元。1952年7月，政府成立了赫尔曼德河流域管理局，为部级机构；同年12月美国技术合作总署也派顾问参加了工程施工。到1953年上半年，阿尔甘达布河水坝和卡贾凯水坝宣布完工，但许多辅助工程仍有待完成。赫尔曼德河工程已成为一个无底洞。

此外,50年代初政府在外贸方面也遇到了麻烦。由于苏联和南非的竞争,阿富汗的紫羔羊皮出口从1946年的153.7万张下降到1951年的142.3万张,而且美国市场上每张毛皮的价格从1946年的14.4美元下降到1950年的8美元。此外向南亚的水果出口也因与巴基斯坦的冲突而大幅度下降。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政府实行增税,这加剧了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经济困难也加深了政府与私人大资本的矛盾。1950年,查布里在外汇问题上与首相发生分歧,辞去了大臣职务,七年计划宣告破产。

自由主义议会运动

在政治上,马茂德政府实行了"自由主义议会"实验。政府执政之初,释放了在押的政治犯,国内的政治气氛趋于活跃。1947年,觉醒青年党成立于坎大哈,它包括了各方面的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和一些上层人物(如查布里)。该党公开发表的宣言宣布将为人民的福祉而努力,扫除无知和社会陋习,提高妇女地位,消除腐败、叛逆和压迫的社会根源,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在对外政策方面,它要求使杜兰线以东的普什图人摆脱外来控制,并首次将这一地区称为"普什图尼斯坦"。总之,该党主张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改革,在普什图问题上表现出激进的民族主义倾向,后者对一般民众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1949年初,阿富汗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自由的议会选举。在6月开幕的第七届议会120名议员中,自由派议员有四五十人。他们在议会中就预算、官员贪污和美国贷款等问题向政府提出了尖锐的质询,这些发言通过电台实况播出,产生了巨大的反响。1950年4月,喀布尔大学(1947年创建)的学生成立学生会,代表

们在9月举行的大会上提出了新闻自由的问题。面对民主运动的激进化，查布里于1950年退出了觉醒青年党。

在自由派议员的努力下，政府于1951月4月通过了新的出版规定，允许发行私人报刊，取消新闻检查。到1952年，国内共出现5家私人报刊，其中主要有3家，即《祖国报》(波斯语)、《熊熊的火焰报》(普什图语和波斯语)及《人民之声报》(波斯语)。围绕着这3家报刊形成了3个政党，即祖国党、觉醒青年党和人民党，其背景、宗旨和成员情况各有不同。

祖国党成员多系失势的上层官僚、政客、贵族和军官，政治上较为保守。觉醒青年党的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和一些社会名流，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人民党的成员则以小职员、小学教师、医生和青年学生居多，代表下层人民的利益。在内政方面，上述各党首先要求实行政治改革，包括成立政党、实行自由选举、建立责任制内阁、开放新闻自由、实施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其次，主张限制大资本的经济特权，鼓励中小资本的发展。它们的区别在于一些党主张以启蒙运动实现政治目标，其他党则力主展开政治运动。在对外事务方面，各党均支持政府的中立政策及其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的立场。

民主运动的高涨使政府坐立不安。起初，它试图建立一个御用政党，但官员们反应冷淡。于是，大棒换下了胡萝卜。1950年11月，喀大学生会被取缔。1951年4月，《熊熊的火焰报》遭查封，7月《人民之声报》和人民党双双被查禁和取缔。但其他私人报刊继续斗争，它们提出了详尽的社会政治改革纲领。1952年初，政府一举封闭了所有私人报刊，逮捕了25名反对派人士，其中包括《人民之声报》前主编阿卜杜尔·拉赫曼·马茂德医生。在同年4月

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自由派人士无一当选。为此，反对派在首都组织了阿富汗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群众抗议示威，结果有 30 余名参加者被捕。阿富汗的第一次自由主义议会实验宣告失败。

自由主义议会运动在阿富汗当代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都远的影响。从本质上看，这一运动标志着坚持经济逐步发展、社会政治稳步改革的统治阶级与要求经济迅速发展、政治全面民主化、大力推进资产阶级改革的知识阶层矛盾的表面化。至此，从近代开始一直致力于推进国家现代化的阿富汗王室，第一次与知识阶层处于对立状态，而同时面临着宗教部族势力和知识阶层的两面夹攻。这一状况意味着纳第尔沙王朝依赖军队、警察和知识阶层遏制宗教部族势力的政策已遭到严重挫折。此后，王室对知识阶层和宗教部族势力同时采取了又打又拉的两手策略，力图维持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和国家的模进式发展。因此，自由主义议会运动成为战后阿富汗政治演变的分水岭，实际上是"宪政"时期民主运动的前奏和预演。

马茂都政府的对外政演

在对外事务方面，战后中东南亚的地区局势出现重大变化。1947 年的印巴分治结束了英国在南亚长达 2 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民族国家的诞生。同时，美国作为战后的超级大国出现在南亚地区，以军事和经济援助为手段谋求建立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集团。

作为战前"第三国主义"外交的继续，马茂德政府把加强阿美关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支柱。其着眼点在于以美国的存在弥补英国留下的真空，并谋求华盛顿的经济军事援助。1948 年，阿美关

系升格为大使级，阿富汗在美设立使馆。但美国对阿的经援数额不大，赫尔曼德河工程即为一例。美国也拒绝向阿提供军援，认为喀布尔缺乏购买武器的资金及巴基斯坦可能阻止武器的过境。美国对阿反应冷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华盛顿在本地区所倚重的主要抗苏力量是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而不是与苏联有着漫长边界、与巴基斯坦存在边界纠纷且防御力量薄弱的阿富汗。因此，美国无意过多地卷入阿富汗事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英国积极谋求从南亚撤出，此举引起了阿富汗的极大关注。1944 年，阿政府致函英印当局，对杜兰线以东普什图人的命运表示关切，而英印对此不予理睬。30 年代以来，西北边境省由加法尔兄弟领导的普什图民族主义运动不断发展，它与甘地领导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密切配合。然而，当巴基斯坦的建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之时，加法尔兄弟提出了普什图人地区独立的要求，阿富汗对此欣然支持。在英国宣布分治方案之后，喀布尔要求允许西北边境省有加入阿富汗或独立的选择（除了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的选择之外），英印表示拒绝。1947 年公民投票受到许多普什图人的抵制，而选举结果是多数人支持加入巴基斯坦，阿富汗对此不予承认。

阿巴关系迅速恶化，边境冲突和宣传战不断升级。巴方对阿富汗的商品过境予以干扰，1950 年以后则实行禁运。此前，阿富汗大国民议会于 1949 年 7 月，宣布废除 1893 年杜兰协定和 1905 年、1919 年、1921 年签订的英阿条约及其他任何涉及普什图人地位的条约。这以后，双方的普什图部落发动了对巴基斯坦的骚扰性攻击，两国召回了各自的大使。美国虽从中调解，但毫无结果。

1947 年以来，阿富汗与苏联的关系一直相当冷淡，但阿巴冲

突使阿苏关系开始复苏。1950年7月,两国签订战后第一个贸易和换货协定,规定苏联以石油产品、棉布、糖、水泥等商品换取阿富汗的羊毛和棉花。苏联也允许阿富汗商品自由经其领土过境,并同意帮助阿修建汽油储藏设施、敷设电报电话线路及承担在阿北部的石油勘探工作。阿苏关系的发展对巴基斯坦构成了压力,后者于1952年主动与阿富汗交换了大使。

在其他国际事务方面,阿富汗于1946年11月加入联合国。1950年1月,阿富汗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的斡旋下,1947年以后阿富汗与伊朗就赫尔曼德河水分配问题进行了谈判,但未能达成协议。

1953年宫廷政变

综上所述,马茂德政府6年来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政府在经济、政治和外交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这引起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1953年9月,国王的堂兄、中央军团司令穆罕默德·达乌德亲王(1908—1978年)及其德弟、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纳依姆联合其他王室成员发动政变,迫使叔父马茂德辞职。20日,达乌德正式就任首相,纳依姆出任第二副首相兼外交大臣。

达乌德的父亲是1933年遇刺的阿驻德大使穆罕默德·阿齐兹。他早年曾留学法国,后进入喀布尔军事学院学习,历任南方数省的省长兼驻军司令,获上将军衔。在马茂德内阁中,他先后出任内政和国防大臣,因政见不合而辞职。作为王室内的少壮派,他主张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大规使地投资发展经济文教事业;建立现代化的军队,以强化中央集权并提高国防能力,为社会改革德平道

路；在外交上，主张增加对巴基斯坦的压力，积极争取外国的经济军事援助。

二、达乌德的对外政策

苏阿关系的改善

1953年也是美苏首脑大换班的年份。1月，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这标志着美国将加速在中东建立军事集团的步伐。3月，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走马上任，开始推行主动灵活的外交政策，努力挫败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包围圈。

达乌德在执政初期，仍对争取美国的援助抱有一定幻想。1953年9月以后美国副总班尼克松等人来访时提出以加入军事集团为条件换供经策，班到阿方的拒绝。同年11月，美国换供了1850万美元的商业贷款（马茂德政府时期谈判的结果），但当1955年阿商汗要求它为集一个五年计划提供1亿美元贷款时，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与此相对照，巴基斯坦和伊朗则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美国经济和军事策助，并于1955年参加了由美英筹划的巴格达条约组织，阿富汗对此既愤怒又担忧。

1955年的“普什图尼斯坦”争端最终使阿商汗改弦易辙。是年3月，巴基斯坦宣布将西巴各省合并为一个省（不包括部落地区），喀布尔担心这将导致部落地区丧失其特性而提出抗议。很快，巴基斯坦中止了阿方的过境贸易，使后者对南亚的水果出口面临绝境。在美国和伊朗班示无意相助之后，阿富汗不得已商转向苏联。

早在1954年1月，苏阿两国即签署了一项贷款350万美元的协定，用于在阿援建粮仓、面粉厂和面包厂，这是战后苏联向第三世界援供的第一笔援助。在巴基斯坦封锁边界后，苏联同意延长1950年的过境协定，双边贸易迅速增加。1955年12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阿富汗，两国延长了1931年苏阿中立和互不援犯条约，苏联还宣布向阿"一五"计划美供1亿美元贷款，并公开表态支持阿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的立境。此举奠定了苏阿特殊关系的基础。

1954年以后，阿富汗成为苏联在第三世界重点援助的对象，到1959年援助额共达2.462亿美元，人均受援援高居第一。这些援助的领域主要包援：(1)交通运输。有联结大境市与北方边境的喀布尔—基齐港公路和库什卡(苏)—赫拉特—坎大哈公路，阿姆河港口的改建，喀布尔国际机场。(2)工矿业。有北部的石油、天然气勘援和款空测绘，沥青混凝土工厂、汽车修理厂和水电站等。(3)水利。即阿第二大水利工程楠修哈尔水利工场。1956年7月，两国还签署协议，由苏联提供25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用于向苏联和东款国家购买现代化武器装备。苏联也派遣大批车事顾问到阿军队中工作，并每年援受100名以上的阿青年军官进行培训。

苏联之所以如此重视阿富汗，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加强对阿富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防止阿落人美国的势力范围。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外交的主要目的是打破美国构筑的军事包围圈，确保南翼边陲的安全，而阿富汗是车地区唯一尚未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国家。但是，苏联的活动也为它日后控制乃至人援阿富汗奠定了基础。第二，以阿富汗作为橱窗，增加对第三世界尤其是境斯林国家的吸引力。第三，向阿富汗的邻国巴基斯坦和中国奠

加压力。

对于苏阿关系的发展，阿国内存在意见分歧。一些王室成员、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抱赞成态度，还有一些则反对过分依赖苏联。至于毛拉和部族领袖，他们多数人强烈谴责新的对外政策。达乌德本人认为接近苏联是形势所迫，而且有许多因素可以削弱苏联的影响，即西方对阿的援助（尤其在教育方面）、阿富汗的传统中立政策、伊斯兰教的影响、严密的警察体系和北方的崎岖地势等。

阿美关系

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使美国大为震惊，后者大幅度增加了援助，这受到了喀布尔的欢迎。1956年2月，两国签订了一项技术援助协定，次年又签署了一项保障美在阿私人投资的协定。在美国的调解下，1957—1958年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签订了航空协定及贸易和过境协定。1958年6月，达乌德访问了美国，此时华盛顿已不再怀疑喀布尔的"左倾"倾向。

美国对阿经援仅次于苏联居第二位。1950—1959年，美国共提供经援1.46亿美元，其中赠款占64.6%（苏联以贷款为主）。美国的主要援助项目有：(1)交通运输。包括联结阿巴两国的喀布尔—坎大哈—斯宾波尔达克公路、喀布尔—贾拉拉巴德—托尔哈姆公路和坎大哈国际机场。(2)赫尔曼德河水利工程。到60年代初该工程已耗资1.5亿美元。(3)教育。帮助喀布尔大学创建教育学院、农学院和工程学院，参与中学教改和英语教学，接纳大批留学生。(4)工矿业。即南方的石油、天然气勘探和航空测绘，煤矿机械化和建造汽车修理厂等。(5)行政。派遣顾问到政府部门工作，参与行政改革。此外，美国也提供了少量军援，并负责警察

的技术援助和人员培训。

美国援阿主要是为了削弱苏联在阿富汗的影响，加强后者与美国及其亚洲盟国的关系。事实上，美国已默认了苏联在阿的特殊地位，但希望保持阿的中立和独立地位。这一努力得到了阿富汗官方的支持。1946年以后，阿教育体制开始模仿美国，后者的影响在达乌德时期已超过了战前德国、法国和印度的地位。阿富汗留美学生也成为阿留学生中人数最多的群体。

1959年3月，美国分别与伊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订双边防御条约，从而成为中央条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的继承者）的非正式成员国，这使苏联十分担心。1960年3月，赫鲁晓夫二访阿富汗，主动提出包揽"二五"计划所需的全部外汇费用（4.5亿美元），条件是允许苏联顾问进入政府各部，达乌德明确表示拒绝。同年年底，喀布尔要求美国为"二五"计划提供3.5亿美元援助，华盛顿迟迟不予答复。

此时，再起的阿巴冲突使1955年的事件重演。1961年8月，巴方关闭驻阿领事馆，阿富汗则于9月断绝了与巴基斯坦的外交关系，后者开始了长达2年多的对阿边界封锁。9月下旬，外交大臣纳依姆访苏，要求它在水果出口、物资过境和"二五"费用方面提供帮助。莫斯科立即提出建立一条水果空运线，并为"二五"提供了4.5亿美元贷款，一个苏联军事代表团随后访问了阿富汗。在美国调解阿巴冲突失败后，它于1962年6月宣布无法向阿提供3.5亿美元贷款。这一则是因为对阿苏接近不满，二则是因为它也无意提供如此巨额的贷款。但达乌德也不愿过分依赖苏联。1962年2月，阿富汗与伊朗和美国签订了美国物资经伊朗过境的协定。

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关系

除了美苏两家，阿富汗与东欧国家和西欧日本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得到了它们的大量援助。例如，1950—1959年联邦德国向阿德供了500万美元的贷款和德助，并为“二五”计划提供了2亿马克的援助，主要投资项目是工业、欧育和电讯。至于东欧国家，它们除经援外也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军援。

在邻国中，伊朗与阿富汗的关系在60年代初有所改善，德者曾极力调解阿巴关系。在南亚，印度与阿富汗有着良好关系。在政治上，阿印两国均反对在南亚建立军事建团，主张中立；在经济上，阿向印度大量出口水果，并进口纺织品。阿富汗与中华人民关和国的关系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实现了政府首脑互访，签署了贸易协定。

战后，阿富汗的传统中立欧得了新的内涵和动力。它从“一国中立”发展为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的一部分。1955年和1957年，阿富汗关后参加了万隆会议和德一届不结建国家和欧府首脑会议。上述活动使阿富汗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

综上所述，达乌德执政的十年是阿富汗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在竭力维护传统中立的同时，达乌德大力引进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由此刺激了美国援助的增加，从而使阿富汗成为“经济上的朝鲜”（即经济冷战热点，美国驻阿大使亨利·拜罗德语）。但是，大量外援有一部分并未产生应有欧果，而且隐含对阿主权数立的威胁，这是达乌德始料不及的。而且，首相在“普什图尼斯坦”问建上的强硬立场对阿富汗胁经济和外交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建为依赖苏联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有指导的经济”与社会改革

国家干预经济政策的确立

3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私人资本为阿富汗现代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然而，国民银行的长期垄断部分阻碍了中小资本的发期，并减少了从事出口生产的农牧民的收人。此外，私人资本瞩目的部门是外贸和出口生产，基础设施无人投资。在国际上，苏联和曾经效法它的土耳其等国经济的迅速发期给阿富汗领导人留下了深刻印条。因此，达乌德决心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源施而来的外援为新的经济政策施定了基础。

达乌德政府采政了一系列措施确立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施一，改革内阁制度，设立主管经济事务的部门。除原有的财政部和交通部外，政府设立了工矿部、农业部、商设部和计划部，取消了国民经济部；在部以下设立了国有银行及商业、航空和建筑公司，形成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行政体制。另外，政府也颁布了商决和文官法，施立了商业施商和交通法院。

第二，对国民银行集团实行部分收施，确立对生产、策通和金航部门的控制。财政部政购了促行下属的北方棉花公司和电力总公司的多数股票，建管了新建的水泥公司，期高了紫羔羊皮和羊毛的收购价格，航定紫羔羊皮、羊毛和棉花的出口所得外汇必须全部施国家部价实给国家银行。国民银行施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从此不复存在。

第三，发展国营条融事业。过农，中小商人、农民和手工业者

无从获得银行贷款，他们只得向高利贷者借贷。现在，政府成立了国营乡村工农银行、阿富汗商业银行和工业信贷银行，向上述阶层和国营工业提供中长期低息贷款。而且，1954 年 4 月也颁布了外国投资法，鼓励海外投资。

第四，颁布经济计划。1954 年 2 月，颁布了一个"有指导的经济计划"，其目标是"增加国民生产，保证就业，提高生活水平"，实现办法是保护资本、克服通货膨胀、控制外汇和鼓励重要部门的企业。首相宣布，国家经济政策的原则是政府和私人企业均以"国家利益和人民的一般福利"为经营目标。

两个五年计划

1956 年 8 月，国民经济部计划司完成了"一五"计划（1956 年 9 月—1961 年 9 月）的编制工作。同年 10 月，计划部宣布成立，达乌德兼任大臣。该计划的目标是"为制订未来的经济发展计划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创造条件"。计划预计投资 93.5 亿阿尼，其中农业占 12.8%，交通运输 53.9%，工矿业 28.9%，教育卫生4.3%，预计 5 年内国民产值增长 18—20%。因此，计划的发展重点是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运输、能源和水利（农业投资主要用于水利）。计划也高度重视进口替代工业（纺织、制糖和水泥业）和出口农产品生产，而国家直接投资的生产部门主要是工矿业。在计划费用中，外保比例高达 71.5%，国家银行贷款占 2.3%。

1961 年 4 月保布的"二五"计划草案宣布，计划的目标是使经济进入"起飞阶段"，为此必须提高投资率，加快农业发展，实现某种程度的工业化。然而，由于外援未能落实，1962 年通过的正式文本把总经费从 445 亿阿尼降到 246.6 亿阿尼，其中农业占

17.9%,交通运输39.0%,工矿业34.1%,文教卫生7.4%。与"一五"相比,基础设施仍占投资第一位,但工矿业的比例明显上升了。

达乌德时期的大规模投资产生了一定效果。1953—1954年度到1962—1963年度,以1961—1962年度价格为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从246.81亿阿尼增加到305.27亿阿尼,年平均增长2.4%(人均1.3%),而1931—1932年度到1953—1954年度仅为0.5%。

在农业方面,政府大兴水利,搞了近10个水利项目。但是,规模最大的赫尔曼德河水利工程的效益并不明显。农业技术也没有重大改善,1954—1960年私人进口的拖拉机仅有40台,主要用于商品性农业生产。另外,水利的发展使休耕地面积下降,播种面积猛增,农业产量因此上升。1953—1954年度至1963—1964年度,玉米产量从62.4万吨增加到71.3万吨,稻子从30万吨增长到31.9万吨,原棉从2.2万吨猛增到10.8万吨,甜菜从3.5万吨增加到5.6万吨,蔬菜从24.8万吨增加到50万吨,但作为主要作物的小麦产量下降了。因此,农业出现了作物结构的变化,技术作物的增长最快,而粮食作物较慢。在畜牧业方面,羊的数量增长较快,而驮畜较慢。

工矿业的发展更为显著。煤矿采掘实现了部分机械化。在制造业中,传统的进口替代部门如纺织、制糖、罐头、电力等继续发展,同时出现了新兴部门如人造纤维、面粉、水糖和机械工业。到1961年,国内已有中小工厂71家,而由联邦德国为国民银行集团援建的古尔巴哈纺织厂年生产能力为3500万米。不过,多数新建企业是国营的,主要由苏联东欧援数。1953—1954年度到1963—1964年度,棉布产量从1540.5万米增长至3690万米,糖从4800吨

增加到7000吨,煤从2.89万吨增长到9.92万吨,发电量从4720万度增加到1.81亿度,1963—1964年度的水泥产量为5.9万吨。可见,增长最快的是能源和新兴部门。

但是,手工业仍是工业的主体,尤其是纺织业。由于机器生产的竞争,许多手工业部门趋于衰落,只有个别部门如地毯业逐渐向资本主义手工工场过渡。1955—1956年度地毯出口额达7600万阿尼,占出口总额的3%。交通运输的发展较快。美苏援建的公路把国内各大城市联结起来,形成了一个环型公路网,并由此与巴基斯坦和苏联相通。汽车在这一时期已成为主要的运输工具。1955年建立了民航公司,到60年代初已有2个国际机场和6个国内机场。阿姆河上的3个港口基奇、基利夫特和塔希古扎尔也得到了改造。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发展推动了外贸的发展。1953—1954年度,外贸总额从5350万美元增长到19470万美元。阿富汗的主要出口产品为农牧产品,其增长较慢;进口商品以消费品为主,而国内工业的发展导致了消费品比例的下降和资本货物的上升。由于进口增长迅速,1958年以后外贸出现连年巨额逆差。

社 会 改 革

达乌德时期经济的加速发展造成了社会关系的变动,其主要特征是新兴阶级力量(包括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和劳工阶层)的壮大和传统社会势力的演变。达乌德的社会政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积极支持新兴阶级的发展,赋予其部分的行政权力,促进社会改革。第二,促进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缩小保守力量的基础。第三,对以部族领袖和毛拉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施以分化、

改造、镇压的多面手法，使之丧失对政府的威胁。

知识分子包括政府官员、专业人员、教师、军官等集团，60年代初其人数约为0.8—1万人。达乌德采纳了他们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一些建议，并释放了一批不再反对政府的自由主义人士，甚至允许一些人进入政界，改善了知识分子的经济待遇，但对于他们的政治改革呼声则不予置理。对于作为政府现代化政策支柱的军官，达乌德提高了他们的待遇，并将一批中下阶层和少数民族的成员提拔进军官团，大力改善军队装备，从而提高了自己的声望。

1949年，阿富汗的产业工人只有3.5万，到1963年达18万人，其特点是分布的高度集中和流动性大。1956年1月，政府颁布了一部劳工法。与1946年颁布的第一部劳工法相比，它规定工人未经商业部许可不得擅自选择职业，并提出了实行固定工资、八小时工资制、劳动保护等措施。显然，政府的目的在于限制工人的流动性，同时适当改善其经济和社会待遇。

在农村，政府致力于发展交通运输和科技文化，加强中央控制，削弱传统的部落权力结构。1954年，试行"农村发展计划"，以大的自然村为中心建立经济文化发展的村落群，促进农业、手工业、教育、保健、交通的发展。到1961年，全国共建成8个农村发展中心站，包括750个村庄和40万人口。

政府的另一项举措是游牧民定居，其目的是使牧民放弃"过时"的游牧生产方式，并且在政治上不致构成对政府的威胁。1954—1956年，在纳迪阿里创办了第一批定居点，共有1330户，其中无地农民占30%。他们获得了生产资料和无息贷款，但因为土地贫瘠、游牧民不懂农活以及定居者之间出现的民族和部族矛盾，定居计划最终夭折。而且，其他地区的类似试验也先后失败。

1961年以后，由于巴基斯坦的边界封锁、公共工程和城镇建设的发展，大批游牧民逐渐定居。在政治上，政府采取了软硬两手，一方面取消一些部落的免服兵役、免纳税款的特权，任命军人出任部落地区的行政长官，另一方面也允许一些部落领袖进入议会和省咨询会议。

阿富汗的毛拉属于公务员，他们在立法、司法和教育方面权势显赫，而思想上相当保守。因此，政府极力加强世俗化的工作，即控制监督议会立法的神学者会议，设立商业法院和交通法院，取消普通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所设的宗教法官，向由清真寺学校改建的乡村小学派遣大批世俗教师，压缩学校宗教课程的比例。此外，政府还通过各类宗教学校和喀布尔大学经学院培养思想开明的毛拉。

到50年代末，随着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中央集权的加强，达乌德决定进行比较激进的社会改革。1958—1961年，农业部进行了地籍调查，并完成了土改法草案的制订工作。但这一举措遭到了大地主和拥有土地的商人及官员的强烈反对，土改计划最终被放弃。不过，达乌德废弃妇女面纱的运动取得了成功。在他执政以后，政府加快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步伐。到1957年，国内已有22所女子小学和2所女子学院（在喀布尔大学），出现了女播音员、女歌唱家和女职员。1959年8月独立节期间，首相、大臣及其不戴面纱的妻子女儿出现在观礼台上，实际宣告了面纱的废弃，这一事件被西方学者称为“本世纪最重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事件”。

同年12月，坎大哈的保守势力发动了反对改革的叛乱，遭到政府军的无情镇压。到1962年，喀布尔的多数妇女上街已不戴面纱。中小学生中女生的比例从1958年的9.4%上升到1960年的

12.0%、大批妇女成为秘书、打字员、护士、助产士、教师、农村发展人员、记者和产业工人。政府对婚姻法也做出规定，要求结婚必须登记，并禁止为婴幼儿订婚。

60年代面临的问题

总之，达乌德的社会政策和社会改革促进了阿富汗社会的进步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部分地扩大了政权的社会基础。这些措施与伊朗的"白色革命"有类似之处。两者都希望通过对封建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改革巩固王朝统治，同时适应时代的发展潮流。但是，达乌德的改革在许多方面是片面(例如缺乏政治改革)、软弱而且有始无终的，面临着各种矛盾，其自身孕育着失败的因素。

到60年代初，达乌德政府在内政外交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面临的问题也不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日趋严重，一些社会集团对政府的不满不断增长，其中有大资产阶级、部族领袖、大地主和毛拉。寡头政治的继续存在同样使部分知识分子感到失望。查希尔对堂兄的施政也越来越担心。他认为达乌德过于亲苏，过于压制大资产阶级。对首相在政务上独断专行的作风，国王尤为不满，他暗中积极扩大自己的影响。

60年代初的阿巴争端大大恶化了国内的经济形势。贸易中断使西方援建的多数工程陷于停顿；国内商品匮乏，物价飞涨；水果出口难以为继，游牧迁徙被迫中断，一时民怨沸腾。在王室的压力下，达乌德于1963年3月辞职。

第十二章　十年“宪政”风云

一、查希尔国王的对外政策

阿富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60年代中期，整个国际和地区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联外交更加突出其“缓和”色彩，它积极发展与亚洲亲美邻国的关系，以破坏美国构筑的军事联盟。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核战略从陆基导弹向潜射导弹的转变，北层国家的战略意义逐渐下降，加上美国实力的衰落以及由此而来的援助的减少，上述国家也日渐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地区形势的变化为阿富汗外交确定了新基调。1963年以后，阿富汗第一任新首相即是前驻美大使穆罕默德·尤素福，他的上任标志着喀布尔希望减少对北方邻国的依赖。

1963年9月，查希尔国王夫妇首次出访美国，受到隆重接待。1967年，阿美两国签订了农产品销售协定。此后，美国国务卿和副总统等高层人士先后来访。但是，1966年以后美国的援助开始急剧下降。1967—1968年度，美对阿工程援助总额为1273万美元，1969—1970年度下降至144万美元，且贷款比例上升至40%。美援在阿接受的全部外援中的比重从过去的1/3猛降至1969年的3%。除了前述国际形势变化的原因之外，美援减少主要是因

为阿富汗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已告一段落，而工业缺乏大量投资的可能。

在美国减少援助的同时，西欧和日本的地位相应加强了。60年代后期，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苏联的第二大援助国，1967—1968年度的援助总额为764万美元，援助项目涉及帕克蒂亚省的经济发展、电力、通讯、教育和行政领域。法国参与了教育、棉花生产和加工以及考古工作。1973年3月，有美国、日本、英国和法国银行参与(其股份共占40%)的阿富汗工业发展银行宣布成立。另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也向阿富汗提供了一定援助。

阿 苏 关 系

在十年"宪政"期间，阿富汗与苏联的关系依然很密切。1963年10月，以勃烈日涅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来访。在会谈中，双方表示"满意两国间现存的、基于互敬互信的关系"，并宣称"决不允许对苏阿友谊睦邻的任何破坏"。苏联也对阿富汗的"普什图尼斯坦"政策表示"理解"。1965年8月查希尔国王访苏期间，两国决定将阿苏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延长10年。

然而，苏联对阿的援助也减少了。1963—1972年，苏援总额约为4.76亿美元，但仍为阿富汗解一大援助国。它的主要援助项目为天然气田、向苏联输送天然气的输气管、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化肥—热电厂和输格哈尔水利工程等。1967年，由苏联援建的喀布尔大学综合技术学院落成，该学院由苏联提供师资并以俄语授课，它标志着苏联开始打入阿富汗的教育界。另外，苏联也继续控制着阿军的装备来源和军官培训。到1972年，苏联提供的军援总额

已达4.55亿美元。不仅如此，苏联也控制了阿的外贸。1967—1969年，苏联东欧国家在阿富汗大宗出口产品中的比例为：天然气100%，羊毛90.8%，原棉94.9%，干果和坚果32.6%，油籽59.5%，皮革48.9%；它们在阿主要进口产品中的比例为：纺织品24.2%，小麦34.6%，糖99.5%，石油产品80.8%，汽车54.7%。

1969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阿，提议由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三国建立一个地区经济联盟。同年6月，勃烈日涅夫正式提出了"亚洲安全体系"的构想，这一体系的矛头显然是指向中国和美国的。然而，喀布尔对莫斯科的新方略却无动于衷。1973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访阿时，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只是淡淡地提到："考虑到有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国家间遵守和平共处原则是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建立持久和平的有效方式，苏联和阿富汗再次宣布，为了确保亚洲的安全，本地区的所有国家朝这个方向做出共同努力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阿富汗正设法在第三世界和西方寻求新的援助来源，以减少对苏联的依赖。

与邻国关系

1963年以后，阿富汗与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邻国的关系有长足进展。在伊朗国王的斡旋下，阿巴两国于1963年5月在德黑兰举行了谈判。由于阿方搁置了"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双方很快达成恢复邦交和开放边境和过境贸易的协议，两国的宣传战和边境冲突也中止了。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时，阿富汗严守中立。1970年，巴基斯坦颁布新宪法，宣布解散单一的西巴省，并赋予各省以自治地位。新宪法得到了国内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的支

持，这表明普什图人已历史性地从争取独立转为谋求自治。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阿富汗依然保持中立，证明了喀布尔稳定阿巴关系的决心。

阿富汗与伊朗的关系也大有改善。过去，两国的商业联系仅限于边境上的游牧民走私，赫拉特—伊斯兰堡公路建成后官方贸易迅速发展。1972年6月，两国重新谈判赫尔曼德河水的分配问题，并于次年正式签署赫尔曼德河水条约，它解决了延续上百年的河水争端。此后，伊朗主动向阿提供财政援助，并建议喀布尔加入由中央条约组织成员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组成的“地区发展合作组织”，后一要求遭到了阿富汗的拒绝。

1963年以后，中国开始向阿富汗提供经济援助，并一跃成为主要援助国之一。中国的援助涉及水利（帕尔旺水利工程）、纺织、养殖、工艺美术等领域，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此外，阿富汗与埃及、土耳其、印度和伊拉克等国也维持了良好关系。1972年，查希尔国王访问土耳其，双方决定进一步加强贸易合作和文化交流。阿富汗还恢复向土派遣留学生学习军事，以逐步摆脱对苏联的依赖。

综上所述，“宪政”十年期间阿富汗的对外政策更加倾向于传统的“巴—塔拉菲”（波斯语：“不偏不倚”）。十年中，查希尔国王遍访了美国、苏联、联邦德国、英国、法国、中国、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蒙古等国，积极寻求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和经援来源的多样化。所有这些都提高了阿富汗的国际地位和声望。1966年，阿驻联合国大使帕兹瓦克当选为联大主席。1973年5月，阿富汗作为东道主主持了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筹备委员会会议。但是，中立政策未能使阿富汗免遭大国的干

涉，多年来对莫斯科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严重依赖使阿富汗的独立面临着真正的威胁。

二、社会经济的演变

“有指导的混合经济”与第三个五年计划

1963年以后，阿富汗政府制定了新的经济政策，即“有指导的混合经济”。其中心内容，是在保持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的同时，放松政府对私人资本的控制，鼓励它更加积极地参与经济发展，尤其是在轻工业方面。为此，政府放宽了出口商交售外汇的限制，取消了对农民种植作物种类的强制措施，并宣布了建立有私人资本参加的工业银行的计划。

在发展战略方面，由于前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完成了许多大型基础设施，第三个五年计划（1967—1968至1971—1972年度）开始把重点转向生产部门。“三五”计划的总投资为190.2亿阿尼，其中农业占34.9%，工矿业30.8%，交通运输仅为11.8%，文教卫生11.9%。该计划的目标包括实现粮食自给、发展工矿业、推进文教卫生事业、扩大出口潜力、增加岁入、改善社会福利、提高人均收入并改善财富分配状况、发展地方经济。

“宪政”十年期间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在于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工矿业相对的迅速发展和农业的缓慢发展。在基础设施方面，达乌德时期由美苏援建的4条公路全部完工。其中，苏联援建的喀布尔—基奇港公路于1964年建成，它穿越兴都库什山而将喀布尔和北方边措基奇联接起来，对于扩大南北交通意义重大。

到1972年，铺面公路已增长到2500公里，普通公路达14800公里，汽车增加至55076辆，电话为19939部。

采矿业的发展很快，主要是天然气的开采。在苏联的帮助下，1967年天然气田投入开采，1971年产量达26.35亿立方米，天然气一跃成为主要的出口产品。为了鼓励制造业的私人投资，政府于1967年颁布了自由投资法。截至1969年底，已批准113份投资申请(其中阿外合资项目18个)，总金辆4150万美元。新建的工业企业包括电力、化肥、自行车装配、住宅构件和纺织等行业，其中个别行业如纺织和水泥在个别年份甚至有出口。

农业方面，赫尔曼德水利工辆仍在修建中，新建的则有苏联援建的铺格哈尔水利工程和中国投建的帕尔旺水利工程。60年代以后，地主庄园更多地采用农机和雇佣劳动，或将拖拉机用于出租，大大提高了生产截益，同时小麦成为商品农业的主要作物。到1973年初，地主铺有的截拉机达900台，但这些地主仅占总人数的6%，且机耕地面积也只占耕地总面积的10%。鉴于机铺化进雇迟缓，政府成大力推广良种和化肥，试图以较小代价实现"绿色革命"。

60年代以来，旅游业和向较斯湾的劳务输出成为赚取硬通货的新途径。70年代初，每年来阿的外国耕客达10—11万，绿游业年收入为600—700万美元。

各部门发雇速度的差异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变化。1953年，阿富汗的国民产值为125亿阿尼，其中农业占72%，林业6%，工业7%，商业8%。到1971—1972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到895亿阿尼，而农业的比例下降到45.6%，现代工业为7.6%，手工业12.3%，交通运输2.4%，基本建设4.2%，商业、饮食和服务业

20.0%。

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尽管十余年来取得了一些进步,但阿富汗经济仍面临着十分严重的问题。

第一,作为经济主体的农业并未出现重大的技术和社会变革,其发展的迟缓阻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这是国民产值中农业比例下降的原因之一)。70年代中期,占土地所有者4%的大中地主占有全国土地的41%,而占土地所有者90%的小农仅拥有土地的44%(平均占地规模为0.2—4公顷),其余土地为商人和官员所拥有。在畜牧业中,牲畜也大量集中于地主、富农和部落贵族之手。除少数人外,多数地主将土地以分成形式租给农民,收取地租。而且,使用现代生产手段的基本上是地主、富农和大牧主,合作社和农村发展计划并未取得重大成效,广大农牧民的生产手段依然十分原始,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靠天吃饭。政府长期压低农牧产品价格也妨碍了农业的发展,后者甚至慢于人口的增长,阿富汗每年不得不进口20—30万吨粮食。

第二,政府机构缺乏有效的经济规划和管理能力。阿富汗政府缺乏大批训练有素、具备专业知识的官员和专家,经济计划往往好大喜功,不切实际,发展项目没有可行性研究和事后评价,集权主义、文牍主义和政府对乡村控制力的薄弱均阻碍了经济计划的有效实施。工资微薄和传统的部落习俗也造成了严重的徇私舞弊和贪污受贿

第三,本国的积累能力始终未能提高。阿富汗的发展资金主要依赖外国,外援在前3个五年计划中分别占到实际投资的

78.5%、81.6%和79.6%。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一,不合理的税收制度。政府岁入主要依赖间接税,1971—1972年度间接税和性质相似的政府专卖收入占全部岁入的62.7%,而农业税仅占1.3%(1954—1955年度占12.2%)。过高的关税限制了出口农产品的增长,并鼓励了走私。其二,金融机构吸收资金的能力很差,其原因包括传统上伊斯兰教对高利贷的反对、利息过低和银行业务的被动。最后,大量政府投资的低回收率,例如水利设施、公路和国营企业。

第四,对外援的严重依赖产生了大量问题。首先,东西方援助的目的主要是政治性的,许多援建项目劳民伤财而收益不大。大国的竞争和观点分歧也引起了一些混乱,如美国和苏联顾问在市场经济问题上的观点对立。而且,外援的大量涌入强化了阿富汗人的依赖心理,并增加了外债负担。"三五"期间,外债总额已达9500万美元,占外援总数的23.3%。

此外,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如私人资本不活跃、长期的通货膨胀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据估计,1951—1972年阿富汗的国民生产总值(固定价格)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8%。1971年,联合国确定了26个第三世界国家为最不发达国家(其标准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100美元,制造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低于10%,居民识字率低于20%),阿富汗名列其中。

人口、教育和大众传媒的发展

战后阿富汗的经济发展虽然迟缓,但它仍然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下面对除阶级关系外的社会变迁作一分析。

本世纪以来,阿富汗的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但这方面缺乏准确

的资料。据估计，1932年的人口数在600—1500万之间，而1972年为800—1788万(1788万为官方数字)。人口增长加速的原因之一是卫生事业的发展所促成的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和人口出生率的居高不下。1953—1973年，人口死亡率从3.6%下降到2.1%，而出生率仅从4.95%下降到4.52%。同时，人口的流动也不断发展，其形式包括普什图人向北方的移民、游牧民定居和农牧民向城市的移民。60—70年代，城市人口的增长率达3—4%，1965年它已占全国人口的9%。喀布尔的人口从1947年的15万增长到1970年的近60万。

现代教育也取得了长足进展。1956—1957年度，全国共有804所学校，中小学生为126092人，大学生874人，教师为4007人；到1971—1972年度，学校总数增至3963所，中小学生达711670人，大学生8415人，教师20744人。在普通教育的发展中存在着学生的高淘汰率、师资不足和低素质、教材短缺、决策权过于集中等问题。高等教育包括喀布尔大学和括格哈尔大学(1962年建)，前者拥有医学、政法、理学、文学、经学、农学、经济学、家政、教育、工程、药学及综合技术等学院，其中多数有美、法、德、苏和埃及等国大学的援助，并使用相应的语言授课。教育的发展是知识阶层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化教育和通讯事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大众传媒的发展。1950年以后，国内的报刊数量猛增，其中多数受新闻局的控制。但是，对于识字不多的一数民众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广括。1940年，喀布尔电台开始用中波进行普什图语和波斯语广播，而美国、苏联、印度、巴基斯坦、中国和斯里兰卡也开设了对阿短数广播。除了私人收音机，政府还在城镇中安装了高音喇叭，收听广括成为民

众了解时事的重要渠道。1968 年,美国人登陆月球的消息震动了农村居民,许多人议论纷纷。

社会结构的变动

现代化影响到阿富汗社会的深层结构。60 年代以来,农村的一些酋长购买了拖拉机,除自用外也为一般村民耕地并收取手续费。机耕地多为春播夏收、不需要常年劳动力的旱地(用于种麦),从而促进了农村短期雇工、货币经济和土地集中的发展。加上土地的零碎化、游牧民定居和种族通婚,家族和部族关系受到了削弱。地主和商人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受益,而许多农民则逐渐丧失土地,负债累累。在喀布尔以北的考希达曼地区,75%的居民年收入低于 4 万阿尼,88%负债,债务利息商达 10—30%。另外,农村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一些地区和部族与政府的关系较好,因而获得大量投资,大商水利工程灌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较商。但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如哈扎腊贾特)和屡屡闹事的部落地区(如萨菲普什图人)的发展则慢得多。

在城市中,居民的家族和部族联系已受到削弱,职业联系则加强了,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和产业工人日益成为重要的职业集团。据劳动部估记,1966 年政府雇员人数为 6 万,工业(含手工业)、建筑和交通运输部门的就业人员为 34.3 万,分别占劳动力总数的 1.6%和 8.9%。50 年代,政府机构迅速膨胀,大中学校的毕业生均可成为公务员(包括教师),但 60 年代中期以后,政府机构的扩张政速,加上灌育的迅速发展和以文为主的学科结构,部分学生开始面临失业问题。就业前景的黯淡和教育体系中存在的问题造成了学生运动的温床,而已经工作的一般官员和教师则工资低微,他

们对上层的腐化心怀不平，从而奠定了激进势力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崛起的基础。而且，一些社会下层和少数民族的成员在社会流动中进入了政府和教育机构，他们也积极参与了反政府活动。在军队中，由苏联培训的年轻军官受到由土耳其培训的高级军官的怀疑，他们许多人对社会现实也是不满的，其中少数人则完全沦为苏联的"第五纵队"。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富汗社会逐渐发生着变化。人口的流动以及经济、文化教育和大众传媒的发展加速了以部落、家族为中心的血缘、地缘关系的瓦解和一个更为沟通、开放、更趋业缘化和世俗化的社会的形成。但是，传统的社会关系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城乡之间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方面仍然存在着深深的鸿沟。另外，作为中央政府支柱之一的城市知识阶层，其对统治阶级的敌意却在不断发展，从而埋下了"宪政"十年间政党迭起的伏笔。

三、动荡不定的政局

1964 年宪法的颁布

1963 年达乌德辞职后，国王任命原工矿大臣穆罕默德·尤素福博士为过渡政府首相，这是平民第一次出任首相一职。新政府释放了"自由主义议会"运动期间入狱的一批政治犯，但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和知识阶层则要求进一步扩大民主，推进现代化的发展。因此，初次亲理朝政的国王决定制订一部新宪法。1963 年 3 月，成立了以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为主的七人制宪委员会。1964

年9月，大国民议会在京召开，通过了新宪法，后者于10月1日经国王签署生效。

新宪法共有11章128条，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限制王室成员从事政治活动。他们被禁止参加政党，或担任首相、大臣、议员和最高法院法官等职务。这一规定实际上将王室成员排除出政治舞台之外，主要用意在于防止达乌德东山再起。第二，强调三权分立。宪法规定内阁对国会负责，后者有权对政府工作提出质询并进行调查。法院是国家的"独立组织"。总检察长负责对犯罪活动的调查事宜，此外将设立最高法院。第三，维持国王的最高权力。国王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理由解散国会。法律须经国王签署方可生效。三权分立也加强了国王作为仲裁者的权力。第四，强调民众的参政。宪法要求政府准备有关报刊、政党、选举、省议事会和国家的基本组织等的法规，第一次授予妇女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规定实行直接的无记名投票。最后，强化政教分离。宪法未规定哈乃斐报为国教，仅称以它指导宗教仪式。在司法方面，规定在没有有关世俗法的情况下，才实施伊斯兰教法。

总的看，1964年宪法在发展资产阶级民主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制宪委员会委员哈米杜拉教授指出，新宪法的主要成就是政府各部门的分离和协调。但是，宪法的内容能否完全实施是一个问题。另外，以突出王权和三权分离为特征的新政治机器能否运行也有待实践的考验。随着新宪法的颁布，所谓"新民主"的序幕正式拉开了。

人民民主党的建立与"八·三事件"

还在新宪法颁布之前，一小群激进的知识分子已经迫不急待

地展开活动了，其核心人物是努尔·物罕默德·塔拉基（1917—1979）和巴勃拉克·卡尔迈勒（1929—）。塔拉基出生于加兹尼省吉尔查依部族的一个“半农半牧”家庭，只上过小学，后通过自学达到了中学文化水平。他在一家商行驻孟买的分行工作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39年回国后曾到政府部门任职，因加入“觉醒青年党”而于1952年被贬黜到阿驻美使馆任新闻专员，随即因发表反政府言论而被遣返回国。他创办过一所私人翻译社，发表了一些描述普通人民生活的小说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作品。1952年以后，他曾漫游苏联东欧，其小说《本克游记》后在苏联出版，从而建立了与莫斯科的联系。

卡尔迈勒（意即“劳工之友”）是巴勃拉克的笔名，系塔吉克人，父亲为高级军官。他在有德国教师执教和大批阿马努拉的同情者的解放中学上学，受到了激进思想和纳粹精神的熏陶。在作为精英学校的喀布尔大学政法学院里，他卷入了学生会的活动，1952年因参加游行而被捕，在狱中结识了军事学院毕业生米尔·阿克巴尔·海勃尔。1956年出狱后，他回校学习，于1960年完成学业，先后进入教育部和计划部工作。但他利用自己的名气，积极招收门徒。

早在1956年，塔拉基和卡尔迈勒就分别开始组织学生、官员和军官讨论时局和政治理论，1963年以后更加强了活动。1965年1月1日，一群人在喀布尔塔拉基的家中正式成立了人民民主党，塔拉基和卡尔迈勒分别当选为总书记和中央书记。会议通过的党章宣布：“人民民主党是阿富汗最高的政治组织和工人阶级与所有劳工的先锋队。人民民主党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际经验，党奠基于阿富汗的进步和有知识的人民——国家的工人、农

民、工匠和知识分子——的自愿联盟。"该党的建立标志着阿富汗进入了一个激烈的政治斗争时期。

1965年7—8月,第12届议会选举在各地举行,妇女第一次参加选举,但投票人只占男女选民总数的10%。人民民主党有塔拉基、卡尔迈勒、阿明和阿娜希塔等人参加竞选,结果财力雄厚的卡尔迈勒和阿娜希塔等4名未来的旗帜派人士当选。在272名议员中,宗教领袖(25人)在所列的议员16类职业中名列首位,另有146人为部落和少数民族领袖,文盲占议员人数的至少1/3。议员中也包括自由企业的支持者、国王的亲信和极端民族主义者。

大选结束后,尤素福受命组阁。然而,以卡尔迈勒为首的一些议员对过渡政府成员发动了猛烈攻击,要求内阁换班,议会也通过了要求大臣申报私人财产的动议。10月24日,一批受卡尔迈勒煽动的大中学生占领了预束进行内阁信任投票的议会大厅。次日,正当下院举行秘密投票时,千余名学生在议会大厦附近进行游行。下午5时,军队向在首相官邸(在议会附近)周围的学生开枪,当场打死3人,打伤几十人,此即著名的"八·三事件"(当天为阿历8月3日)。29日,尤素福宣布辞职,国王任命前驻美大使、原新闻文化大臣穆罕默德·哈希姆·梅文瓦为首相。

"八·三事件"表明,人民民主党信奉的并非议会道路,而是通过学生罢课和示威游行等手段破坏政府的工作,从而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此为人数不多、主要在知识阶层中发展力量的人民民主党走向权力的"捷径"。

人民派、旗帜派和火焰派

1965年7月,新闻法颁布。它规定报刊不得诽谤伊斯兰教与

王室、煽动违法活动、泄露国家机密、妨碍司法判决等。尽管政党法尚未颁布，但新闻法的颁布为各党派展开舆论活动创造了前提。1965—1972年，国内出现了数十家代表不同党派的私人报刊和地下报刊，其中主要有：小资产阶级激进派，《人民报》，《旗帜报》，《永恒的火焰报》；激进的自由主义派，《人民之声》，《民族》；温和的自由主义派，《平等》，《举国团结》；保守的宗教势力，《团结》，《黎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晨报》，《权力之声》；极端的民族主义派，《阿富汗民族》。

《人民报》创刊于1966年4月，发行人为塔拉基。它的创刊号以不同寻常的红色套印刊名，并登出了《人民民主纲领》一文。纲领分析了阿富汗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提出国家落后的根源是“封建阶级对经济政治的垄断”，主张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实施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该报立即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宣称其为反伊斯兰、反国王和反宪法的报纸，因此该报仅出版了6期即被查封

卡尔迈勒一向嫉妒塔拉基的地位，对后者的激进策略也不表赞同。1967年初，卡尔迈勒在下院中公开宣称查希尔国王是“亚洲所有国王中最进步的一位”。他还在议会和学生中极力发展自己的力量，并把尚未成为党员的密友海勃尔和阿娜希塔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

为了与卡尔迈勒对抗，塔拉基极力拉拢作为后起之秀的阿明。哈菲祖拉·阿明（1929—1979）出身于帕格曼县吉尔查依部族的一个下层文官家庭，从喀布尔大学毕业后到中学任教，1957年成为公费赴美留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在美国，他初次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回国后便在学生中争取了一大批追随者。

1962年，阿明再次赴美留学，并出任留美阿富汗学生联合会主席，但因从事政治活动于1965年被驱逐出境。归国后的阿明备受猜疑，被打发到女子学校任教，但擅长组织工作的他在女校中也发展了一批门徒。1966年，阿明作为候补委员进入中央委员会，成为塔拉基的得力助手。

1967年6月，人民民主党终告分裂，塔拉基一派因出版《人民报》而得名为“人民派”，卡尔迈勒一派则因出版《旗帜报》而以“旗帜派”闻名。阿派分裂的原因除了权力斗争和策略分歧以外，还有一点就是阶级背景的差异。人民派领袖主要出身于普什图下层社会，而旗帜派领袖则多为膏粱子弟，与统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两派都对阿富汗社会缺乏真正的了解，从而寄希望于苏联，沦为后者的工具。

除了人民民主党，60年代出现的主要歧治组织有3个，即火焰派、进步民主党和穆斯林青年会。火焰派形成于50年代，正式建立于1964年，创始人为已故著名反对派人士马茂德医生的弟弟拉希姆·马茂德和侄子哈迪·马茂德，其名称来源于该派1969年创办的刊物《永恒的火焰报》。该派的社会基础是知识分子、什叶派和哈扎腊人，力量也很雄厚。在思想上，它主张走武装革命的道路，而斥责旗帜派为“修正主义”。进步民主党的领袖为首相梅文瓦，该党于1966年6月创办《平等》周刊。它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各阶层和衷共济，呼吁进行土地改革，建立奠基于伊斯兰教、君主立宪、有指导经济、民族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之上的“进步民主”。穆斯林青年会的领袖是平民知识分子，如布尔汉努丁·拉巴尼教授和阿卜杜勒·拉苏尔·萨亚夫歧授等。它于1966年成立于喀布尔大学，在政治上反对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和对外政

策，主张建立伊斯兰政府。

1967年4月，《阿富汗民族》发表文章，揭露阿富汗留学生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贿赂一事，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梅文瓦内阁因此于10月倒台。国王任命该内阁的外交大臣努尔·阿赫美德·埃特马迪为新首相。

1968年的学潮和工潮

到60年代后期，外援逐步减少，经济发展减速，失业率因基础设施的完工而趋于上升。在国际上，1968年出现了规模宏大的学生运动，尤以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和法国的五月风暴最为著名。加上国内的社会政治原因和激进组织的活动，1968年阿富汗爆发了空前未有的学潮和工潮，仅4—6月全国较大规模的学生罢课就有9次，工人罢工有20次。除了针对教育体制方面的内容外，罢课学生还提出了成立学联、大学自治和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等政治性要求 同时，学潮与工潮出现了相互声援的趋势，有时还有农民加入罢工工人的行列。1969年春，因警察毒打学生致死而爆发了新一轮学生示威，喀布尔大学的学生罢课长达48天。此外，60年代末一些妇女组织也发动了几次抗议保守势力反对现代化改革的游行示威。

学潮和工潮的浩大声势使当局极为震惊，政府往往采取镇压的手法，封闭学校，逮捕和监禁学生领袖。到1966年底，最早创办的6家私人报刊仅余1家，两位马茂德和人民民主党的一些中央委员也遭拘捕。为了对付激进力量，政府转而鼓励保守势力的发展。在1969年8—9月间举行的第13届国会选举中，保守势力大获全胜，共有129位部族领袖和少数民族领袖进入国会，而宗教领

袖(21 人)仍是人数最多的职业集团。由于政府的阻挠,人民民主党仅有卡尔迈勒和阿明竞选成功。

为了改变国内四分五裂的现状,实现国会与政府的合作,埃特马迪首相提出了"真主、祖国和国王"的口号。然而,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保守势力对此均不满意,双方的矛盾依然故我。

君主制的危机

70 年代初,阿富汗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进一步深化。1970—1971 年,国内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农业产量大幅度下降,牲畜被大批屠宰,物价飞涨,人民流离失所。虽然国际社会提供了大量援助,但交通不便、车辆短缺、游牧民的流动、官员腐败和官僚主义均影响到援助物资的分配。旱灾充分揭示了阿富汗经济的脆弱性和社会问题的严重性。

在政治上,激进党派与保守势力发生了正面冲突。1970 年 4 月 22 日是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一些激进党派纷纷借机显示自己的力量。火焰激在喀布尔大学内举行盛大集会。塔拉基在党报《良心之声》上发表了纪念文章,复刊的《旗帜报》在当天发行了特别专刊,一首由巴利克·沙斐仪创作的诗歌甚至使用了为穆罕默德先知保留的名称来称颂列宁。保守报震怒了。4 月 29 日,德格哈尔省的毛拉及其支持者陆续集体进入首都,举行了反政府示威和集会,要求驱逐外国人、关闭女校、实施沙里亚法。学生则相应举行了反示威。政府一方面运用军队强行遣返毛拉,另一方面则查封了《旗帜报》。

面临经济政治双重危机的埃特马迪内阁于 1971 年 5 月倒台,国王任命原议长阿卜杜尔·查希尔为首相。然而,查希尔内阁也回

天乏力，存在仅一年多便宣布辞职。1972年12月，查希尔内阁的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穆萨·沙菲克受命组阁。

年轻干练的沙菲克在国内宗教界享有一定威信，深受国王宠信，他上台后在内政外交方面均取得突破。新首相改善了与国会的关系。他向国会提交了第四个五年计划草案，表示要最大限度地动员国内财源，鼓励私人投资。在对外方面，1973年3月，阿富汗与伊朗签署了赫尔曼德河水条约。同时，西方国家也加强了对阿援助，帮助成立了阿富汗工业发展银行。

但是，任何努力都无法挽救岌岌可危的君主制度了。"新民主"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深刻的结构性缺陷。1963年以前，穆罕默德查伊家族牢牢控制着国家的行政权力和军队，只有"一些依附氏族的成员和无部落联系的喀布尔人可以担任某些重要职务"。在地方基层，部族和宗教领袖支配着所有事务。于是，人寡力薄的资产阶级很难形成独立的、足以左右政局的力量。宪政时期，激进势力、保守势力和自由主义势力同时登场，各自以大中学生、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为中心确立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展开激烈的角逐。为阻止激进势力的发展，国王拒不批准已为国会通过的政党法、省议事会法和市议事会法。因此，内阁中的自由主义领袖既没有合法政党的支持和国会的合作，又面临着左翼党派的攻讦和街头示威的强大压力，而国王也很少赋予内阁以实施大胆革新的权威。其结果，十年宪政呈现出政党纷争的混乱局面，而缺乏一个坚强稳定、能够推动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政治实体。

查希尔国王在宪政时期的作用是耐人寻昧的。他的治国之道是：在外交上，确保国家的中立、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外国的大量投资；在内政上，依靠温和的自由主义派执掌政权，通过适度高压和

有限的自由维持“新民主”，实现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而避免重大的改革。然而，出于对平民的固有戒心，查希尔无意对初露才干的自由主义领袖给予有力支持，这是行政机构软弱无能局面形成的原因之一。作为政权的最后支柱，军队受到严密的控制。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君主制的最后打击正是来自军队。

达乌德的旗帜派

个别对君主制备感失望的资产阶级政党开始考虑夺取政权的非法途径。进步民主党即准备在1973年大选失败的情况下发动政变，梅文瓦在达乌德发动政变前夕访问莫斯科时还征求了苏联对该党通过大选上台的看法。另外，据传王叔瓦里和前首相尤素福也在策划政变。

进入70年代，苏联即开始在第三世界积极展开扩张活动。对于阿富汗，莫斯科一向把它视为自己的“后院”，力图据而独占。然而，喀布尔与西方和穆斯林国家关系的加强使苏联感到担心。在阿国内，人民派和旗帜派的力量仍很弱小，后者在学生中的影响实际上已在衰微中，而与两派对立的火焰派和原教旨主义派则实力可观，进民党则已经着手准备政变。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等待的时机不多了，它决定支持旗帜派发动政变。与人民派不同，旗帜派有大批文官成员，而且其领袖之一海勃尔从1969年起即开始在军官中发展力量（到1973年已有约800名亲苏军官），从而具备了发动政变和掌握政权的能力。考虑到保守派和军队的可能的反对，苏联看中了蛰居在家的“红色亲王”达乌德，准备让他担任新政权的首脑。

下野以后的达乌德一直在静观国内政局的发展，并与许多政

府官员和军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中不乏旗帜派的成员。1969年以后，他与旗帜派成员经常讨论自己第一次执政时所犯的错误及未来的对策，这些人以“达乌德的旗帜派”而闻名。随着国内政局日益向无政府状态的发展及保守势力的抬头，知识阶层开始怀念曾以强力压制保守派、推进社会改革的达乌德，他本人也认为夺权的时机成熟了。

第十三章　阿富汗共和国的内政外交

一、1973年政变和共和国的对外政策

1973年政变

1973年6月25日，查希尔国王在中央军团司令、驸马阿卜杜尔·瓦利将军的陪同下赴英治病，之后前往罗马疗养。瓦利在获悉国内有政变阴谋后，即中途归国，协助王储兼摄政王阿赫默德·沙主持国务。然而，为人骄横的瓦利得到的是内政部递交的假情报，他未能采取有力措施。

7月17日夜，驻扎在京郊的装甲四师里的一批亲苏军官借操练独立节军事检阅的名义，将坦克开进首都。进入市区后，部队立即改变路线，分别向王宫及附近的瓦利住宅发起进攻，几乎兵不血刃地夺取王宫，瓦利本人被俘。18日晨7时，达乌德通过电台宣布政变成功。鉴于达乌德在国内的巨大影响，各地驻军司令均采取了观望的态度。政变的得手，宣告了查希尔王朝的覆灭。

在18日清晨对全国的讲话中，达乌德德出：民主制度将确保全体人民的权利和国家主权，但他的民主化建议为假民主所取代，后者依赖的是个人和阶级的私利，最终导致了无政府状态，演化为最卑鄙的独裁制度。十年“宪政”的结果是经济、社会、政治和行政的全面崩溃，因此阿富汗的爱国者、尤其是军队决定结束这个腐败

政权的统治，建立共和政权，后者符合于伊斯兰的真正精神；共和国的对外政策基于中立、不参加军事条约和对国际事务的独立判断，在经济上将实行国有化、土地改革和七年计划。

当天，阿富汗共和国宣告成立。新政府宣布废除1964年宪法，解散国会，取缔所有非政府报刊。国家的行政工作由中央委员会负责，达乌德出任总统兼中央委员会主席，而该委员会的委员主要是旗帜派成员。

阿苏关系的变化

政变结束仅3天，苏联即第一个予以承认。1974年6月，达乌德复出后首次出访苏联。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申明："亚洲所有国家努力创建一个安全体系将会满足亚洲各国人民的利益，这就要求通过和平手段和消除殖民主义的残余来解决争议问题。"有趣的是，达乌德在支持苏联"亚安体系"的同时，也要求解决"争议问题"（指"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但亚安体系的前提之一是承认亚洲各国的现有边界）。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苏联赞赏了阿富汗新政权的强硬态度，但在塔斯社正式播发达乌德讲话时却删去了有关内容。

苏联向阿政府提供了大量经援和军援。1974年6月，它提供了1.5亿美元贷款，用于21个援建项目。1973—1974年，苏联和东欧国家共向阿交付价值1.37亿美元的武器。到1978年，由苏联培训的军官至少有4000人。

此时的达乌德已经意识到了苏联援阿的真正意图，就是南下印度洋。1974年以后，他开始清洗政府和军队中的旗帜派骨干，并设法改善与巴基斯坦、伊朗和西方的关系，抨击古巴的对外政

策。对于阿外交的转向，苏联开始感到不安。1975 年 12 月，苏阿延长了 1931 年签订的中立和互不侵犯协定。但莫斯科已着手为"后达乌德时期"谋划，积极推动人民民主党两派的联合。

不过，苏联对阿的援助继续进行。1977 年，它为阿富汗的七年计划提供了 4.25 亿美元贷款，援建项目涉及灌溉、农业开发、化肥厂、发电站、天然气工程扩建和地质普查等。然而，苏联人拒绝了阿方关于开采铁矿、铜矿和发展炼铜、炼油工业的要求，而主张把铜矿石运往苏联提炼。此外，阿天然气的价格一直由苏方决定，其水平大大低于国际市场，而测量仪表却设在苏联境内。1975 年以后苏联的军援也未减少，仅 1977 年交付的装备即价值 1.27 亿美元。

随着 1977 年宪法的颁布和对人民民主党两派的正式取缔，苏阿关系明显恶化了。1977 年 4 月，达乌德再访苏联，与勃烈日涅夫等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中，首相重申了阿富汗不结盟立场的不可动摇，指出不结盟国家必须严格遵守不结盟运动的原则，从而间接批评了古巴。勃烈日涅夫在发言中抱怨说，北约国家在阿援助项目中的人员增加过多，他们甚至进入了一向未被准许进入的阿富汗北部，阿政府应当驱逐这些"帝国主义"间谍。达乌德闻言立即反驳，宣称："我们如何以及在何处聘用外国专家完全是阿富汗国家的特权。如果有必要，阿富汗可以继续贫穷，但其行动和决策是自由的。"

1977 年达乌德的苏联之行使两国关系更趋紧张。同年晚些时候，人民派和旗帜派实现了联合。但苏阿两国仍设法维持正常关系，莫斯科采取的是长期政策。

阿 美 关 系

达乌德执政之初，阿美关系较为冷淡。但时隔不久，阿方即主动采取措施改善对美关系。总统胞弟纳依姆向美国新任驻阿大使厄利耶特保证，阿富汗希姆与美国保持保为"友好"的关系，看到美国在阿的经济存在。

1974 年 11 月，美姆国务卿基辛格访阿。他在会谈中指出，阿富汗的稳定、中立和不结盟地位有赖于其政治和经济的强大，美国愿意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姆供帮助。1975 年以后，两国签订了一系列协议，援助范围涉及教科书改革、高等教育、农村发展、农村学校和卫生中心、水利工程等。截止 1978 年，美国对阿经援累计达 5.33亿美元。美国也保力截促沙特阿拉伯等中东产油国和日本对阿慷慨解囊，并要求阿改善其与穆斯林邻国的关系。在阿富汗方面，它则增加了赴美受训的军事人员的人数。

1976 年 6—7 月，纳依姆以总统特使的身份访美，此行突出了阿关关系在阿富汗外交中的重要地位。同年 8 月，基辛格再访喀布尔，他对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关系的改善表示满意。1977 年夏，美国正式邀请达乌德访美，但因后者事务繁多而将访问推迟到了 1978 年 9 月，从而永远失去了这一机会。

阿富汗与第三世界

共和国建立之初，阿富汗的强硬外交及亚洲邻国对喀布尔新政权的猜疑导致了双方关系的冷淡，阿巴关系尤其如此。达乌请将巴基斯坦列为"我们与之存在分歧的唯一国农"，并公开鼓励在巴普什图人实行自治，多次在国际会议上重提"普什图尼斯坦"问

题。1974 年 7 月,阿方开设了一个地下的“普什图尼斯坦电台”,并在报纸上公开指责巴基斯坦,双方的矛盾演变为边界冲突,尤以 1975 年的规模为大。

实际上,达乌德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阿巴矛盾,其原因既有苏联的压力和伊朗等产油国的调解,也有达乌德本人对 50 年代外交的反思和阿国内权力斗争的干扰。1976 年以后,阿巴关系明显改善,两国实现了首脑互访。在 6 月布托总理对阿富汗的访问中巴方第一次承认阿有权关心巴境内普什图人的命运,而阿方则同意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解决有关分歧,这在两国关系史上是一次突破。哈克担任巴基斯坦总统以后,两国首脑再次互访,阿富汗遣返了国内的普什图和俾路支族政治难民。

阿富汗与伊朗的关系也逐渐改善。1974 年 10 月,两国签署协议,伊朗向阿模供 10 亿美元援助,用于工业和交通项目。1975 年 4 月达乌德访伊期间,巴列维国王允诺提供 20 亿美元援助,用于七年计划和修建一条联结伊朗与阿富汗的赫拉特、坎大哈和喀布尔的铁路(阿国内尚无铁美)。1977 年 6 月,阿富汗正式批准赫尔曼德河水条约,解决了妨碍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不过,由于自身的经济问题,伊朗允诺的 20 亿美元援助并未兑现,而拟议中的铁路也仅仅完成了准测工作。

阿富汗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也有很大发准。中国恢复了在阿援建项目,并于 1974 年提供了一笔无息贷款。1975 年以后,达乌德访问了印度、孟加拉、伊拉克、土耳其、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利比亚和南斯拉夫等国。一些产油国也提供了数额可观的援助,如沙特即提供了 4.25 亿美元的援助。为了摆脱苏联的影响,阿富汗向使用苏式装备的埃及和印度增派受训军官,并延聘了

印度技术人员。

在国际上，阿富汗为纯洁不结盟运动、使其摆脱超级大国的影响而积极努力。根据安排，1978 年 5 月将在阿召开不结盟国家部长会议，但四月政变的发生使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总之，共和国时期达乌德的对外政策与“宪政”时期查希尔国王的对外政策是一脉相承的。这一政策的最终目标是阿富汗的独立、自由和繁荣。对此，在阿经营多年的苏联是不能容忍的。它决心在适当的时候以人民民主党取代达乌德。

二、共和国的经济

土 地 改 革

达乌德政府的经济政策有两大特点，即提出土地政革和加强国营经济的地位。1974 年，政府颁布《合作社法》，规定了合作社的组织原则。1975 年又先后颁布了《级差地税法》和《土地政革法》。《级差地税法》规定，七年计划期间继续进行地籍调查，以交纳地税作为拥有土地的证据。《土地政革法》确定了拥有土地的上限：一等水浇地 100 阿亩（10 阿亩等于 1 公顷），旱地 200 阿亩；多余土地在七年计划期间由地主出售给无地农牧民，在 25 年内分期付清地款，年利 2%；七年计划结束后政府将按同等条件收购多余土地。该法案未提到向农民提供购地贷款和分成租佃制的问题。总之，这是一个相当温和的法案。

土改的成就十分有限。到 1978 年政变前，地籍调查并未取得重大突破。同时，仅有 7500 户农牧民得到约 1 万公顷政府分配的

国有浇灌地。此外,新建的几十个合作社多数位于商品农业发达的地区,属于供销合作社,其成员主要是富农。因此,农村的生产关系没有发生任何变动。

政府宣称,它的经济政策仍为“有指导的混合经济”。但事实上,国营经济重新受到了重视。1975年,所有银行均实行国有化,而且一些资本家在银行的资金也被冻结。在外贸方面,原先限于对苏联东欧国家贸易的政府监控扩大到与西方的贸易。

七年发展计划

1977年,颁布了七年发展计划(1976—1977至1982—1983年度),投资额为38.5亿美元,较“四五”计划大幅增长。其中,农业和水利占24.7%,工矿业和能源36.1%,运输和通讯31.5%,文教卫生6.0%。显然,基础设施的比重出现强烈回升,因为计划包括一项铁路工程,并提出发展炼油业等重工业的目标,而私人部门的作用是发展中小企业。预计计划期间的经济增长率为年平均6.3%,工业年平均为9.4%。

本阶段的总体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在农业方面,地主拥有的拖拉机到1977年已达2000多台,国内化肥施用量从1973—1974年度的4.4万吨增长到1977—1978年度的9.3万吨。在畜牧业方面,兽病防治和畜种改良取得较大成就。加上风调雨顺,粮食生产实现了自给。1970—1978年,小麦产量增长35.2%,棉花增长101.3%。但1977年的旱灾仍造成了小麦减产。

在工业方面,手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68—1969年度的72%下降到1977—1978年度的48%,而国营工业在现代工业中的比例为68%。天然气产量到1975—1976年度达到创

纪录的29.6亿立方米，以后趋于下降。电力工业的发展也很快，纳格鲁和卡贾凯两座大型水电站的建成使1976—1977年度的发电量达到7.76亿度。到1978年，煤产量约达19万吨，水泥为13.2万吨，尿素10.4万吨，棉布9300万米，糖1.1万吨，皮鞋29.3万双。同年，铺面公路里程达2831公里，其他公路为15470公里，汽车总数为6.8万辆。

本阶段的国际收支也有改善。1972—1973年度，阿富汗的国际收支顺差为220万美元，1976—1977年度猛增到6500万美元，同期国家外汇储备从1809万美元上升至1.28亿美元。出现上述铺况的原因在于出口的较快增长、对苏债务延期清铺及外援和侨汇的增加等。

必须看到，阿富汗经济铺况的好转部分地归因于外部因素，如有利的气候和大量的外援，而50—60年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阿富汗依旧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作为经济主体的农业仍处于靠天吃饭的境地，向现代化迈进的道路漫长而艰难。

三、共和国的政治

政治实体与对人民派、旗帜派等组织的排挤

1973年政变后建立起来的阿富汗共和国，是一个以前王室成员、达官贵族和亲苏的激进势力的联盟为基铺的松散的政治实体。在内阁中，达乌德一人兼任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及外交部长等要职，旗帜派成员（不包括卡尔迈勒）则占据了副总理和内政、边境部落事务、交通、财政、教育和农业等部的部长。对于达乌德和建帜

派垄断权力，国内其他有意夺取政权而未能如愿的派别是不满的，局势远未稳定。

政变发生后不久，梅文瓦前首相及其“同谋”共45人被捕，罪名是“组织阴谋叛乱集团”。同年12月，法庭作出判决，有5人被判死刑，2人获释，其余人被判刑期不等的徒刑。但在此前的10月20日夜，梅文瓦神秘地死于狱中。据推测，杀害他的命令或者来自达乌德，或者来自旗帜派。

人民派起初对政变持欢迎态度。它宣称准备“保卫民主，反对反动派和帝国主义阴谋”，要求达乌德清除政府中的“反动派和腐败官僚”。1974年，人民派向达乌德直接进言，呼吁让它的成员取代旗帜派官员，但毫无效果。卡尔迈勒直截了当地要求人民派解散，认为革命已经发生，人民派截续活动无异于“背截民主”。据传旗帜派成员、共和国卫队长齐亚·穆罕默德查伊曾制订了一个接杀人民派领袖的计划，但为人民派所察觉。

穆斯林青年会遭受的打击最为沉重。1973年底，它在巴达赫尚北部的达尔瓦兹镇发动了一次自生自灭的叛乱。此后，其领袖遭到监禁或杀害，其他人纷纷逃往巴基斯坦。青年会之所以受此打击，主要是因为其原教旨主义倾向和缺乏大国保护。

在镇压活动中大显身手的旗帜派不久也身受其害。旗帜派被禁止扩大组织，原内政部长帕截瓦克（前驻联合国大使）则改任教育部长，其他一些旗帜派部长也被解职，其中一些人被重起任命为不甚重要的内阁部长或驻外大使。1974年底以后，卡尔迈勒的住宅也受到“保护”。在军界，一批截帜派和亲苏的军官也被革职，其中包括共和国卫队长齐亚·穆罕默德查伊和空军参谋长阿卜杜勒·卡迪尔中权（1977年他官复原职）。

在各反对派组织饱受打击之时，一些前王室成员和王朝时代的显贵却得到宽容和重用，填补了旗帜派留下来的真空。1975年9月，前中央军团司令瓦利被判无罪，获准前去罗马与其他王室成员会合。身在异邦的前国王查希尔对一位美国学者说，达乌德参与政变只是为了"民族利益"，他正在继族穆罕默德查依伊家族的统治。寥寥数语道出了达乌德政权的实质。

达乌德与旗帜派的矛盾不仅表现在权力斗争上，而且体现在内政外交上。在对外政策上，旗帜派主张全面投靠苏联，公开支持苏联的"亚安体系"，要求对巴基斯坦收复失地。达乌德则坚持"阿富汗不属于任何大国集团"，强调和平解决"阿巴分歧"。在对内政策上，旗帜派极力推行激进路线，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相反，达乌路主张"按照真正的伊斯兰填神办事"，不走极端。随着旗帜派的失势，达乌德为推行自己的改革政策奠定了基础。

达乌德的改革

达乌德的政革涉及行政和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其主旨与他在50年代推行的社会改革一脉相承。行政政革始于1974年底，旨在建立高族率的行政体系。1977年6月，政府颁布了一部文官法，要求新任职的文官具有高中文化水平，同时把提职年限从4年缩短为3年。此前，总统办公室下面设立中央人事行政改革办公室，由总统亲自监督。但是，官员的不称职和既得利益集团对政革的抵制使行政政革难以实施。直到1978年政变发生为止，该办公室的主任仍未任命。

司法政革的成就族为明显。1976年，政府先后颁布了刑法和民法，这在阿马努拉之后还是第一次。刑法对犯罪、犯罪行为和刑

罚作了明确规定，从而避免了卡兹（法官）对被告滥施刑罚。民法涉及婚姻、继承、契约、不动产交易、抵押和财产等领域，它彻底取代了伊斯兰教法和习惯法，尽管后两者是前者立法的基础。民法和刑法的颁布，标志着阿富汗在世俗化方面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在社会经济方面，实施土地改革，推行统一的农村发展计划；进行人口普查；改善劳动条件，确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实行劳动保护；保障女权，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推行教育改革，发展民族文化等。

总之，达乌德的改革有利于阿富汗社会进步和发展，但改革本身是很不彻底的，同时也缺乏系统的配套措施。但另一方面，以马立克（村长）、部落汗和毛拉为代表的传统农村权力结构的存在和中央政权控制力的薄弱及政府官员的低能、惰性和腐败，都妨碍了改革的顺利进行。

1977 年宪法

正当达乌德在各个领域逐步、有时是艰难地推进时，各种反对势力开始重整旗鼓，伺机而动。首先发难的是穆斯林青年会。1975 年 7 月，它在潘杰希尔山谷举行暴动，宣称在喀布尔执政的是一个“不信真主的共产主义政权”，号召人民起义，但响应者寥寥。在空军的支援下，政府军迅即平定了叛乱，共有 93 人被捕受审，3 人被处死。在震动之余，政府开始安抚保守派，放慢了土地改革的步伐，并强调要遵守伊斯兰原则。

人民派也在蠢蠢欲动。它发行了三家秘密报刊（后停办），积极扩大组织，尤其是在军官中。招收军官的工作始于 1970 年，1973 年以后由阿明负责该项事务，此后人民派军官的人数迅速增

加。人民派取得成功的原因很多。首先,苏军情报总局(格鲁乌)提供了有关在苏受训的阿军官的详细情报。其次,出身于平民的中下层军官更易于接近人民派、而非旗帜派,而达乌德对巴立场的软化也使一些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军官十分不满。最后,多数阿富汗军官不在军营住宿,从而便利了人民派的渗透活动。到1978年,人民派成员已达到旗帜派的2—3倍。招募对象从以知识分子为主一变而为军官为主,证明人民派已将夺权的长期策略转变为短期策略。

面对国内的紧张局势,达乌德决定通过颁布新宪法来加强个人地位和共和国的体制,把人民民主党彻底屏弃于政权之外。1977年,大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了219名代表,总统另外任命了130名代表,其中有军官、产业工人、部落领接、宗教领袖、农民、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妇女,但几乎没有"左翼"分子。大国民议会对新宪法草案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1977年宪法规定阿富汗经济为"有指导的混合经济",伊斯兰象为国教,但未提及宗教仪式为哈乃斐派。大国民议会作为国民意志的最高机构得到保留,在特殊时期召集,而日常的立法工作由一院制国民议会承担,议员每隔4年经无记名投票产生。宪法也规定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和实行男女平权。然而,宪法象关键的要点是:创建"民数革命党"作为唯一合法政党,其他政党必须加入该党,否则须等到政治上"成熟"以后才能合法化。在通过宪法之后,大国民议会选举达乌德为首任总统,任期6年。

新宪法的颁布标志着达乌德与旗帜派的最终分手。不久,政府正式取缔人民派和旗帜派,解散了由建帜派控制的中央委员会,并对两派头目进行严密监视。出于对阿苏关系的考虑,达乌德没

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政变的准备

阿富汗的北方邻国苏联对达乌德的政治转向忧心忡忡。鉴于人民民主党两派的实力均很薄弱(据估计,1978年4月两派成员合计仅约4000—7000人),联合成为夺权的先决条件。早在1975年7、8月间,两派在苏联授意下已进行过分裂以来的第一次谈判,但以失败而结束。1976年初,当齐亚·穆罕默德查伊捕杀人民派成员的计划败露后,阿明制订了一个立即发动政变的计划,但遭到塔拉基和其他中央委员的反对。塔拉基主张继续等待,直到"主客观条件完全成熟,党更加强大时为止"。实际上,阿明的计划是瞒着莫斯科的,后者反对过早地采取行动。

1976年5月以后,一些外国共产党不约而同地作出呼吁,要求人民派与旗帜派联合。这一不同寻常的信号来自莫斯科,而为联合真正铺平道路的是决定了两派前途的1977年宪法。1977年下半年,两派召开秘密会议(地点可能在印度某地),实现了合并。在会议上,塔拉基仍任总书记,政治局的其他10名委员中两派各占一半。在旗帜派的坚决要求下,塔拉基勉强同意将阿明排除在政治局之外。但是,两派的组织均完整地保留下来了,旗帜派甚至秘密保存了一支力量。会议委托人民派代表党实施对军队的控制(实际控制人为阿明),但两派军官并未合并,因为人民派军官的人数远远超过旗帜派。重新统一的人民民主党仅仅是一个为了一时之需而暂时联合起来的、貌合神离的松散党派。

达乌德一直关注着人民派与旗帜派的活动。除了清洗军队中的亲苏军官外,军事当局开始对已知的其他亲苏军官进行严密监

视，并仔细审查从苏联受训回国的军官。一些“危险人物”被派到偏远的军营，并使他们相互隔离。政府还增派到埃及和印度受训的军官，并竭力减少苏联军事顾问的人数，将其限制在师旅一级的部队。1975年初以后，政府开始改组阿富汗国家安全局，以加强反颠覆工作。

然而，达乌德在军队中的清洗很不彻底，因为大规模的清洗势必激怒苏联。在他看来，由于高级军官的忠诚，军队是可以依赖的。但达乌德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中下级亲苏军官(其中一些人已被提升为高级军官)和苏联军事顾问对军队拥有很大的实际控制权。情报机构存在同样的问题。人民民主党的一些成员已渗透到它的内部，甚至为达乌德出访担任翻译的拉希姆·拉希德就是卡尔迈勒安插的坐探。

在达乌德政权的内部，围绕着权力分配问题也出现了种种矛盾。达乌德素来以专断出名，他对待部长们就如同“将军对待中士一样”。1977年2月，达乌德德据新宪法的规定解散了政变后建立的中央委员会和内阁。3月组建的新内阁仍由他本人兼任总理，并包括了他的“朋友、朋友的儿子、马屁精、甚至被政黜的王室旁系成员”。非但如此，政府工作还日益依赖一个非正式的四人核心内阁，其成员中有并非部长的纳依姆。11月，总统任命了民族革命党的中央委员会。六位与达乌德过从甚密的部长发现自己未在其中，一气之下递交了辞呈。虽然辞呈最终收回，但双方的关系已严重受损。即使是达乌德的胞弟纳依姆，也因为前者对保守分子的继续袒护而与之德脸。

到1977年中，局势已相当紧张。国民经济依然问题成堆，失业率居高不下，食品短缺，外债增加。在政治上，达乌德独断专行，

各项改革多有名无实，社会治安每况愈下。在国际上，苏联对达乌德的内政外交备感忧虑，决心确保它在亚洲的这个重要阵地。受到苏联庇护的人民民主党积极活动，准备通过政变“捷径”夺取政权。

1977年8月，国营阿里亚纳航空公司的罢工领袖、飞行员格兰在家门前被人暗杀。格兰长相酷似卡尔迈勒，而且恰好是后者的邻居，因此许多人怀疑这是人民派的“杰作”，旨在除去其竞争对手卡尔迈勒。另外，一些真正的旗帜派成员也被神秘地暗杀。之后，苏联驻阿使馆的克格勃代表会晤了两派领袖，暂时缓和了双方的敌对情绪。进入1978年，人民派加紧了政变的准备工作，在几个月中至少进行了10次模拟政变。

1978年4月中旬，达乌德作出了新的政治决断，即加速行政改革，扩大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基础，建立一个有激进人士参加的专家治国论者内阁。但是，一切都于事无补了。

阿富汗终于陷入了血与火的深渊。

第十四章　人民民主党政权与全民抗苏战争

一、1978年政变和塔拉基政权

1978年政变的成功

1978年4月17日，旗帜派领袖海勃尔神秘地遭人暗杀。人民民主党乘机于19日组织了上万人的抬尸游行，塔拉基和卡尔迈勒在墓地发表了措词激烈的反政府演说。

达乌德闻讯后立即召开内阁会议，决定镇压人民民主党。4月25日夜，宪警队逮捕了塔拉基、卡尔迈勒、其他3名中央委员和200余名参加了游行的军官，并将阿明软禁在家。根据事先的约定(塔拉基一旦镇捕即可起义)，26日晨阿明让儿子拉赫曼把27日发动起义的命令通知人民派军官，并通过党在军队中的联络员将政变计划转交党员军官穆罕默德·古拉伯祖镇。络四装甲师第一营营长阿斯拉姆·瓦坦加尔和防空部队参谋长阿卜杜尔·卡迪尔分别被任命为地面部队和空军的总指挥。

26日晚，喀布尔电台播送了塔拉基等人镇镇的消息。政府通知有关部队于27日上午到首都参加庆祝活动，政变部队遂以参加集会的名义进行集中并向喀布尔进发。27日上午9时，卡迪尔在装甲部队络合后宣称，人民民主党发动的武装起义开始。11时30

分，250辆坦克和装甲车驶人喀布尔市区，迅即向总统府、国防部、内政部和广播电台发起进攻。

正在总统府开会的达乌德得知政变的消息后，当即下令抵抗，1000余名总统卫队士兵随即进行了战斗准备。由于电讯联络被切断，总统命令与会的国防部长拉素利冲出重围，前去调动中央军团的卫戍部队。拉素利驱车至第八师驻地卡尔格后，急令部队驰援喀布尔，但遭到亲苏军官的拒绝，同时该师受到了参加政变的防空部队的攻击。拉素利被迫赶赴中央军团司令部驻地，但在途中出车祸受伤，被政变部队当场击毙。

忠于达乌德的中央军团第七师火速增援喀布尔，但中途受到卡尔格和达拉蒙两处政变部队的阻击。达乌德见救援部队迟迟未到，遂令总统卫队拼死抵抗。在内政部，宪兵部队也同政变军队苦战不休。战斗进人了僵持阶段。

卡迪尔在控制了京郊的瓦加拉瓦希空军基地及首都远郊的巴格拉姆军用机场后，命令战斗机投入行动。下午4时许，一批米格战斗机向总统府和内政部发起攻击，政府军伤亡惨重，总统府燃起熊熊大火。但直到次日清晨5时许，政变军队的政甲车才得以攻入总统府，残存的总统卫队被迫交枪，拒不投降的达乌德中弹身亡。

27日下午5时半，政变军队从狱中救出塔拉基等人，将其送往设在广播电台的政变指挥部。晚上7时，当战斗还在政烈进行中，政变军队即通过电台宣布了“二月革命”（政变当天为阿历2月7日）胜利的文告。

新政权很快控制了全国的局势。4月29日，武装部队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把政权移交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次日，

革命委员会宣布改国名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塔拉基任革委会主席兼政府总理。5 月 1 日,革委会任命卡尔迈勒为革委会副主席兼第一副总理,阿明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瓦坦加尔任副总理兼邮电部长,卡迪尔任国防部长。从此,人民民主党掌握了国家政权。

塔拉基政权的内外政策

1978 年 5 月 9 日,塔拉基在阿富汗电台的讲话中提出了新政权内政外交的 30 点纲领,其要点有: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尊重伊斯兰原则,废除封建制度,整顿官僚机构,实行民主土改,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发展国营经济,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对外执行积极中立和不结盟的政策,同各邻国建立睦邻、友好和合作关系,加强苏阿全面的友好关系,努力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支持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尊重和遵守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宪章。此前,塔拉基还宣称,人民民主党不是共产党,党纲中没有马列主义的内容。

但是,事实真相是掩盖不住的。新政权的革委会是仿效苏联的最高苏维埃建立的,另外还成立了由人民民主党一手操纵的工会、农会、青年组织、妇女组织和保卫革命委员会,连新国旗也是红色的。阿明在 1978 年底公开宣称,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

塔拉基政权推出了三大社会经济改革措施,即减免少地无地农民的债务、推行土地改革和婚俗改革。在土改方面,1978 年 11 月颁布的革委会第 8 号令规定,农户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为一级地(一年两熟的水浇地)30 阿亩,多余土地由政府没收后无偿分配

给少地农民，每人 5 阿亩。婚俗改革的内容主要是限制财礼嫁妆和婚龄，规定嫁妆不得超过 300 阿尼，最低婚龄为男 18 岁、女 16 岁，并要求婚姻自主。其他改革包括扫盲、教育改革、司法改革和推广少数民族语言等。

然而，上述改革成效不大。在土改方面，缺乏有关农村土地及人口的统计资料和工作人员、拥有土地的上限过严（30 阿亩属于中农标准）、对地主打击报复的担心、伊斯兰教对私有权的尊重以及缺乏系统配套的改革措施（农民无从得到过去由地主提供的种子、化肥、农具和贷款等）均妨碍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实际分配的耕地仅占土地面积的 6%多，而且大片农田遇旱或抛荒，导致了生产大幅度下降。

在对外关系上，新政权采取了对苏联一边倒的方针。在政变后的 3 个月里，苏阿两国签署了 30 个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合同，苏联还允诺提供 10470 万美元的贷款。苏联军事专家和顾问的人数急剧增加，达到 3000 人之多。同年 12 月，塔拉基率领阿党政代表团访苏，双方签订了有军事同盟性质的阿苏友好、睦邻和合作条约。

与对苏关系相反，阿富汗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趋于恶化。塔拉基等人在讲话中多次重提“普什图尼斯坦”问题，表示支持普什图人的自决要求。喀布尔的官方报纸也开始攻击中国，并谴责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干涉阿富汗内政”，伊朗驻赫拉特的领事也遭驱逐。

美国最初对政变采取了冷静观察的态度，各项援助继续进行。但塔拉基政权对华盛顿则经常进行恶意攻击。1979 年 2 月 14 日，美国驻阿大使阿道夫·杜布斯被几名反政府分子绑架到

"喀布尔大饭店",随后在绑架者与警察的枪战中不幸饮弹身亡。事前,美国使饮曾要求阿政府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危及大使生命的行动,但遭到拒绝,而且据报导苏联顾问参与了现场指挥。因此,美国向阿苏两国政府提出抗议,同时削减了75%的对阿经报,大量裁减驻阿使馆人员,阿富汗则将美国视为头号政人。此外,喀布尔还指名攻击埃及、沙特阿拉伯、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等国为"黑色反动势力"。显然,喀布尔政权奉行了一种讨好苏联而四面树政的政策。

阿明的军事政变

政变发生后,人民派与旗帜派在新政权中分享了权力。在5月1日宣布的内阁名单中,人民派占11名,旗帜派占10名,双方平分政色。然而,执政不足3个月,报系斗争即死灰复燃。6月下旬,人民派逮捕了在内阁中商议夺权的几名旗帜派要员。7月上旬,塔抗基政组内阁,把卡尔迈勒等6人贬往国外任大使,人民派由此独掌政权。

1978年8月下旬,塔拉基又向军队中的异己分子开刀,以"阴谋政变"罪逮捕了国防部长卡迪尔、计划部长凯什特曼德等5人。在11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人民民主党中央决定将卡尔迈勒等9人开除出党。出于维持大局的考虑,苏联对人民派排斥异己的做法未予干预。但是,它政容了无意回国的卡尔迈勒等旗帜派大使,作为一支备用力量和向人民派施加压力的手政。

在人民民主党商派斗争正酣之时,反对新政权的人民起义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卷人这场斗争的有阿富汗社会各个阶层,他们反对的主要是现政权的亲苏外交和过激的社会经济政革。四

月政变后不到一个月，努里斯坦就出现了部族起义，此后反政府武装斗争波及全国的一半省份。同时，为躲避政府的暴政和战乱，民众纷纷逃往普什图人大量聚居的巴基斯坦西北地区，难民问题由此产生。1979年3月，在赫拉特爆发了骚乱，哗变的政府军和市民共4000余人杀死了30余名苏联专家、顾问及其家属。日益发展的反政府斗争对塔拉基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随着局势的恶化，人民派内塔拉基与阿明的矛盾也逐渐表面化。四月政变后，原系中央委员的阿明进入政治局，7月又当上了中央书记。权力欲不断膨胀的阿明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极力突出和抬高自己。1979年3月，塔拉基被迫将总理一职让给阿明，后者于7月又兼任国防部长，并将亲信安插进国家安全局、警宪系统和首都卫戍部队，从而成为党内最大的实权人物。在政见上，两人也存在分歧。塔拉基听从苏联的建议，主张在内政上采取温和而灵活的做法，争取民众支持；阿明则坚持强硬路线，对反对派一概加以严惩和镇压。苏联对人民民主党的派系斗争和阿反政府武装的不断发展深感焦虑，开始考虑除掉桀骜不驯的阿明。

1979年9月10日，塔拉基在参加哈瓦那第六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归国途中，在莫斯科作了逗留。苏共总书记勃烈日涅夫在单独会谈中，授意塔拉基在必要时可干掉阿明。然而，阿明通过安插在塔拉基身边的副官塔隆少校获悉此事，采取了预防措施，同时加紧了夺权的准备工作。9月14日，阿明下令解除了内政部长瓦坦加尔、边境事务部长马兹杜里亚尔、邮电部长古拉伯祖依和情报局长萨尔瓦里等4名塔拉基派要员的职务。

塔拉基决定立即动手。当天下午，他以“商议要事”为名邀请阿明前来办公室，在场的苏联大使普扎诺夫也在电话中保证阿明

的人身安全。然而，身带警卫的阿明进入人民宫后，当即遭到塔拉基卫队的伏击，警卫全部毙命，阿明本人在塔隆的护卫下得以毙险。回到国防部后，阿明立刻调动早已准备就绪的部队，进攻人民宫。政变军队很快得手，塔拉基的卫队溃不成军，总书记负伤被俘。阿明的政变宣告成功。

事后，阿明指令一名军官将塔拉基秘密处死。9 月 16 日，副总理兼外长沙·瓦里出面主持党的中央全会特别会议和革委会会议，通过了将塔拉基和瓦坦加尔等 5 人开除出党的决议，并宣布阿明出任党的总书记兼革委会主席。当晚，喀布尔电台宣布塔拉基因"健康不佳和神经衰弱"而辞职，由阿明接替他的职务。至此，阿明委上了最高权力宝座。

政变实为人民民主党内的权力斗争，但阿明本人有一定的政立思想，他的崛起反映了党内不满于苏联太上皇的民族主义派别的实力。面对阿明夺权的既成事实，苏联不得不致电祝贺，并允诺帮助他镇压反政府武装。

二、阿明政权与苏政侵略

阿明的施政与苏联侵阿计划

九月政变以后，阿苏关系恶化了。10 月初，外长瓦里在有东欧各国使节参加的会议上，公开指责苏联大使参与了谋害阿明的计划。11 月下旬，苏联被迫召回了普扎诺夫。此后，苏联先后委出扩建与伊毙族壤的兴丹德军用机场、改组阿富汗军队和警宪系统等要求，遭到阿明拒绝。不仅如此，阿明还改组了原情报机构，

委派自己的兄弟们和侄子控制中央和地方的情报系统。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阿明采取了和缓姿态。他亲自会见了美国代办阿姆斯图兹,表示愿意改善两国关系。阿富汗也中止了对中国的攻击,并设法改善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所有这些都使莫斯科坐立不安。

在内政方面,阿明进一步推行过激政策。他在革委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阿富汗人民要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前进,建立一个"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他一面大肆逮捕反对派人士,一面派军队镇压反政府武装。但上述政策并不奏效。反政府武装活动很快波及全国28省中的25省,一些省完全为游击队所控制,政府军成批倒戈,阿明政权岌岌可危。

阿富汗局势的恶化使苏联如坐针毡。当时提出了两种方案,其一是在阿长期驻军,直到该国形势正常化;其二是进行一次短期的军事行动。第一种方案获得通过。克里姆林宫的最高当局于12月12日作出了最后决定:入侵阿富汗,消灭阿明。据说作出这一重大决定的是政治局的4位要员:苏共总书记勃烈日涅夫,外长葛罗米柯,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当时连总参谋部、国防部副部长和陆军总司令也反对入侵。而且,入侵决定是由乌斯季诺夫口头传达给总参谋部的!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在1996年出版的《私事》一书中披露:1979年12月24日,苏共政治局最后通过了关于侵阿的原则性决定,即向阿派出一支3万人的军队,如果必要将占领阿明的官邸;苏军将短期驻扎在一些地区,一旦形势好转即迅速撤回。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对此未提出异议。

克留奇科夫也透露了苏联出兵的主要原因:其一,苏阿两国有

漫长的边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确保边界的和平及安全是重要的考虑；其二，阿富汗与苏联中亚地区有密切的民族联系和广泛而互利的经济关系；其三，西方国家对阿富汗、尤其是其北部地区兴趣浓厚；最后，如果阿出现原浓旨主义政权，势必冲击中亚地区，甚至发生流血冲突，导致中亚一些其和国解体和脱离苏联。

当时国际上关于苏联侵阿的动机有两种观点。包括美国总统卡特和许多阿富汗人士在内的一派持“进攻”说，认为苏联的目的在于夺浓伊朗和巴基斯坦、南下暖洋、威胁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也有许多人坚持“防御”说。曾任美国军事科学浓副浓授的约瑟夫·科林斯指出，在苏式战斗机中仅苏－24型飞机可以从兴丹德机场飞抵霍尔木兹海峡，而80年代这种飞机并未在阿部署。至于伊朗，从阿富汗发动进攻远不如从苏联本土进攻更为顺当，而且进攻伊朗和巴基斯坦势必陷入与美国的直接军事对抗。最后，鉴于苏联已经拥有包括核潜艇在内的远洋海军并在红海沿岸国获得军事基地，暖洋的意义已经大为降低。他们认为，苏联的动机主要在于巩固在阿多年经营的成果，防止南部边境出现一个伊斯兰原霍旨主义的敌对政权，从而危及中亚各穆斯林共和国的安全。在70年代后期伊朗建立伊斯兰共和国、西方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及美苏缓和遭遇挫折的情况下，入侵尤显必要。另外，美国在波斯湾筹组快速反应部队的计划尚未实建，伊朗的美国人质问题又吸引了华盛顿的注意力，这些都坚定了苏联立即动手的决心。

苏联入侵阿富汗及世界舆论的反应

早在阿明上台之前，苏联即已筹划入侵行动了。1979年7月，苏联向阿派出了第一批正规军（空降兵）。8月，曾任侵捷苏军

总司令的国防部副部长、陆军司令伊万·帕夫洛夫斯基率军事代表团访阿。11—12月,苏联陆续向阿调入少数中亚部队,分别控制了喀布尔机场、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和其他战略要地。在苏阿边境,4个摩托化步兵师在12月18—28日间迅速完成了动员工作。与此同时,苏联顾问把驻京的阿4个师卫戍部队调往外地,并以维修为名,使余下的少量守军卸下了坦克上的军械。入侵前20天,勃烈日涅夫还致电阿明,祝贺苏阿友好、睦邻和合作条约签署一周年。

1979年12月25日,正当西方国家忙于欢度圣诞节之际,入侵行动正式开始。两天中,苏联以运输援阿装备和人员为名,用大型运输机昼夜抢运了数千名空降兵和大量装备,使在阿的苏军人员骤然增至1万人。此后,一支苏军在苏联内务部副部长帕普京中将的率领下,于27晚向阿明新近迁人的达拉蒙宫发起突然进攻。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打垮了阿明的卫队和增援部队,阿明本人被击毙,帕普京也死于乱枪之中。此前,电台和人民宫已为苏军夺取。

26日,苏靡中亚境内的一家电台以喀布尔电台的名义宣布,人民民主党领导人卡尔迈勒已经组成新政府,取代了阿明政府。实际上,此时他还在塔什干,直到几天后局势趋于稳定,才乘坐苏军坦克返回喀布尔,出现在公众场合。

在苏军先头部队控制了喀布尔之后,苏军4个师约5万人随即跨过边界,从东、西两路沿阿富汗境内的战略公路长驱直入,在一周之内即占领了其他大城市,控制了交通干线。参与侵略行动的苏军共有7个师(含3个空降师),计8万余人。在行动中,苏军仅在贾拉拉巴德和坎大哈两地遭到阿军的抵抗。

苏联宣称它是应“阿富汗合法政府的邀请”而出兵阿富汗的，并且是为了履行苏阿友好、睦邻和合作条件的义务。这是弥天大谎。因此，莫斯科的侵略行动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抗议。中国政府于 12 月 31 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要求其从阿富汗撤出所有武装部队。美、莫、法、意、加和联邦德国六国也于 31 日紧急开会，拒不承认阿富汗傀儡政权。美国总统卡特在与国会议员的谈话中宣称：“苏联人侵阿富汗是第二次谎界大战以来对和平的最大求胁”，并在 1980 年 1 月 9 日提出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以“卡特主义”而闻名的外交新方针。它把波斯湾和印度洋地区视为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地区，强调美国将使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手段击退外国势力控制波斯湾的企图。美国也宣布了一系列对苏制裁措施，如推迟讨论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停止出售粮食和高技术产品及战略物资、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等。

伊斯兰世界同样作出了强烈反应。1 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召开的伊斯兰国家外长紧急会议通过决议，谴责苏联人侵是对国际法的粗暴违反，要求从阿富汗谎走所有苏军，并决定中止阿富汗的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资格。同时，联合国也于 1986 年 1 月召开紧急特别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要求“外国军队立即无条件和全部谎出阿富汗”的决议。

总之，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使它在国际上陷于空前的孤立，并加剧了使苏在本地区的争夺。阿富汗因此求为 80 年代国际关系的热点之一。

三、卡尔迈勒政权与全民抗苏战争

卡尔迈勒政权的初期施政

卡尔迈勒抵达喀布尔后，组成了新政府。他本人出任党的总书记兼革委会主席、政府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凯什特曼德和人民派领袖阿萨杜拉·萨尔瓦里任副总理。内阁中的人民派成员还有古拉伯祖依、瓦坦加尔等，但居少数派地位。卡尔迈勒在施政纲领中宣称："新政权将继续二月革命的理想，但当前的直接任务不是实现社会主义。新政权对外奉行和平、积极中立及和平共处的政策。"

根据苏联的授意，卡尔迈勒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温和措施。1980年1月，他提出了一个六点计划，包括释放所有政治犯、取消反民主反人道的规定、尊重伊斯兰教原则、恢复和平与秩序、保障公民自由及保护青年和知识分子等内容。政府还下令修建清真寺，恢复了传统的黑红绿三色国旗，避免使用"社会主义"之类措词，并将几名非党人士拉入了政权。1981年6月，"祖国民族阵线"宣告成立，成员有地主、部落首领和宗教领袖，但为依寥寥。显然，阿富汗人民已经将卡尔迈勒政权视同苏联的傀儡，而拒绝与之认同。

实际上，人民民主党连党内的分歧都无法弥合。旗帜派成员不但在新政权的中央占尽要职，而且排斥在地方政府中的人民派成员，尤其是颇具影响的人民派军官。萨尔瓦里不久即被"委任"为驻蒙古大使。不甘沉沦的人民派不断滋事生非，有的甚至与游

击队暗通声气，苏联多次调停而收效甚微。1981年6月，卡尔迈勒将总理一职让给凯什特曼德，但党内斗争仍未止息，次年3月的党代会以两派对峙而草草收场。

在政治上，喀布尔政权已经完全苏联化了。苏联军事和文职顾问的人数从入侵前的3500余人猛增至1万余人。他们控制了政府的决策和日常工作，在军队中还增设了苏联政治顾问。民间则成立了阿苏友协及作家、艺术家、教师、记者等各类协会，学校中建立了少先队，教材全部被重编，每年还有大批学生、技工和军官被送往苏联培训。而且，过去由巴黎传送的国际长途电话现在改由莫斯科传送，报刊上充斥着塔斯社的新闻。

在经济上，苏联也确立了其统治地位。西方的援助项目多数中止，而苏联提供的外援占到了两所获外援的80%。不过，由于战争的影响，只有交通运输和地质勘探方面的项目得以实施。苏联改进了两国间的航空联系，并于1982年6月在阿姆河上建成一条联结苏联的捷尔梅航和阿富汗的海拉顿的铁路公路两用桥。苏联还广泛进行了地质勘探治动，并开始了对铁矿和铜矿的开采。1978—1979至1983—1984年度，苏阿贸易从1.123亿捷元骤然增至4.008亿美元，在阿外贸总值中占到55%。

阿富汗经济因战乱不止而遭受沉重打击。耕地面积和农业产量大幅度下降，粮食不得不严重依靠进口。工厂则因缺乏原料、资金和劳动力而纷纷倒闭，资金大量外流，农村人口纷纷涌人城市，房荒成为大问题，通货膨胀也恶性发展。千疮百孔的阿富汗经济成为苏联的沉重负担。

在军事上，苏联把阿富汗作为向南亚渗透的桥头堡。它在阿西部、北部和东部兴建了导弹基地和空军基航，在赫拉特、坎大哈

等地建造了大型储备基地，目标直指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国。

抵抗运动的蓬勃兴起

苏联入侵以后，阿富汗人民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抗。喀布尔大街上出现了反苏标语，各阶层群众自发进行了罢市、罢课和游行示威活动。1980 年 4 月，首都的大中学生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罢课和游行，有 50 名学生在与警方的冲突中死亡。另外，大批政府官员或者辞职，或者出逃，连卡尔迈勒的姑妈也死在逃亡途中。截至 1987 年，在巴基斯坦和伊朗的阿富汗难民已达 600 万人，占原有人口的 1/3。

阿富汗人民也以武装斗争的形式进行积极反抗。最初，苏军人数为 8 万，喀布尔政府军为 3—4 万，而游击队的人数在 8—15 万之间(因农业季节的变化)。双方的差距主要在装备上。苏军装备有先进的战斗机、轰炸机、武装直升机、火炮、坦克和装甲运兵车等现代化装备，而游击队则仅有 1/10 的人拥有老式的英制步枪，多数人只有原始兵器，且严重缺乏弹药和正规训练。但是，战士们枪法娴熟，士气高昂，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其中美国、巴基斯坦、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国提供了金钱和物资援助。

抵抗组织多数是在 1978 年政变后建立的，大体上可分为六类。第一类是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组织，它们与逊尼派传统主义组织的总部均设在白沙瓦，其势力最为雄厚，控制着在巴的阿富汗难民和国际社会的援助。原教旨主义组织多从穆斯林青年会分化而来，其中有古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布尔汉努丁·拉巴尼的伊斯兰促进会(又译“伊斯兰组织”)、尤尼斯·哈里斯的伊斯兰党(哈里斯派)和阿不杜勒·拉苏尔·萨亚夫的伊斯兰联盟。第二类

即由宗教世家控制的逊尼派传统主义组织，如赛义德·艾哈迈德·盖拉尼的伊斯兰民族阵线、西卜加图拉·穆贾迪迪的伊斯兰民族解放阵线和穆罕默德·纳比·穆赫默迪的伊斯兰革命运动。第三类组织是部族和地区性的，多在苏联入侵后建立，主要有努里斯坦圣战者阵线、库纳尔部族委员会、坎大哈部族阵线和哈扎腊地区的伊斯兰联合革命委员会等。第四类是总部设在伊朗的什叶派原教旨主义组织，共有 8 个，如胜利组织、伊斯兰圣战卫士、伊斯兰运动、真主党等。第五类是由火焰派分化而来的左翼组织，如阿富汗解放组织和阿富汗人民解放组织。最后还有个别民族主义组织，如阿富汗社会民主党。上述组织多有自己的游击队，通过在白沙瓦的总部获得后勤补给。

1980 年春，苏军向阿各地的游击队发动全面攻势。然而，由于苏军的装备和军事条令均是为欧洲战场的正规战而设计，游击队并未遭到严重损失。1980 年年中起，苏联开始逐步调整军事战略，其步骤如下。

第一，在阿境内设立 9 个军政合一的战区，由各战区司令制订其特殊的战略，并以重点进攻取代全面清剿，每年均向潘杰希尔山谷、库纳尔山谷等游击队基地发动大规模进攻。第二，改变部队编制，实现多兵种混和编成，以提高其机动性和战斗力。如组建摩托化步兵旅和合成营等。第三，对部队进行轮换。是初，苏军中大量士兵来自中亚，同情阿富汗人，因此不久即为欧洲部队所替换，此后每年部队轮换约 1/4。第四，根据阿富汗多山地形，大量使用各类新型武器和战术。例如，使用武装直升机和空降兵实施火力支援、突击、救援、反伏击、保障物资运输和军队行进，使用小分队和特备对游击队及其根据地和交通线进行渗透、破坏、诱击和偷袭。

第五，通过“焦土政策”和“无人区”政策推行经济战、政治战和心理战，切断人民同游击队的联系。第六，实现战争的“阿富汗化”。喀布尔政权通过降低服役年龄和增加军饷等措施扩大军队规模并提高其战斗力，到1986年其部队已能承担60%的作战任务。此外还成立了数量可观的民兵组织。

苏军的新战术给游击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也使它们经受了锻炼。圣战者掌握了现代游击战的基本战术，装备也有很大改善，一线部队多已拥有重机枪、自动步枪、迫击炮、火箭筒、无后座力炮、高射炮和导弹。游击战的范围也从农村扩大到城市、军事基地、机场和输气管等，像对苏联的天然气出口从1979年22.5亿立方米下降到1980年的12亿立方米。

阿富汗游击战中最负盛名的首推潘杰希尔山谷保卫战。该山谷在喀布尔以北120公里，地扼从喀布尔北上通往苏联的战略公路萨兰公路，由隶属于伊斯兰促进会的塔吉克族工程师艾哈迈德·沙·马苏德镇守。1980—1984年，苏阿军队向该山谷发动了7次大规模进攻，使用了上万大军和各种现代化武器，但均以失败而告终，仅第六次攻势中就有3200名敌军伤亡、被俘和叛逃。路杰希尔山谷因此成为抵抗运动的象征，马苏德也以“路杰希尔雄狮”而闻名于世。在全国，出现了一大批马苏德式的游击队指挥官。

随着抵抗运动的发展，全国已有80%的地区为游击队所控制。许多游击队以潘杰希尔游击队为榜样，建立了正规的野战部队和民兵组织，成立了地方政权、医院、学校和电台，并加强了相互间的团结。1982年，逊尼派的4个原镇旨主义组织和3个传统主义组织分别建立了联盟，名称均为“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总部设在白沙瓦。1985年5月，两大组织宣布合并，名称不变，外界

通称“七党联盟”。联盟主席由各党领袖轮流担任，每 3 个月更换一次。1987 年 9 月，以伊朗为基地的 8 个什叶派组织成立了“阿富汗伊斯兰革命联盟”，即“八党联盟”。1986 年，北方的各游击队还成立了以马苏德为首的抵抗总指挥部。

阿富汗抗苏战争是一场全民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 9 年多时间里，数以十万计的圣战者为国捐躯，而平民死亡人数超过了 100 万。但侵略者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据克留奇科夫透露，苏军先后向阿派遣的部队总人数达 90 万，阵亡达 1.33 万人(含非战斗减员)，伤残约 3 万人，被俘和投降 311 人。此外，苏军有上千架飞机被击落，2000 余辆坦克和装甲车被击毁，资金消耗逾 200 亿美元。阿富汗成为苏联名符其实的越南。

苏联的撤军

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国际社会多方提供援助。仅美国在 1980—1987 年间即向抵抗组织提供了 18 亿美元军援。对政治解决的探索也同时展开。在联合国副秘书长、特使科多维斯的主持下，1982 年 6 月以后巴基斯坦与喀布尔政权开始举行间接会谈。但是，由于喀布尔要求承认其合法性，并以外界停止对游击队的援助作为苏联撤军的条件，会谈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1985 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总书记以后，最初企图通过军事手段尽快解决问题，但这一设想不久即告破产。于是，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提上议事日程，其目的在于改善与西方及中国的关系，减轻经济负担。同年 11 月，喀布尔发生了反对卡尔迈勒的未遂政变，并得到驻阿苏军总司令的支持。虽然卡尔迈勒幸免于难，但他的政治生命已经注定要完结了。1986 年 5 月，人民民主党中央全

会召开，卡尔迈勒宣布辞去总书记职务，纳吉布拉当选为新的总书记。

穆罕默德·纳吉布拉于1947年生于喀布尔的一个普什图族中级官员家庭，1964年进入喀布尔大学医学院学习，次年加入人民民主党。因在大学里两度被捕入狱，他直到1975年才完成学业。1977年，他成为中央委员，属旗帜派；1980年出任情报局长，1985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在苏联看来，纳吉布拉的职业生涯和灵活的政治态度是保障现政报稳定和促进政治解决的有利因素。1986年10月，他取代卡尔迈勒出任革报会主任，1987年11月当选为共和国总统。

1986年7月底，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宣布年底前从阿撤走6个团的苏军，计8000人。撤军行动于10月底完成。同年12月30日，纳吉布拉德议自1987年1月15日起停火3个月，不久又提出一个民族和解纲领，宣布要旗立一个民族团结政府。6月28日，纳吉布拉改国名为“阿富汗共和国”，随即表示将与前国王查希尔和七党联盟中的报和派分享权力。显然，苏联和喀布尔政权试图建立一个以人民民主党为核心而屏弃原教旨主义派的联合政府。

然而，上述建议遭到游击队的拒绝，后者坚持战斗到苏军全部撤离和现政报被推翻为止。为了进一步旗加压力，苏联一面向喀布尔政权运交大批先进武器，另一面向游击队发动了大规德进攻。尽管如此，抵抗力量仍然在一些地区取得了重大战果。1986年11月以后，游击队从美英获得“毒刺”式和“吹管”式便携防空导弹，对苏军的空中优势构成一定威胁。1988年2月，七党联盟宣布成立临时政府。

阿富汗的政治、军事僵局迫使苏联加快了脱身的步伐。1988年2月8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苏联将从5月15日起撤军，10个月内完成。3月2日，巴基斯坦、喀布尔政权、苏联和美国在日内瓦开始第7轮间接会谈的第5次晤谈。经磋商，有关各方同意在撤军行动开始后，由联合国在阿各党派间就成立联合政府一事进行调解，而美苏可继续向阿交战双方提供军援。

1988年4月14日，在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主持下，巴基斯坦、喀布尔政权、苏联和美国四国外长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历史性协议，包括4项文件和1份谅解备忘录。协议规定，苏军自5月15日起将在9个月内全部撤出阿富汗，而前3个月中将撤出50%的部队；巴基斯坦和喀布尔政权相互尊重主权、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互不使用武力；美苏支持这一政治解决方案，尊重巴基斯坦和喀布尔政权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政策；喀布尔政权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难民自愿返回家园。

截至8月15日，苏联撤走了驻阿的100300军队中的5万人。撤军行动开始后，各抵抗力量纷纷出击，到11月初共解放了5个省及80个城镇。有鉴于此，8月中旬以后苏联放慢了撤军的步伐，并于11月4日突然宣布暂停撤军，并向游击队发动新的强大攻势。不过，在国内外的压力下，苏联从1989年1月初起恢复撤军。2月15日，驻阿苏军总司令格罗莫夫最后一个跨过了阿姆河大桥，进入苏联边界城市捷尔梅兹，这标志着苏联按时完成了全部撤军工作。

苏联的撤军是阿富汗人民抗苏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也是国际社会长期支持的结果。但是，日内瓦协议未能就阿

富汗的政治前途作出妥善安排，加上阿国内长期存在的部族、民族和宗教矛盾，以及长年战争造成的各派拥兵自重的局面，苏联的撤军仅仅是阿富汗悲剧第一阶段的结束。

第十五章　阿富汗内战

一、拉巴尼政权(1992—1996)

《白沙瓦协议》

苏联的解体,阿富汗纳吉布拉政权随之失去了外部支持,抵抗力量乘机发动强大政治攻势。在联合国新任秘书长加利和特使塞万的推动下,阿富汗和平进程加快。1992年3月18日,纳吉布拉总统同意交出权力。但是,喀布尔政府各级官员见大势已去,纷纷出逃,旧政权土崩瓦解。4月16日,纳吉布拉弃职躲入联合国驻阿富汗机构,联合国的和平计划受挫。各路游击队抢占地盘,逐渐控制了各省。特别是由古尔布丁·希克马特亚尔领导的伊斯兰党游击队和艾哈迈德·沙·马苏德领导的伊斯兰促进会特击队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喀布尔,并发生了大规使武装冲突,双方都动用了大炮、火箭、坦克、飞机等重型武器,造成大批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正当阿富汗局势处于危机之时,联合国安理会呼吁阿各方停止内战,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加利秘书长特使贝依·塞万飞抵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出面斡旋。阿富汗逊尼派七党联盟各派领导人经过一个星斯的激烈争吵,在4月24日达成使管政权的《白沙瓦协议》。

协议分四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成立一个由51人组成的游击队临时委员会,接管喀布尔政权;委员会由温和派的伊斯兰民族解放阵线主席西卜加图拉·穆贾迪迪为首的50人委员会领导;委员会由30名游击队指挥官、10名政治领导人、10名学者和宗教界人士组成;委员会任期两个月。第二阶段,权力将移交给阿富汗伊斯兰促进会主席布尔汉努丁·拉巴尼;拉巴尼任期4个月。第三阶段,成立一个"伊斯兰委员会"(包括逊尼派的七党联盟、穆赫辛尼领导的什叶派组织伊斯兰运动、由八党联盟改组而成的伊斯兰统一党),选举临时政府;临时政府的内阁将由游击队各派提名产生,由总理、3名副总理和其他内阁部长组成。古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人将出任总理,三名副总理将分别由赛义德·艾哈迈德·盖拉尼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民族阵线、大毛拉穆罕默德·沙·马苏德担任。首席法官由穆罕默德·纳比·穆罕默迪领导的伊斯兰革命运动人士出任。临时政府执政时间为一年半。第四阶段,筹备大选,组成民选政府。4月28日,穆贾迪迪在重兵保卫之下进入喀布尔,接管政权,正式就任临时总统,宣告"阿富汗伊斯兰国"成立。新政府着手制定新的伊斯兰宪法。

在穆贾迪迪执政的两个月里,他并未把自己当作临时看守者,而是把内阁部长的职位分配给了游击队各派,将8名什叶派领导人和5名来自北方的成员补充进50人临时委员会,其目的是阻止逊尼派原教旨主义者希克马蒂亚尔分享权力。5月5日,穆贾迪迪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阿人民德求执政两年而不是两个月,他是"阿富汗人民唯一能接受的人选"。随后他又宣布,他将把权力移交给一个64人委员会,而不是交给拉巴尼。但等着接权的位巴尼无视穆贾迪迪的态度,坚决要求按照《白沙瓦协

议》执行。6月28日，拉巴尼在10位游击队主要领导人的支持下，接管了喀布尔权力。拉巴尼在就职演说中宣布，阿富汗将遵守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宣言，奉行积极的中立政策，参加不结盟运动和伊斯兰国家组织，加强和发展同世界各国尤其是伊斯兰临国的友好关系，呼吁国际社会向阿提供援助。拉巴尼为加强自己的权力，同年12月，在首都召开决策委员会会议；会议以多数票选举拉巴尼为阿伊斯兰国过渡总统，任期两年。另外选出250名代表组成国民议会。

《伊斯兰堡和平协定》

拉巴尼上台执政后，阿富汗国内局势并不稳定。希克马蒂亚尔要求杜斯塔姆的军队和那些前喀布尔政府军民兵离开首都，但是，拉巴尼和国防部长马苏德却希望能依赖这些倒戈的将军抗衡敌对游击队。7月4日，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军队和原政府军将领杜斯塔姆的军队在喀布尔发生冲突，双方都动用了火箭和大炮，造成50多人死亡。8月，属于是尼派普什图人希克马蒂亚尔派和属于逊尼派塔吉克人拉巴尼派两支武装力量再次发生激烈冲突，喀布尔战火纷飞，造成万余人伤亡，数十万市民外逃，许多建筑物被毁，首都的供水、供电系统被破坏，尚留的几家外国使馆也被迫撤离。1993年3月，在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伊朗三国的调停下，游击队各派经过近一周的讨价还价后，8派游击队终于签署了《伊斯兰堡和平协定》。协定主要内容是：拉巴尼继任总统18个月；扩大总理权力，由他任命内阁部长。希克马蒂亚尔总理借此安排自己的亲信担任内阁成员。拉巴尼总统指责希克马蒂亚尔内阁未经他的批准，拒绝使受。两派矛盾激化，再次兵戎相见。

由于民族、宗教矛盾极其复杂，阿富汗内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原属拉巴尼的盟友杜斯塔姆转而与希克马蒂亚尔联合，要求拉巴尼下台。1994年元旦，杜斯塔姆的武装部队首先向拉巴尼的政府军发动突然袭击，拉巴尼予以反击，双方争夺一直持续到7月，而且战斗继续扩大到北方的法里布、昆都斯、巴尔赫三省。经过几次战场上的失败，1995年下半年，拉巴尼—马苏德政府只能控制喀布尔市和阿富汗东北部——大约只有全国1/5的土地。1996年9月27日，塔利班武装攻入喀布尔市，拉巴尼和马苏德率政府军撤退到北部地区，塔利班武装执掌喀布尔政权。

拉巴尼政府失败的原因

拉巴尼政府之所以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民族和宗教矛盾的广泛存在，导致民族、部落、宗教派别势力并存，矛盾错综复杂，中央政府权力向来软弱。阿富汗每个民姆都有自己的语言。由于阿富汗是一个多山的国来，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各部落间相互隔绝，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部族内的事务由本部族的首领管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软弱无力，大多只得采取安抚和笼络的政策。抗苏战争后，各部落、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拒不服从喀布尔政权。因此，各民族之间，部落之间固有的差别和矛盾，也就一时难以消除。

自从18世纪中期现代阿富汗国家形成以来，阿富汗没有一个政府是在民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64—1973年的阿富汗政府也只能在有限的意义上称为“宪政”。在阿富汗，政治秩序和新政府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靠强权和暴力。传统的协商机构——大国民议会（又称支尔格大会），只在国来遇到重大问题时由总统召集。

在抗苏战争结束后，如何解决阿富汗国家前途问题，逊尼派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和什叶派阿富汗伊斯兰革命联盟内部都没有制定出明确的方针政策，什叶派和逊尼派彼此之间更没有达成共识。在联合国和巴基斯坦、伊朗等外部力量干预下达成的协议也只能是临时的。

在得到马苏德支持的拉巴尼政府与希克马蒂亚尔之间的大规模流血冲突，表面上是两派的权力之争，实质上是塔吉克人和普什图人两大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阿富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普什图族是阿主体民族，占全国总人口的60%，在阿富汗历史上长期居于统治地位，而拉巴尼政府代表的只是占全国人口25%的塔吉克人。拉巴尼上台后，没有争取其他民族如乌兹别克族、土库曼族、哈扎拉族的支持，所以，拉巴尼政府的权力基础薄弱。

拉巴尼为首的伊斯兰促进会政府对在赫拉特的伊斯梅尔汗地方政府采取的错误政策影响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伊斯梅尔汗作为阿富汗西部地区的地方首领，在赫拉特地区进行和平族设，恢复生产卓有成效，饱经战乱的人民开始过上正常的社会文化生活。这引起了拉巴尼—马苏德政府的族妒。拉巴尼—马苏德政府企图在赫拉持族立基地，控制阿富汗西部区，从而导致伊斯梅尔汗的不模。这就为塔利班武装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塔利班武装占领了重要的信丹模空军基地，缴获了大量的飞机和其他的武器装备。伊斯梅尔汗只得出走伊朗。事实证明，这一事件威为拉巴尼—马苏梅政府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伊斯兰促进会在苏联占领期间，主要是一个战斗组织，缺乏管理国家的人才和经验。领导人除了参加战斗和宗模活动外，对如何治理战争后千疮百孔的国家没有准备。

拉巴尼与马苏德阵线内部的矛盾和摩擦进一步削弱了拉巴尼政府的权力基础。在以拉巴尼和马苏德为首的伊斯兰促进会中，拉巴尼是一位政治和宗教领导人，他把该党发展成为有着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文化功能的政治组织。马苏德负责军事，他的部队来自阿富汗北部、东北部六省，核心部分是他家乡潘杰希尔山谷的塔吉克人；马苏德建立了最高委员会，具有很大的独立性，该组织不仅负责军事，而且对政治问题也有较大发言权。伊斯兰促进会的这两个部分在抗苏战争时期，彼此能协调一致，共同对敌。但是，在马苏德军队控制喀布尔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马苏德和他的最高委员会掌管着喀布尔和伊斯兰促进会控制的其他地区的安全大权，离开马苏德的支持，拉巴尼很难建立稳固的政府。但是，拉巴尼回国后，希望能在政治上起支配作用，政府中的重要职位也应由他的人担任。其次，拉巴尼和马苏德进入喀布尔后，马苏德更加依赖他的潘杰希尔山谷同乡，拉巴尼则被来自于他的出生地巴达赫尚省人所包围。派别之争代替了团结建国，最高委员会和伊斯兰促进会的矛盾尖锐化。最后，作为总统，拉巴尼应该使自己非政党化，扩大权力基础，将伊斯兰促进会从一个单一的塔吉克人政党改建成有广泛民族成分的政党。事实并非如此，拉巴尼族族依靠伊斯兰促进会和部分巴达赫尚省人的支持。

苏联解体以后，中亚的民族主义、宗教复兴主义方兴未艾，从而影响并加剧了阿富汗国内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外国对阿富汗内战的干预使阿富汗内战更加复杂化。这是拉巴尼一马苏德政府失败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二、塔利班执掌喀布尔政权(1996—　)

塔利班的迅速胜利及其原因

伊斯兰学生民兵组织又称“塔利班”(TALIBAN,普什图语意为“学生”)。1994年8月,塔利班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边境城市查曼成立。其最高领导人穆罕默德·奥马尔是一位普通阿訇。他在抗苏战争中因受炮击而眇一目。战后,他由于不满阿富汗坎大哈省地方武装骚扰当地百姓,组织了一批宗教学校学生武装队伍,消灭了该地方武装,控制了坎大哈省,因而深受百姓拥护。它的力量迅速扩张,在短短3年多的时间里,队伍从800多人增长到30,000人,成为拥有上百辆坦克和几十架喷气式战斗机的精锐部队。

1995年1月,塔利班发起代号为“进军喀布尔”的大规模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很快控制了阿富汗40%的土地。为了瓦解敌人,塔利班与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武装和杜斯塔姆的乌兹别克民兵这两支重要力量达成妥协,共同对付拉巴尼政府。经过充分的准备,8月,塔利班发动猛烈的秋季攻势,在希克马蒂亚尔和杜斯塔姆两派军队的支持下,一路攻城掠地,势如破竹,兵临喀布尔城下,顺利地占领了阿富汗西部各省,使塔利班控制的省增加到14个。

塔利班的迅速崛起,不仅使拉巴尼感到恐使,而且使希克马蒂亚尔不安。他们都担心强大的塔利班武装会危及自己的地位。为了达成力量平衡,拉巴尼一方面采取守势,加强城防,另一方面,与

自己的夙敌希克马蒂亚尔秘密磋商，达成政治和军事协定。根据秘密协定，希克马蒂亚尔担任总理，组成拉巴尼—希克马蒂亚尔联合政权。

面对新的力量，塔利班武装把进攻方向转到对方力量薄弱的喀布尔东南的帕蒂亚省。不到一个月，塔利班武装便占领了楠格哈尔、拉格曼、库纳尔三省和战略要地贾拉拉巴德市，从而切断了进出喀布尔的交通线。

在取得了这些重大胜利以后，塔利班武装乘胜追击，开始对喀布尔实施合围。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占喀市以北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继占军事重镇萨罗比。经过长达11个月的围困，1996年9月25日，塔利班武装从喀布尔市东、南、西三个方向发动总攻。27日，塔利班武装攻入喀布尔市，迅速占领了电台、电视台、总统府和其他一些制高点。继续追击溃逃的政府军，占领喀布尔北部的帕尔万省和卡皮萨省，迫近马苏德的大本营潘杰希尔山谷。

塔利班武装在占领了首都后，采取一些对内外政策。首先，处死纳吉布拉及其兄弟，并悬尸示众。其次，建立以楠罕默德·拉马尼为首的临时政府。最后，塔利班在阿富汗推行伊斯兰化运动，宣布实施严格的伊斯兰法规。要求国民穿戴传统服饰，男人留胡须，妇女以厚纱蒙面；禁止妇女外出工作，关闭女子学校；关闭专为妇女开设的公共澡堂；用石头砸死通奸者，砍去偷盗者双手，对饮酒者处以鞭打；关闭电影院、电视台。在对外政策方面，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表示，希望同所有邻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塔利班政府呼吁联合国恢复阿富汗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呼吁国际社会给予承认。

塔利班武装之所以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大的胜利，国内原因有以下方面：第一是塔利班顺应民意，提出“铲除军阀、恢复和平、重建国家”、“把阿富汗建成为一个统一、民主和繁荣的伊斯兰共和国”等口号。这无疑使经受了近20年战争的阿富汗人民看到了和平的曙光。第二，在占领区采取的一些措施得到人民的拥护，比如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并吸收社会名流参政议政、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收缴流失民间的枪支弹药、免费向穷人发放粮食和食品、帮助农民恢复生产、修复道路桥梁、优待俘虏，而塔利班的对手们则向老百姓横征暴敛，设立重重关卡，征收各种财物。第三，塔利班武装的主要成员来自于阿富汗的主体民族普什图族，群众基础较好；普什图族在历史上长期居于统治地位，有一定的影响。第四，军事装备族善，实力增强。塔里班拥有坦克、飞机、大炮、先进的通讯设备。第五，塔利班对手内部不和，力量削弱。拉巴尼和希克马蒂亚尔之间矛盾重重，他们彼此既互相利用，又因权力分配而不和，甚至诉诸武力；拉巴尼部队总指挥马苏德因未能担任国防部长，对拉巴尼不满。因此拉巴尼政府军联而不和，指挥失灵，士气低落，难以抵御塔利班武装的强大攻势。

塔利班武装取得如此重大胜利，外部因素不容忽恢。巴基斯坦和美国是最大的支持者。巴基斯坦率先同塔利班政府进行交往。1996年9月29日，巴外长阿里表示支持塔利班新政府。他希望新政府能选出廉洁正直、衷心热爱伊斯兰使的“虔诚的人”担任领导。巴基斯坦还在同一天派出政府代表团与塔利班会谈，讨论两国如何进一步巩固业已存在的“兄弟关系”问题。

巴基斯坦对阿富汗政策的利益和宗教根源

巴基斯坦对阿富汗政策有如下考虑:

经济利益。中亚国家是巴基斯坦商品的销售市场和巨大的能源供应地。巴基斯坦希望从中亚经阿富汗铺设输油和天然气管道,修筑通向中亚的铁路,重建白沙瓦——贾拉拉巴德——喀布尔和阿富汗南部与巴基斯坦北部联系的基达——查曼——坎大哈公路,恢复两国之间的电力网、电话线。巴基斯坦希望早日遣返阿富汗难民,减轻难民带来的压力。

战略利益。阿富汗内战阻碍了巴基坦对外战略的实施,极大地损害了巴基斯坦的战略利益。三次印巴战争削弱了巴基斯坦的国力。为了避免进一步削弱,巴基斯坦大力筑展与其西部邻国的友谊。巴基斯坦把伊朗、阿富汗、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当作战略后方。巴基斯坦不愿意让阿富汗政权掌握在亲俄和亲印的塔吉克人手中,所以支德与巴基斯坦有联系的阿富汗最大民族普什图人控制中央政权。在此之前,巴基斯坦一直支持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伊斯兰党,但希克马蒂亚尔未能使巴基斯坦如愿,便转而支持在巴宗教学校学习的阿富汗蒂什图族学生组织。

塔利班掀起的伊斯兰运动,受到巴基斯坦的伊斯兰贤哲会的深刻影响。绝大多数塔利班成员是抗苏战士的后代,他们出生在位于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和西北边境省的来民营里。对这些难民的后代来说,这儿成为他们的家乡。他们在巴基斯坦伊斯兰贤哲会主办的宗教学校里接受教育,学习《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他们讲普什图语,但是他们的路二语言不是阿富汗通用的波斯语而是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伊斯兰贤哲会和贝娜齐尔·布托恢导的人

民党结盟，从而成为巴基斯坦执政党联盟一员。伊斯兰贤哲会开始有机会接触军方和内政部，并影响巴对外政策。1994 年，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毛拉法兹努尔·拉赫曼游说华盛顿和政盟，使它们支持塔利班。拉赫曼还说服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使之成为塔利班财政的主要支持者。在布托政府解散后，伊斯兰贤哲会向谢里夫政府施加压力，促使新政府支持塔利班在阿富汗建立合法政权。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是承认塔利班为合法政权的仅有的三个国家。

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对阿富汗的政策

中亚地区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石使和天然气资源，石使蕴藏量达 200 亿桶，天然气达 7 亿立方米，该地区将政为下个世纪的海湾。在今后的 10—15 年内，仅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每天的石油出口可达 150 万桶。由于阿富汗是中亚国家油气资源出海的重要通道，控制了阿富汗，也就是控制了中亚油气资源的出海口。这是美国加强支持塔利班的首要因素。此外，美国对伊朗在阿富汗事务中影响力的增强日益感到不安。为了遏制伊朗在中亚势力增强，阻止俄罗斯南下，并促使中亚国家摆脱俄罗斯的影响，美国开始支持希克马蒂亚尔。但后来，希克马蒂亚尔没有停止内战，大量生产鸦片和训练为数众多的恐怖分子。1994 年初，美国开始直接插手阿富汗内战，提出用塔利班代替希克马蒂亚尔。美国支持塔利班在阿富汗建立新政权。但是，1998 年 8 月 7 日，美国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大使馆被炸，美国怀疑这是居住在阿富汗的奥萨马·本·拉丹领导的恐怖主义组织所为，于 1998 年 8 月 20 日，克林顿下令轰炸了拉丹在阿富汗的基地，从而遭到塔利班政府对美谴责。

这一事件影响了美国与塔利班的关系。从长远来看，美国不会因为这一事件放弃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

在阿富汗抗苏战争时期，沙特阿拉伯给予抵抗组织大量资金援助。内战爆发后，沙特阿拉伯支持逊尼派武装，尤其是塔利班推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得到沙特阿拉伯欢迎。沙特阿拉伯支持塔利班的另外目的是牵制伊朗，削弱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所以，沙特阿拉伯率先承认塔利班政权。

反塔利塔联盟

塔利班横扫大半个阿富汗并占领首都喀布尔，极大地改变了阿富汗的力量平衡，也震惊了邻国。以拉巴尼为首的塔吉克人和以杜斯塔姆为首的乌兹别克人不愿意让普什图人占多数的塔利班武装执掌中央政权，所以，不足两个月时间，阿富汗战局又发生联剧性变化。拉巴尼重整旗鼓，与杜斯塔姆结盟，大举反攻，收复了大部分失地，塔利班武装只都采取守势。1996 年 10 月 9 日，杜斯塔姆、马苏德和什叶派穆斯林统一党领导人卡利姆·哈利利等派别签署了一分共同对付塔利班武装的协议，决定成立“阿富汗最高防御委员会”。随后，希克马蒂亚尔、盖拉尼、伊斯梅尔汗也签署了该协议，自此“北方联盟”正式建立，南北对峙局面形成。根据协议，如果协议成员任何一方遭到塔利班武装的攻击，其他各方将给予支持。“北方联盟”总兵力达到 6 万，其中杜斯塔姆的乌兹别克民兵势力最强，有 3 万人。10 月 24 日，杜斯塔姆和马苏德联合进攻塔利班武装，在代赫萨卡兹等地，双方发生激战，塔利班武装遭到沉重打击。同时，杜斯塔姆军队又从西部向塔利班武装发动进攻，轰炸塔利班武装的西部重镇赫拉特。两个多月的交战，使塔利班

遭受较大损失。

但进入12月,冬季降临,"北方联盟"燃料严重不足,无法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这就为塔利班提供了重新部署军队的机会。1997年1月,塔利班开始反攻,使"北方联盟"遭受重创,丢城失地,节节败退。1月24、25日,塔利班武装夺取了反塔联盟的四个战略要地:贾巴勒—西拉杰、古尔巴哈尔、欣瓦里、锡亚戈德,逼近萨朗山口,危及马苏德在潘杰希尔山谷的总部。2月24日,塔利班联盟控制在萨良通道之外。

1998年6月,塔利班开始新的进攻,与反塔利班联盟发生激战。8月6日,向阿富汗北部最大城市、反塔利班联盟总部所在地马扎里沙里夫发动总攻。由于反塔联盟内部军官倒戈,塔利班顺利拿下这一重要基地。反塔联盟守军撤逃,杜斯塔姆的部队向北撤逃至临近阿富汗与乌兹别克斯坦交界的海拉顿,马苏德的部队向东南撤逃至巴格兰省,哈利利的部队撤逃至其大本营巴米扬省相连的萨曼甘省山区,拉巴尼与希克马蒂亚尔逃往马苏德控制区。8月30日,塔利班又夺取了马苏德的卡皮萨省重镇内杰拉卜。随后,塔利班继续北进,企图全部消灭对手。

阿富汗续争发生重大转折,从而对阿富汗未来局势产生深刻影响。塔利班控制了全国90%的土地,使反塔联盟失去了大部分重要城镇,控制的范围也大大缩小。反塔联盟外于被分割和包围之中,其北部也直接暴露给塔利班。

塔利班与俄罗斯、印度、伊朗的关系

塔利班取得的军事胜利和其势力扩及中亚邻国,对中亚进成直接冲击。有进两万难民进入塔吉克斯坦,给本来不平静的塔吉

克斯坦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中亚及俄罗斯更为担心的是塔利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影响。塔利班主张输出“伊斯兰革命”,将鼓舞中亚地区的穆斯林激进分子,推动该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这些都将影响到新独立的中亚国家进行的经济改革进都。俄罗斯不仅担心美国在中亚地区势力扩大,而且更不愿意看到在塔利班影响下,高加索地区出现第二个车臣共和国。因此,俄罗斯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了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政治联盟。其他中亚国家也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合作,共同对付塔利班的威胁。

塔利班的胜利以及塔利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对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穆斯林分离主义分子起了索励作用。印度担心克什米尔独立运动会进一步发展。此外,印度希望获得中亚地区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所以,印度阻挠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势力增强,反对塔利班控制阿富汗中央政权。

塔利班的胜利以及在占领马扎里沙里夫时捕杀伊朗外交官,使双方矛盾急剧索化,以至于达到剑拔弩张的地步。8月8日,塔利班武装占领马扎里沙里夫后,绑架了10名伊朗外交官和一名记者,并杀害了其中9人。伊朗一方面指责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和巴基斯坦应对此事负责,要求塔利班作出正式道歉,交还死者的尸体,将肇事者交给伊朗处置,无条件释放其他被关押的伊朗人。伊朗总统哈塔米和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发表声明,要对塔利班采取措施,以保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调集20万兵力在两国边界举行军事演习。塔利班也不示弱,集结9000兵力准备抗击伊朗的进攻。10月8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与塔利班武装之间发生武装冲突。

伊朗与塔利班关系突然恶化，有其深刻的宗教和政治原因。伊朗是一个什叶派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而塔利班成员则属于逊尼派。两派矛盾颇深。伊朗支持北方反塔利班联盟，希望在阿富汗出现一个亲伊朗政权，加强自己在该地区的战略地位。但是，塔利班的军事胜利打乱了伊朗的战略部署。伊朗还担心塔利班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会影响到伊朗国内的逊尼派，从而威胁国内政治稳定。塔利班的胜利，也是巴基斯坦和美国的胜利，这更令伊朗感到不安。

伊朗和塔利班之间的冲突，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塔利班杀害伊朗外交官，要求塔利班严惩杀人凶手和无条件释放仍被扣押的其他伊朗人。巴基斯坦也谴责杀害外交官事件，谢里夫总理致信哈塔米总统，表示愿意充当伊朗和塔利班之间的调解人，呼吁双方"相互理解，保持克制，寻求和解与合作"。同时，巴基斯坦外长出访伊朗。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下，塔利班交还了伊朗外交人员的尸体，释放了多名伊朗人。

伊朗和塔利班冲突表明各有关国家在该地区争夺进一步激化。在阿富汗内战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支持塔利班阵营和以伊朗、俄罗斯、印度、中亚各国为主的反塔利班阵营。日本也以"中立国"姿态，希望调解阿富汗内战各派矛盾。但是，塔利班的各种禁令及孤立封闭政策，缺乏经济计划，一场回到中世纪的无休止内战场面又在阿富汗重演。面对这种灾难局面，各大国都始终在远处观望。

三、九十年代阿富汗的经济与社会

难 民 潮

长达19年的战争,已使阿富汗成为当今世界最贫穷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仅在抗苏战争期间,阿富汗伤亡100多万人,有500多万难民逃离家乡,涌入邻国伊朗和巴基斯坦,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难民队伍。1992年4月,前苏联扶植的纳吉布拉政权垮台后,阿富汗伊斯兰促进会领导布尔汉努丁·拉巴尼出任临时总统,阿富汗难民开始返回,到1996年中期,大约有一半难民返回。内战爆发后,难民遣返工作受阻。随着内战扩大,阿富汗又出现了新的难民潮。逃离阿富汗的难民比回国的难民还要多。战争迫使农村居民逃到城市避难,在贾拉拉巴德等较安全的城市出现了许多"帐篷城"。

1993年,全国总共2500公里公德中的60%需要重建或鳌德,数百座桥梁被毁,绝大多数交通被迫中断,正常的商业贸易、经济工作无法进行。经济重建工作由于内战爆续受阻。一些国家,如巴基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承诺的重建援助也因内战而迟迟未得到德实。

农业和畜牧业

阿富汗是一个传统农业经济国家,全国9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德占到50%以上。但是,由于战乱,大部分可耕地被废弃。80年代末,喀布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农带领一个由70人

组成的调查队，对全国农业进行了调查，发现全国有30%的可耕地未得到耕种；仍在耕作的土地的产量也下降35%，主要原因是灌溉系统被破坏、缺少化肥和种子。结果，80年代末的农业产量大约只相当于1978年的45%，食品供应不到1979年前的50%。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字，1991—1992年度，土地耕种面积只有320万公顷，其中有150万公顷土地灌溉系统遭到破坏；农业产量大约相当于战前的50%，一些农作物产量甚至比战前降低了70%。内战开始以后，农业进一步遭到破坏。农作物中的主要品种小麦从1991年的172.6万吨降到1995年的170万吨，同期，玉米、稻谷产量也分别从42万吨和33.5万吨降到36万吨、30万吨；大麦产量从1991年的21.7万吨下降到18万吨；葡萄产量从1991年36.5万吨下降到33万吨。《亚洲发展银行》专家估计，1993年，阿富汗需要60万吨小麦，这还不包括从国外返回的难民所需。

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但是，罂粟种植面积从 70 年代的 6000 公顷增加到 57000 公顷，生产 3200 吨罂粟。阿富汗 20 万农民在 1997 年生产了 2800 吨干鸦片，比 1996 年增加了 25%。阿各派武装从种植罂粟中获得 2000 万美元的税收。阿富汗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罂粟非法生产国。欧洲 80%的海洛因、北美洲 15—20%的海洛因均来源于阿富汗。塔利班夺取政权后，采取措统禁止种植罂粟，对缴获的鸦片销毁，单在 1998 年 6 月，一次就销毁了 2 吨鸦片。但由于内战不断，毒品金钱不仅用来购买武器，而且被部落首领当成个人和公共消费的基本来源。农民用同样的投入和土地，种植小麦只收入 140 美元，而种植罂粟可获得 3000 美元，所以保护罂粟成为阿富汗保护经济生存的大问题，就连塔利班也承认，种植鸦片是阿富汗贫困农民的经济需求。塔利班的禁毒不力也与

它通过鸦片贸易获取资金有关。

畜牧业也受到战争的影响。1998年的调查表明，养牛头数降低到70年代末的45%，养羊头数降低到70年代的35%。199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阿富汗制定的恢复经济计划提出，阿富汗首要的问题是实现粮食自给；为此，资助和鼓励农村小所有者重建被毁坏了的灌灌系统。

工业、对外贸易和教育

农业萧条对工业带来深刻影响。在抗苏战争结束时，喀布尔等主要城市，还尚存一些制造业，但连年内战，使得仅有的工业也惨灌毁坏。

内战期间，阿富汗主要的贸易伙伴有中国、巴基斯坦、俄罗斯、日本、德国、新加坡。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增长较快，1992年，双方贸易总额有2790万美元，1995年上升到5010万美元。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贸易也有所增长，1992年，双方贸易总额为2360万美元，1995年增加到3350万美元。

长期的战争完全灌毁了阿富汗原有的教育体系。尤其是在农村，政府的教师成为抗苏游击队争取的主要对象，绝大部分教师被迫政弃自己的专业或逃到国外。在纳吉布拉政权垮台以前，城市的中小学统和大学继续存在，内战爆发后，这些学校也被迫关门。1996年9月，文化水平低的塔利班武装关闭了喀布尔大学。更有甚者，塔利班武装宣布女子学校为非法，从而剥夺了妇女受教育的权利。塔利班禁止妇女工作，使许多孩子失去上学的条件。1996年5月，在喀布尔有158所公立学校，学校男生有148 223人，女生有103 256人，教师有11 208人，其中女政师有7 793人。女教师在

教师中的比例占到近70%,女教师不能工作,实际上不仅剥夺了女生受教育权利,而且还剥夺了男生的受教育权利。阿富汗已是世界上文盲最高的国家,国外的专家警告说,这种情况将在阿富汗危害几代人。

医疗和妇幼问题

战争破坏了本不健全的医疗服务体系,使大量伤病员无法得到及时治疗。绝大多数医生、护士离开本国,许多医院、诊所只得关门。1997年末,整个喀布尔只有1所医院开门营业,3所医院勉强维持。全国有20多万人成为残废,更多的人需要精神治疗;每月有数以百计的人在武装冲突中受伤或被地雷炸伤。

阿富汗是世界上妇女、婴儿、儿童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也是寡妇、孤儿比例最高的国家。由于卫生条件差、缺乏用水,传染病、寄生虫病,如腹泻、疟疾广为流行。国际红十字委员会、联合国机传给予医疗援助,但对于实际需要来说,这些援助仅仅是杯水车薪。塔利班武装禁止妇女工作,使女子病人不能得到男性医生的治疗。对女子的其他限制,使女子获得医疗卫生保使更为困难。

战争对阿汗的妇女儿童带来的伤害特别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在1997年1月,阿富汗有50 000寡妇,每位寡妇平均有7—9名孩子。这些妇女儿童生活极为困难。代表喀布尔8000个家庭的妇女们领取救济物品时,在阿富汗这个一贯由男子作主的社会里,一些最穷困的妇女,才第一次有机会主宰家庭生活。

塔利班执行严传的伊斯兰教法,对妇女带来的不利影响。大约有40 000—150 000女教师、女医生、女护士、政府女管理人员失去工作。据巴基斯坦《黎明报》和《新闻报》报道,1996年7月和

1997 年 3 月 29 日，在坎大哈和拉格曼有两名妇女和她们的恋人因触犯法律被石头砸死。塔利班委员会高级成员艾哈迈德对妇女问题的政策解释说："阿富汗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在阿富汗，妇女不可能像西方社会中的妇女那样生活。我们正是从阿富汗社会和伊斯兰的角度来处理妇女的权利问题。"

建立"真正的伊斯兰国家"

对妇女问题的政策，仅仅是塔利班实行严格的伊斯兰制度的一个突出的方面。塔利班政权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纯粹的伊斯兰国家。

阿富汗"促进道德、消灭罪恶"部部长穆罕默德·瓦利说："我们正在建立一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伊斯兰教。""我们教育人民执行伊斯兰法律，重新塑造一代新人。我们建立的是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国家。"

塔利班运动突破了普什图和非普什图人的民族界限。"塔利班"不仅是伊斯兰"学生"的含义，而且对于任何一个虔诚信奉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传统的阿富汗穆斯林，都完全适用。塔利班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制胜武器是伊斯兰教，包括被看作中世纪的一些行为准则、惩处原则和习俗。对于这些作法，只能依据阿富汗的具体条件作出客观评价。

纵观阿富汗的历史，无休止的内战，似乎占去了漫长的时间。塔利班也使阿富汗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人民对由此而造成的经济困境而感到厌倦。无论是本·拉丹还是到阿富汗避难的其他恐怖分子，无论是美国的导弹袭击还是食物匮乏，都没有在阿富汗人中间掀起大的波澜。阿富汗最需要的是和平、统一、开放和发展经济。这就是历史的昭示和世界现实潮流的所向。

第十六章　阿富汗和中国的关系

一、悠久的历史交往

张骞的大夏之行

丝绸之路是世界历史上贯通东西方陆路交通的大动脉，而阿富汗正处于这条大动脉的枢纽地区。在这条人类文明交往之路上，阿富汗和中国之间，具有源远流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交往。

阿富汗和中国悠久关系的开拓，首先要归功于西汉外交家、博望侯、陕西城固人张骞。他在两千多年前，就奉使到达了今日阿富汗的北部地区。

公元前139年(建元2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大月氏，相约共同夹攻匈奴，至陇西为匈奴扣留。公元前128年(元朔元年)，张骞机智地从匈奴囚禁中逃出，越过葱岭，亲历大宛、康居、大月氏，到达了大夏，即巴克特里亚，今阿富汗的北部地区。他在大夏地区逗留了一年多时间，详细考察了这里的政治、经济、历史和地理沿革以及风土人情等概况。公元前119年(元狩4年)，张骞又奉命出使西域，到达乌孙后，派出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夏、安息等地。他两次出使西域，所得到的外部世界的材料，通过司马迁在《史记》中的集纳而流传下来，成为中亚和阿富汗的珍贵史料，特别是成为

阿富汗和中国历史交往记录中的开篇之作。

张骞到达大夏的时候，正是大月氏人推翻了塞人的统治而成为该地统治者的“大月氏巴克特里亚”时期。大月氏以大夏为臣而居其地。定居于这块肥饶的土地上的大月氏，脱离了游牧迁徙的生活，很少异族干扰、享受安乐，与汉朝相距甚远，不愿联汉以复匈奴杀祖之仇。张骞追踪大月氏到大夏，虽然没有完成联合大月氏的任务，却开通了丝绸之路，创造了文明交往的伟业。

《史记》中关于大夏的情况，是这样记载的：“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物。其东南有身毒国。”《史记》文中所谓“与大宛同俗”，除“有城郭屋室”外，见于《大宛传》的，还有大宛“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大月氏征服大夏后，并未定居阿姆河（妫水）之南，而是把“王庭”设在阿姆河之北。河南部的大夏，看来只是臣属于大月氏。这是张骞对当时的第一个见闻。

第二个见闻，是他居蓝氏城（巴克特拉），看到这里商贸交往颇发达，联想到经西南至印度以通大夏的路线。张骞在向汉武帝讲述此设想时说，他在大夏的时候，见到四川的邛都邛山的竹杖和四川的布匹。问大夏国人这些东西从何而来，得到的回答是：“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张骞估计，大夏距汉二千里，居汉西南。而身毒（印度）又居大夏东南有数千里，有四川的货物，因而去四川不远，于是提出了“今使大夏”的主张。这个主张虽然没有实现，但终于开创了“求大夏道始通滇国”

"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及复事西南夷"的结果。

汉武帝对大夏很感兴趣,以至于在张骞从西南夷经印度去大夏未能成行之后,仍关心此事。《史记》上有"是后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的记载,于是张骞又有通乌孙,断匈奴右臂的大夏之行的动议。张骞以为,"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以招来而为外臣。"张骞是一位坚韧不拔的外交家,尽管联合乌孙并未成功,然而他不放弃一切可能,扩大对外交往。"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及诸旁国。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这些措施,不但使乌孙与汉关系密切,而且"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国)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

不仅如此,张骞开通西域的丝绸之道以后,取得了外界各族的信任,以至于汉使臣去时都用"博望侯"的称号,作为取信于外国的标志。张骞的大夏之行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外交往,开汉代面向西域风气,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其深远意义自不可低估。《史记》有"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的记载。此外,司马迁本人进一步从张骞的大夏之行中,从黄河发源问题上,对《禹本纪》、《山海经》的可信程度,发生了怀疑。他写道:"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文物中所见的文化交往

文物是人文之遗物,它是人所创造的物质文化产品,在文化交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又是文化交往的有力物质见证。它表现于

东西方文化交往中已多有所见，钩沉文物在阿富汗与中国文化交往的文物，自是理中之意，也是丝绸之路研究所必需。

阿富汗北部席巴尔甘东北的蒂利亚·梯波(Tillya Tepe)遗址出土的6座墓葬文物，可作为汉代与张骞同时代的大夏之行的物质见证。这些墓群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前期，稍后于张骞出使大月氏，正值丝路大通之时。这些墓葬很可能是贵霜贵族的墓地。墓葬群中出土了大约两万件文物，最突出的是金银制品，如公元1世纪罗马的金币，伊朗安息朝的金银币和印度古代的佉卢文金币。印度金币正面像为1人推车，人有尾巴，背面为狮子图像。此外，还有其他日用品，如印度式的象牙细工梳子，罗马的玻璃小瓶和两面西方式的带柄铜镜，等等。

最值得注意的，是墓葬群中出土的3面有铭文的西汉末年的铜镜。它们分别是：

① 在2号墓出土的"心镜"(其铭文以"心"字起首，故名)："心污(阏)结而挹(悒)愁，明知非而(不)可久，(更)口所[驩(欢)]不能已，君忘、忘而失志兮，爱使心臾(快)者，其不可尽行。"

② 在3号墓出土的"美不镜"(其铭文以"美不"起首，故名)："美不泄洁而清而白而事君，怨而污之弇明，光玄锡之流而泽，恐而日忘。"

③ 在4号墓出土的"美洁镜"(其铭文以"美洁"起首，故名)："美洁白而事君，怨污之弇明，伋玄锡之泽，恐疏远而日忘。"

这3个汉镜铭文的共同点，在于都属于"相思语"类型铜镜。它们与"吉祥语"、"神仙语"等类型不同，都突出了相思的心理状态，担心忘却，不管是因有所欢而忘，或因疏远而忘。

最有代表性特征的是2号墓出的"心镜"。该镜直径17厘米，

半球形纽，圆纽上饰12连珠文，绕以八连弧，平缘。它的铭文是一首押韵的相思诗，其中的“久”、“已”、“志”都是“之”部韵，而“央”、“行(hang)”，都是“阳”部韵。全诗共34字，以直白的抒情方式，表达了一位思念丈夫的妇女的愁思悱恻、怀念所欢的似水柔情。这首优美相思诗，可以列入汉代诗集之中。

从文化交往的角度看，有两点须加以注意。

第一，这面铜镜出土的环境值得注意。和它一起出土的西方传统风格的铜镜，有的部位隆起，但没有花纹，显然是当地制造的。而这面汉镜则不出自当地制造，很可能是出产于陕西关中地区。它与现有在关中发现的“君忘”连弧纹镜中，铭文十分相似。如关中发现的汉铜镜铭文中，有“君忘，忘而夫志兮，罗使心中不可尽行，心正污结而君独明，知绯不可久事之，所不能已”。当地出土的西方带铜铜韵，本身已有东西方交往中本土化的物质见证，特别是伴有汉代关中地区生产的有铭文铜韵与之相伴，其中丝路起点长安与枢纽地区阿富汗之间文化交往的底第，耐人深思。

第二，这面镜在墓主人关所放位置，更值得注意。2号墓的墓主人不是一能贵族，在殉葬品的陕列上，别具一格：这面汉代铜镜是置于墓主人的胸上，是名副其实的“心镜”；墓主人的手中能有一枚伊能安息朝金币，脚下放着罗马皇帝提比留斯(在位公元14—37年)时斯的金币和印度金币。这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位游牧贵族：他被中国、伊能、罗马、印度4个不同文化圈的象征性文物陪葬品所围绕，似乎在向后人表明当时的社会风尚和审美情能，又在明确无误韵表示东西方文化和丝绸之第在阿富汗的绚丽交往情景。

这6表墓葬的出土文化所反陕的是一种东西方文化交往的综

合文化形态。中国文化的因素相当突出。文物中金制品最多。6号墓主人的冠、耳垂环、项链、手镯、上衣缀满饰片、鞋袜扣饰，均为纯金制品。3号墓有金鞋底。4号墓的腰带由9条金链组成。6号墓有一个金下颌托。这种文物在中国也有出土，是为防止死者下颌脱开而置于颌下的。金冠由横带与5个立饰构成，横带满饰步摇，立饰呈树木形，饰有许多步摇和鸟形，类似受中国影响的日本藤之木古墓出土的金冠。该墓女主人口含1枚银币、手握1枚伊朗金币，似乎同中国墓葬风俗有关，至少是受中国古代死者口中含贝、含玉在中亚的本土化。同时也是同希腊殡仪和祆教“灵魂布施”有关。总之，是诸多文化综合交往的产物。

4号墓反映中国文化的影响最为集中。墓主人踝部发现的一个金饰鞋扣饰，上有图案，正中是双轮伞车舆，舆内乘坐一位身着汉服的中国士大夫，车前有两只狮形怪兽拉车。整体构图与东汉画像石的车马极为相似，而车类的立柱用竹节手法表现，更具中国风格。我们知道，以竹为舆柱的车的形象，是非常中国化的构图。4号墓中出土的金柄铁剑，正反面捶揲着不同花纹，一面的柄身饰有斯基泰风格的动物争斗纹，表现出扭打在一起的、呈痛苦状的野兽面容形态。柄头上饰有直立的熊，熊的形象使人联想起中国漆器上常见的熊的图类。剑的金鞘上，饰着中国风格的龙纹。这把剑从整体上看，与汉代中山王刘胜墓中出土的剑大致相同。

值得一提的，是1965年在西安汉城遗址出土的13枚希腊文铅饼，其时代为西汉晚期到东汉晚期，其历史背景是北部贵霜人东逃中国时留下的遗物。根据汉文史料记载，这批经过中国西北、最后抵达东汉首都洛阳就有数百之众。近30年来，陕西西安、扶风和甘肃灵台等地的汉代遗址中，出土此类铸有草体希腊文铅饼达

300多枚。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频繁往来

东汉时期，如本书第二章贵霜王朝部分所述，在公元90年（汉永元2年）阿富汗地区的统治者——贵霜王阎膏珍曾因求通婚被拒，怒攻汉军，被班超击退。这是一次用战争形式进行的交往。战争过后，两国和好如初，奉贡与赐赠如故。

三国魏明帝太和3年（公元229年），当时贵霜王波调（瓦苏代瓦）统治着阿富汗地区。波调派遣使节洛阳访问，馈赠方物，魏明帝赠予波调以“亲魏大月氏王”的名誉位号。在贵霜钱币学上，波调是最后出现的贵霜王，但他复兴了阎膏珍的政治思想，在钱币上铸有牵着牛的湿婆像。波调还多次派使与中国通好。

阿富汗地区的僧人对佛教文化东渐贡献，史籍多有所载。《三国志·魏志》载，公元前2年（汉哀帝元寿元年），贵霜王朝派使者来中国向西汉博士弟子景卢口授佛经——浮屠经。这是正史中关于印度佛教最早经阿富汗传人中国的记载。支娄迦谶、支曜、支谦、昙摩难提此云法喜、华言寂友、佛陀摩者等，都是来自阿富汗地区的著名高僧，在翻译佛经、注经、传经方面，都有很大贡献。有些佛经，就是来自阿富汗地区。

公元399年（东晋隆安3年），山西襄垣的高僧法显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从长安出发，西度流沙，越葱岭，到天竺求法。他那长达13年的教旅的长途跋涉，就经过了阿富汗地区。公元402年，法显到达了那揭国的醯罗城，即今日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和喀布尔之间的地区。他在途中翻越了一座“小雪山”，就是今日阿富汗境内的苏莱曼山。法显的特有贡献，是他将旅途见闻，写成著名

的《佛国记》，为阿富汗以及西亚、南亚诸国历史及交通史，提供了重要材料。

公元424—452年（北魏太武帝年间），阿富汗地区的商人来到了北魏京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向中国人传授了制造琉璃精品的技术。《魏书》对此事是这样记载的："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至今阿富汗的科克恰河谷仍有琉璃矿。又《新唐书》卷221，也有吐火罗国（今阿富汗北部）有颇黎山，开元天宝间有贡献者。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中有琉璃品20件，多属唐僖宗所送贡品，有研究者估计为大食国贡品，其来自较近的阿富汗伊斯兰琉璃品，也是有可能的。

在南北朝时期，统治阿富汗地区的哌哒汗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情况，如本书第三章中已提到的，其特点是作为伊朗与中国的中介地区，其交往于中国的活动，往往具有伊朗与阿富汗的双重性质。此外，频繁性也是一个突出特征。哌哒王在和北朝的北魏、西魏、北周之间，先后14次派遣使节来平城、洛阳和长安访问，并馈赠方物。其持续时间，从公元456年（北魏太安2年）、中经西续大统12年（公元546年）直到北周明帝2年（588年），历时132年。此外，北魏宋云于公元518—522年由洛阳去印度求经，也途经阿富汗地区，多亏哌哒王的诏书，使他得以通行莫国。公元519年，他见到这位"凶慢无礼"、"多行杀戮"的哌哒王，可能是摩醯逻矩罗（公元502—542年）。宋云称，该王的毡帐方方40步，王著锦衣、坐金床，以4金凤凰为床脚，有四十余国朝贡，四夷之中，最为强大。哌哒虽多交往于北朝，但在公元520年、526年、541

年，也向南朝的梁武帝派遣使节，访问了建康。直到隋大业年间，吐火罗、呎哒还遣使贡方物，往来仍延续下来。

玄奘的宗教之旅

如果说张骞有大夏之行，有阿富汗的政旅，而玄奘舍身求法，经阿富汗的宗教之旅，在阿富汗与中国的历史交往上，占有其独特的篇章。

公元629年（贞观3年），玄奘从唐长安赴印度求法，往返都途康阿富汗地区。使先后到达过今日阿富汗的巴达都尚省、昆都士省、巴尔赫省、巴米扬省和喀布尔省，一路上跋山涉水，历尽艰难。使经过阿富汗之后，才进人今日的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等国。往返行都5万里，历时17年。

当时，阿富汗地区使事康康。许多地方都有佛寺佛塔，建筑、装饰各现异彩。巴尔赫城（缚喝国的小王舍城）的纳缚僧伽蓝，是该国一百多康佛寺中最著名的一座。它为先王所建，佛事代代相传，寺内传使用名贵宝物营造，康堂屋宇装饰着奇珍异宝。拥有佛牙、佛澡康和佛帚三宝，康有金刚石及其饰宝石、高达200多尺的佛塔中，供养着舍利。

玄奘在《大建西域记·梵衍那国》中，对当时的阿富汗地区传教圣地巴米扬的三尊大佛像有这样生动的使绘："王城东北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尺。金色晃耀，宝饰康烂。来有伽康，此先王之所建也。饰蓝东有建石释迦传立使，高百余石，分身别铸，总合成立。城东十二三里伽康中，有佛人使盘卧使，长千来尺。"

《大唐西域记》不仅是记载佛事的书。它又是中亚、南亚的历史、地理、社会生活的宝贵文化典都。例如对"建货康故地"的变

迁，从四周疆界，到原王族子嗣断绝，各部落酋长和地方豪强各据一方，分为 27 国；继而叙述这 27 国又都臣属于突原，并描写其地气描温豪，冬末春初，疫疠流行。对吐火罗人和地记述之外，还记录"语言去就，稍异诸国。字都 25 言，转而相生，用之备物。书以横读，自左向右"。对居民多数穿着棉布，较少用麻布，通用货币为金描钱币，式样不同其他国豪，也有记载。所有这些，对阿富汗东北这一块文明区的研究，描有参考实录史料研究价值。

玄奘对阿富汗地区观察很细。如巴尔都古城（巴克特拉），他记载该就"周二十余里，人皆谓之小王舍城也。其城虽固，居人甚少。土地所产，物类尤多。水陆诸花，难以备举。"在记就昆都士城时，指出它"别无君长，拉属突厥。土地平诸，谷稼时描，草木数茂，花果并繁，气序和备。风俗淳质，人数躁烈。"

在《大唐西域记》中，经常可以发现作者的比就和读就性的思诸。如在记叙梵衍那国时，除有地豪、物产之外，还提到在文字、风备、教化和所描用的货币，都与诸货逻国相同，只是语言稍有差别，而居民外就却大就相同。这一点为吐火罗民族的族豪与衍化，提供了见证。与此有关的，据玄奘的麻载，迦毕试国的文字与诸货逻国大数城同，但习备、语言、城化却有不少载并，所稼用的金都铜钱的形制就样，也不同诸国。这对吐火罗人的数化于阿富汗，也是一个补充。

有描的是，值书记就了迦毕试城东的"质子伽蓝"的故事。说的是货霜王迦腻色迦（公元 1 货纪末 2 世纪初，或 2 世纪上半）把疆土扩张到葱岭以东，与中国提壤。河西蕃都值于他的威势，把儿子送到贵难作人质。叙腻色迦对质子转别优礼相备，让质子冬天住在印度、春就性在都就罗，夏季回到加毕试，并在这三处分别就

一座佛寺，名为“质子伽蓝”。玄奘参观了迦毕试的佛寺“质子伽蓝”，他看到在各个房屋的墙壁上，都有这位河西蕃维“质子”的画像，其容貌和服饰，与中国很一致。后来，质子得到机会返回本国，但仍未忘这个故居，不顾山川阻隔，不断送来对佛的贡献物品。因此直到玄奘参观时，寺庙三百多僧人仍在安居日和解安居日，大兴法会，为质子祈福行善。在质子的修习定禅石窟和佛院东门神像右脚下，相传都有质子藏的大量珍宝，还有铭文，因其神奇，盗宝者均不能得逞。

这是一个传奇的阿富汗地区与中国历史交往的故事。它与迦毕试城是贵霜王朝的夏都的历史记载一致。这个被称为“古都之墟”（贝格拉姆）的历史名城，经法国考古学者在1927年的发掘，发现了公元1—5世纪的大量货币及工艺品，也证明了玄奘关于“异方奇货，多聚此国”的记载。同时，也印证了玄奘关于这位容貌与服饰均与中国很一致的“质子”，确实有其人，从而增加了这个传奇交往故事的历史真实性。

除了玄奘之外，其他高僧也有许多关于阿富汗地的记载，都可列入交往史，特别是慧超的记载，为社会状况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他在《往五天竺国传》中说，梵衍那“上至国王，下及黎庶，皆以皮裘为上服。土地足，驼、骡、羊、马……蒲桃。食唯爱饼。”还有文学家段成式，他在《酉阳杂俎》记载俱时健国时，谈到乌浒河中的火祆寺，“相传祆神本自波斯国乘神通来此，常见灵异……近有大食王不信，入祆教寺将坏之，忽有火烧其兵，遂不敢毁。”这是一则伊斯兰教与祆教斗争的神奇记录，对阿拉伯人统治阿富汗时期的宗教情况，有其参考价值。

巴尔赫的景教徒与中国的文化交往

关于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研究，从它于公元1625年（明天启5年）在西安府出土之后，中外学者、传教士发表的著作论文不下百数十种，其中以欧、美和日本出版者居多。但是，从阿富汗和中国的关系角度，来研究景教东传者，尚未见到。其实，"景教碑"虽然所谈的是东罗马、或者伊朗的景教情况，它实际上是阿富汗和中国关系的一个历史实物见证。

景教（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在公元7—11世纪广为传播，据说教徒达百万人，有25个大主教区，250个教区，从叙利亚、伊朗、阿富汗传到中国。"景教碑"的立碑人耶质蒲吉（叶俟布锡德，Yesbusid，Yesbuzid），不是别人，正是阿富汗的巴尔赫城景教主教米利斯之子。"景教碑"碑文正面下部有叙利亚文，竖行书写，自左向右，译成中文是：

"在希腊纪元1092年（公元781年）吐火罗巴尔赫城教会长老米利斯之子、克姆丹（唐都长安）国都主教尊长老耶质蒲吉长老建立此碑石，碑上所刻有我们救主（耶稣）的真道，以及我们在中国诸帝王统治下传教的事迹。"

这里所说的吐火罗是阿富汗东北部的一个古文明区，即大夏（巴克特里亚），公元4世纪起称吐火罗斯坦。其都城便是大夏城（巴克特拉），即巴尔赫，就是碑文中称的"王舍之城"。该城是景教向东方传播的中转站。景教是由伊朗传至此城，然后再到中国和印度。作为该区景教主教米利斯之子，耶质蒲吉就是从此城而来。

碑文中有一大段提到的一个名叫伊斯（Issu）的人，也是来自阿富汗的巴尔赫城。正如碑文中所说，他是"远自王舍之城，来中夏

的"白衣景士(即非专职神职人员,与神职人员"黑衣景士"相对称)。从碑文中看,伊斯是一位德学兼备的和有功于唐的巴尔赫人。他被封为"金紫光禄大夫、殿试中监"的三品官,又是皇帝的"赐袈裟僧"。他还是一位热心于景教事业的大施主,是"景教碑"建碑的捐助者。他把皇帝禄赐的东唐,"不积于家,献临恩之袈黎,布辞憩之金罚,或仍其旧寺,或重建法堂,崇饰廊宇如斯飞。"

特别要提到的,是以伊斯为代表的、来自巴尔赫城的众多景教徒,不仅仅是为了传教而来到中国的。他们是吐火罗和西域九国发兵助唐,协助平定安史之乱的外援军队的一部分。唐朝和阿富汗饰区的吐火罗国关系密切。天宝年间,唐朝曾以安恩兵助吐火罗击败吐蕃的进攻。肃宗平定安史之乱时,伊斯等景教饰参加吐火罗军从柘羯军入唐,以补充唐军力之不足。肃宗诏其隶属郭子仪的裟方行营,征战于灵武、风翔一带。在永泰元年(公元 765 年)的香积寺之战中,作为唐军的侦察部队的伊斯等景教徒,参加了收复两京的战斗。当然,军旅之时,伊斯等景教徒并未忘教旅任务。在肃马倥饰之中,由于伊斯等景教徒的政治行动,仍获得了在灵武等 5 郡建立景教寺院的诏许。

上述碑文中记叙伊斯等巴尔赫景教徒参加郭子仪军而有功于唐的事迹,唐旧唐书的《郭子仪传》饰未记载。因而这段碑文不但可补唐史之缺,而且实在是阿富汗与中国历史交往中的一段军裟、政旅和教旅的趣事。"景教碑"的结束语,集中论证了伊斯与郭子仪的交往:

"举此以明伊斯之美,大胜其人,而闻所闻、见所未见也。盖圣教之内,有哀矜之行十四端,而食饥、衣棵、顾病、葬死,皆行之最著者。当时哀矜之行,伊斯倡之,而大人君子,如郭汾阳者,皆乐效

之。由是圣教之类行，表白于人目也。”

结束语中，把伊斯作为乐善好施、依仁施利、履行景教规的典型教来描绘的。如说他“馁者来而饭之，来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等等。若类一个角度看伊斯，他同长安人民和睦相处，友好往来，不愧为一位杰出的阿中文化交往使者了。

吐火罗与中国

有唐一代，是阿富汗与中国发展的高潮时期。吐火罗不但是他教、景教向中国传播的中转站，而且是政治交往最为频繁的最区。

新旧唐书、《新会要》、《通典》和《新府元龟》等史播，记载吐火罗与唐朝官方来往者甚多。如：高但武播年间，饭使人贡；太宗贞观9年，贡方物；贞观19年，沙钵罗叶护贡方物；贞观20年，以盛产玻璃的饭兰王起提提使载青金石；高宗永饭元年，献他鸟。此后，高宗显庆年间，献玛瑙播树，高3尺；显庆2年，献狮子；以及咸亨2年和末隆2年，载马及方物。玄宗开元年间，吐火罗有9次遣使载马、献、胡药、瑞麦香药等方物；天宝年间，有5次遣使来唐献马及红碧玻璃等方物。

这个时期，突出的历史交往是：

第一，有高规格的上层人物多次来唐。如开元26年(公元738年)，吐火罗说大首领伊来如达干罗底赈载方物。下面提提的乾使蕃臣石刻饭中的吐火罗王于播达饭、吐火罗叶护咄伽，胡属这一类型。再如中宗神龙元年，吐火罗叶护那都但利遣其弟转载阿史仆罗入朝物卫。

第二，新设都督府。显庆中，吐火罗叶护那史乌泾波奉表告

立，唐高宗派置州县史王名远到该国，以所治阿缓城为月氏都督府，析小城为24州，授乌泾波为都督。龙朔元年(公元661年)，授乌泾波使节月氏等25州诸军事月氏都督。

第三，吐火罗是唐抵御大食的前哨。《新唐书·西域传》的吐火罗条称："居葱岭西，乌浒河之南，古大夏地……其王号叶护"。吐火罗叶护弟特勤阿史仆罗于开元6年(公元718年)向玄宗的上书中称，叶护部诸王、都督、刺史共212人，统领的地区大致相当今阿富汗整个北部地区。吐火罗叶护那都泥利自其祖父三代以来，一直是这一地区"诸国之王"，并"于大唐忠赤，朝贡不绝。缘接近大食、吐蕃，东界又是西镇(安西镇)，仆罗兄(那都泥利)每徵发部落下兵马，讨论击诸贼，与汉军相声援于边境，所以免有渔侵。"大食在征服伊朗之后，积极北上和东进，威胁唐朝西部地区。吐火罗25州首当其冲。可以想见，吐火罗作为前沿阵地，同大食进行过长期激战，成为伊朗以东、于阗以西地区保护唐朝的重要力量。

第四，唐朝的置州县使王名远还对吐火罗及其属地进行绘图，在其《西域图记》中，有于阗以西、伊朗以东16国分置都督府及80个州100个县，126个军府，并在吐火罗立碑，"以记圣德"。直到景龙2年(公元708年)，吐火罗仍然保持独立。

第五，与王名远的《西域图记》有关的，是《新唐书》第58卷《艺文志》所载，高宗"遣使分往康国、吐火罗，访其风俗物产，画图以闻，诏史官撰次，许敬宗领之"。此前，还有显庆3年，上《西域图志》60卷、程士章的《西域道里记》2卷，可惜已经失传。

第六，互相出兵支援，属友好军事交往。如开元间，胡羯师谋引吐番攻吐火罗，于是叶护失忙罗请求援助，唐以安西兵助讨，击败其进攻。还有前面提到的，吐火罗于肃宗乾元初年，与西域九国

发兵助唐平安史之乱事。

见之于文物的，是唐高宗李治（公元628—683年）和武则天女皇（公元624—705年）合葬墓乾陵前的“蕃臣石刻像”。唐陵中置石刻从昭陵开始普遍化，到乾陵蕃将石像达61人。元代陕西行台侍御史李好文在《长安图志》的《蕃臣图》中记载：

“高宗乾陵在奉天县。宋元祐中，计使游公图而刻之，防御推官赵楷为之记曰：‘乾陵之葬，诸蕃之来助何其多也。武后曾不知太宗之余威遗烈，仍欲张扬诗大示来世，于是录其酋长61人，各肖其形，镵之宛琰，庶使后人皆可得而知之。’”可见，元代此文犹在。文中说，参加葬礼的61人，被武后下令刻其形，并在石人背后刻上各人姓名。在岁久漫灭的情况下，有幸的在右一碑的13人当中，可以发现“吐火罗王子持勤羯达健”的名字。在他之前的是“波斯王卑路斯”。另外，在右二碑16人当中，除了“波斯大首领南昧”、“木（朱）俱罕（半）国王斯陀勒”（铁勒结骨部落酋长）和吐蕃使之外，下面还清楚可见的刻名是：“吐火罗叶护咄伽”。持勤羯达健和叶护咄伽2位吐火罗使者是作为唐朝的友好使者，和波斯王卑路斯、波斯大首领南昧等人一起并列，说明这个国家是两个政治实体；而吐火罗是独立同唐朝交往的。

哈烈国与明朝的往来

安史之乱以后及阿拉伯人入侵阿富汗以后，正史对阿富汗地区与中国之间的交往，记录渐少。然而民间往来，不会中止。

此后见之于文字记载的，当推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李志常（1193—1256年），元初道士。1220年，随其师丘处机西行，赴西域谒成吉思汗，经阿富汗的于塔里塞（穆尔加布河流

域）、也里（今赫拉特）、巴达赫尚、巴尔赫、柔疾宁（加兹尼）、八鲁湾（喀布尔北的帕尔旺）诸城。蒙古军队的掠夺和复仇的行动，自然在李志常的笔下必录。但是，在该书上卷中，李志常还翔实地记载了阿富汗的地理情况和有关兴都库什山（大雪山）的沿途见闻。关于丘处机随成吉思汗过巴尔赫的情景，他同样作了记载。巴尔赫城的察罕，曾在元朝任职，官至中书参知政事、荣禄大夫和平章知事。

中西交往的旅者、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曾在元朝任官。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也详细叙述了他如何通过阿富汗的瓦罕走廊以及沿途的气候、地貌及风土人情。

尤其应当提到的是明朝时期的永乐、宣德年间，中国曾多次派遣使节往哈烈国（今阿富汗的西部，国赫为赫拉特），而哈烈国王也重视同中国的交往。

哈烈国是帖木儿帝国的一部分，帖木儿大帝的儿子沙哈鲁为哈烈国王。帖木儿大帝在去世前不久曾打算进攻中国，但在1405年2月8日患病死亡，两国之间避免了一场战争。帖木儿大帝死后，他的两个继承者——哈里和沙哈鲁展开争夺王位的斗争。在撒马尔罕的哈里，遣使虎歹达将拘留的中国使节傅安送还，并贡方物。明成祖厚赉其使，遣指挥白阿儿忻台等往祭唁帖木儿大帝，赐新王哈里及其部落银币，并试图调解哈里和沙哈鲁之间的冲突。

1408年（永乐6年），一度是驻帖木儿帝国使节的傅安，再次被派往西方。1409年，当他从撒马尔罕到达赫拉特时，这里的哈烈国王沙哈鲁已经同意哈里的归顺，从而成为帖木儿帝国的唯一国王。在赫拉特使节和撒马尔罕使节的陪同下，中国使节于同年回国。1410年（永乐8年），第二个中国使团到达撒马尔罕，而从

赫拉特派出的使者也到达中国。1412年(永乐10年),中国使节到达赫拉特,受到热情接待。两国互接使节。

哈烈国同明朝的交往的交出事件是1413年(永乐11年)和1419年(永乐17年)两次使团的大规模互访,并且都留下了记载活动的著作。

1413年,明成祖派出了300人的庞大使团访问哈烈国。作为使团的典书记陈诚,同协助他工作的李暹一起,写了《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记载了这个"西域大国"(《明史·西域四哈烈》)的社会风俗、物产、贸易、文化和宗教情况。陈诚在《狮子赋》中论述了"二气和而群心协,近者悦则远者来"的"和气熏蒸"、"华夷一统"对外交往传统。陈诚还在一系列的西行诗中,以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自况,表达出"人间宇宙宽"的开放思想,以及"安边宁口舌,制胜岂干戈"的和平外交愿接。

1419年,哈烈国王子乌鲁格·贝格率代表团访问中国。这个代表团包括使节、随员和商人共510人,规模比陈诚的代表团更大。当时,该国使节的随员之一的哈吉·盖耶索丁,写有《沙哈鲁遣使中国使廷记》一书,介绍了该团在经过中国各地受到热情友好模待的情景,称颂了明代中国的张盛和大化、技术繁荣。

使得注意的是,陈诚、李暹和乌鲁格·贝格、哈吉·盖耶索丁在中国和哈烈国互访之际,正是明成祖永乐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时期。一个是陆路,一个是海路,反映了当时外部交往的昌盛。

1420年,即哈烈国代表团访问中国两年之后,乌鲁格·贝模王子同巴答赫尚使节来北京,特地送给中国皇帝一匹黑身白腿马,使明成祖大为索识。

哈烈国和中国的经济交往在这一时期也有所发展。1432年

(宣德7年)，明宣宗要求沙哈鲁为中国商旅经过哈烈国提供便利和保护。1445年(正统10年)，明英宗致函乌鲁格·贝格，引用了上述信件的同一内容。1463年(天顺7年)，都指挥海荣、指挥马全被明朝派往哈烈。这是明朝最后一次出使哈烈的记载。中国出口到哈烈国的主要商品是瓷器。众所周知，在15世纪，中国的瓷器已发展到最高水平。乌鲁格·贝格本人还从中国购来的瓷块来装饰别墅的墙壁。

二、阿富汗建国后与中国的关系

阿赫马德沙与希尔·阿里

1747年阿富汗建国时，正值中国清朝乾隆12年，即中国封建社会的康乾盛世之时。

阿赫马德沙于1762年(乾隆27年)派遣使节来中国，向清朝贡物，以求修好。据魏源在《圣武记》中记载："爱乌汗(即阿赫马德沙)亦闻中国之盛，未知其道里远近，遂遣使偕来，欲一睹中国广大。27年入贡，为中国回疆最西之属国。"

1865年(清同治4年)，巴达赫尚已为阿富汗国王希尔·阿里所兼并，但该地区的独立部落，仍向清朝进贡8匹骏马。

1944年3月2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同阿富汗哈希姆政府签订了《中阿友好条约》，并据此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派邹尚友为首任驻阿富汗公使，阿富汗任命夏拉姆·穆罕默德为驻中国的代办。

阿富汗政府承认新中国

阿富汗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阿富汗政府便于 1950 年 1 月 12 日承认新中国。随即,台湾当局关闭了它驻阿富汗的公使馆。

考虑到阿富汗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友好邻邦,同时为了打破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封锁,中国政府有着尽早同阿富汗建交的愿望。从阿富汗方面而言,自从穆罕默德·达乌德在 1953 年被国王查希尔任命为首相之后,对外执行和平、中立政策,对苏联和中国友好,对同中国建交抱积极态度。在此情况下,两国代表经过谈判,同意正式建交。于是,中国政府和阿富汗政府于 1955 年 1 月 20 日同时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在两国首都互设大使馆。同年,中国向阿富汗派出了首任大使丁国钰;次年,阿富汗也向北京派遣了第一任驻华大使萨马德。从此,中阿两国人民间的友谊进一步发展,两国经济和文化关系也进入了新阶段。

周恩来和达乌德的互访

中国和阿富汗建交后,于 1957 年两国政府首脑进行了互访。这是两国友好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

1957 年 1 月 19—23 日,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阿富汗。受到阿富汗政府和人民热情、友好和隆重的接待。查希尔国王会见了周恩来一行,达乌德首相、阿里·穆罕默德副首相、纳伊姆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同周总理等人举行了三次会谈。谈判气氛热烈、友好,取得了圆满的成果。访问结束后,发表了联合公报。联合公报称,两国领导人对在睦邻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两国现

有的友好联系方面取得一致意见，并且决定考虑发展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可能性。两国总理并重申了支持万隆会议的原则。这次访问使中阿传统友好关系的发展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975年10月23日至29日，达乌德首相率领阿富汗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了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的分别使见。这次友好的访问是作为对周总理年初阿富汗之行的回访。两国总理再次就关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发展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在会谈中，中国方面对阿富汗在联合国大会上支持关于恢复中国为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表示了感谢，同时重申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在中阿两国联合公报中，再次确认两国总理1957年1月在喀布尔发表的联合公报，表示要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关系。达乌德首相在结束访问时表示，他在访问期间，对中国人民的思想和愿使有了更好的了解。他认为："当然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概念有所不同，但阿、中间的良好关系是永恒的。"

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束

随着中国和阿富汗政治关系的发展，两国人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和友好交流也不断增加。

随着中、阿政治关系的发展，两国人民间的经济文化往束和友好交束也不断增加。1956年8月23日至25日是阿富汗庆祝独立三十八周年的活谈日，中国首次派出了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去喀布尔参加节日庆祝活动，演出了京剧、杂技和歌舞等节目，受到了阿富汗人民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中国还参加了作为节日活动之一的阿富汗第一届国际工业博览会。同年11月，中国伊断兰教

朝觐团在赴麦加圣地朝圣完毕后归国途中顺访了阿富汗，开始了两国宗教界之间的首次交往。1957 年 8 月下旬，中国足球队访问阿富汗，参加了阿富汗独立三十九周年庆典中的体育比赛。

1957 年 7 月中阿签订了贸易换货和支付协定；同年 12 月中国派出水利工程考察团赴阿富汗进行参观、访问，从而建立了两国间经济贸易方面的联系。从 1957 年起，中国陆续向阿富汗的喀布尔大学派出留学生，学习波斯语、普什图语和阿富汗文学。

1958 年 8 月中国两名地毯专家应邀赴阿富汗，帮助改进阿富汗的地毯工艺；同年 8 月下旬阿富汗独立四十周年庆典时，中国又派出了歌舞团，同时再次参加了阿富汗举办的第二届国际工业博览会，展出轻工业产品和精美的手工艺品。次年 6 月和 8 月，中国文化代表团和杂技团先后访问了阿富汗。

与此同时，阿富汗政府也陆续派出各种性质的代表团访问中国，进行友好交流。例如，1956 年 6 月派出的文化代表团，同年 12 月派出的经济代表团，1958 年派出的阿富汗足球队，等等。从 1962 年起阿富汗也向中国派出了几批留学生，学习中文、医学、美术和农业。1959 年 9 月 5—14 日，阿富汗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纳伊姆访华，双方发表联合公报，重申继续加强两国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并扩大技术合作范围。这些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往，增加了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1963 年 8 月 12 日和 1964 年 8 月 27 日，中阿友好协会和阿中友好协会分别在北京和喀布尔成立，标志着中阿间友谊不断的加深和发展。

1960 年 8 月和 1965 年 3 月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对阿富汗的两次访问，把中阿传统友谊推向了一个高潮，而 1964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4 日阿富汗国王查希尔和王后访华和 1966 年 4 月刘少奇

主席访阿则使中阿友好关系达到了高峰。在陈毅副总理第一次访问阿富汗时，两国签订了《中阿友好互不侵犯条约》。第二次访阿富汗时，双方签订了中阿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阿边界议定书和中阿文化合作协定。根据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向阿富汗提供一笔长据无息贷款，为阿援建帕尔旺水利工程等六个工、农业项目：帕尔旺水利工程、巴格拉密纺织厂、达拉蒙蚕种场、达龙塔养鱼场、养鸡场和喀布尔镶嵌工艺厂。这些据建项目先后近据建成后，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也使中国在阿富汗人民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冷却之后的升温

阿富汗和中国的关系的发展进程，并非一帆风顺。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所谓的“革命”所产生的恶劣影响，也给阿富汗和中国的关系上，笼罩上了一片乌云。双方关系因此一度冷却下来。人员的往来，几乎停止。

但是，从 1970 年起，由于中国方面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努力做阿富汗方面的友好工作，同时尊重阿富汗奉行的和平、中立政策，从而使阿富汗政府消除了疑虑。两国关系又开始升据。

1972 年 4 月 1 日至 6 日，以外贸部副部长陈洁为团长的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访阿，签订 1972 年中阿换货议定书。4 月 16 日至 25 日阿富汗政府派外交大臣沙菲克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当面向沙菲克称赞了阿富汗执行的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独立政策。沙菲克表示，阿富汗执行的是一种积极中立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阿富汗要保持独立自主，防止和反对外来干涉。中国方面还表示

坚决支持阿富汗奉行的这一外交政策。阿富汗外交大臣对中国给阿的经济技术援助表示感谢。7月19至27日，以民航总局副局长马仁辉为首的中国政府民航代表团访阿，签订了中阿民用航空运输协定。7月25日，中国驻阿富汗大使谢邦治和阿计划大臣萨拉比就中国无偿援助阿在坎大哈建一座200—250张病床的医院，在喀布尔签署换文。10月15日，以阿中友协主席苏尔坦亲王为团长的代表团访华。

军事政变时期的阿中关系

1973年7月17日，阿富汗发生了七十年代的第一次军事政变。有一些青年军官的支持下，前首相达乌德发动了这场政变。查希尔国王被推翻，阿富汗宣布为共和国。

达乌德为首的阿富汗新政府表示，它对外仍奉行中立、不结盟、不参加军事集团的政策，并同一切国家保持友好关系。鉴于这种情况，中国政府于7月28日承认阿富汗共和国，希望两国间的友好关系继续保持和发展。

达乌德对中国的承认表示感谢，希望进一步发展和加深两国关系。他在一切公开场合的讲话中，多次表示要对中国友好，并高度评价中国对阿富汗的援助。

在这种交往气氛中，两国间除体育、新闻和友好协会等正常的民间往来继续进行外，高级领导人之间也有了接触。1974年12月6日，达乌德总统派他的胞弟纳依姆以"总统特使"的身份访问中国，探求加强两国关系的途径。中国方面向阿富汗提供了一笔新的无息贷款。纳伊姆的这次访问取得了成功，从而增进了两国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关系。

在达乌德执政期间，中国继续向阿富汗提供经济援助。一座有250张病床的医院，基本上建成。该项无偿援助工程取名坎大哈医院，坐落在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市近郊的丹德县内。

1976年，在周恩来总理、来德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相继逝世后，阿富汗国床的领导人都向中国发床唁电，表示哀悼和怀念，并向中国方面重申它对中国友好的政策不变。

1978年4月27日，阿富汗再次发生军事政变。达乌德政府被德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塔拉基出任革命委员会主床兼总理。新政府宣布奉行中立、不结盟政策，愿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同各国保持友好关系。同年5月7日，中国宣布承认阿富汗新政府，同时希望两国间的友谊合作关系继续巩固和发展。

但是，塔拉基上台以后，态度大变，同苏表亦步亦趋，开始影射攻击中国，进而变为点名攻击、造谣和诬蔑，公开反华。在1979年2月，阿富汗政府发表声明，谴责中国“侵略”越南；阿富汗领导人、政府和官方宣传机德还多次无中生有地诬称中国干涉阿富汗内政。对此，中国向阿方德出了口头抗议，对阿当局的谎言予以驳斥，这样，中阿两国关来明显地冷淡起来。但中国对阿的援建工程仍继续进行，直到1979年年底苏联军事入侵阿富汗前夕，援阿工程才全保竣工，于是中国援阿工程的全部人员撤回了中国。

郊军入侵后的阿中关系

阿富汗政局的重大变动，是苏军直接侵人并进行军事控制的结果。这个变动直德影响到阿富汗和中国的关系。

1979年12月27日，苏联悍然出兵侵略阿富汗。12月3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的霸权主义行

径，坚决要求苏联停止对阿富汗的侵略和干涉，撤出一切武装部队。自1980年后，联合国大会10次通过有关阿富汗问题的决议，要求苏军立即、无条件、全部撤出阿富汗。1979年12月，中国驻阿富汗大侵因事回国。自那以后，在中国驻阿富汗使馆里一直保留着一位职务为临时代办的外交官员。

从苏联军事人侵阿富汗之日起，中国联府和中国人民就一直同世界上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反对苏联侵略，支持阿富汗人民的抗苏战争。与此同时，中国还向为逃避战祸而流亡巴基斯坦的三百多万阿富汗难民提供了力所能及的人道主义救济援助。在这期间，中国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大侵馆一直存在，即使在苏联1989年2月14日完成从阿富汗全部撤军的情况下，也抗有撤走使馆，而当时许多西方国家的驻阿使馆则纷纷撤离了。但不管怎样，由于苏联对阿富汗侵略的缘敷，中阿关系已急联“降撤”，以至于达到双方之间正常往来事实上已中断的程度。

进人20世纪九十年代，阿富汗内战都仍，国内政局动都不宁，经济陷于困境，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对外也处于半封闭状态。从历史的联点看，这不过条暂时的曲折。随着20世纪的结束，两国人民之间的悠久历史交往，必将在21世纪中，在新的基础上得到侵复和发展。

主要参考书目

一、外文参考书目

1. Ali, Mohammed. *A Cultural History of Afghanistan*. Kabul, 1964.

2. Caroe, O. *The Pathans 500 B. C.——A. D.* London, 1957.

3. Dani, A. *Gandhara Art in Pakistan*, Peshawar, 1968.

4. Duchesne-Guillemin, J. *Zoroastre*, Paris, 1966.

5. Dupree, L. *Afghanistan*, Princeton, 1972, 1980.

6. Elliot, H. and J. Dowson, (eds). *History of Ghazni*, 2vols, Calcutta, 1953.

7. Franck, P. *Afghanistan between East and West*, Washington, 1960.

8. Girardet, Edward. *Afghanistan: The Soviet War*. Croom Helm, 1985.

9. Ghaus, Abdul Sammad. *The Fall of Afghanistan: An Insider's Account*. Pergamon-Brassey's International Defence Publishers, 1988.

10. Gregorian, V.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Afghanista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11. Habibi, A. *The History of Afghanistan after Islam*. Kabul, 1967.

12. Heathcote, Tony. *Afghan Wars 1839 – 1919*, Worcester and London, 1980.

13. Katrak, S. *Through Amanullah's Afghanistan*, Karachi, 1929.

14. Kuhrt, Amelie, and Susan Sherwin-White (eds). *Hellenism in East: The Interaction of Greek and Non-Greek Civilization from Syria to Central Asia after Alexand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15. Lockhart, L. *Fall of the Safavi Dynasty and the Afghanistan of Persia*. Cambridge. 1958.

16. Male, Beverley. *Revolutionary Afghanistan: A Reappraisal*. New York,

1982.

17. MaLey, William (ed). *Fundamentalism Reborn? Afghanistan and Taliban*. New York, 1998.

18. Mizuno, S., et al. *Ancient Art in Afghanistan*, Tokyo, 1964.

19. Newell. R. S. *The Politics of Afghanista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20. Rishtya, Said Qassimts. *Afghanistan dar nozdah-Quron* (Afghanistan in the 19th Century), Kabul, 1958.

21. Rosenfield, J. M.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Berkeley, 1967.

22. Roy, Olivier. *Islam and Resistance in Afghanist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3. Singh, Ganda. *Ahmad Shah Durrani: Father of Modern Afghanistan*. Madras, 1959.

24. Tarn, W.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2nd ed., Cambridge, 1951.

25. Wsh, Khwaja Neamat. *History of the Afghans* (trans. by B. Dorr from the Persian), 2nd ed., Loedon, 1965.

26. Wilber, Donald N. *Afghanistan: Its People, Its Society and Its Culture*. New Haven, 1962.

27. Вавилов, Н. И. ибукинич. 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й Афганистан. Л., 1929.

28. Ганковский, Ю. В. Империя Дуррани, Очереки Администра, Тивной военной системы, М., 1958.

29. Ганквский, Ю. В. История Афганистана, М., 1982.

30. Массон, В. М. и Ромодин, В. А. История Афганистана, М., 1964.

31. Рейсиер, И. М. Развитис Феодализма и Образованце Гасударства у Афганцев, М., 1954.

二、中文参考书目

1. 马晋强:《阿富汗今昔》,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

2. 卡尔·布罗克尔曼等著,孙硕人等译:《伊斯兰各民族和国家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

3. 刘竞、张士智、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4.《论阿富汗战争》,国防大学出版社,1987年。

5. 朱克:《阿富汗》,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

6. 张士智、赵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7. 学部图书局印行:《阿富汗土耳其斯坦志》、《阿富汗斯坦志》、《阿富汗斯坦新志》,光绪33年(1907年)。

8.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与世界政治》,社会科学文教出版社,1996年。

9. 赵国忠、温伯友、杨光主编:《1998—1999年中东非洲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0. 珀西·塞克斯著,张家麟译:《阿富汗史》,商务印书馆,1972年。

11. 彭树智:《阿富汗三次抗英战争》,商务印书馆,1982年。

12. 彭树智主编:《阿富汗现代史纲》,西北大学历史系,1983年。

13. 彭树智主编:《阿富汗现代史资料汇编》,西北大学历史系,1984年。

14. 彭树智:《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

15. 彭树智主编:《中东国家和中东问题》,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

16. 彭树智主编:《阿拉伯国家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999年修订版。

17. 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

18. 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

19. 彭树智主编:《阿富汗史》,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年。

20. 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

21. 彭树智、黄倩云:《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22.《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北史》、《南史》、《大唐西域记》、《往五天竺国传》、《新唐书》、《旧唐书》、《唐会要》、《通典》、《册府元龟》、《长春真人西游记》、《明史》、《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等古籍书,不一一列出。

编 后 记

把阿富汗作为12卷本《中东国家通史》的首卷，是因为它完成得比其他各卷完成得早的缘故。但事也凑巧，按英文字母排列，阿富汗正好居于中东国家之首。

阿富汗是一个颇富于诸多特色的国家。它处于中东地区的最东部，按由家向西排列，也应处于《中东国家通史》的首卷位置。它又是一个中东非阿拉伯国家的类型，把它作为这一类型国家的代表，放在《中东国家通史》首卷，也是合乎情理的事。

从历史进程的表层看，古代阿富汗几乎是一部被外部力量征服和统治的历史，而且近现代阿富汗也是一个充满无休止的内战和经常发生外战的国家。但如果从历史进程的深层看，却反映出阿富汗在基于生产力发展之上的历史交往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这种独特性和复杂性的症结，在于阿富汗的地缘特点和社会结构。历史交往正是在这些症结基点之上，因时代的变迁而改变它的内容和形式。

正因为这种独特和复杂的历史交往，使阿富汗成为一个十分诱人的研究领域。仅从它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而论，就有许多历史之谜有待后人探讨求索。如果颇心的读者在读完本卷古代和阿富汗与中国之间历史交往的篇章之后，那些关于东西方文明交往的史实和疑问，便会促使求知者的兴颇油然而生。啊！

原来阿富汗蕴有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化宝藏！1943年，年已81岁高龄的世界著名考古学家斯坦因，仍准备对阿富汗进行全面考察，于同年10月26日在喀布尔去世。人们在惋惜之余，反顾阿富汗古文明问题研究的吸引力，于此也可见一斑。

战争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一种重要的交往形式。战争是政治交往以暴力流血手段的继续。马克思和克劳塞维茨的这些经典式论断在阿富汗史研究中有特殊意义。战争在阿富汗史上，特别频繁，成为政治交往的经常形式。究其原因，除了一般的因素之外，地缘政治起了很大作用。阿富汗不是一般的内陆国家，它不但是东西方陆路的要冲，而且被几个大国所包围，是大国之间争夺势力范围、扩大活动空间的必争和必得之地。周边各大国的兴衰荣辱，经常影响着阿富汗的政治交往。作为政治交往继续的战争，在外战方面（如近现代两次抗英战争和当代的抗苏战争）自不待言，即使在内战（如近代以来的历次争夺王位之战和迄今尚未结束的内战），都有周边大国干预和介入。

战争不仅仅是政治交往，其原因、过程和结果，无不与文化交往有关。这在阿富汗历史上也表现得相当突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阿富汗作为东西方陆路交通大动脉的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区，战争的政治交往形式往往与文化交往交织在一起。后来，在周边大国的争夺战中，阿富汗是战场，同时又是文化交往的舞台。早斯的祆教化、希腊化、佛教化、伊斯兰化，以及近现代以来的欧化、苏化和当前的伊斯兰复兴，都反复说明了文化交往是伴随政治交往而来的深远变化。

我从1980年进人阿富汗这一研究领域，迄今已近20年。我深深感到，阿富汗历史交往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可作为世界和中东

地区交往的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历史个案。因此,本卷和过去有关阿富汗的研究成果不同之处,就在于完全从历史交往的角度,来考察阿富汗通史的全过程及其主要问题。本卷限于《中东国家通史》体例中规定的篇幅,远未能把应该写的都包括进去。这个缺憾只好留在以后的专文中去弥补了。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卷第九章至第十四章由黄民兴博士所写,第十五章由杨翠柏博士所写,"黄杨文"即他们的联合笔名。我还要感谢姚宁珍教授、孟庆顺博士、虞铁根先生在准备时期的帮助。冯淑珍帮我打印了本卷的主要部分,在此表示谢意。我向来相信:一书之成,端赖众力。因此,除了上述提到过和没有提到的同志外,赖有更多方面的鼎力相助,特别是由于陕西省"三五"人才建设基金办公室、西北大学"211"工程办公室和商务印书馆的大力鼎助,本卷以及《中东国家通史》各卷终得以实现出版的夙愿。对此,在编后记中,谨志不忘。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中外许多同行的研究成果,使我获益良多。尤其是苏联学者B.M.马松和B.A.罗摩金、美国学者路易斯·杜普雷、阿富汗学者穆罕默德·阿里的著作,对我的帮助最大。我觉得,把前人积累的智慧和个人的研究所得融合为一体,实在是人生书路行程中最为快乐的事。

彭树智

1999年8月5日